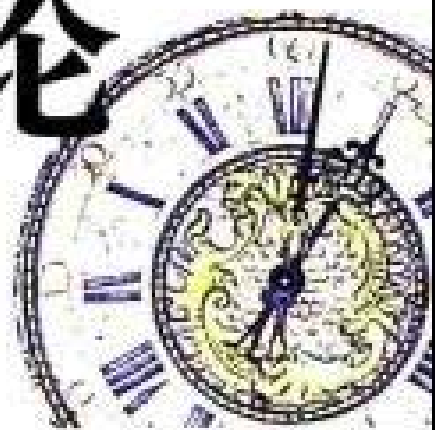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港台学人系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王尔敏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本书就中国近代思潮之涌动，推考展现于近代知识分子中之面面反应与理解。分别论及：醒觉意识，思潮动向，时代变局之认识，国际观念、商战观念，中国名称溯源，以至民族主义思潮。皆据广泛直接史料，建立各个思想观念轮廓，俾学者能够获致正确了解。 ■

ISBN 7-80149-842-9



9 787801 498427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842-9/K · 121
定价: 29.80元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港台学人系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著 者 / 王尔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65286768

项目经理 / 周 丽

责任编辑 / 贺照田 罗 琳 钟 人

责任校对 / 闫晓琦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5.25

字 数 / 375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49-842-9/K·121

定 价 / 29.8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王尔敏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港台学人系列)

ISBN 7-80149-842-9

I. 中… II. 王… III. 思想史-研究 中国-近代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591 号

大陆版自序

今日有幸将个人昔年研究著作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刊印问世，与国内学界同道有所相遇切磋，自是深感欣慰，引为荣宠。大致在十余年前，承北京中华书局，将拙著《淮军志》印出以飨国人，宗旨亦在于学术之广为流通，彼此大有进益。本人深信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既已出手问世，即为天下公有，并未抱定敝帚自珍之念。惟久承国内名家厚爱，于拙著揄扬有加，深感各界之礼重。学界先进若李侃、王戎笙、汤志钧、姜义华、夏东元、张宪文、张海鹏、王庆成、耿云志、刘德麟、陈东林、胡守为、陈胜彝、韦庆远、林庆元等，以及近年所结识顾卫民、易惠莉、忻平、熊月之、李景光、张海林、江沛多位具富厚学养者，相与诘谈中国近代重大问题，无不针芥契合，备见共识，实亦学术交流沟通之盛事。

鄙人自 1950 年起学习研治历史，得先师郭廷以先生亲教并属命我研究近代军事史，举凡早期所著之《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及《淮军志》二书，皆承郭夫子亲加指定论域，且亲为校订润色，吾敢大胆自承为军事史家，自信于清代之湘军、淮军、勇营、练军皆具史乘贡献。吾另一书《清季军事史论集》即包括以上所述问题。敬求学界先进指教。

吾于学术界所受同道共相肯定者，更在于多年所作近代思想史之著述。此亦吾追随先师郭夫子而以个人努力所开拓者，早启念于前期游艺子师门期间。无论出以勤奋努力或学问兴趣，生平

所研治应以治思想史投界心血最多。所撰论文在五十篇以上。不需多言，中国学界于我治思想史之肯定实久蒙同道青睐。近年相遇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承其特识，来函征求出版本书。一则感承贺先生厚爱，一则藉得与多数学者观摩切磋。吾固当视为一个请教良机。

吾为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重在此一时代人物共趋之意识观念，乃是原于外来冲击，以致产生反省与醒觉。其立即之实质意义，俱启动于因应时代困局，实即强大外敌侵略压力，政治外交经济制度面临崩解之危困，有待改革加强，自全出以拯民之贫救国之弱之识觉反应。实可由此测知中国民族之智慧能力，所当于世势巨变之强大冲击，表现其自觉自救之警醒因应。

吾之研究近代思想史，乃注重于一般时代创生观念，尤切于国人思想之广度与全面性，任一思想观念，于前史任一时代构成国人共识。举例而言，若西学源出中国说、中体西用论、托古改制论、贵因论、中西调和思想、商战、实业、招商、不缠足、以夷制夷、治外法权、幼童出洋、格致、西学、新学、不平等条约、文明排外、变法、立宪、议院、开明专制、强人领袖，而其一代思想中心主流，则可以富强二字概括。甚至文学改良、国语运动，亦俱为富强而来，实本之于救亡观念，危机意识，而出以唤醒民众以图警告国人之奋起抗敌自救危亡。盖近代思想主流动向，全面归趋，自定命之为富强运动。吾生平努力于近代思想研究，重点即在于澄清此诸类观念之内涵意识，固深信其代表此一重大时代。吾之思想史论著，自以解析各个思想观念之创生形成为目标。尤重在于观念之创生的年代，“商战”一观念之创生于1862年，即为鄙人考订而得，当可自本书查知。

此一时代思想先驱人物，百余年中无虑三百余家，吾为时代思想内涵而用心，则所研究，一向着意于思想观念，以此为中心宗旨。惟亦未尝薄视个别之思想家，其中每每列重点而讨论者，

若先驱人物研究王韬者不下四篇，研究孙中山者达十余篇、郑观应者二篇，其外若姚莹、郑复光、薛福成、张謇、张之洞者各一篇。惟相关于特出之主张思想者，虽未以人物为主，而其内涵则专括纳于一二人者，若言商战必集中于郑观应、汪康年等人，言公仆必集中于严复、孙中山，言德智体，智仁勇，必集中于严复、张之洞；言开明专制必集中于严复、梁启超，言主权在民者，必集中于孙中山。各样专论俱能突出其人物表率。总而言之，吾虽以研究时代思想观念为致力重心，实亦并未忽略此时代中之思想先驱人物。就全时代人物之风起云涌，吾自信生平用心网罗数百位之多。凡能力所及，一定表暴于世，但不敢谓其全无遗漏。在此必申明其中若干重要者尚未表出，若沈毓桂、蔡尔康、刘光蕘、李春生，实早留心多年，却尚未能写人拙著，深感遗憾。

综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时代反应与所表达之救国思想，俱能见其智虑超卓，思辩精审，充分可信其高明之识断。早在鸦片战后，1844至1847年，林则徐与魏源已提出其因应世局之定见，是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语用于今世，愈见其光照全局。国人可永世奉为圭臬。由此例以观，则中国代有才人，其智慧超卓可期，自亦富强可达，复兴有望。

此书得以刊行国内，就教于当世贤达。特须感谢几位热心学者，三年前首创其议者为贺照田先生，又因缘黄克武教授、张寿安教授推毂引介，使拙著荣列于学术思想参考之林。余自深感荣幸，亦感念三位学者之厚爱。在此特申感谢。至于全书内容、观点，俱出于诚笃之钻研，当自负全责。同道批评指正，尤所欢迎。

王尔敏手记

二十世纪之尾年（2000年）季夏七月十二日

写于多伦多市之柳谷草堂

叙 录

自从1969年印行一种论集：《晚清政治思想史论》，随后终觉尚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继续努力，从事钻研，可以逐渐使近代思想史显现一些粗略的轮廓。接着7年时间，又写了十余篇思想史论文，多半是大篇幅，现将先完成的九篇集成这本书，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则是急需补充前一书所未解决的问题。二则是负责地呈献我在近代思想史方面一点耕耘的成果。

20多年来，可以说我是从事近代思想史研究，并留心历代思想变迁。虽然已著文不少，但仍以开路小工自视。一来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原是在开辟荒芜阶段，还没有形成全面建树的基础。二来我个人不敢自登堂奥，一直盼望有更精密博大的近代思想史家出现，利用前人个别问题的研究，而建立起完整体系。起初我是迫于研究近代史的需要，而先从事思想史探讨，结果被牵引半生，难能罢手。终于不敢写出一部近代思想史。自叹才资不及，学养不足，尚不能拟具近代思想全局结构，只有再拖延若干岁月，或竟期待后贤的完成。中国史家优良传统，在尽学者天职，其生平勤恳撰述记注，无非为守先待后的想望，使一旦有贤哲出现，而取来用为著作的资材。这是我研究近代思想一个基本的并且稳健的计虑宗旨。

我个人研讨近代思想史的态度，基本上原由于急切需要了解。因此是非常盼望快速地发掘与解决各项个别问题。这在最近六七年来，略有较满意的成绩。除了我个人撰写十余篇论文之

外，同道学者陆宝千先生曾探讨了近代公羊学及清代经世思想等重大问题，他已撰思想史论文不少，亦在计划出版论集。吕实强先生曾探讨了近代思想先驱冯桂芬，以及争议关键近代儒家与维新思想问题。此外尚有其他同道朋友处理 19 及 20 世纪各项思想问题，并有不少新作问世，不及一一引述。由于在这期间我曾指导一些研究生撰写硕士论文，我的门人王文发完成了《中国近代的墨学复兴》，许弘义完成了《国学保存会研究》，萧人英完成了《谭嗣同的生平与思想》，江勇振完成了《张君勱思想评述》，陈炯彰完成了《近代农业改良思想》。虽然距离目标尚远，但对于准备后人来撰写综合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确是加快实现的可能。我个人力量不够，我的许多同道朋友和学生却同样尽了推动的努力。我愿近代思想史研究，可在一个短时期内留下来重大的贡献。目前我自然仍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在史家守先待后的职责上言，我无愧于后世中国学术。出版这本书，也正是一点小小的告成。当世贤豪，能者尚多，凡致力近代思想史研究，如非冒滥剽窃，都要尊敬为同道，尤深望其指示教正。至一时代共同之贡献，凡有所知，亦必心仪而崇敬之。

在此再略为声明一点我个人探讨近代思想史的用心之处。我所注意把握追寻者，在于一个观念创生的契机。往往一些粗浅的创意，却能构成思想的先驱。无论它合理与否，是否荒谬，却均值得追究。大凡思想的创意，起初多半是粗略宽泛而具有新意境。它的特色在表现多样矛盾、杂驳而富有包容性，尤其具有潜在发展趋势。嗣后的发展延续，多恃深密思考的学者继承，可以笃信而专致地加以系统化，终于建立一套体系。至再延续伸展，则不免自然形成分流，是即所谓思想流派。

然而近代中国思想，其所表现五光十色，令人目炫者，不但流派分歧，而尤显示创新观念的活泼勃发，此起彼落，同样是莽如乱丝，极费考察。当此一代思想敏觉的知识分子，凭其智慧信

心与责任感，往往事先发现并指出时代病征或疑点，虽然仍是反映时代心声，但在警悟性而言，可以说提出超时代的思想方向。这种超越时代的敏觉以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思潮，正是我做研究所要发掘和探讨的。

同样的用心之点，我也如同一般常识的了解，对于思想发展的时代高潮也十分留意，决不会轻轻放过，只是一般常识或许略知时代思潮爆发的热闹，而却完全不知道它创始的契机。我对于这些，自然都看成史家的重大责任，对于前人后世，这都是严肃的学术使命。举一个简明的例：全盘西化论在1898年为创生的起始，在1930年代是爆发高潮的顶点，两者各代表不同的意义。一般常识或许会知道1930年代那回子事，思想史家就必须原原本本前后探讨清楚。如果你使问题澄清，后来诈伪之徒的抄袭旧套，即使大声疾呼，鼓吹提倡，你也会清楚看出这只是欺世盗名的伎俩。治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责任，就是澄清一个时代一切思想理念的意义，追究各个理念的根源与其时代的关联性，以及评估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

至于在一个时代众多人物中选择其代表性者，自应着重在思想观念的时代意义。无论为保守为激进，为复古为维新，为传统为西化，五光十色的诸般主张，要点重在代表真实的时代心声，反映一时代真实的意念想像。但就选择而言，实须依恃深厚的历史知识，须真能熟习一时代重大史事关节。因为资料之庞杂，所呈现的陈腔滥调，拾人牙慧，投时髦风气，夸诈欺世种种言论，一概混迹其间，必须耐心选择，判断取舍。像这样连篇累牍的资料，如经审慎鉴别，可能等于一无用处。而审慎鉴别的学识能力，自然必须长期培养历练，因此使我不敢不努力向学，以求一日之长，尤其感觉没有满足的时候。

思想史是现在史学家不可缺少的知识，甚至也构成某些史家所不可缺的研究论题。我个人经验，是为解释近代史的需要而从

事近代思想史研究。先是为自己，后是为他人，说得更光朗一点，也是为后世学术。思想史较哲学史之体系完密当是大为逊色，但是范围宽阔，包罗深广，重点尤在思想与人生社会种种活动之直接关系。同时也较所谓伦理学宽广，不止要探讨伦理思想，而同时还要涉及人群精神状态全部。合理的思想，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固然要探讨，而一般心理反应，意趣风尚，以至习性感染，也同样要加以探讨。甚至于往往不合理的情绪冲动，对于历史变化，会更具重大影响。这如何可以忽略不谈。基本关键，史学家治思想史与思想家的讨论批判思想有相当不同，虽然两者同样讨论思想，无论立场、方法、目的均不相同。大致说，思想家在批判与辨析概念之是非、正误、真伪，以至精确的定义。而史学家的研究，则多注重它们的性质，时代意义，以至影响的范围。

我个人研习思想史，另一个副目的也是在教育自己，锻炼超然的观察能力，历练缜密的辨析问题的习性。同时也可以培养追逐抽象思路的耐心。从过去经验中的受益，使我领悟到思想之泉愈发愈旺，可以长用不竭。所见问题愈多，解决的意愿愈强，而承担的学术使命感也愈觉重大。我个人终于不能不抱一点负责任的野心，那就是要与同道师友们把近代中国思想先作一个初步的全面发掘与澄清，以便后世贤哲用为著作的资材。

对于出版这本论集，可以再声明一点个人的自私意愿，那就是到明年我就是50岁，一则作一个学识修养的回顾，一则顺便作一个纪念。我的学问得自师友的熏陶很多，十多年前（1964年冬）我在英国时写下两句话：“一个学者最大的幸运是：有师友砥砺，无人事纷扰。”我正可以自认是这样的幸运者。看看司马迁的悲慨，刘知几的愤叹，我觉得我的同道师友真多。在此需要感谢先师郭廷以（量宇）先生，以及在思想史方面受益最多的刘殿爵先生，刘广京先生和郭颖颐先生，并感谢我曾多次请益而

深获谈慧的杨联陞先生和饶宗颐先生。

此外我必须郑重向台大医院眼科主任张荣茂教授表示万分感谢之意。他先在 1966 年医治好我的眼疾视网膜剥离症，又在 1970 年医治好我的眼疾玻璃体破裂出血症。到今还能阅读图书，撰写论著，全然是承受张教授小心维护的恩惠。

本书多承好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的悉心筹划，并承学长汪中先生题署，在此一并深致感谢。

最后要表达我一点思亲之情，就是在外流浪近三十年，没有得一天机会孝敬母亲和照顾诸妹弟，在人伦上是一大缺憾，永世难赎的罪疚。家母七三高龄，思念游子更切，暮年孤寂，更不堪其凄苦。这真是人生中一大悲剧，令人不敢回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之晚六时

目 录

叙 录	1
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 新观念	1
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	80
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	140
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177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198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	323
“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	370
附表：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汇录	387
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	401
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	433
征引书目	453
本书作者所著其他有关思想史论文目录	469

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 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

近代中西接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联键。自鸦片战争起，中西接触频繁，西方器物知识大量输入。中国朝野人士所见所闻，为亘古以来所未曾经验。中国人凭藉历代累积之知识能力，与新入群、新事物、新体制接触，往往不免产生许多误解，但也未尝没有直觉的偶合与推理的解悟，并逐渐达到洞悉真象的程度。统观近代中国历史，诚然表现着中西冲突的纷乘。战争与交涉，仇视与疑惧，复杂的历史事件，足以耗竭历史家费力的分析描绘。但是在思想层面，也在同时期各个不同发展段落，遗留下丰富的果实。

自 1840~1900 年的 60 年间，是酝酿近代思想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发展段落。这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会、萌芽、蜕变的过程。思想的创发，有加速趋势，也就是说一直维持着扩张的动力。思想的内容，多样而驳杂，不免被后人视为幼稚浅薄，但它确代表这一时代人真诚的理念与想像。在此 60 年间，中国人对中西关系之反应随时代进展而有四个阶段可寻。每一段落思潮之涌现，皆为当时历史发展之结果，亦皆具有开辟新方向的意义。此四段落为：①1840~1860 年；②1860~1880 年；③1880~1895 年；④1895~1900 年。各个段落，都有新观念出现，其历史意义与其对下一阶段中国思想演变之影响，皆极深巨。

中国人在这60年间的对外态度，由于各时期中外关系的变化很多，再加上每人理解的深度不同，因此在同一时代的对外态度仍显现矛盾和繁复的情势。笼统的归纳大概性质，约可分为非理性的与理性的两种态度。非理性方面所表现的是先入之见的排斥，对新事物歧视、厌恶与诅咒。即勉强被动的适应，因客观形势的需要而被迫正视现实，也并无创造性之反应，真正态度改变甚为缓慢。在理性方面则不乏创造性之反应，先经主观的体会与选择，再益以推理与联想，虽常不免曲解，但有时亦竟达成真实的领悟。具有理性之官绅并主张折衷与调和，使固有知识与新观念融合一致。而同时更有人散慕西方新知，主动吸收并予传布。这60年间的思想变化，究竟是中国社会中哪一群人为主体？无疑地可以确定说：是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士大夫^①。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这个主体就逐渐改变。

19世纪中国士大夫之认识西方，先后表现三种不同程度，虽然有时间的先后差别，而在事实上仍然共同存在，平行发展。第一是因中西接触而生之认识与感想，无论为正确为错误，只是一种初步的反应。第二是中国官绅在面对因有中西关系而产生之问题时所衍生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显然是近代中国独有的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尽同于西方近代。第三是移植西方固有观念，以吸收为中国人自己思想的重要成分。这三种程度，就各别分量比重而言，有显著的时间差别，却并不是前后连接形式，而是三者平行发展，由时代的推进，可以看出消长的趋势。

本章讨论中国官绅对中西关系之态度，乃依照各种新概念衍生之先后次序以及新概念之内容，划分段落，加以分析。虽然各种新观念在中国士大夫中普遍接受之程度，目前史家一时尚未能作准确之“量”之估计，但著者认为即“质”之分析，对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已可有其贡献。

一 初步认识与反应 (1840~1860)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传统，足以影响士大夫对外之基本态度。其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其二是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这两种传统均有深远的背景。历代累积的经验，造成中国人素来具有一切自足，无待外求之心理。此种心理之背景，简单说来是：①自商周以来政治文化的创造发展，一直维持一个中国中心的形式，即遭外族武力扰乱或征服，惟因外族之迅速汉化或崩溃，王朝之观念并未改变。②中国从历代经验了解到天朝对外武力扩张的害处，即在汉唐两代，士大夫亦常会有消耗国力民力的警言。③在经济上中国素不希求外国商品，人民日用所需，可以完全自足。因此种种客观情形，中国对外态度，乃不求积极主动了解域外情形，而对域外来华之人，尤其是商人，既不完全摈拒，亦仅应付容忍而已。通商虽然彼此有利而政府并不重视。此种对外态度，形成一种消极的策略，就是所谓“羁縻不绝”。中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自然蒙蔽了对外的真实了解，而对外羁縻的策略，亦实不足称为真正的外交政策。基于此种悠长的背景，中国在适应中西接触的初始阶段，自然不免产生许多误解和盲目的政策。就常识所了解的事实，英国于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与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Lord Amherst）先后来华，中国方面并未认真了解英国国力与国情，仅仅单方面重视朝贡制度下礼仪细节的要求，迫使对方就我范围，终至失去两次沟通双方正常关系的机会。因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与西洋虽勉强维持在广州之商业接触，但整个说来，中国之国策乃不免自我镕蔽。

中国对域外了解，第一步骤当自接触来往开始。而在初期若干人的主张见解，则是尽量避免中西间非商业性的来往关系，仍然保持深闭固拒的态度。此种态度，即在鸦片战争行将结束双方

议和之际，以至平时中外交际之时，仍然存在，足见其根基之深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842年8月17日）耆英在主持议定和约，说他要亲见英人，道光皇帝则批示他以不见面为好^②。日后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846年5月8日）赛尚阿所提出的对外办法，是预绝其求见之路，也是彻底断绝接触的政策^③。很显然，这一种隔绝中外的主张，必定构成对外认识的障碍。这种观念之存在于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与重要官吏间，自然会具有强大的效力，阻滞中西关系之演进。

但是清廷的隔绝意愿，不能阻止西方的冲击。中国门户被动地逐渐打开，承受对外来往。五口通商并许传教，自然在表明这种事实。但是既有中外接触，自亦不免产生初步的误解。先自外人状貌面言，欧美人士显与华人有别，皙肤、赤发、碧眼、深目、高鼻、虬髯等等，与衣着紧身，躯干挺拔，均易引起许多奇异的印象与误解。这在鸦片战争前后保留下不少类似的记载。汪仲洋有诗咏其所见，以为英国人是鹰嘴猫眼，红色须发，腿长，只能挺立，不能超越腾跑；眼睛绿色，畏惧日光，在正午时不敢睁眼^④。裕谦则数次明白形容英人是腰硬腿直，可以一击便倒^⑤。但在反方面冷静观察，据情理推断，也颇有人驳斥这些错误的印象。萧令裕据所亲见，洋人登山涉水，十分矫捷，用而举实反证。包世臣则据情理推断，英人本来生长陆地，当不信传说所谓西人一登岸上即无所能为的印象。^⑥

19世纪中西关系，原始起于通商，在华所习见，则洋人所需中国货物以丝品、茶叶、大黄为大宗。中国官绅从肤表了解，竟转折推出一些荒谬理论。再加彼此传告解说，无不信为真实。外人贩运茶叶、大黄，是一显著事实。两物为外人所需，当是情理所必知。但若因外人需用之物，即进一步判断为关系洋人性命，其推理自不免流于荒谬。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官绅与民间大多确信茶叶大黄系英人必需之物，一经断绝，即有瞽目塞肠之

患。当时有此言论传于后世者当不下 20 人之多，足以显示其代表意义^①。不过在众情一致之外，同时代中尚有清醒人士，立言驳斥这种误解。例如黄恩彤与魏源认为洋人需茶，在嗜好品味，实无关于生存问题^②。

对外误解，自然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在中国思想转变时代，足以阻碍创造性的对外反应。不过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官绅士庶的反应检讨，并非完全麻木停滞。事实上，国人对外之认识，当时曾有若干程度的醒觉，并有具体可见的进展，中国初期对外反应的主体，包括两种显著的态势。先是向外对现实世界的求知，也可以说是寻求应付外人的手段。最终则引起国人因中西比较而有内向之反省。然而向内反省与对域外知识的探求，实为同一行动的内外两面，两者紧紧互相关联。凡经对外接触，知能的取得与内心的感悟，往往同时发生。

鸦片战争之刺激引起中国士大夫间两种知识方面发展的动向。第一是对于西方兵船火器的认识，以及基此认识进而追寻机械火器知识。另一个则是对于异国人物风土的接触，以及由此而增长域外地理知识的探讨。

中国官绅对外洋兵船火器的认识，可见于一时盛行的“船坚炮利”之说。在现有的文件资料中，可以确知，有 66 人具备这种观点，包括道光皇帝在内，全部为高级官吏和一些著名的绅士^③。由于对西方如此认识，遂产生国人自身的反省与要求。一种强烈的动机，趋向于火器机械学的研究与发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1843 年 1 月），魏源完成《海国图志》初稿 50 卷，其中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火器局，并雇法美两国工师，带西洋工匠前来制造，并教习驾船演炮；同时又建议科举项目增加水师科，能造轮船枪炮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轮船施放枪炮者为行伍出身。而水师将官均必须由此途升转。这当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早的先驱意见。^④至在同时代所重新刊印的传统兵械火器著作

不计算在内，其一般研讨西洋火器及自创新法者，包括造枪炮者7种，其作者有丁拱辰、龚振麟（二种）、汪仲洋、梁章钜（二种）、西拉本等。造地雷、水雷、炸弹者6种，其作者有黄冕（二种）、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高邦哲等。造炮台者二种，其作者为黄冕、叶世槐等。造火药者二种，其作者为丁守存、陈阶平等。讨论一般火器攻防者5种，其作者有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祁元辅等。共计达22种。^①这些成书，大部分完成于1840~1850年之间，最晚亦在1860年以前。无论价值如何，却表现了中国官绅对于西方器物主动研讨和真诚接受的意愿。至于观察西方火轮船而记录介绍者亦在10人以上。其详细解说而著成书者则有郑复光所著的《火轮船图说》^②。这些显然都是因为西方器物的直接启发，而开始引起内向之要求，即应改变中国原有之军事技术，由中国人自制西式船炮。

再次就域外地理知识的探究而言。表面上是向外方考察未知的西方世界，乃至更宽广的地球知识。而对积极需要来说，则是充实本身的见识能力，是进一步求知的动力。换言之，此时中国有少数官绅已存蓄一种积极的启念，是要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其所形成的客观因素：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敌人乃来自西欧。此敌人之情况究竟如何？欧洲是何等地方？当急于求正确解答。在这种动力驱使之下，遂形成同时代世界地理学研究的潮流。

中国固有史志，记载欧洲事物甚少。尤其是当世欧洲列强，纪录更缺。较早的世界地理知识，多出于耶稣会士之手，亦仅有三种图说。而1840年代以前，中国人自著较为可靠的参考书，仅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成书），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806年成书）和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成书）。林则徐曾经很清楚地在1839年参考《海录》，用以了解英国国情^③。但是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官绅逐渐注意到外国地志的研究。从事探讨，著为文字图说，介绍国内，前后著成之书，至1861年以

前，至少有 20 种^①。最著名者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姚莹的《康輶纪行》。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每人都表示其严肃求知的立场和启迪国人的苦心。魏源自述著作动机，主要在充分了解洋人情况。无论用于作战，用于议和，他的中心理论，均在于学习洋人优长，再用来制服洋人。因此《海国图志》内容，不但记载各国地理，同时并把西洋造船制炮方法，尽量收入。但就外国地理知识而言，他认为中国凡有血气有耳目心智的人，都应该讲究。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较为简明，虽不如《海国图志》繁富，但更具系统。徐氏因在福州主持通商而兼从事著作，利用 5 年时间，著作此书，没有一天间断。至于姚莹所说，他的著书动机在饮恨忍愤，从事撰作，期望使中国老幼均能习见熟知，认识各国情势。最后以图雪中国耻辱，重边塞海防，免使国家沦亡于异族。^②这种研讨域外地理的风气与成就，实充分代表中国人因外来的刺激而内求诸己的反省；同时也正是中国人转变观念最有效的基础。

统观在 1840~1860 年间，中国人表现在火器机械与轮船的考究以及对域外知识的追求，虽仅表现于个人著述，亦尚未由政府提倡或依之采取行动，但少数中国官绅反省觉悟与转变态度之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适应，当是起于现实而急切的具体需要。很显然，外洋通商传教，以及各种交涉皆促成中西之间日益加多加密的接触，中国人必须面对挑战，拿出具体的应付办法。闭关是无法做到，应采取之对策，有见识而热衷的官绅不能不深长思之。至于此一时期中设想而出的对策，无论内容品质如何，有效无效，皆足以表达当时中国官绅的态度与判断能力，并可表示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初相逢时国人最初之反应。

自鸦片战争起，夷务变为一项中国重要的政事。“夷务”是当时朝野人士普遍的称词，其共喻的意义，就是指对外国的交涉

来往。中国官绅面对日见重要的夷务，不能袖手不问，应付的对策就自然一一展现出来。夷务的对象既是夷人，于是种种制夷的方术就被提出来讨论。在1840~1860年间，提出制夷的方法最重要者有三种，可以分别一一研讨。

①用民制夷。“用民制夷”一词，曾确定的为徐广缙和胜保先后提出来^⑧。但讨论此项政策者却相当多，而且影响普遍深远。其实际意图，是利用民众的反对声势，以对付在华外人。最初用于通商口岸，嗣后渐及于内地传教，结果往往造成严重的事件。“用民制夷”的观念，反映中国士大夫两种基本想法。其一是基于一般对民情的外表印象。中国官方普遍地相信洋人畏惧百姓，因此主张利用民情，制服夷人^⑨。其二是对于民情确有相当认识与把握。即相信民心巩固，群情容易煽动，可以利用于对付洋人^⑩。官绅之间常常存有“民情可用”的想像。

②用商制夷。近代中西关系的建立，始于通商。中国为地主之国。传统朝贡制度之下，外交与通商常混为一谈，不但如此，传统天朝根本不承认有“外交”之事，对西洋之关系乃视为夷务范畴。夷务其实又不过是通商的别称而已。所以当时中国官绅就自然沿用“通商”的办法来应付外交事件。他们对待远来贸易的商人。很早就懂得使用停市的办法，用以制服洋商。但中国本身原无意于彻底排拒，这种最后手段，并非时常使用，也仅于重大争执时，偶尔运用而已。此项政策，则为徐广缙、叶名琛惯常使用。“用商以制夷”一词，即出于二人的官方文书^⑪。徐、叶可谓用商制夷的重要代表。

当时人用商制夷的政策，其基本假定即相信洋人非与中国贸易不可。因此只要在贸易关键上限制洋人，便可使之就范。^⑫其实用商制夷政策，本身利弊很难臆论，近代世界主权国家间采用商业抵制政策，乃常有之事。但就中国自古贸易传统言，用商制夷并不以闭关抵制为手段，实以开放交易为手段。所谓用商制

夷，乃在以商利投外人所欲，以免武力争战。此亦朝贡制度下常行之事。鸦片战后，五口开关起始，中国官绅亦有此思想。耆英所主张“因势利导，一视同仁”的政策，即为开放商利的最佳例证。此一方式之以商制夷政策，实当时清廷处理夷务最重要策略之一。^②

③以夷制夷。中国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已经在沿承一个重要的国际理想。就是“天子守在四夷”的观念。其意义是：中国的防卫线是建筑在四邻外邦的安全上。又有一个实际上活动频繁的列国盟会，沟通各邦来往。这些观念和习惯的联带发展，当很容易引申出以夷制夷观念。^③自西汉中国通使西域起，无论策士言论，或国家对外的实际设施，均颇重视以夷制夷政策。降至鸦片战争时期，这一观念又被重新提出。战争期中，阮元曾建议利用美国制英国，但伊里布立即谨慎地批驳，不予采纳。林则徐亦主张允各国商人在华通商以制服英人。战后检讨，魏源主张联俄国自陆上威胁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及尼泊尔，且联合法、美，自海上助攻英国。惟在耆英主持两广外交期间，则反对采用此一观念。他的意见依据两个重要理由：其一，他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以夷制夷，必须先有能力制外夷，而后才可以收为己用。此时美法二国，远隔重洋，中国实无力控制。其二，若一旦借美法之兵助攻英国，既不能保证必胜，而一旦战胜，实又多出更难控制的外夷。^④

至于当时所谓“以夷制夷”的实际意义，其实并未深涉到遥远的欧洲、美洲，而中国官绅也并无如此远大雄心，一般观念仅以来华的英、美、法三国官商为对象。用中国的商业利益，使各国相制相敌，甚至于相战。然此政策的基础，乃必归趋于中国商利的全面开放。此与1870年以后李鸿章、张之洞所主张之“以夷制夷”政策并非尽同。

统观19世纪中期，中国官绅承受西方所加的冲击，并被迫

采取应变的对策。虽有“用民制夷”、“用商制夷”以及“以夷制夷”几个方式，实则彼此比重并不相同，后日影响深远广泛者，仍为“以夷制夷”观念。

这里尚须略一论及对外主战派之思想。在战争中的言论，无论如何激烈，并不具备代表性。然在鸦片战后与平时，中国官绅之间，一直仍有不少人主张对洋人作战。其所筹议方案，布防活动，固不免浅薄幼稚，并无取胜把握。然此类言论，具有相当持续的影响，在晚清多次对外战争前后，均并产生不少主战言论。其所形成因素，当甚复杂。约略可以追寻者，至少可有三点：其一，天朝尊严的维持。其二，战败耻辱之激愤。其三，光复固有权威尊荣之想望。大致而言，此类所谓主战思想，基于感情用事，只反应一种心理状态，并不足以和由理性思考而创发之观念相提并论。

进一步在中西接触的初期阶段，实易看出中国官绅是否对于其所处的时代有正确认识，以及基于何种知识能力而达成对于当前世局的了解。就此时代言，中西间既已展开频繁的来往，少数敏锐的中国官绅，依据直观的警觉，已开始认识到一个新局而的开始。他们用固有知识来考察判断，并自传统思想中找出它的命义。这就是当时人形容的所谓“运会”。“运会”正确的意义，就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自然势力，在不可预期的机会中到临，并由此带来天地人群事物等等巨大转变。中国官绅向来都相信这个新世局是命运使然，而称之为“天数”或“气数”。当时有两位研究域外地理的学者，魏源和徐继畲，提出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表示，中西间的交往关系，正是一个新的运会的开始^⑧。此时中国官绅，已推断出巨大的世变将会不可避免地要降临到中国。然则他们依据何种知识而研判出如此结论？事实上毫无疑义，他们并不是胡乱猜测，而是本着传统的宇宙观作推理的解释。在中国传统知识中，有几套假设的理论系统，数千年来为中国人判断自然

人物一切活动的法则。有八卦方位的理论，五行运转的理论，过去这些理论常用为朝代更替之解释，而此时正可作为解释中西关系新局面之工具。他们就八卦方位理论，而相信天地之气是由西北起始，逐渐向东南运转；换言之，是由西欧起始而通向中国。因为八卦的运行起始于“乾”，而“乾”的部位是在西北，所以推断当前的运会是由欧洲而渐次到达中国。此外他们就五行性质理论，相信西方属金，遂并信西方人士特性属“金”，故而擅长金木之工与机械巧思，能利用器物，创造发明，并以此种特长向中国输入机械技巧知识。这种推理，当然非西方人士所能梦见，但自此以后，中国学者依据这种传统理论来认识这个新世界者，实不在少数。^②

二 西力冲击下衍生之新观念（1860～1880）

1861年以后，中国本身急剧发展不少新创的概念，足以代表当时人对于世局理念的趋向。这些新生的观念，并不是由传统思想沿承下来，而是在西方势力与知能冲击之下产生的反应。虽然如此，这些观念也并不不同于西方思想。中国与西方之接触只是启导的重要动因，而非惟一之动因。

近代中国一切新观念的创发，大体以时代的醒觉为基础，由于能认清世变的严重，而后才会设想适应世变的方法。中国人对于中国所处地位“变局”的发现，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中国先知先觉之士议论中一项重要前提。这些人的共同认识，以为中国正而面临数千年来一个巨大的变局，在中国历史上，将产生一个从所未见的创新机运。就现有资料计算，自1861～1900年间，申述当前变局之意旨者不下37人。最早黄恩彤认为道光年间中国已面临数百年来大变局。同治年间，丁日昌认为中西接触之扩大是千载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认为西人之东来侵略是三千年大变

局，王韬认为是四千年来大变局。光绪年间，曾纪泽认为是五千年来大变局，而张之洞亦认为是中国自上古以迄当代前所未经见的变局。^④至于“变局”的意义，也就是中国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的大变化，既不同于往古，而所遭遇又非已往经验所能知。但中国局面之巨变亦可视为一新转机。处于如此时代，看清新的趋势，谨慎选择适应的步骤，是要急切考虑而不可轻忽的。中国官绅之先知先觉者对变局的认识相当广泛，实已觉悟新时代的严重意义。然诸人究以何种依据而能获此见解，其答案仍可以就传统中运会观念找到线索。盖凡时代变迁，正合于运会观念所推知的变化效果，据传统知识，由联想而极易觉察世变之意义。中国传统思想，亦并富有变的信仰与敏觉，易经正是中国官绅宗奉的重要教材。此外则中国周秦之际历史大局之剧变，清末人并未完全忘记，因而感悟中西关系之扩大，至少在二千年来为一新的创局。

变局之来临既无可避免，中国人自然必须做处变与应变的准备。官绅中之敏觉者既有此种认识，则一切创新观念与积极行动，均有随之而起之可能。当时论议者乃认为中国应该在此时把握时机，顺着世变的趋势，自行开创一个千载以来未有的新天地。当时讨论应变的意见，可先从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之恭亲王、文祥说起。恭亲王、文祥于1861年1月之奏摺中即指出西夷与中国历代外夷之不同。英法于占据北京逼订条约后，立即退兵，恭亲王即认为洋人所请尚执条约为据，并不图中国土地人民之利。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⑤吾人可断言，即使在英法联军之后，官绅中盲目排拒外人的观念仍有其庞大势力，而主持外交者多数均能运用理性的判断和清醒的思考。自耆英主持外交起，中西和平交往的事实一直存在。1861年建置总理衙门，1866年斌椿非正式出使，1868年派前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使，均足以显示中国开始采取外交步骤，

逐渐接近西方规制与方法。兹先就外交关系检讨，观察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究竟如何？是否接近或领悟，或吸收现代西方的外交原则。

近代中国对国外交际往来，虽然缺乏西方外交知识和现代外交经验，但中国自有的外交原则，自1842年起，即已具备理性的基础。耆英、伊里布均可谓表达“诚信外交”的理想。这种理想并一直坚持延续，可以贯串全部晚清历史。就诚信外交的理论基础而言，有一个最有效的中心信念支配当时人心，就是孔子教人对待夷狄，是要采取“忠信笃敬”的原则。1862年曾国藩引孔子的话请李鸿章参考，并把四字解释：笃是厚道，敬是慎重，忠、信是诚实不说假话。1864年王韬建议丁日昌的外交原则，也举孔子这几句话。1876年郭嵩焘也向朝廷建议，以孔子这几句话为外交原则。^②诚信外交从若干方面说，实合于近代欧西尊重条约之外交，中国不待外求，在精神上实早已坚持这种信念了。

世界外交的最高宗旨是维持和平，避免战争，虽然无论西方与中国，随时均不免有战争发生。西方野心家与中国主战派纵不断踊跃活动，但和平宗旨实为人类最高理想，而积弱落后之中国，在列强侵逼之下，主持外交者竟能苦心经营维持和平，以求避免战争之灾害，实真正了解和平之可贵。恭亲王、文祥、李鸿章为19世纪主持外交的首脑，三人均用尽生平智术，谋求避免战争。彼等同时亦深知外交若失败，诉之一战，必为中国带来更多灾害。李鸿章后半生的事业，纯为和平努力，不轻言战争。1870年他曾说：由中国历史经验证明，对外战争必难长期继续，而和平则有持久之可能。1871年李氏更表示：与其百战百胜，实不如不战而胜更为对外之良策^③。凡此亦俱反映中国外交思想中的和平精神。

但进一步，则当时先知先觉者除以信义外交维护中国应有之

行政权之外，更认为与列强接触，最后仍须凭藉中国之国力。1861年创设总理衙门，恭亲王、文祥即云办理外交乃是治标工作，并未能探其源。至于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①因此清廷除于天津练兵，及在北京成立神机营之外，并鼓励当时在江南剿太平天国之能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操练西洋枪炮，甚至建立兵工厂，制造轮船。而李鸿章、冯桂芬更主张为学习西洋长技，必须省察中国制度之缺陷，略变考试制度，另设一科取士。此说冯桂芬于1861年著论详言之^②。越二年，李鸿章创办上海同文馆，较北京同文馆学科扩大，实已开始提倡“西学”。而1864年春季，李鸿章致总署书倡言：日本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③。李氏之主张筹设技艺一科取士，乃当时应付变局最前进之思想。

自强思想之进展，在变局之认识下，颇为迅速。王韬以为上天使西方数十国聚集中国，并非要使中国变弱，而是要磨砺中国，使中国变为富强国家（1865）。周星誉以为西方数十国聚集中国，若仍守古老办法应付，势必行不通（1867）。李鸿章认为中国此时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奇局，就应该创建数千年未有的奇业（1880）。薛福成以为与西洋诸国相遇，必恃智力相竞争。商必须变，不变则必贫穷。工必须变，不变则必愚拙。火车轮船电报必须变，不变则必行动迟缓。条约外交必须变，不变则必孤立。兵制战法必须变，不变则必危弱（1879）。^④

应变的对象，仍然是面对西方势力的挑战，比较1840年以后之信义外交、条约外交，虽然是继续的趋势，却有进一步深省及采取必要行动之新认识。也可以说，认识重点已不相同。1860年以后，先知先觉之官绅，除折冲樽俎，尽可能维护行政权之完整外，最大目标就是“自强”。这个中心题旨，参与讨论者，人数日益增多。后世历史家所称“自强运动”，即在思想观念上也

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就现有资料所知，1895年以前，以谋求自强而立论者，至少有39人。“自强”一词，原本于易经解释天的自然性质为刚为健，教人不停息地加强自己，以符合这种天性。至宋代董槐，又将此概念应用到华夷关系上，认为宋室能自强，即可不畏北方之外族。这可说是近代自强意义所依据的大致范围。^⑩1860年战败之后，天津条约立即实行，外国商人教士在口岸的骄横，若干官绅的确真心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外侮的国家。至于如何达成此一目标？上述39人的议论，除若干重视内政者，及仅泛论而未提具体方案者之外，仍多归趋于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吸收与应用。换言之，求强的具体行动，终必自然步入一个西法模仿的时代。西法模仿当时被称之为“洋务运动”。是以“自强运动”可以形容为这一时期中国官绅的精神目标，而“洋务运动”实则是这种思想所推展的具体内容。当然“自强”必须牵涉到内政改革，但当时自强的内容实是以模仿西洋技术为主体。

洋务一词的意义，随时代而演变。1860年以前，大致是与“夷务”同义。其意义也就是外洋交涉和通商事务。此后洋务一词，仍常指与西洋（包括俄国）甚至与东洋之日本，办理外交交涉。但凡有关洋人知识器物之经营，亦并包括在内，实即涉洋之一切事务也。举凡兵工、造船、航运、开矿、铁路、电线等，均为当时洋务设施的一部分。洋务的新意义，因此含有工业化的趋势，但为工业化而工业化却不是当时思想上的中心概念。

进一步在“洋务”的细节上，或求实际成果，或追求理论与观念，无论其为外交交涉或工业建设，寻求西方知识，乃不可避免之事。但西方知识之追求，反映在中国人理论与观念上，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种现象在当时思想转变之过程上，殊难避免，正表现出这个时代思潮的意义。吾人仍可看出当时先知先觉人士对外与内求的两个发展方向，互相激荡，互相交织，足以引

发各种思想概念的产生。

洋务的途径除外交的折冲樽俎之外，首先表现在国防工业的需求。就此方面来说，常与“海防”并论。这包括造船、造炮、陆军、船坞、炮台，以及电线等等的兴设，其本质毫无疑问地是西方技术与组织的承受，而尤侧重于国防之需要。其次则洋务亦注意在民生工业的创设，诸如航运、煤矿、织布、铁路、造船、钢铁厂等，均采用西方机器生产。采纳西方技术，虽不免起步迟缓，经营烦难，但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无疑义的，民生工业有若干项可与国防需要配合，如战船需煤，运兵需铁路，而铁路则需钢铁。同时其观念部分创发动力，无疑地乃是来自官绅求富的意愿。而求富的动机，一部分乃由于求强观念透进一层的追索而得，另一部分则为国人对通商口岸西人企业经营如轮船、棉纺织品等之直接反应。亦与所谓“利权”概念有关。

求富观念，虽随求强观念之后应运而生，但内容则更复杂，发展并很曲折。民生工业建设是一单纯构想，然凡经营推动，则不免引起许多关联问题。诸如机器、原料、厂地、人工，以及生产，大部关系西方技术知识。至其重大关键，足以启发思想醒觉者，实在贸易平衡、税制、与外人之竞争。于是由 1840 年以来中外通商之旧问题，进而转变为关系中国本身命脉的商务问题。由官方的漠视放任态度，进而变为若干先知先觉者认真之忧虑。此时的“用商制夷”观念，已失去价值，代之而起的则是“利权”观念与“商战”观念。利权本传统名词，督抚处理财政，控驭盐漕利源时多用之。惟自 1862 年后，李鸿章、丁日昌因目睹上海经济利益，权操外人之手，因用此词以表示华洋两方有关经济利益之主权^⑤。后李氏创办轮船招商局及上海织布局，主要目的乃在挽回利权，亦即经济权。进一步，当时先知先觉之大吏及通商口岸之爱国商人，更创有“商战”一说。而通商口岸之文士及李鸿章之幕僚，更倡重商思想。“商战”一词，最早出现于

1862年曾国藩的函札，当时仅偶尔提及。1878年，李璠向皇帝申陈重商护商意旨，亦曾论及“商战”，并再度引用曾国藩的成说。1879年，薛福成亦表达其商战思想，认为当此世局，工业为体，商业为用，而商业竞争实为不可避免之事。嗣后“商战”一词更变为国人流行的词汇，实代表一种普遍的认识与警觉。^⑧至于发为专文议论，认真讨论“商战”意义者，则以郑观应之说为最完备，足为此一观念的重要代表。郑氏光绪初年已有商业及航运竞争之理论；嗣后增刊盛世危言（1884~1893）中，更强调“商战”之必要，并详尽阐明^⑨。据当时了解，“商战”大旨是仿军事战争，且可援法家商鞅之“耕战”政策。但近代“商战”自有其理论系统。举凡税制、海关、物产流通、对外贸易、通商章程、条约，以至设领事、遣公使，均与商战有关。质言之，商战者，以通商为对抗他国之武器也。而“商战”一词正可反映1860年以后重商思想的特色。

由重商思想自然引申，可以达成“富民”观念。实际上重商与富民都是求国家富强意愿所诱导出观念。历代传统官样文章，虽竟言保民、便民，而实则至多不过减免徭役赋税，与民体息，而且未必历久施行。此种保民观念仅构成现代富民思想的原始背景而已。近代中国“富民”观念的正确意义，是认为国家与众民有密切联属，众民之富庶，即构成国家强盛的基础。换言之，欲使国家富强，首先须使全国人民安富康健。这种“富”“强”联属的观念，才正是近代“富民”思想生成的直接渊源。依此定义范围而论，此观念的产生，当在1880年左右。上海织布局的创建，正是这个观念的实践。很显然富民意义较重商尤宽。其宗旨尤在于对中国内部的充实。但在当时却不及商战之影响广泛。提出富民观念为主题讨论者，郑观应即肇其端，王韬亦论及之，惟完备之理论当以马建忠为重要代表。此点容于下节续述。

在此同一时期，洋务运动之外，新起一种文化意识的醒觉，更足以充分代表 1860 年以后的思想特征。因为这种反省，实较洋务更着重观念与态度的讨论，所以尤其显出思想层面的意义。这就是“变法”的要求，在 1880 年以前已开始酝酿。洋务运动代表着西化动向，是不争的事实。但凡一般新创的组织，当时一律称之为“局”。“局”的本义，在表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是在制度以外的权宜设施。这可反映出固有制度的坚定不摇。新兴事业，则并非常规，在观念上不免犹豫迟疑，尚未永久定策。但即在此种初步探索过程中，已有先知先觉之士，深知长远变法之必要。所谓变法，原指传统“经世”思想之改制主张，自顾炎武以至龚自珍，此种思想甚为明显。但亦可指近代自动的采行西方制度。洋务运动之模仿西方技艺亦为其中一端。主张改制而不显用变法一词者，应自 1861 年冯桂芬之言论算起。李鸿章 1864 年明白要求更改兵制及增加科举制度中技艺一科，虽明称变通变计，实即变法。而李鸿章正式向朝廷建议变法的言论，则为 1874 年的海防奏议，其中援引易经，充分说明求变的意旨。其重要结论，有谓：“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 年 1 月与友人通信，更再度申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意旨。同时代敏觉之官绅，如李氏之幕僚薛福成（1879 年）以及在港沪从事文字鼓吹之王韬（1883 年以前），皆已专文讨论“变法”。

维新趋势之下，思潮的激荡，显出文化意识的争执。这种文化意识的基本出发点，是起于所谓“西学”。环绕“西学”一概念面辗转应生许多不同概念（西学与新学二词意义相仿，但新学在 1894 年以后方见盛行）。西学在指欧西输入的各项学问知识，因其不同于往古传统知识，相对而言，即为新学。然则以西对中，以新对旧，自然产生文化分辨与选择的态度，其中存在着对西学内容的解释，西学特性的分析，以及西学价值的估量。这是

自然的，但是构成新生观念的重要因素，本节所述暂以1880年以前之发展为限。

采择西学之实际行动在1860年后有显著进展。翻译西文报纸早在1840年代已为一种了解外情的手段。自1861年以后，则更扩大为译书。单就官方主持者言，江南制造局及北京同文馆出版物甚多，傅兰雅、丁韪良等皆以清政府雇员之资格，有大量出品。再加上西洋教士等之私人译著，数量尤为可观，实为广泛推展西学的重要媒介。这些译书曾在中国官绅间流传，是毋庸置疑的。可以举数例证。如魏源的《海国图志》，1852年以后有新版流行，其中大量抄录当时所见的译书，数量在20种左右。又如赵烈文收藏西洋教士在香港发行的《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共刊33号）月刊全部，为官绅友人辗转借阅（翰林吴嘉善、道员邓随帆均曾先后阅读）。又如1874年江南制造局译印《防海新论》，而在同一年，就有4位督抚分别在其奏摺中引用此书的理论。这4人是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了宝桢。^⑧江南制造局为当时贡献最大的译书中心。计自1868年开始译书起，至1879年6月止，共出版所译西书98种（此外已译成而未刊者45种，尚未译成者13种），而销售则达31111部。^⑨凡此足以推知西方知识在当时之流布状况。

次一行动为西式学堂之创设。官方的语文、工艺、电线、煤矿、造船、海军、陆军，各附设训练班，益以西洋教士的私人学校，直接提供更深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再次则为官绅亲往外洋游历与出使，以及幼童及福州船厂学生出洋求学。此则于西学的吸收更具深度，若论扩大影响，则仍以出洋者之游记等记述为重要。中国出使或游历外洋官绅，自1866年斌椿起，即产生一个优良习惯，即凡经历外国，多将其见闻观感写入日记，或赋诗吟咏。据约略统计，自1866年至1900年，撰著外国记事之人物有61位，而撰著记录达151种。^⑩而此类日记诗稿，往往因其出

版而广泛流传，影响官绅文士最大。

本节所述乃 1860~1880 年 20 年间中国官绅在西方冲击下因自省之结果而摸索所得之现代观念。但除中国自创之思想观念外，当时人亦开始直接吸取及移植源自西方之概念。此种移植至 1880 年以后较显明，且不断加速。本节仅就 1880 年以前 20 年间对西方观念之吸收，加以叙述，亦即构成后日较为深固融会所必需经过之准备阶段也。

吾人首应注意者，为清廷及各省大吏除实行诚信外交、条约外交外，渐能采取西方之国际公法概念，以为折冲樽俎之工具。中西扩大接触之起始，最初阶段（1842~1860）中国只承认恢复通商，并不承认建立外交。于是在交涉过程中，中国每居于被动。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方法、理论，均在失败的经验中逐渐获得。换言之，1860 年以后，中国与列强交涉来往，在外交肆应之中，不得不依循西方规制方法，终至将其整体移植，渐渐形成中国人外交思想的一部分。

中国基于实际需要，最先移植西方国际公法观念，1864 年恭亲王曾引用万国公法处置普鲁士在天津扣留丹麦船只的案件，并在同年总理衙门又刊刻了丁韪良（W.A.P.Martin）所译的《万国公法》（Henry Wheaton's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①。印成之后，分发各通商口岸参考使用。更清楚的具体例证，是李鸿章曾在 1875 年，引用该书条文，处置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被杀案件^②。

再进一步，中国近代外交思想，自然而然逐渐吸收西方的“主权观念”。1860 年以后，中外通商与交涉日渐频繁，在实际交涉时，外人依据条约，恃为既得权利，凡有利便无不坚持。中国不能充分利用这种条约，反被条约所束缚，而且双方不能对等互惠，中国则居于受损的一方。这种警悟，很容易直接刺激受辱

的观感，进而形成理性化争取对等权利之具体理论。

中外通商来往，西人在华取得若干特权，1860年之后更日益增多。一般而论，中国最先注意到“治外法权”的害处。在1868年，文祥曾向英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坦白说明，若果外人能除去治外法权，则商人教士可以住居中国任何内地；但若保留这种特权，中国政府将尽一切能力使外人和这种困扰限制在条约口岸^④。不过当时中国尚没有一个正式词汇来形容此一要求之理论根据。

有关主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则为国人对于“利益均沾”的讨论。“利益均沾”的先例，建立于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此后各国援引，损害中国权利甚大。1878年御史李璠就各国均沾进出口之协定低税率，而议论到中国商业受害之深。1879年曾纪泽在英国，也曾向巴西驻英公使批评利益均沾不合于公法，并说明是中国急求删改的一项条文。同年（1879）薛福成把“利益均沾”与“治外法权”两大重点，申述讨论，以为中外约章中为害中国最甚的就是这两项，主张设法削除^⑤。薛氏此议曾由李鸿章进呈总署，请其考虑。

主权观念乃近代世界外交制度之基础。薛福成、李鸿章能见及此，足征国际观念的觉悟。换言之，中国看世界，看西欧列国，自1860年以后确曾逐渐改变固有观感，进而吸取西方国际观念。1861年，冯桂芬已自古代春秋列国的形势，清楚地比拟当时列强并立的世界。就此观点，他第一个提出加强外交的建议。在冯氏以后，直至1894年，用中国历史知识中春秋与战国的形势来解释当时国际现状者，不下十数人之多^⑥。这种由现时世界情势的认识，回溯上古，而比较公元前8至3世纪的历史，表而似乎浅薄，但在思想的转变言，却有其重大意义。其一，将19世纪世界和春秋战国比较，乃反映一种新的国际意识，自然地放下中国中心观念，以古史的镜子，重新思考中国所面对的新

世界。其二，中国官绅在面对列强并立的世局，很容易在固有经验中寻求适应方法，而古代列邦的国际关系，就是现成的参考资料。从这种历史比较，以至于古代邦交经验的参考引用，却正是由中国中心的国际观念转变为对等国际关系观念的一个天然的有效的通道。换言之，即在1860年以后的20年间，西方列强维持国际和平的方式与策略，确曾予中国外交思想提供了很大启示，同时也使中国官绅认识到当时西方的“均势主义”。1878年，马建忠曾很详细的介绍西方均势主义的发展经过，及其实际效益。“均势”一词的出现也以马建忠为最早代表。但他的进一步介绍与建议，则更着重在西方国家间的联合与结盟。在同一文件中，他举例说明，西方的联合与结盟，是办理外交上最有效的策略。马氏的言论，已很清楚的移植了现代西方的均势主义与联合结盟政策。而马氏为李鸿章之僚属，李氏外交政策受马氏影响甚大。同时代人中，如郑观应主张联美，张焕纶主张联英，均反映出吸收结盟政策的外交思想。^⑧

三 西方观念之吸收与融会（1880~1895）

1879年至1881年之间，中国国际环境又有危机。日本改琉球为郡县，继对朝鲜准备侵略。中俄伊犁问题冲突尖锐化适均在此时。清廷主战主和，举棋不定，所谓清流党，轻言战争，态度激昂。于1884年用事于对法战争，不免均遭挫败。同时朝政方面，清廷罢免恭亲王，重用醇亲王奕譞，战后醇亲王主持创设海军衙门，反能与李鸿章合作，增建海军，修筑铁路。此时李鸿章为应付朝鲜危机，仍继续推行自强政策，配合国家需要。然自1889年后，清流党分子张之洞崛起，渐次成为自强运动之新领袖。在湖北举办矿务及钢铁工业，为修芦汉铁路之准备。自1880年至1895年15年之中，自强运动仍然进行。但此15年中

更重要之发展，则为对西方观念进一步之吸收，且经融会贯通之过程，在中国官绅思想上，展开一更新幅度。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此种趋势尤为显明。

先就外交思想而言，1880年以后之先知先觉分子，其主张已超出当初薛福成、马建忠之外。约在1882年以前，郑观应已实质上批评外人在华的法权问题。王韬更敏锐地创出一个名词，称为“额外权利”，即指治外法权。他用专文讨论，主张废除此项“额外权利”。他认为外人通商传教，尽可许其自由往来。惟外人来华，即必须受中国法律管辖，所有特权必须废除。额外权利存在一天，中国即必须与西人力争，可一争再争，不达目的不止。^⑧中国官绅中更有人明确地使用“治外法权”这个名词，并做深入讨论，极力主张废除者，最晚在1887年。这年黄遵宪完成其所著日本国志，其中详细举例，批评治外法权对中国之害，以及引起国人的愤恨与不平，主张改变现状，使中外通商约章，仍回到1842年南京条约时的状态^⑨。

次一重要论题，是外国在华的租界。曾纪泽基于主权的维护，主张废除外国租界，他在1886年，以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提出修改条约，收回中国主权。特别对于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主张在1890年修约时期，一律废除，重立新约。^⑩

另一有关主权问题，是关税的自主，这个问题可分别两层，其一是协定关税。就是中国的海关税则，无论进出口货，完全要与通商各国共同协商，不能由中国自行议定多少。税率很难自由控制，更难提高。其二，中国关税人员，完全为英法等国人充任，关税行政，难免受外人操纵，足以长久影响中国税收。郑观应在1884~1892年之间，多次提出批评，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既为自主之国，即有定税之权，外国虽强悍，也不能加以阻挠。他主张重新修改条约，立即停止外国协定关税之权。对于海关税务人员，亦主张于10年期间，完全改由中国人充任，使外

国人不致再干预中国关税。^①

除上述各项建议之外，中国外交思想在 1880 年以后之十余年间更有重大的突进。1878 年马建忠曾介绍西方“均势”思想，已见前述。中俄伊犁纠纷，中法越南冲突，及中日在朝鲜之竞争，当时负外交责任之李鸿章皆思如何利用西方国家间彼此之矛盾，如英俄与英法间之竞争，以谋中国之和平。至于李氏之朝鲜政策，目的乃在利用西洋国家与朝鲜立约，彼此牵制，维持均势。然国人中之先知先觉者，于此种新的“以夷制夷”政策之外，已有怀抱世界大同，参加国际组织之理想者。即在 1892 年以前，中国已有学者提出国际组织的建议。陈虬在其 1893 年出版著作中，不但讲求均势主义，更建议联合地球上五大洲的国家，在印度创设一所“大公法会”，以主持世界公法之施行。这是因为印度位于东半球的中心，其次也可以考虑设在朝鲜。陈虬并很有信心的推断说，或者这个建议会在 30 年后达到实现。^②

外交既可与“自强”配合，而同时中国官绅对“富强”之追求，亦有进一步之发展。即由“重商”转入“富民”思想。1890 年，郭嵩焘即主张国家富强在于富民，不在国家。同一年，李鸿章之幕僚马建忠亦并提出具有体系之“富民说”。马氏于中法战争中一度参与经理轮船招商局，与上海中外商人接触之后，深感求强必先求富，而求富必先富民。遂于 1890 年，专文揭橥富民意旨。其说甚广博，包括商务与民生工业之全部，但重点仍在工商业之西化，最终目的仍为求强。^③此正反映当时洋务思想之主流，且足以看出西方的挑战，对于启发中国近代思想的重大效果。

至于求富思想，亦有新的转向，除工商业以外，并达到农业改良观念。此种观念并非古代重农思想的复活，而是积极改良农业技术，加强农业知识的研究，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农学体系。所采行途径，显然是步趋西化，而非沿承传统。近代中国官绅，

申述兴水利、劝农桑之言论数量甚多。然仅代表传统经世思想之老套，不足以称为农业现代化观念。郑观应在 1875 年已有利用西洋种树之法，以防旱灾之论，实仅片断零星。但其新“保民”观念，或已受西洋近代人民福利思想之影响。若按实际行动而论，1877~1881 年间，左宗棠已在甘肃推行农田水利。其所推行之种植棉花等政策，仍属传统经世范围，但左氏曾利用机器开河掘井，纺织羊毛，确应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声。可惜并未具有新体系的思想基础。^⑧至于具有完整体系的农业现代化观念，实当晚到 1890 年以后，才有认真的讨论。由当时先知先觉者所注意之范围，可以看出理论重点。彼等研究农学之方式，乃从翻译欧美农学书报入手，注意改良品种、牧畜、殖养、林木。同时引进西方灌溉施肥之新法，且主张改良农具，仿效西方机械器用。并进而主张模仿欧美之农业赛会。此等建议，实开辟 20 世纪农村建设运动的先路，并表现缜密思考、实事求是之功利精神。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可以陈炽及孙文之言论为代表，陈炽庸书于 1893 年前后撰写。孙文于 1894 年有上李鸿章书，1895 年著农学会缘起。两人均广泛讨论改良中国农学农政问题，举凡西方植物、土壤、肥料、机械等知识，以及养殖、畜牧、造林等技术，以至农业资本与展览，农学书刊之翻译，均有论及。在同一时期，广州创立“农学会”（1895），上海创立“务农会”（1896），刊行《农学报》，更为现代农业改良思想的实践。^⑨

1880~1895 年间，不但自强及富强观念皆因西方观念之吸收而不断充实，同时士大夫中对西学之态度，因中法战败之刺激，有显著之变化。此期正值当时关于西学之书籍日益增多，西方之冲击与西方知识之灌输同时并进。其结果国人中之先知先觉者，不但对有关外交策略及富强政策之西学充分接受，而且进一步探讨吸收关于西洋政治制度之观念。基于对西洋政治制度之新了解，过去之“变法”思想性质亦随之改变。李鸿章、冯桂芬在

1861~1865年之间即主张改变军制及考试制度。但在1885~1895年之间，“变法”、“维新”的要求渐趋于迅速扩张，并形成所谓“变法运动”，由是对于固有制度产生重大的挑战。变法旨在要求改良制度，维新具有同义，尤重在新的创始。凡此思想趋向，自然更代表思想的发展转变。

变法思想之蜕变，可以汤震（1890）、陈虬（1892）、郑观应（1892）、陈炽（1893~1894）及宋育仁（1895）等人言论为代表。其内容涉及甚广，虽若干方面仍不脱传统经世文之形式，而内容主旨，已大为改变，兹将五者之主要观念分别略述如下：①论西学，②论议会政治，③论法律。只此三端即可见中法战争后以至中日战争前，先知先觉之士接受西洋学术及制度之程度。

①论西学。此期有关西学言论，仍驳杂不一，但显著之重点，则在于内省要求，发抒变更学制之意见。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之全面改革，自此已开始进入严肃思考阶段。当时官绅所讨论改革学制，始终与西学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即改革之宗旨，乃在于如何使国人增强西方知识学问而已。^⑤且此种增强，并不止于涣漫之阅读西书，实在于严正考虑将西学纳入正常学制之中。就此观念之表达，乃依循两条途径，使西学引进中国正常教育制度之中。其一是继承魏源、冯桂芬之早期建议，继续主张于当时科甲正途考试，增添“艺学科”与“西学科”。至其与前人不同之处，尤在于大胆建白，要求革除无用之科目，八股时文，即在废除之列。实质上亦即主张改革科举条目，使考试内容面目一新，并不止于增列西学科一端。^⑥其二则在于广泛增设西学书院，充分授以西方知识技艺，用以培育真才，以备国家任使。同时以西学书院所教人才，参与洋务建设的经营，因而进入仕途。^⑦凡此两途之设计，表而虽甚温和，其趋势则已构成教育制度全面改革之先声。

②论议院。介绍西方议院制度，早为1840年代中国学者所

注意：魏源、梁廷枏、徐继畲均曾有记述。而最早提出仿效意见，则自1861年冯桂芬已作初步讨论。至于广泛讨论，大胆建议中国采行西方议院制度者，则自1880年以后开始蓬勃。1895年以后更产生积极之要求行动。然在1880~1895年间之言论，实代表吸收西方议会制度之酝酿阶段。

在此建议仿行西方议院之最初阶段，有两个重点被反复地多次讨论。其一是继续扩大介绍西方各国议会制度，并确定应用“议院”一名词^⑤。其二是更清楚地申论议院制度在国家政体上的重要性，其理论中心，在于说明议院的功能，足以开辟广大言路，沟通上下了解。他们一面介绍事例，一面申述理论，而最终目的则在于更重要的建议中国采行西方议院制度。同时所为言论往往托古立说。尤其古代乡官之选举，更引为建议之入门。^⑥

中国自1840年代之介绍西方议会，以至1880年代之建议采行。虽然观察讨论者日益增多，建议之理由并十分坚强。但对西方制度的真实了解，却仍有距离。中国所观察西方议会，在形式规制上，比较容易认识，无论介绍上院、下院、选举、政党、议事、表决、执行等等方式，大致均能一一讲述清楚。至于议会制度形成之理论与意义，中国官绅也颇乐于分析探讨。而实际的了解，却表现出重大隔膜。在此半个世纪的讨论中，中国官绅所认识的限度，仅在确信议院制的重大意义，乃在于开放言路，使下民有表达意见的机会。皇帝及执政大臣方面，也可因此了解众民情形。整体意义，即在于沟通上下意见。至于他们所举有利的细节，均不超出这一点基本理论。当然他们的认识，并不错误，自有某种程度之真实。而且他们信心坚定，如陈炽所谓：西方议院制度，方才兴起，虽圣人复起，也不能再加改变^⑦。但这种认识仍然很浅，西方议会形成之理论与历史，大半不同于中国官绅所论说，重点发源于基本人权的要求。中国这种觉悟，当在1892年才开始萌芽，1895年以后，才形成正确认识。然而

1895年以前中国官绅的议院建议，却反映出在专制政治下图谋打破上下阻隔的一种努力与呼吁，同样具有时代意义。

③论法律。1880~1895年之间，有两个外在情势的诱导，促醒中国官绅法律改革的自觉，亦形成一种改革要求。其一是由“治外法权”之刺激，而提出废除此项丧失主权之条约；进而再由收回“治外法权”之思考，自然反省到考察中国原有法律之好坏。再由于对原有法律章制之批判，自然即必走上法律改革之要求。其二是由于中国人出洋游历或求学，更清楚而正确地了解西方列强之律例、刑罚、监禁等现状，比较中国法律之施行，亦必自然走上法律改革之要求。郑观应就国际公法立场，提出平等互惠之国家，必彼此互相尊重各本国之法律。陈炽则进而分析到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之扩张，实由于中国刑罚重于西洋，西人不肯遵守，而逐渐形成一种外交上争取而得的特权。但在自主之国而言，则关系主权甚大，即如日本小国，外人在日本亦必服从其法律。而1887年何启之讨论更详细分析到中国原有律令刑罚系统之败坏，自然势非改革不可。^⑥

由中西法律之认识与比较，产生改革法律的意愿。而所要求改革项目与建议改革之实在内容，当时只有西方现成榜样可以取法，讨论此一问题，遂自然并走上法律制度的西化，改革意见，尤其重要在于采纳西方的赎金折罪罚、劳役代监禁的办法。以上是宋育仁曾比附中国上古刑罚制度，与西方刑罚精义所做详细之分析与建议。^⑦

上述1880~1895年间先知先觉之士对西洋教育制度、议会制度及法律制度之认识与吸收，主要目的仍在求国家之富强。惟在同一时期中有深思之士更能体会及西洋政治思想之精髓，即个人有自主之权，此自主之权亦为一切制定法律及议会制度之基础。此一概念在近代中国无疑系由康有为发其端。康氏于1883年路过上海，尽购有关西学之书而读之，包括《万国公报》；而

江南制造局出版傅兰雅所译之《佐治刍言》(1885)康氏亦于后日购得。《万国公报》及《佐治刍言》皆屡用“自主之权”一词,将基督教人人皆有灵魂皆有得救之权引申于社会政治生活。康氏具有宗教与哲学之敏感,对此学说立即接受,于其所著《实理公法》(1892年完成)一文中,即以“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为讨论主题,并藉以发挥妇女与男性须受平等待遇之观点,一切制度并必须由受制度支配之人参与立法。^⑥此一观点实为民主之真正基础,较前述陈虬、郑观应为富强而采用议会制度,其思想更深入一层。

四 民族主义与西方思想之移植 (1895~1900)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战争惨败,促醒中国全面之惊惧。继之又有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之竞逐,更予中国朝野极大刺激。在东西洋武力及经济力冲击之下,益以中国人新发现关于西方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及进化思想之认识。同时,当时各种报纸及有关西学书刊之传播,实有助于民族主义之空前汹涌,以及对西学之吸收与西洋政治思想之中国化。

1895年以后,中国官绅产生普遍醒觉,行动日渐积极,并扩大方向。除了自1840年以来之新思潮趋势继续发展转变融会创新之外,又有若干新方向之活动,反映出此一时期之特色。至少有4个具体重心,足供表达此一新时期之重大意义。

其一,西洋教士书刊之广受欢迎。中国人开始重视西方译著,至少当始于1840年代,西方地志与火器学之大量介绍。其后,1860年代,又扩大及于广泛之工业技术知识与通商税则以及公法外交。1880年以后,更又扩及于西方政制、财务、法律、学校等问题。而至1894年之对日战败后,使多数官绅更广泛趋好于当时发行之教士书刊,多集中注意到西方列强之历史发展、

立国规模，尤其注意改革制度之种种理论与效益。

此时“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之出版品，自1892年以来，已开始加强出版非宗教性之书刊，对西方文化政治乃至新制度多加介绍，特别在《万国公报》之论文，更广泛提示中国改革之途径。适逢1895年中国战败，“广学会”书刊立即被官绅们大量购买参考。其所关心之要点，大致趋向于改革问题，而改革实即当时惯称之“变法”要求。此期“广学会”书刊发行量之激增，反映出读者之欢迎程度。以此期售书入款总数即可见出读者购求之热烈：

- 1892 —— 592 元
- 1893 —— 464 元
- 1894 —— 1047 元
- 1895 —— 801 元
- 1896 —— 4386 元
- 1897 —— 11821 元
- 1898 —— 13866 元
- 1899 —— 46112 元
- 1900 —— 9418 元^⑥

实际售书入款，尚只代表一半情况，因为“广学会”售书之外，并广泛赠送中国读者。即1897年一年，赠书已达12万册，成为空前最高量。一般而言，“广学会”历年赠书多与售书量相近，更足以见出西洋教士书刊受欢迎之情形。更深进一层言，由于当时官绅热烈吸收“广学会”书刊，遂至影响至各省书坊的大量盗印。这并非全部书刊遭盗印，即凡“广学会”畅销之书，往往被一再翻印，其数量甚至可以超过原版之5倍。^⑥由此则更足见此类型出版品对当时中国官绅之影响。

其二，时务、富强、经世、西学等名目之丛书大量出版。自

1826年，魏源完成其经世文编120卷，使清初以来的经世思想言论，有了系统的安排。此后直到60年后，在1888年才有葛士藩的续编120卷出版，其中就特别增辟“洋务”一门。足见传统经世思想之适应能力，及其容纳之广阔。但在1895~1900年之间，出版经世文续编及新编达三种之多。而合类似之文编丛书，用自强、富强、西学、西政、时务等名称而出版的大部丛书，至少有12种之多。^⑥这正反映出中国官绅急遽关心国事的新趋向。

其三，中国官绅广泛创办报纸。这一种情势，在中国而言，纯为开辟创新的行动，不但自古数千年来所未有，就是在1895年以前，也少有先例。除了王韬在中国行政领土之外之香港办过报纸外，其在中国土地，由中国人主动主持创刊报纸，前例实为不多。而在1895~1900年之间，中国官绅在中国土地上创办的报纸至少有21种，在日本东京者一种。^⑦这种中国官绅创办报纸的行动，正反映出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

其四，中国官绅的组织学会。中国官绅之组织学会，大抵多受“广学会”之影响。在1895~1900年之间，所组学会至少有73所^⑧。此种学会，并非传统性之结合形式，而系充分模仿西洋，完全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结合。这种情势，在1895年以前实绝无前例可言。此点尤其反映中国官绅时代之觉悟，亦正表达此一时期之特色。

上述报纸书刊之传布，学会之组织，其结果使中国士大夫之思想有更多之充实与更新之转变。对日战争之后，对主权观念更加认识，民族主义思想亦藉以充实。中国自古并不乏种族思想，惟为天朝概念及文化惟我独尊观念所掩盖。自上古以迄清代中叶，所表现的民族思想，重点在于族类之异与文化之优越感。两者比较则文化意识特别深强，族类的分别，反居次要。至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后，因主权观念的认识及列强瓜分中国之威胁而增强中国的民族思想。主要由于增加了主权观念，使中国民族主

义，具备了族类、文化与主权三个要素，而三者并在此同一时期为中国官绅所广泛讨论。最显著的代表，是1895年康有为等抗议中日议和之“公车上书”，及1898年北京所成立的“保国会”。“保国会”的宗旨，在揭示保国、保种、保教三个重心，记载在“保国会”章程第九条。同时在第三条申明保主权的意义。第四条申明保族类的意义。第五条申明保教的意義。甚至清廷大吏张之洞在《劝学篇》（1898）所表达意见，也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他并直接声明“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是以两者显出一致的意向，就是他们都把主权的地位列为第一。^⑨但张之洞之保国，仍将“国家”与“清廷”视为一体，且不承认民权之价值，与康有为揭橥之民族主义，较多传统之束缚。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观念上进一步的成就，是中国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体认，也就是中国国格更清楚的自觉。虽然“中国”一词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4世纪。但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它的大致意义是泛指同一文化的“诸夏”民族。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当然更增强政治统一的意义，而于主权一概念，一直到19世纪，只有天朝在朝贡制度下之宗主权观念，而无列国并立主权国家之观念。但是到1895年以后，主权观念日渐成熟而普遍，所谓“国”的自我肯定，随之有迅速发展。一般中国人自有的事物与名称，多加以“国”的冠称。例如“国权”、“国地”、“国民”等等，1900年以后出现的新名词更多。均反映出近代民族意识的增强，这也正代表主权观念所充实的民族主义思想。^⑩

民族主义的活动与表达，其重要方向，仍然环绕主权问题而发展。1895年以后，开始有积极活动，1900年以后更发展扩大。若专就1900年以前的民族主义思潮而言，反映在当时言论，可分两方面。其一，是对中国本身的检讨与要求，颇近似于自强运动的延续，但表达方式却完全不同。这时对中国自身的反省要求中心，仍以求强为首要，但自我奋发振作的观念更加扩大。所表

达方式，多在于私人自由组合的新式学会。如“强学会”（1895）、“知耻学会”、“群萌学会”（以上 1897）、“学战会”、“任学会”、“雪耻学会”、“群学会”、“同心会”、“匡时学会”、“励志会”、“保国会”、“保川会”、“保滇会”、“保浙会”（以上 1898）等。其二，是对外国努力争取中国的自立与主权。此处与前面所讨论之外交思想所不同之点，在于国人所思考者不在外交条文与权利项目之细节，而在于一般性的国际地位平等问题。换言之，民族主义之对外反映，在于反抗一切外来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待遇，以图争取国际间平等待遇。中国人所以不平的感觉，尤其表达在中国人平时遭受欧人歧视所发抒的反感。^①

中日战争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又因进化论的输入而更加增强。中国开明之官绅对于严复介绍之进化理论，一开始即毫不怀疑毫无排拒，而且尽量吸收，踊跃介绍。当时士大夫对于此一观念并扩大其应用，作各种引申。中国士大夫因国际环境之变化，及对西洋科学知识之开始尊重，乃领悟到物种适应环境，争取生存，优胜劣败的冷酷自然律。此自然律应用到当前情势，使人对国家存亡竞争之严重性更加认识。尤其中日战争的失败，并联想到中国民族正面临存亡的危险关键，亡国灭种大祸，可能不免于降临，使他们立刻警惕醒觉。上下呼唤，争取生存，遂诱发出一个“竞存”观念。竞存的宗旨在于“救亡”，救亡观念遂与竞存观念共生。^②

同时当时流行的所谓“物竞天择”观念，使人立刻联想到中国民族与他族对立的种界斗争问题。优胜劣败的意义，是表现于优种劣种的分判。这促醒中国民族整体单位的意识，自然的而派生一个“群学”观念。“群学”本来是严复对 *Sociology* 一词的翻译，但迅速传布于中国士绅之间，立即由其字而意义转入一个本属误解的观念，其结果则更加促醒中国群类种界的自觉。再加上种界对立斗争的了解，终于合流而强化为群体意识。于是 *Sociolo-*

gy 的本义并不为人注意，它的译称“群学”，却因误解而变为士绅间通行讨论的观念，并成就为一个信仰中心。^③

对于群体认识之后，很容易产生个人与群体间关系的相对意识。即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并两者的关系价值，必随群体意义的肯定而连带有所解释。于是而有群己权界的分判。自群与己两者关系价值解释，进一步立刻引进两个新观念：一个是社会有机体的观念。他们很快接受并承认个人在民族、国家、社会中间，如同一个物体的细胞，物体与细胞生命的共同延续，息息相关。另一个是由社会有机体观念，再推衍出来“小己大群”观念。就是对待一国家民族的群体而言，个人价值为轻，群体价值为重。^④

群体争持生存，先决条件自须在使国族强大，而国族强大其基础仍在于个体的强健。由此又连带引进西方德、智、体的教育目标，以为锻炼与充实个体的三个重要项目。德、智、体观念的获得，本来是依循对西方观念反应的线索而来。然在中国官绅思想中，实又引起传统儒学思潮的复活，这就是他们向来熟知的“智、仁、勇”三达德。因为两者观点与宗旨，同是充实个人的教育项目，中西观念的融汇贯通，这个观念是一个出色的例证。^⑤

严复对进化论之介绍，开始于 1895 年，所译赫胥黎《天演论》，至 1897 年出版。惟在 1895 年前后，中国士绅对民主思想之认识亦大增强。何启介绍西方民治法律基础之书适于 1895 年完成。而梁启超在 1896 年创刊《时务报》，更高倡“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之学说。1895 年以前由基督教义引申之“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学说，至此乃与严复介绍之天赋人权说汇合，很快促醒中国人人格意义的自觉。1892 年康有为讲到：“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1895 年严复讲到：“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均确定反映中国官绅的天赋人权思想。到了 1898 年谭嗣同、毕永年、

欧榭甲，1899年何启、胡礼垣，均并发挥这种意义。^⑥

人权天赋思想的吸收，除对戊戌变法为一重要思想背景之外，在思想史上有多方面影响。第一是人格尊严的觉察。使人认识其为人的意义，无论种族肤色，强弱智愚，其得自于天赋予的基本权利，并无区别，亦无厚薄，使人增强其自爱自尊的意识。第二是向外国对待而增强民族自主意识。第三是政治自主权的认识。这就自然归趋民主观念的肯定。第四是社会人格平等的醒觉。于是代表妇女解放的雏形观念：“不缠足”就构成此时代的中心议题。

人权天赋理论，是当时人热烈宗奉与讨论的基本信念。且在行为的实践方面，表现于“自由”与“平等”的维护。而自由、平等亦同时受到注意和讨论。关于自由的意义，1895年严复首先介绍，认为是中国历代圣贤所未曾立为教法的观念。严复对自由下一定义，即：“凡所欲为，理无不可。但人之自由必须不妨碍他人自由。”严复更推进其意义，强调西方的政教宪章，制度设施，都是基于这个思想而形成，这一点更是中国政教制度中所缺乏的。就纯一观念本身，严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追寻相似的观念，举出儒家的“恕道”作为比较，认为虽然相似而并不相同。他特别指出西人对个人自由之争取维护，已非恕道所能包涵。至于谭嗣同之讲自由，则托称为庄子学说，向往于无国界无畛域，可以逍遥天地活泼寡欲之原始民族。两人认识想像绝然不同。严复实在充分介绍西方正确知识，谭嗣同则由感悟而自创理解。^⑦

关于“平等”的意义，当时学者吸收承受，辗转讨论，更具时代意义，因为中国传统信仰，特别是受儒家学说薰陶的官绅，多数是讲究差等主义，很不重视平等观念。近代则随西方知识的输入，连带了解西方平等观念的普遍。1892年以后，受到热烈的讨论，成为当时新的转向。大致均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1892年康有为即直称“天地生人本来平等”。1898年樊锥则更进

而创立同宇宙万物平等说，即谓诸星球万物一切出之于天，由天之所生，即同于一，彼此皆为平等。1898年皮嘉祐追述历史渊源，举墨子尚同兼爱为平等说之创始。进而由佛家阐释平等义理，最后西方国家则取为立法行政之本。这些均代表一时平等观念的吸收与阐扬。^⑧

由人权天赋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基础，思考及于政治权力来源，自然容易产生民主政治的愿望。单就理论上探讨，当时已有不少人提出民为政权本源的言论。但反映当时的民权思想者，实有多样的不同性质的表达，有两个很清楚的方向。一个是历史性的回顾，就是将古代民本论重新提出，加以阐扬。书经和孟子，均构成重要根据。另一个方向，则纯就学理申说，总括大致内容，约有三种新学说出现。

其一为公仆说。这就是主张政权在民，民为真正主人，至于君相以至各级官吏，皆为公众仆人，为民所用以执劳役者。倡此说者有严复、梁启超。“公仆”一词，并自1895年起因严复的介绍而开始流行。^⑨其二是政权契约说。众民之国，需人主持治理，遂在众民中举一人为君，执行治理，则其得政权者，乃众民所信托所付予，有责任之契约。主张此说者有康有为、何启、胡礼垣、谭嗣同。^⑩其三是君民同源说。这全不同于古代民本论。古来承认君权出于天授，帝王乃为天子。天意本之于民，君之爱民重民系行天意，符合天命。此时所论，即追溯未有国家之前，原无所谓君，即只有民，民因有国而举其君，由是而主张历代所有国君本来皆为民，所有民亦具备为君资格。主张此说者有陈玉树、张寿波。^⑪

除理论观念之外，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吸收与仿习，至1895年以后更为加强。至是乃由康有为等正式向皇帝提出。1895年“公车上书”中，即建议全国每10万户举一代表为“议郎”。议郎除供皇帝咨询外，并有权讨论财政及其他变法问题，

得三分之二议即通过之法案即由六部施行之。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倡办“南学会”，目的即在为湖南省议会之准备。而1897~1898年，康氏奏章中更主张设立制度局，由其筹备召集国会。并于六部之外，增设新部，实行教育法律等重要改革。光绪皇帝之“百日维新”，可谓当时民主思想之暂时胜利。但正因光绪之愿进行民主改革，乃有政变之爆发，排外派因而得势。中国民主思想，乃改途而助成革命运动之兴起。1900年以后，邹容撰写《革命军》及孙文之创立“同盟会”，实皆此一时期民主思想之延续，其曾受西方政治思想之影响，绝无疑问。

结论：中国传统与19世纪西化之意义

19世纪中西接触日渐频繁，中国官绅对外了解日渐增多，态度亦随时代改变。1840~1900年间，中国对西方武力及文化之反应，虽不免于杂乱矛盾，却足以表现此一时代思想特色，并充分反映中国官绅的理性、智力、精神与愿望。

综观此60年思想的进展转变，其原动力显然乃对西方冲击之反应与适应。中国传统思想在这60年中其势力仍存在，并构成对外适应的原始基础。而在此60年间，又有一持续不变的新方向，也就是渐趋于西化。但是西化的方式，不是直线进行，其间大大小小许多新观念的产生，使中国近代思想变为迂曲委婉，多彩多姿，亦正反映中国西化受传统观念影响，其过程殊为复杂。

中国思想观念渐趋西化，1860年以后之发展最为显著。在西方冲击下，中国不得不接受原始于西欧而遍及于全球之国际制度。当时大吏不但极力履行符合传统伦理观念之信义外交，且进一步接受西方观念，运用国际法，强调中国之为主权国家。虽然因事实不许可，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已晚至20世纪中期，然至少

在思想与观念上，则在 1860~1900 年之间，中国士绅已不乏重修条约，伸张主权之愿望。中国官绅之趋向西化，其核心目标即求国家富强，以为外交后盾。所以富强之企望为贯串 19 世纪中国思想发展之中心线索，殆无疑问。然而吾人同时亦须指出，19 世纪中国士绅于追求富强之过程中，对西方之文物制度认识渐渐扩大。起初第一步乃肯定中国必须赖西洋之科学技术以求富强。1869 年王韬预言地球万国有合一之势，他推断百年之内，铁路轮船必遍及中国，将为平常通用之器具。1872 年李鸿章推断，电线铁路势将盛行中国，百数十年后，舍此别无他途。同年沈葆楨表示，轮船的兴造，不但不能停止，势将如国家命运维持万年长久。1882 年陈启泰表示：自和西洋通商以来，即令周公、孔子复生，也决不至于舍洋务不讲。1889 年郭嵩焘表示：虽使尧舜生于当代，也必会积极采取西法推行，不能有一天延缓。1890 年汤震就运会观念推断，认为中外通商局面将成长久之势。1896 年陈炽认为轮船、铁路、电线三事，将使万国通商局面永远维持。1898 年皮锡瑞表示：假使孔子、孟子、程颐、朱熹生于当代，也不能舍开西学不讲。^⑥

然而到了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之时，中国对“西学”的认识又扩大许多。郑观应、薛福成等强调提高商人地位之重要；陈炽及孙文则力言农业技术之重要；汤震、陈虬特别注重议会制度之重要；何启、胡礼垣则坚持法律改革之必要。随着民族观念之滋长，中国人求富求强之企望益强，然同时对西洋政治社会思想之了解亦逐渐透彻。就康有为、谭嗣同而言，则富强虽重要，而每人应有之“自主之权”又何尝不重要？男女平等又何尝不重要？“不缠足”固有益于国家富强，然“不缠足”本身已成为一目标，自有其价值，亦有其本身之必要。1895~1900 年间之变法思想，包括对民主制度之肯定与对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之肯定。富强虽为大目标，而民主思想本身至 19 世纪末，由于学会之创立，已

成为中国政治的一股庞大力量，至 20 世纪初年自更加伸张。

吾人以史家之眼光，返观 19 世纪中国对中西关系观念之演变，则尤须注意到此一期中新旧观念的灭裂糅杂，与中西观念的融会混合。模仿西法虽然不能免，但同时亦表现综合创造的精神。因传统思想势力之大，此种综合创造精神，表达之方式不能不迁就旧思想，然同时亦未必即拒绝新思想之精髓。兹将 1840~1900 年 60 年间先知先觉者为西化辩护之理论，作一分析，以为本章之结论。

①西学源出中国说。此一理论大致认为西方知识学问，皆为中国原来所有，而后辗转西传。西人学得，加以转变发扬，乃变成更精进严密的学问。这是 1840 年以后即有之观念，到 20 世纪初，因受到严苛的攻击而渐被放弃。^⑧这个理论，就思想家看来是很浅薄，就意旨的内容言也很单纯。但在思想史的立场来看，却是有其时代意义，是必须严密考量的理论。“西学源出中国说”，是 19 世纪后半中国官绅的一个自圆其说的论调，自然是毫无可疑。但吾人同时必须注意到此一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曾一再重复出现。在同样的中西文化接触与融会的环境之时会，其同一论调，17、18 世纪耶稣会士输入西洋历算学时，即已产生类似之理论。自大数学家梅文鼎到北京起（1689），以至康熙皇帝晚年令学人编纂《数理精蕴》，皆以数学源于中国为学说。此外，阮元编成的《畴人传》（1799），也抱同一理论。他们认为中西历算多相同之处，乃因中国古代算学之西传，其根据为史记历书，认为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在纪元前 3 世纪逃散到外国去，而将心得传予夷人之事实。^⑨至于 1840 年以后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在数学方面，仍是沿承前代学说，而中西接触扩大后，恭亲王、文祥为同文馆扩大课程辩护（1867），亦曾揭橥其说。1875 年以后，黄遵宪、张自牧分别均有明确的中西对比讨论，引证中国古书，以证明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工

程方面之机械、舟车、火炮；甚至宗教教义之仁爱，社会伦理之平等，政治制度之民主，均可溯源于中国墨学及先秦诸子之书。

再进一步追察，西学源出中国的理论，尚不止在于17、18世纪耶稣会士输入科学之时代。往古探索，自公元第二世纪至第三世纪间，曾有佛法源出中国说，这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传布广远。当佛教盛行东汉之际，有一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流传。大意是老子西行到印度，变为佛祖，写下“化胡经”，并传授29个弟子。后来老子回到中国，又写成一部“太平经”。当时认为这两种经内容是一致的，因此相信佛教和道教都是老子所创。佛学当然就是中国原有的东西。^⑥以上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事例，显然并无沿承关系，其意义实在于两种不同文化初接触时的文化心理反应，表达人们对于新事物寻求自圆其说。然就整个西化过程而言，19世纪之“西学源出中国说”，其实不过是过渡现象而已。

②托古改制论。此一理论的内容，乃利用古代已有之规制来为西化辩护。19世纪中国官绅往往把西方观念制度、事物行为，附会到中国古代可效法的历史成就上，藉以主张西化。1860年后，凭藉古代典章而求接受西洋规制之作家，为数甚多，自冯桂芬、郑观应以至康有为皆揭橥其说。^⑦当然，托古改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公元第一世纪，王莽新政的制作，实为一个最有名的前例。中国既有悠久之文化，遭遇新的事物时，自不免与固有经验做联想和对比，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同或相似，引为采择新法之理论根据。况且中国士大夫信古与好古传统根深柢固，支配着他们共同的想像。托古改制因此比凭空改制易于为人接受。

③中体西用论。这个理论在古代历史上却没有前例，显然地是19世纪晚期中国官绅的新理论。当然，“体”与“用”的联袂，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在公元11世纪即已出现。宋代儒家胡

璦、朱熹、范祖禹皆曾用以代表概念与事物的两面。此后“体”、“用”并沿用为一种习惯的日常语汇，凡讨论问题概念，往往套入“体”、“用”二词，作对比解释。到了19世纪，更有很多例证。如耆英所谓：“以炮身为体，炮弹为用。”严复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康有为所谓：“以群为体，以变为用。”^⑧均极平常。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出现，是自然地本此习惯而来，不过它却形成同时代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广泛地受人注意和讨论。这个理论自1861年以后开始酝酿，冯桂芬和王韬的言论可为代表。但“中体西用”一词则出现颇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则为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中体西用”的意义重点，在说明中学与西学的如何联属应用。基本上仍起于一种文化意识，而作中学与西学的分判。虽然中学为体，但因西学为用，即已肯定西学的价值。中学西学各具特色，可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或辅助充实中学的应用。当然在取舍分配上，仍存在中西不同比重观念，自足以反映中国接受西化条件性，但其反映西化之意愿则甚明显。

中体西用虽然至1898年始正式成为一个口号，在1870年以后“道器”的两分一般注意西化者皆常讨论。大致相信以西方之器，可以补助中国之器，以充实中国之道，使之更为完美。如王韬认为中国之器可变而道不可变。而早在1876年，薛福成代李鸿章拟的信稿即曾说到：道之所寓者器，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⑨可见中西学术并非必须严格两分，不能融汇。同时吾人又须注意道器之器，并非仅包括西洋技艺而已。至1895年左右，陈炽已公然主张政治应属于器的范畴。1898年张之洞之劝学篇虽认为西学为用，但张氏所承认之西学范围颇大，自学校教育、军事教育，乃至财政改革皆在其列。惟狭义之教，即儒教，则张氏绝对认为乃不变之体，民权亦自不能接受。张氏之体用说与陈炽之体用说其范围亦并不同。可见此概念具有很大

弹性。在张氏及近乎其思想者提倡之下，结果使中国对近代教育制度，开放大门，广泛采用西方制度。最出色的例证，就是京师大学堂与南洋公学的创建，以及张之洞在武昌所办之文武学校，都是很清楚地本着这个理论为宗旨。后来张氏改革及废除科举，其理论根据亦中体西用而已。^⑧

④贵因论。这个理论是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而在二千多年后有新的复活。古代贵因论具有完整体系，内容丰富，应用在政治方面，有几层不同意义。但近代中国官绅之引用，又扩大到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就是表现于一种倾向西化的新理论。19世纪所谓之贵因，和此一名词在古代之用法属同一范畴，但实际的内容与意义，则已完全不同。古代的所谓贵因，意义复杂。就《吕氏春秋》而言，其目的主要在指导政治领袖，利用时机，采取对己有利之行动，因此乃有：因势、因利、因事、因人情、因政策、因权术种种观念。而1861年以后的所谓贵因，主要在表达因应时势，及因袭西洋之意愿。以学习他人、效法他人之贵。实际上就是以因袭西方为贵为重的理论。其重要代表为薛福成与涂儒鸞。他们一致的理论，是认为“因”比创造容易。“因”在于继承创造，使之更进于完美。“因”之最后功能是超过创造的成就。同时，他们所提倡的最后目标，也就是因袭西方。^⑨

⑤全盘西化论。这一理论，纯为现代衍生的思想，而且也是中国土生的观念。这是由于1895~1898年间，因变法运动之急遽进展而产生之半理智半感情的思想。全盘西化的大旨，在肯定西学绝对的优越性，认为西学无不善、无不美、无不有用、无不高明。因此主张充分效法，全盘接受。首先谭嗣同即主张变衣冠，变中国之人伦制度，变中国之学术。然至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多主张全变、速变，其代表为樊锥和易瀚。他们以为中国固有制度、礼俗、法律、科举、学校应完全革除摒弃。进而改

正朔，易服色，一切仿行西洋。樊锥有谓：“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易簫有谓：“一切制度，悉从泰西。”^⑧此种论调，实开 1930 年代“全盘西化”论之先河。亦可见出 19 世纪中国受西洋文化冲击之深，与反应之剧烈。

总观上述五种理论，无论其各别的意义与成熟的程度如何，却无疑地代表这时代人的思想，充分反映此一时代共同的文化态度与醒觉意识。同时这些观念也各有其深远的影响，足以带使某些行动、组织、政策的开创，以至旧有制度的改革。吾人今日追述 19 世纪中国士大夫因中西关系扩大而引起之反应，无论其为上述五种自圆其说之理论，或自耆英、魏源，以至谭嗣同、樊锥为止之各种新学说、新思想，当不免见其浅薄，有时且互相矛盾。但吾人若循其发展之大体方向，寻其脉络之连贯处，同时又细考其每一时期之关节，在西洋势力威胁冲击与影响之下，中国士大夫经过内省深思而提出之新方法 with 概念，无论其为自发之观念，或直接吸收之舶来思想，皆各有其重大之时代意义。吾人如更能忆及中国传统思想之根深柢固，非一朝一夕所可变革，便更能认识 1840~1900 年 60 年间，中国士大夫在知识、思想与价值观念上开创工作之可贵。虽然中国之醒觉乃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方较普遍，但是专就思想之幅度而言，20 世纪初期显露之思想发展，1900 年前实已开其端绪，大规模西化之潜能实已事先具备。固然思想与概念仅构成历史之一端，未尽支配整个历史发展。但此一幅面本身，实自有其精深研究之价值。

1973 年 12 月 9 日初稿

1974 年 10 月 25 日第三次修订

附 记

本文创稿于1973年7月，自始即承刘广京先生指导、订正、增补与润色，迄今为时年余，稿凡三易，几无时不与刘先生往返商酌。除就文字稿件直接笔削之外，刘先生并来书指导体例规制、资料依据、布局重点者不下数十函，可谓积牍盈尺。故此文之所能完成以及或略具贡献于学界者，实由于刘先生裁成斧正之功。谨此声叙，并志感谢之忱。

1974年10月25日

注 释

-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5~17页。
-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八，第33页A，耆英奏云：“如果将来议有成说，奴才等自应会同面见该夷酋，以定大局。”道光硃批云：“既有成说，总以不会面方好。”
-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第28页A，赛尚阿云：“惟有豫绝其求见之路，庶足以杜覬覦而省枝节。”
- ④ 阿英（钱杏邨）：《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汪仲洋诗云：“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膏布裹缠，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
- ⑤ 《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页A，裕谦奏：“查英夷腰劲腿直，见该国王向无礼拜。嘉庆年间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驱逐回国，是其明证。”裕谦之外抱此见解者尚有金应麟、叶钟进、林则徐、徐继畲等。
- ⑥ 萧令裕：《英吉利记》，第1页B：“或谓番舶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趑捷，涉浅水则一

纵即过，此所目验也。且夷性沉鸷，多巧思，所制钟表仪器，中土所重，而船炮尤至精利。”

又，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五，第10页B：“又论者皆谓英夷长于水战，一登岸则技穷，此言断不可信。英夷虽习船，其生长本在地上，何不可登岸之有？”

- ⑦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二，第2页A：“公（指粤督孙玉庭）奏：‘其富甲中国，彼以所有易茶叶转鬻于附近诸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穷，又安能强。’”

又，《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2页B，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第30页A，福建巡抚魏元烺云：“外夷之人，非内地之大黄茶叶无以为生。”

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第25页B至26页A，粤督邓廷桢通谕各国夷商云：“照得天朝准予各国通商以来，垂二百年，深仁厚泽，义利无疆，而内地茶叶、大黄二项，为尔外夷必需之物，生死所关，尔等岂不自知，是天朝本不必通市，而尔各国能一日不通市否？”

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第6页A，顺天府尹曾望颜云：“惟该夷所需以为命不可一日缺者，乃中国之大黄茶叶，臣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惧而求我者也。”

又，夏燮：《中西纪事》卷三，第21页B至22页A：“夫中国无所资于外洋，而外洋实有资于中国，茶黄之属是也，以其为祛瘴不可少之物，故中国以此全其民命，即以此制其死生，但使关市持平，蛮夷向化，则其趋之也，如蒸臠，其甘之也，如食菘，又何取乎夷关折符而绝之哉。”

又，《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二，第44页B，户部侍郎袁希祖云：“其实中国百货，皆外洋所必需者，不但大黄、茶叶者有关外人性命，若真闭关不与通商，此通商之夷人，必与用兵之夷寻闹不已，而我中国夷税之利自在也。”

又，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十二，第3页A：“臣闻大黄茶叶，为夷人制命之具，西域等处，黄重而茶轻，红毛等国，茶急而黄缓，红毛收

买私销黄茶，每于离粤约有十站水程之新嘉坡及七站之新埠地方，屯积无算。”

又，汤彝：《袖村文》卷四，第13页B至14页A：“夫番土百货非中国不可缺，而中国之茶叶则为番土所必需。是以远国商贩不避盗贼剽劫风涛沉溺之险，则向化之情，互市之利，昭然可睹矣。”

又，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页B：“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惟大黄茶叶荡涤称神，一不得食，立致困病。”

又，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第3页B：“茶叶大黄，实彼生命攸关。”

又，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五，第9页A：“仁皇帝所为开海者，知各夷非大黄茶叶不生。西口陆路艰险，所通无多，故仰体昊天好生之德，设关通商，以全各夷民性命，并非为榷税起见。不意英夷造作毒烟，贻害我内民至此。”

除以上诸人言论外，尚有周瑛、林则徐、万启心、刘韵珂等人。

- ⑧ 黄恩彤：《抚夷纠略》（抄本）第2页：“其实夷之饮茶，但嗜其味，并非资以为生，故不惧也。”

又，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第5页后面：“至大黄则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岁出洋大黄不过值五万余员。茶叶虽西洋所盛行，而佛兰西国不甚需之，以其本国皆饮白酒，不甚饮茶，故佛兰西到粤之船较少。然前代市舶，从不闻茶叶出洋，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

- ⑨ 道光两朝（1821~1861），中国人士论及西洋船坚炮利者计有：道光皇帝、卢坤（两广总督）、林则徐（钦差大臣）、裕谦（两江总督）、朱成烈（给事中）、邵甲名（江苏巡抚）、陈化成（江南提督）、琦善（直隶总督）、蔡家珩（御史）、石景芬（御史）、邓廷桢（两广总督）、奇明保（杭州将军）、刘韵珂（浙江巡抚）、奕山（靖逆将军）、齐慎（参赞大臣）、牛鉴（两江总督）、禧恩（盛京将军）、赛尚阿（大学士）、讷尔经额（直隶总督）、杜受田（工部尚书）、奕经（扬威将军）、特依顺（参赞大臣）、文蔚（参赞大臣）、裕泰（湖广总督）、祁埏（两广总督）、黄恩彤（广东巡抚）、金应麟（大理寺少卿）、梁宝常（浙江巡抚）、李湘棻（漕运总督）、耆英（两广总督）、林福祥（布政使）、程懋采（安徽巡抚）、姚莹（台湾道）、伊里布（广州将军）、徐继畲（福建巡抚）、祁崧藻（大学士）、保昌（福州将军）、梁章钜（江苏巡抚）、萧令裕（绅士）、方熊飞（绅士）、包世臣

(绅士)、汤彝(绅士)、梁廷枏(绅士)、李炳奎(绅士)、魏源(绅士)、潘仕成(绅士)、吴文镛(江西巡抚)、曾望颜(陕西巡抚)、骆秉章(湖南巡抚)、许乃普(工部尚书)、恒楫(直隶总督)、许其光(御史)、尹耕云(御史)、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沈兆霖(兵部尚书)、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刘成忠(御史)、薛书堂(给事中)、吴敏树(绅士)、夏燮(绅士)、冯桂芬(绅士)、徐鼎(绅士)等66人。

⑩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第2页。

⑪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页。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七，第2页A。

⑫ 嘉庆、道光年间，中国初见西洋火轮船，以为新奇，颇留心描述记载，今可知者，至少不下10种，而以郑复光之《火轮船图说》最为详细。郑书收入《海国图志》卷八十五。此外有谢清高所述，载《海录》卷下，第75页：“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辅，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亦多效之矣。”张喜所记，载《探夷说帖》，收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页：“禧欲观其火轮船之机关，该夷导禧前后週观。其船底圆而平，色黑白，前后两桅，桅又分枝，并有横杆，中置烟冲。其船比江浙粮艘较大。中舱煤火之焰，则水滚机动，机动则濠轮转，轮转则船行矣，火益大则船益速。”琦善所记，载《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8页B：“又其次据称名为火焰船，即前日驶进海口者是也。中设桅杆，三层，并无风篷。船身外饰洋漆，内包铁片。舱中皆铺设漆板，其平坦一如房屋之中，而光亮过之。两旁皆系铁栅栏。经千总白含章揭起漆板查看，初层系其睡宿之所，又其下笼罩铁网，存贮火药等项。其睡舱两旁，约去水尺余，各设有枪炮眼，止须在舱内施放。舟中所载均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火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撤去风斗，轮即停止。”陈逢衡所记，载《啖咕刚纪略》：“其火轮船尤捷，遇风利一日可千余里，其制船身窄而长，而头尖，船腰有大车轮二个，上有铜烟筒二座，长约丈余，围圆三尺，中用煤炭，火焰则水滚，水滚则机动，机动则轮

转，轮转则船行矣。火愈大则行愈速。”（此书收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860页）汪文泰所记，载《红毛番英吉利考略》第6页B：“火船者，于般中多作机轮，使递相绞转，烧火而收其烟以发轮，烟炽气激，轮转如飞，拨水而前，不用帆槳，不借风力，不畏侧覆。常使二人司火，一人把舵，无远弗届。此从火能生风悟出，中国走马灯洋灯之制，即此意，其收烟取气之法，无传之者。”耆英所记，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九，第48页B：“奴才所至之火轮船，长约五丈，阔半之，载大炮十二门，中设水火二筒，燔以煤炭，火炽烟升，内外有轮，机关灵便。大约暗运钟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是以不待风帆而行驶迅速。有传为以人力牛力转轮者，乃系臆度之论。”怡良所记，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三，第38页B至39页A：“至火轮之轮，高有二丈余，两边各有机轴转运，与车之同为一轴者不同。其舱中惟有两大柜，机轮悉在其中，无从开看，但见横列六火灶，各深八九尺，据说每日用煤四十担，用火五万数千余斤，但如何激动火轮，则无从测其端倪也。”王蘊香抄录王大海之《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二册第7页：“其船长十丈有余，桅帆备而不用，用车轮二枚，轮以铁叶，每十六片。舱面竖大小烟具二管，管下置煤，旁设灶锅，贮以清水，水生气腾，冲动管上机盘，两轮旋转，铁叶扒水，船即行动如飞。”徐继畲所记，载《瀛环志略》卷七，第48页B至49页A：“火轮船大者如三桅船，小者如两桅船。船之后半，上为水柜，下列火门，或五或九，火门之内，以柴燃煤。水柜之上，两铜管粗尺许，弯折而下至船底，承以两木桶，高五六尺，围七八尺，木桶之前，又接以双铁管，曲折弯环达于轮轴，以激动之。轮在船之两旁，为铁圈三层，横施铁板，略如南方灌田之水轮，外以木匣护之，望如半月。船面有大铁筒，高二丈余，出黑烟以透火气。又小铁筒一，高丈余，出白蒸以透水气。船将行，先烧火，约两三时，候水沸而开船。船内有铜尺二，施于两柱，推之向前，则轮前转，推之向后，则轮倒转，推之依柱，则轮不行。船之行也，轮激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千余里。船面立小桅二，遇顺风则施篷以助轮，风不顺则专用轮而不用篷。船而设炮与甲板同，惟船腹不开炮洞耳。火轮船之制，四十五十年前始创为之，先是，欧罗巴诸国织布多用火轮机，能者推广其法，遂造为火轮船。近年米利坚又推广其法，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亦可谓精能之至矣。”此外并有潘仕成、吴建勋、易长华、许

祥光等之仿造西洋炮船与轮船，俱见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四，第1页B至第6页A。

- ⑬《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5页，林则徐云：“当又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
- ⑭道咸两朝（1821~1861），国人撰著域外地理图书计有：《海国纪闻》（李兆洛著）、《粤东市舶论》（萧令裕著）、《英吉利记》（萧令裕著）、《海外蕃夷录》（王蕴香辑）、《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叶钟进著）、《海防余论》（颜斯综著）、《英吉利小记》（魏源著）、《四洲志》（林则徐著）、《海国图志》（魏源著）、《瀛环志略》（徐继畲著）、《英吉利地图说》（姚莹著）、《粤道贡国记》（梁廷枏著）、《兰伦偶记》（梁廷枏著）、《合省图说》（梁廷枏著）、《康輶记行》（姚莹著）、《英吉利纪略》（陈逢衡著）、《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汪文泰著）、《中西纪事》（夏燮著）、《英志》（蒋敦复著）、《朔方备乘》（何秋涛著）等共20种。
- ⑮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第10页B至11页A，复光律原书：“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岂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莹实痛心。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

又，徐继畲：《瀛环志略》，自叙：“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俾理（David Abeel），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俾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率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丈二尺余，一尺许，较雅俾理册子大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俺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又，魏源：《海国图志》叙：“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又云：“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 ⑯ “用民制夷”一义，取自道光二十八年粤督徐广缙所云：“无事则安民以抚夷，有事则用民以防夷。”（《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A）及，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钦差大臣胜保所云：“为今之计，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四，第22页A）

- ⑰ 徐继畲：《松龛先生奏疏》卷上，第31页B至32页A：“伏思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笔伐口诛，不能懾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诚如圣训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如果民知大义，志切同仇，地方官正乐于激励，以为防御之资。”

- ⑱ 耆英即曾利用民情反对英人进入广州。见王尔敏《耆英外交》，《大陆杂志》30卷9~10期，台北，1965。

- ⑲ “用商以制夷”一词，见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第25页A，徐广缙、叶名琛奏。

- ⑳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A，徐广缙云：“查夷性贪利，以通商为主，懋迁有无，断不能舍内地百姓，别图交易。”

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第4页，徐广缙、叶名琛奏：“查夷人之所系恋者惟在贸易，则所以钦制之者亦惟在贸易。”

又，徐继畲：《松龛先生奏疏》卷上，第36页B：“不知粤省之遇夷，虽由绅民之齐心，实得力于洋行之停市。”

- ㉑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2页B：“且防边之策，尤贵招徕，汉书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故知抚绥遐服，非财贿无以款通，怀畏远人，必负贩乃能要结也。”

又，萧令裕：《英吉利记》第2页A：“汉书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英吉利正其伦比，诚如汉之庙略，通关市不绝以中之，则駑马恋豆栈，即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古所云：匈奴安于所习，心不乐汉，是以无窥中国者，英夷亦殆有然矣。”

- ㉒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社会科学》3卷1期，昆明，1941。

又，夏燮：《中西纪事》卷一，第19页B：“传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盖以夷制夷，其道在近攻而远交，故两汉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渐。”

又，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第35页A：“法布交兵未息，英俄又生猜衅，以敌攻敌，此数强大并处常态，得人控驭必无他虞。”

⑳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一，第21~22页。伊里布代奏阮元摺。

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四，第36~373页，裕谦奏。

又，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第1页。

又，王尔敏：《香英外交》，《大陆杂志》30卷9~10期，台北，1965。

㉑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第9页A。

又，魏源：《海国图志》卷首，第3页A：“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驭，必有于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

㉒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第8页B：“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

又，《海防档》，丙编，机器局，第14页下，李鸿章函：“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

㉓ 19世纪后半，中国官绅认识了当前的世界是亘古以来所未经见的大变局，或称为千古之创局。提出此项言论者，据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49、57、74~75页，所收有：李鸿章、丁日昌、瑞麟、王文韶、杨昌浚、王韬、曾纪泽、黎庶昌、王先谦、张自牧、汤震、康有为、张之洞。并据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页，所收有：黄钧宰、黄恩彤、恭亲王、郭嵩焘、薛福成、夏燮、吴可读、张裕钊、欧阳炳荣，共计22人。今再增：吴云、周盛传、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郑观应、盛康、马建忠、王炳燮、项藻馨、陈炽、严复、黄协坝、皮锡瑞、蔡镇藩、黄蕙，总共达37人之多。

㉔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第17页B至18页A。

㉕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17页：“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又，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16页A：“今日所以待之者，惟有画一以示之信，宽大以示之礼。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权，无诈无虞，以布我之诚。与之行事，必简必正，与之相接，不亢不卑。师其长技，以失其恃，明

其所学，以通其意。如此而犹有或乖者，吾弗信也。宣尼有言曰：忠信笃敬，行乎蛮貊。诚为万世馭外不易之要法也。”

又，《清季外交史料》卷八，第16页A，郭嵩焘奏：“是以办理洋务非有他长也，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体）。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衷，使就绳尺。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矣。”

-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第27页B至28页A：“自周秦以后，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惟练兵制器相去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工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

又，同前书卷十一，第10页A：“至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尤为馭外良谟。汉唐以来，得失昭然。即究今事始末，林（林则徐）僧（僧格林沁）二公逞一时之愤，几隳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

又，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十二，第37页B至38页A：“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化百端，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以彼所求者通商耳，其蓄谋或在数十年之前，其作势尝自处万全之地。每至张大其辞以相要挟，而其与中国相去数万里，用兵之费，又数于中国，本不能轻易言战。其志又不过通商为利，非有仇憾积于心，察其不轻言战，诘难往复，固有余地以自处，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轻言战而激使狂逞则为害必多，一经交兵，所用兵费，终谋取偿，此亦西洋各国互相钳制之义。”

-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第11页A。
- ④ 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四卷二期（台北，1971），第1~8页。
-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8页B至10页B。
- ⑥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3页A，云：“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励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第38页B，给事中周星誉云：“今西洋数十国麇聚海洋，而犹守古之常经，势将有所不可。”

又，《李文忠公奏稿》卷三九，第28页B：“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

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为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又，薛福成：《筹洋刍议》卷一，第21页A：“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物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④ 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又，《宋史》卷四一四，第10页A，董槐传：“帝（宋理宗）一向边事，（董槐）对曰：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

又大略统计，1860年以后的19世纪，讨论中国“自强”问题者有：赵树吉、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彭玉麟、丁日昌、恭亲王、文祥、郭嵩焘、周星誉、英翰、裕禄、李瀚章、王文韶、杨昌濬、李宗羲、周盛传、张之洞、薛福成、黄遵宪、郑观应、曾纪泽、王韬、黎庶昌、陈炽、陈虬、黄协埙、罗应旒、盛康、陈启泰、徐承祖、宋育仁、梁鸣谦、方瀚颐、朱采、强汝询、秦绶业等39人。

⑤ Kuang-Ching Liu,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 1823~186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 p.39.

⑥ “商战”一词，最初当流通于通商口岸官商之间，至曾国藩出以文字讨论，必已相当流行。故1862年实一清楚之文字起点。《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第44页，覆毛鸿宾函：“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怨道。”

又，《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页；御史李璠奏：“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胜，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

又，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B：“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迺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绝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

-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8页A：“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祇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

又，Kuang-Ching Liu, “Cheng Kuan-Ying’s I-Yen: Reform Proposals of the Early Kuanghsü Period.”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III, Nos. 1 and 2, (Taipei, 1970).

李陈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上册，台北，1972，第207~221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四，第12页A。

又，《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复王闿运函：“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 ⑥ Suzanne Wilson Barnett, “Wei Yuan and Westerners: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 *Ching-Shih Wen-ti*, II, No.4, St. Louis, 1970.

又，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北，1964）卷一，第105页：“余向与弢甫（周腾虎）采集夷书：遐迩贯珍全部，弢甫展后展散，余数年来仅而得全，为吴子登庶常索观，不还。乃以转借邓随帆观察，数日前吴子登见访，急言观察已下世，此书遂尔零落，可惜。书此后半月，其书遂

归。”

又，4位督抚引用新译之“防海新论”，分见以下各书：《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四，第16页：“查布（Prussia）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开县李尚书政书》卷六，第56页A：“观西人所著防海新论，备言南北花旗交战之事，虽有极善之炮台，极猛极多之大炮，只能击坏一二敌船，并不能禁其来去自如。是火器不足深恃，可为明证。”《丁文诚公遗集》卷十一，第11页A：“近阅西人防海新论，知其用轮船与铁甲船亦须参用舢板，至其田鸡炮船，极为得力，然细观其战攻时，该船所到之处，须用轮船拖带，则此项炮船，亦非轮船可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第24页B至25页A，刘坤一奏云：“臣尝见布国希理哈所撰防海新论一册，于海口岸上如何筑炮，水中如何设拦阻之物，言之甚详。并称水中无物拦阻，即岸上之炮台林立，亦不足以抵御兵船。而于水中拦阻之物，除各样水雷外，别法尚多，均经绘图注说。且述南北花旗交兵之时，某处以某物制胜，某处以某物取败，历历有据。”

⑨ 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1954），第23～25页。

⑩ 粗略统计1900年以前撰著外国国情舆地者61人，大小著作151种，见以下所开简目：

朝鲜考略	龚柴著	高丽形势	吴钟史著
朝鲜风土略述	吴钟史著	朝鲜风俗记	薛培榕著
朝鲜八道纪要	薛培榕著	朝鲜舆地说	薛培榕著
朝鲜会通条例	薛培榕著	东游记	吴钟史著
游高丽王城记	吴钟史著	朝鲜杂述	许午著
安南小志	姚文枬著	越南考略	龚柴著
越南世系沿革略	徐延旭著	越南地舆图说	盛庆绂著
越南山川略	徐延旭著	越南道路略	徐延旭著
中外交界各隘卡略	徐延旭著	琉球说略	姚文枬著
琉球朝贡考	王韬著	琉球向归日本辨	王韬著
缅甸考略	龚柴著	日本疆域险要	傅云龙著

- | | | | |
|----------|------|---------|------|
| 日本沿革 | 傅云龙著 | 日本近事记 | 陈其光著 |
| 日本通中国考 | 王韬著 | 使东述略 | 何如璋著 |
| 使东杂记 | 何如璋著 | 日本杂事 | 黄遵宪著 |
| 扶桑游记 | 王韬著 | 东游日记 | 王之春著 |
| 东洋琐记 | 王之春著 | 东槎杂记 | 姚文栋著 |
| 东槎闻见录 | 陈家麟辑 | 游日光山记 | 黎庶昌著 |
| 日本山表说 | 傅云龙著 | 日本河渠志 | 傅云龙著 |
| 印度考略 | 龚柴著 | 西轺日记 | 黄懋材著 |
| 游历台言 | 黄懋材著 | 印度札记 | 黄懋材著 |
| 波斯考略 | 龚柴著 | 阿刺伯考略 | 龚柴著 |
| 俾路芝考略 | 龚柴著 | 阿富汗考略 | 龚柴著 |
| 东土耳其考略 | 龚柴著 | 南洋各岛国论 | 吴曾英著 |
| 南极新地辨 | 金维贤著 | 通商诸国记 | 朱克敬著 |
| 乘槎笔记 | 斌椿著 | 航海述奇 | 张德彝著 |
| 初使泰西记 | 宜屺著 | 使西纪程 | 郭嵩焘著 |
| 英轺日记 | 刘锡鸿著 | 随使日记 | 张德彝著 |
| 使英杂记 | 张德彝著 | 使法杂记 | 张德彝著 |
| 使还日记 | 张德彝著 | 使德日记 | 李凤苞著 |
| 出使英法日记 | 曾纪泽著 | 欧游随笔 | 钱德培著 |
| 欧游杂录 | 徐建宣著 | 西征纪程 | 邹代钧著 |
| 出洋琐记 | 蔡钧著 | 出使须知 | 蔡钧著 |
| 瀛海采问纪实 | 袁祖志著 | 西俗杂记 | 袁祖志著 |
| 涉洋管见 | 袁祖志著 | 出洋须知 | 袁祖志著 |
| 瀛海论 | 张自牧著 | 蠡测卮言 | 张自牧著 |
| 瀛海卮言 | 王之春著 | 西事蠡测 | 沈纯著 |
| 漫游随录 | 王韬著 | 弹丸小记 | 龚柴著 |
| 探地记 | 王韬著 | 使美纪略 | 陈兰彬著 |
| 美会纪略 | 李圭著 | 东行日记 | 李圭著 |
| 廓尔喀不丹合考 | 龚柴著 | 俄罗斯户口略 | 缪祐孙著 |
| 使俄日记 | 张德彝著 | 金韬筹笔 | 曾纪泽著 |
| 俄游日记 | 缪祐孙著 | 亚洲俄属考略 | 龚柴著 |
| 取中亚细亚始末记 | 缪祐孙著 | 取悉毕尔始末记 | 缪祐孙著 |

- | | | | |
|-----------|------|------------|------|
| 中俄交界记 | 王锡祺辑 | 通俄道里表 | 缪祐孙著 |
| 三洲日记 | 张荫桓著 | 出使美日秘国日记 | 崔国因著 |
| 随辇笔记 | 吴宗濂著 |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 薛福成著 |
| 使俄草 | 王之春著 | 庚子海外纪事 | 吕海寰著 |
| 海国胜游草 | 斌椿著 | 天外归帆草 | 斌椿著 |
| 日本国志 | 黄遵宪著 | 适可斋记言记行 | 马建忠著 |
| 东西洋考察记 | 仲跻翰著 | 扶桑十旬记 | 杨芾著 |
| 俄罗斯国志略 | 沈敦和辑 | 英政概 | 刘启彤著 |
| 英吉利国志略 | 沈敦和辑 | 英藩政概 | 刘启彤著 |
| 法政概 | 刘启彤著 | 法兰西国志略 | 沈敦和辑 |
| 德意志国志略 | 沈敦和辑 | 奈塔勒政要 | 郑昌棧著 |
| 摩洛哥政要 | 郑昌棧著 | 喀纳塔政要 | 郑昌棧著 |
| 美国地理兵要 | 顾厚焜著 | 古巴节略 | 余思诒著 |
| 中亚美利加五国政要 | 郑昌棧著 | 委内瑞辣政要 | 郑昌棧著 |
| 科仑比亚政要 | 郑昌棧著 | 巴西地理兵要 | 顾厚焜著 |
| 巴西政治考 | 顾厚焜著 | 喀喇道政要 | 郑昌棧著 |
| 玻利非亚政要 | 郑昌棧著 | 巴来喇政要 | 郑昌棧著 |
| 乌拉乖政要 | 郑昌棧著 | 阿根廷政要 | 郑昌棧著 |
| 智利政要 | 郑昌棧著 | 海带政要 | 郑昌棧著 |
| 山度明哥政要 | 郑昌棧著 | 地球方域考略 | 邹弢著 |
| 朝俄交界考 | 马建忠著 | 缅甸图说 | 吴其祜著 |
| 日本风俗 | 傅云龙著 | 东游日记 | 黄庆澄著 |
| 游盐原记 | 黎庶昌著 | 访徐福墓 | 黎庶昌著 |
| 南行记 | 马建忠著 | 南行日记 | 吴广霈著 |
| 苏禄考 | 王锡祺著 | 奉使伦敦记 | 黎庶昌著 |
| 卜来敦记 | 黎庶昌著 | 白雷登避暑记 | 薛福成著 |
| 巴黎赛会纪略 | 黎庶昌著 | 游历意大利闻见录 | 洪勋著 |
| 游历瑞典挪威闻见录 | 洪勋著 | 游西班牙闻见录 | 洪勋著 |
| 游葡萄牙闻见录 | 洪勋著 | 游历闻见总略 | 洪勋著 |
| 游历闻见拾遗 | 洪勋著 | 伦敦风土记 | 张祖翼著 |
| 西海纪行卷 | 潘飞声著 | 天外归槎录 | 潘飞声著 |
| 泰西各国采风记 | 宋育仁著 | 天下大势通论 | 吴广霈著 |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第25页A至26页B：“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需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彼此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适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来言，各有将大清律例翻出洋字一书，并言外国有通行律例，近日常文士丁韪良（W.A.P. Martin）译出汉文，可以观览。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惟文义不甚通顺，求为改删，以便刊刻。臣等防其以书尝试，要求照行。即经告以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据丁韪良告称，大清律例现经外国翻译，中国并未强外国以必行。岂有外国之书，转强中国以必行之理。因而再三恳请。臣等窥其意，一则夸耀外国亦有政令，一则该文士欲效从前利玛窦等在中国立名。检阅其书，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钳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杂，非面为讲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请，因派出臣衙门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澂师、毛鸿图等四员，与之悉心商酌删润。但易其字，不改其意。半载以来，草稿已具。丁韪良以无货刊刻为可惜，并称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即如本年布国（Prussia）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Denmark）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臣等共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印成后，呈送二百部到臣衙门，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

又，*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206.

④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页，光绪元年三月初六：“将来威使（Thomas F. Wade）派员到滇时，应查明公法书内第四卷所云：调兵不能行于局外之地，各国和好时，固可有权索路，惟不得强为通行。局外者或准或禁，皆可任意等语。中华自主之国，岂容他国无故调兵入境。如未商准，则军民势难甘服。”

④ 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London, 1901) pp.68-69.

又，王家俭：《文祥对于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历史学报》第一期，台北，1973，第219-239页。

又，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24页B：“即如开埠一款，中外

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

- ④《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页，光绪四年御史李璠奏：“今中外税则已定，不能骤更，条约又有‘各国均沾’之语，于是日用之需及奇技淫巧之物，纷至沓来，下则工贾吃其亏，上则税厘受其害，今日求开口岸，明日求免厘金，一国既去，一国又来，循环无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不胜其扰者矣。此中国通商受害之实情也。”

又，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

又，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页B至第2页B：“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貽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西人始来，不过一二国，中国不知其牵率而至者如其众也。既因有此约，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失计莫基于此。从前诸国以英国为主谋，英国允而各国莫不照行，是尚有统宗之处。今则德国雄长欧洲，每事与英竞胜，且烟台条款，德人藉英人之力沾利多矣。今复以修约而诛求无已，而英人亦乘间而导之，合力以谋之，此皆利益均沾一语阶之厉也。往者不可救，来者犹可追，今欲顿弃前约，彼必不可从也，莫如存其名而去其实，使彼相忘于不觉。往者戊辰与英国所订新约，第一条及照会之文，用意甚善，惜乎其未行也。又闻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之议，拟订各国通行之约，另设一汉文条约底式。凡有外国订约者，即按通行之约以授之，此诚省事之良法也。利益均沾之文不必去，而其弊自去矣。今岁德国修约，尚未定议，英法亦届修约之期，如竟能罢论固善，不然则三国同时议约，宜告之曰：约文有一体均沾之语，若稍有参差，则一事两歧而开办无期，莫若乘立约之始而会归于一，英法德三国既允，其余诸国可无虞矣。他日届期修约，彼即不能迭出以相尝，万一意见不合，不过互相牵制不行新约而止耳。各国无端之喧聒其少纾乎。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管理也。夫商民居何国何地，即受治于此地之有司，亦地球各国通行之法。独中国初定约时，洋人以中西律法迥殊，始议华人治以华法，归华官管理，洋人治以洋法，归洋官管理，然居此地不受治于有司，则诸事为之掣肘，且中国之法重，西洋之法轻，有时华人洋人同犯一罪，而华人受重法，洋人受轻法，已觉不均。今即以人命论，华人犯法，必议抵偿，议抚恤，无有能幸免者。洋人犯法，从无抵偿之

事，洋官必又多方庇护，纵之回国，是不特轻法所未施，而直无法以治之矣。此无他，有司无权之故也。为今之计，既不能强西人而就中法，且莫如用洋法以治洋人。按烟台条款，有照会各国议定审案章程之约，赫德亦谓华洋讼件，宜定一通行之讯法，通行之罪名，乃能经久无弊。近闻美国与日本议立新约，许归复其内治之权，外人皆归地方官管辖。中国亦宜于此时商之各国，议定条约，凡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大吏遴选干员，及聘外国律师各一人主其事，凡有华洋讼件，均归此衙门审办。”

-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6页：“今海外诸夷，一春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尚，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权，曷可少哉！”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续编》卷中，第12页A：“俄国地广兵强，志在兼并，方诸列国，无异嬴秦。”

又，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第9页：“夫欧洲列国，壤地毗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也。而欧洲自胜朝之末，以迄于今，交涉之道，专主于此。”

又，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第21页：“呜呼！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欧洲诸国皆由西而东，有火车以通同洲诸国，有轮船以通异洲诸国，联络远近，势同衽席。又以电标为之通达信音，虽数万里之遥，捷于顷刻，迹于咫尺。此固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也。仅行之于数十年间，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罗，有若春秋时之列国，一变之效何其速欤。而儒生之拘墟于见闻者，尚复昧昧于其故，而不知上达天心，下权人事，夫亦可哀也已。夫春秋时之秦，与战国之秦一也，而何以强弱迥异，则以前日有晋为之蔽，而秦不得东逮，三晋分而韩魏弱，秦乃得蓄力乘时，而肆其蚕食矣，逞其鲸吞矣。今日之俄，其势亦犹夫秦也。”

又，彭玉麟：《盛世危言》序云：“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尝读春秋，知当时君相，

无不周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日求富强之策，不以资格限人，似无异于今日泰西各国。我朝怀柔远人，海禁大开，亦当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源，方有着手之处，岂徒尚皮毛购船炮而已乎。”

又，葛士藩：《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〇一，第9页B，殷兆镛云：“按泰西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能统一于一尊。最大者为俄为英为法为美，而普鲁士后出，亦颉颃其间，与中土从前之战国绝相似。”

又，陈虬：《经世博议》卷四，第8页B：“夫今日之俄罗斯，战国之强秦也。五洲诸国，皆有约纵之意，故俄欲出红海并欧洲，则英法扼之于土耳其，既不得志于西，将鼓棹东向朝鲜，英人又踞巨文岛以制之。”

又，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6页A，许克勤云：“尝谓欧西诸国，大小相维，迭为雄长，一春秋列国之势也。而迩年以来，德义奥合纵，俄法连横，则又将有大战国之机。”

又，同前书，同卷，第14页A，叶瀚云：“夫欧洲各大国今尚强盛，已虞不足抗俄，诚以俄地形利便，略如战国之秦。”

又，同前书，同卷，第19页A，钱文霏云：“窃以今日战国之势，观诸昔日战国之势，则今日之强俄，犹古之强秦也，古之并六国惟强秦，窃恐今日并四国者即在强俄也。”

又，同前书，同卷，第20页A，项藻馨云：“故就天下大势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义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其堂堂上国，居正朔而大一统者其惟我中华乎。”

又，同前书，同卷，第29页B，杨毓辉云：“方今欧洲各国，犬牙相错，棋布星罗，其上则好大喜功，各思辟其土地。其下则扬威耀武，每欲逞其才能。人心之不齐，亦已甚矣。各国中若德若奥若义若俄若法皆强国也。以强遇强，咸有戒心，远交近攻，各结党援，于是合纵则德奥义固，而俄法无以伺其隙，连横则俄法亦固，而德奥义无以狡其谋，是盖互相维持，亦互相铃制也。”

又，陈炽：《庸书》卷八，第1页B至第2页A：“俄人蚕食鲸吞，见利忘义。彼何爱于中国，独能善保初终。故西伯利亚铁路之工不成则已，成则必败前盟，必攻中国，断断然无可疑者，秦霸西戎，东面以临天下，俄背北海，南下以争中原。先后同揆，若合符节。故俄罗斯者，今日之

强秦也。德相必思马克（Bismarck）曰：俄地如长蛇，袤延三万里，荒远寒瘠，他人所弃。而西界欧洲，东邻中国，皆富庶之名邦也。若权衡然，轻重相等，彼得中国，必灭欧洲，彼得欧洲亦必并中国，惟东亚合力拒而塞之于内，始可永持大局之平。英国君臣深窥此意，舟师铁舰随所向而犄之。然陆兵无多，必结援他国，欧洲之近俄足以敌俄者惟德国，亚洲之近俄足以敌俄者惟中朝。故德之与中，相距七万里，而唇齿相援之局天定之矣。德联奥意以保土，中联日本以保高，俄人用兵于西，则德合奥义御之，而中国议其后。俄人取道于东，则中合日本击之，而德国捣其虚，英以海军游击其间，水陆相资，首尾相应，则柙中虎兕，虽永不复出焉可也。”

- ④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第10页B至11页B：“夫均势之说，创于范斯法尼（Westphalia）之会，然而与会者不过法奥瑞典西班牙暨日耳曼之属。而普因北教而屏，英以异教而斥，故其相维之势足以联络数国，不足以统属欧洲也。至迂特来（Utrecht）之会，英普与焉，而俄国不与，是均势之盟未尽善也。且范斯法尼之会，诸国虽共订条章，而西班牙与荷兰另有孟斯德（Münster）之约，日耳曼王率属邦先与瑞典有奥斯勃卢克（Osnabrück）之约，继与法国复有孟斯德之约，法国与西班牙又有比来纳山（Pyrenees Mt.）之约，前后纷纭，而统谓之范斯法尼之约。又迂特来之会，英人先与法王盟，继与西班牙王盟，复与他国王分盟。然则是二会者，只属数国之私盟，而非列邦之公约。夫会者所以结同盟之信，盟之者众，则信益彰，而守愈笃。今此二会，散漫无纪，不能共相维持，宜其不久而各国弃髦之也。维也纳之会则不然，俄国与约而均势之道公，友邦共盟而要结之谊固。”

又，同前书，同卷，第13页B至14页B：“盖天下事众擎则易举，孤掌则难鸣，理之常也。夫同宅囊中，此疆彼界，而建为国，则必小事大，大孚小，忧危与共，战守相援，而势乃不孤。故英得法助，奏绩于黑海之滨。意与法连，逞志于绿瓊之上。比利斯交欢于英法，自成局外之邦。合众国求助于法王，得行自主之政。此皆邦交之实有所援也。或恐邻国之袒我仇而因与之交者亦有之，如普之攻奥也，结法人而饵之利，则奥独而危。及其攻法也，善俄国而申之盟，则法孤而败。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英人之交，惟利是图，利在则友，利亡则寇。列国之结欢于英者，大抵无实德之可

图，只求其不助之助耳。尝慨今之不善交者莫土人若，见俄国之日强，故附之，而俄已三削其地矣。见法人之喜功，故亲之，而法已两夺其权矣。又见英人之已护也，故私之，而英几半分其国矣。嗟夫，当回人之灭东罗马也，辟疆展土，欧西为之重足而立，所来使臣，动加鞭笞，而莫敢谁何。今则时穷势迫，国内之政教财赋反为外人牵掣，民贫国蹙，僻守一隅，几于国不其国者何也，处递变之时，不因时而与之俱变，内无定向，而知变之士穷，外无友邦，而应变之方少。徒守此千百年前玛奥买所著伊朗一书，欲以应夫千百年后世道之变，无感乎日就削亡，徒为天下后世多一泥古不通今之龟鉴，可不惜哉。”

又，郑观应：《易言》卷中，第13页：“昔诸葛之治蜀也，欲讨魏必先和吴。盖必有心膂之交，乃不受腹背之敌，老谋深算，动出万全。今洋人恃势纵横，观衅而动，我国受其挟制，孤立无援，更宜图之于早也。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然英人险诈，法人鸷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宜外与联合，内严防守，不可或忽也。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携诚布公，立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藉声援。若日本则器小易盈，夜郎自大，中国仍当严备，设重兵于沿海，以杜其机心，驻钦使于藩邦，以通其声气，如有蔑法背约等事，则遣使责之以理，使其有所慑伏，不敢肆行，守在四夷，道不外于此矣。”

又，曾纪泽：《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一，第8页B，记载张焕纶之条陈云：“一曰固结英好，以弭俄患，今日之俄，七国之秦，而英则齐，土则魏也。秦人不得志于魏，不能跨六国，俄人不得志于土，不能跨欧洲。秦人远交齐而近攻魏，秦之得志于六国，齐为之也。英人阳护土，而阴蔽欧洲，俄之不得志于欧洲，英为之也。伯灵城之会，各国公使多观望游移。岂不曰英之护土，护印度也，私也。是岂诚然矣。岂知印度危而英危，英危而欧洲诸国亦必危。且岂惟欧洲诸国哉。诚能未雨绸缪，厚结英好，英既德我，俄亦不敢正视，而新疆回部，地近印度，俄人挟以要我，俄人得志于新疆，亦英人之忧也。异时或当得英之助，出为排解，英既出全力以护土，独不能稍有余力以助我哉。”

④ Kuang-ching Liu, "Cheng Kuan-Ying's I-yen: Reform Proposals of the Early Kuang-hsü Period,"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

VIII, Nos. 1~2 (Taipei, 1970).

又，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25页A：“向者英使阿利国（Sir Rutherford Alcock）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忧，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

④⑧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七，第21~23页。

④⑨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附录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其英文本为：Marquis Tseng,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18: 146~153 (1887)

⑤⑩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1页B至第3页B；卷四，第9页A。

⑤⑪ 陈虬：《经世博议》卷四，第8页B：“虬尝议联五洲设一大公法会于印度，主持公法，取其地居东半球之中也。若准以易理，朝鲜其次也。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原注：易明夷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陈畴演范，独受朝鲜之封，必非无意。）三十年后，上杂用事，明夷之九三将起而应之，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吾说或亦将有所施乎！”

⑤⑫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第39页：“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又，《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第43页云：“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又：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1页A：“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⑤⑬ Kuang-Ching Liu, "Cheng Kuan-ying's I-yen: Reform Proposals of the Early Kuang-hsü Period",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III, Nos, 1 and 2 (Taipei, 1970).

又，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九，第59页B至60页A，与胡光墉书：“来示新出掘井开河机器，极为利用，自明以来泰西水法既已

著称，前曾托幼丹制军代购，迄未见覆。又兰州制造委员赖长，以己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伊拟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希即留意访购。（赖镇所呈之图，并附览）盖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见通饬陕人凿井区种，以救旱荒，尊处购掘井、开河机器，并请雇数洋人（原注：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

又，同前书，卷二二，第33页B，致王文韶书：“见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潜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购运泰西机器，延致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纵使有成，亦非十年以后不能睹其成效。”

- ④ 陈炽：《庸书》，内篇，卷二，第2页B至3页A：“中国农政，自齐民要术外罕有专书。乡曲老农卜岁祈年，间有传习。泰西以商立国，而人稠地狭，农政亦所究心。农事有书，植物其学，近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所验各土质外，植物所断不可缺者三：曰硷，曰磷，曰钙。硷则薰草积水酝酿而成。钙则中国之石灰是已，有取之于山者，有出之于地者，有骨角所成者，有螺蛤之壳所化者。磷则海岛鸟粪所含最多，中土致之匪易。然彘驼羸马人畜之矢溺皮毛骨革，及腐草败木之间，均含此质，所谓朽腐化为神奇也。中国之民知其事而不明其理，故深根厚壘，漫久而自失其传。同此人民，同此土地，而今之与古，腴瘠不同，贫富不同者，教不教之分耳。谓宜荟萃中外农书，博采旁稽，详加论说，宜古亦宜今，宜西亦宜中，宜南亦宜北，不求难得之物，不为难晓之文，括以歌辞，征以事实，颁之乡塾，以教童蒙，俾菴屋穷檐，转相告语，家人妇子，力穡劝功，而后加以董劝之章，导以积储之备，兴水利以防旱潦，勤纺织以殖货财，斯农政可兴，农功可立，民生日厚，而民气日强也。”

又，《国父全集》第五集，第4~5页，上李鸿章书云：“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而尤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蓄，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憾也。夫天生人为万物之

灵，故备万物为之用，而万物固无穷也，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养，而上可生五谷百果以养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长六畜以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尽而用不竭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别土质之美劣而已。倘能明其理法，则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农作物之生长，电力能速农务之成熟，此又农家之格物学也。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数国之大也。”第11页又云：“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今欲振兴农务，亦不过广我故规，参行新法而已。”

又，《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29页，上海务农会章程云：“农居四民之一，虽与工商并称，然必地面生材饶裕，方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则农实为工商之本。中国壤土之沃甲地球，乃汉唐以后，民趋末富，不究根源，致士夫不辨粟麦，农民贱于舆台，土壤不辟，水利不修，耕畜之技日拙，收获之效愈微。使再阅数十年，将并从前之农法农理尽失靡遗，可惧孰甚！中国患贫久矣，谋富者颇不乏人，要不出开矿制造经商等事，此固当务之为急，然循流溯源，则农尤先务。”

-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一，第15页B：“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

又，同前书，同卷，第15页B至16页A：“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则时文重而西学轻也，上之所重，下必有甚焉者矣。上之所轻，下必有不屑为者矣。若夫胡曾诸巨公，皆少年登第，抛弃八股敲门砖，重研精于经济之学，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是科第以斯文重，非人材从八股出也。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

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

又，汤震：《危言》卷一，第14页A：“彼西人之挟以陵栝我者，其育才之法非真擅造化之绝技，有鬼神之秘授也。艾儒略撰西学，凡一卷，述其建学之法，凡分六科：曰勒铎理加即文科。曰斐禄所费亚即理科。曰默弟济纳即医科。曰勒义斯即法科。曰加诺搦斯即教科。曰陡禄日亚即道科。今泰西已小有删并，大氏有乡学院，有郡学院，有实学院，有仕学院，有大学院。学凡四科：曰经学，曰法学，曰智学，曰医学。一艺之成，得专其利，得世其业，无论士农工贾，陆军水师，靡不出身学堂。讲明其理，娴习其事，故所以强食弱肉，要自有本原在，而坚船利炮，特其末焉者也。”

- ⑤ 陈虬：《经世博议》卷一，第3页A：“夫科目者人材之所出，治体之所系也。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改设五科：曰艺学科：曰射，曰算。射取中的，算试九章。曰西学科：分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方言学六门，试以图说，翻译。曰国学科：颁大清会典，六部则例，皇朝三通，试以疏判。曰史学科：取御批通鉴集览，当另刊皇朝新史，颁行学官，试以策论。曰古学科：经则五经、周礼、语、孟、八经，子则管、孙、墨、商、吕氏五家，试以墨义，备五场者始得录。如此则由浅入深，实事求是，国无异学，士皆全才，治平之道基此矣。”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一，第19页B：“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请分立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经史，以覘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吏案，以观吏治。首科既毕，凡海疆各省主试者，宜就地会同各西学大书院山长，订期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算、化、光、电、矿、重之学；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考生各卷，皆由山长分别取中，呈主试者鉴定，论其艺不论其文，精其选不定其额。令于制艺外习一有用之学。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凡深明政治律例者，名为政学举人。精通艺术者，名为艺学举人。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得以考列上等者，名为文学举人。政学艺学用以富国强兵，较文学尤重，有若泰西牧师然。使其专以著述，宣扬孔孟之教，导以训民化俗。如此变通推广，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

又，宋育仁：《时务论》第39页B至40页A：“今国子监，古之太学成均也。上书房景山威安八旗官学，则王宫虎门之学也。大小书院，则

古之族塾党庠州序也。然教官与试官不谋，司教者不典试，典试者不司教，决进于一日之长，不关于平时所学，则学者不劝，而贤能无自而兴。外国升进，举由于学。其学分大学、中学、小学三等。十七岁以前，无人不入小学，操别业者，或入中学而止。为士者皆入于大学。学分五科，共一院而分治业，由学院考取。成名以后，多著述有重望，乃得为大学教习，命为博士。国设典试官，与大学博士参主选士，考授丞贰吏胥之属。典试官为主考，取五科之士，博士为主。于平日群萃州处，考校而以为优，即关于学部，由大学生徒得升为中学教习，其艺多者其廩厚，不名一艺者不得升，由成一艺以上，又能通达事体。凡大学得专举议员，博士与群士，即得举所知以登于议院。”

- ⑤ 汤震：《危言》卷一，第13页B至14页A：“亟乞明诏中外，所有省府州县各书院，一切铲除旧令，改延谙习西学者为之教习。取同文馆章程放示之，就原设之额，拣之、汰之、并之，而以岁数百人之饬饬数十人，季锻之月炼之，致知格物，实事求是，领异标新，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舍书院其焉储之乎。二十三行省书院，何翅以千计，一书院储才者数十人，千书院可储才者数万人，而群索其骏，而类拔其尤，将取之不胜取，用之不胜用，虽驱驾风霆簸达夷长不难矣。储之于书院，以励其专精，进之于学校，以正其心志，事无便于此，亦事无要于此者。”

又，陈炽：《庸书》卷五，第4页A：“宜于各埠一律增设书院，延聘中西宿儒主之。薪俸必极丰饶，规模必期闳壮，斋舍制度，参仿华洋。由海关道主持其事，所需经费，酌取之关税房租，约捐百分之一，已能敷用。学业成后，咨送京师考验，录用补官，次出洋学生一等，愿应艺学科者，赏给生员，一体乡试，此又一途也。”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一，第20页B：“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既求实学当列科考，如唐时之制度，各专一艺。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选聘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选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以三年为期。其膏火经费，仿上海龙门书院章程，官为筹备，按月出题课试，所出之题，务须有裨时务，如铁路、轮船、矿务、邮政

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钱法、钞法、测量、测候、地理、地輿、博物院、赛珍会、息兵会、派员游历、使臣出洋，与夫各国风土人情、文学武备，皆可出题。令诸生详究利弊，择其文之佳者，登诸日报，以广流传，其历考中上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准其一体乡试会试。”

- ⑤ 陈虬：《救时要议》第6页：“何谓开议院？泰西各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顾其制繁重，中国猝难仿行，宜变通其法令，各直省札飭州县一例初设议院。可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四，第1页A：“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又，宋育仁：《时务论》第11页：“彼国有上下议院，上议世爵为主，下议士民为主。两比而从其众，两持而折其中。周礼宰夫掌万民之逆逆者，如上书矣。是民得以言达于上也。司寇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则举其重者而兴贤与听讼，又皆有询众庶万民之事，上下情通，则文具之法无焉，而弊之泰甚者亦去矣。”

- ⑥ 陈炽：《庸书》卷七，第1页A：“前倡乡官之议，实与议院略同，必列荐绅方能入选。县选之达于府，府举之达于省，省保之达于朝，皆仿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举主多者为准，设院以处之，给俸以养之，有大利弊，会议从违，此下议院之法也。”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四，第2页：“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遵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又，宋育仁：《时务论》第34页B至35页A：“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仍请征信于敌国已行之效。一曰：通下情。外国凡有举废，皆询于上下议院，两院议定后谋定，国主报可而后施行。虽有植党而交诤，未有欲陈而无路者也。凡有陈告，皆无所壅，交诤之久，而是非亦见。夫非必能所行俱善，然两议而决所长，两端而从其众，此心有多取于顺民情者矣。其制下议院议士由民举，权至重。临议政府长官列坐而听，可面相诘难。上院亦如之。遇相持不下，则分曹而别其左右袒，视两袒而从其众。周礼询国迁，询国危，询立君。以为国之非常，故始谋及众庶。其平时举措皆有定制，惟宾兴贤能与治讼狱，非周咨广听，则贤否相乱，是非不得其情。故有询万民之事。”

④ 陈炽：《庸书》卷七，第1页A：“英人勦之于前，德国踵之于后，所以威行海表未艾方兴者非幸也，数也，圣人复起无以易之也。”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四，第8页：“其名曰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知此乃可与言公法。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可相维系者何？合性法例法言之谓。夫语言文字政教风俗固难强同，而是非好恶之公不甚相远。故有通使之法，有通商之法，有合盟合会之法。俗有殊尚，非法不联。不能相统属者何？专主性法言之谓。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尔雅释训云：法，常也。可常守也。释名曰：法，逼也，逼之使有所限也。列邦雄长，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有常法以范围之，其何以大小相维，永敦辑睦。彼遵此例以待我，亦望我守此例以待彼也。且以天下之公，好恶为衡，而事之曲直，登诸日报，载之史鉴，以褒贬为荣辱，亦拥护公法之干城。故曰公法者万国一大和约也。”

又，陈炽：《庸书》卷七，第4页B：“诚以断者不可复续，死者不可复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无中外古今一也。惟彼此相衡，仍觉西轻而中重，每有交涉，动启纷争。泰西领事诸官，乃得操会审之权，不复以与国相待。日本东瀛小国耳，而西人之商于其地者，俛首服罪而无辞。国体所关，非细事矣。”

又，何启、胡礼垣：《新政真铨初编》第11页：“夫公平者，国之大本也。国之有公平，犹人身之有脊骨，脏腑之有气血也。人无脊骨，则

耳目手足虽具，而起立无能，人无血气，则肌肤筋骨虽全，而活动不得。国无公平，则虽猛士如云，谋臣如雨，勇夫如海，铁甲如山，亦不能服人心而昭众信。今者中国之律例其有平乎？无也。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陵迟梟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今者中国之法司其有公乎？无也。缙绅名帖，可遽无事，何公之有。苞苴载道，上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贫者无辞，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倾家，何公之有。监牢刻酷，不得为人，何公之有。其不平不公也如是，即中国人尚欲高举远颺，避水火而寻衽席，而谓外国人肯明知故犯，投罗网而人樊笼哉！吾料欧洲诸国，其朝廷苟非丧心病狂，盲聋否塞，必不忍以其商民赤子，付诸威福任意之华官。吾故曰：其决不肯从者，以中国无公平之故也。”

- ⑫ 宋育仁：《时务论》第3页B：“泰西诸国例，皆同平人，有罪则罚，令坐监工作，以国服为赎，期满而舍。此周礼司空之役也。周礼：国之有罪，纳之圜土，而施职事役诸司空，又乡师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其役自三月至于期，上罪在司圜者乃三岁而舍。言辟则为罪罚，可知言役则为工作抑明矣。此则服罪者无闲民，役工者恒省费。”

又，同前书，第8页B至9页：“外域刑简，明丽于法，皆罚以出财入官。其听讼也，官司重取焉，明著为令。罚之为政古矣，尧典金作赎刑，周官之言罚者屢，司教曰：民之有裘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胥师之有诛，罚也。质人司关之有举，罚也。廛人敛其罚布矣，职金入其罚金矣。于后甫侯训刑，更详定罚鍰之格，著以为律。夫财者民所爱惜也，而丽于刑而命之赎。方且感上之仁，耻诸明刑焉，而亦弃于人群矣。临以剜剔之严，民知罪当而幸免，即亦不敢多方以逃罚，此与明刑肉刑相须为用，圣人意深远也。夷固未足知此，直以罚金为罪，尚且行之。而行矣，司寇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令人束矢钩金，然后听之。今中国听讼，有司亦取财，而以为陋规，不敢上闻，则何不较然而明之为愈也。外国因此而讼转稀，常会其罚人以供役，费则相当矣，绝私贿之路，而有养吏胥之资。”

- ⑬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人有自主之权；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

道。”

⑥ 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台北，1973）。

⑦ 同前。

⑧ 在 1895～1899 年之间，所新编之集合丛书，至少 12 种，其中沿用经世名称者 3 种，用时务名称者 3 种，用西学名称者 3 种，其余用自强、富强、西政名称者各 1 种。兹开简目于后：

自强学斋治平十议	(1898)	西学格致大全	(1897)
富强斋丛书	(1899)	西学大成	(1895)
续西学大成	(1897)	时务通考	(1897)
时务经济策论统宗	(1898)	时务丛钞	(1895)
皇朝经世文续编	(1897)	皇朝经世文新编	(1898)
皇朝时务经世文续编	(1897)	西政丛书	(1897)

⑨ 在 1895～1898 年之间，中国人自行创刊之报纸至少 22 种，在上海发行者 10 种，在长沙发行者 2 种。在成都、澳门、天津、北京、桂林、无锡、广州、日本东京发行者各 1 种，未知发行地者 2 种。兹开简目于后：

报刊名称	出版地	发行人	创刊年代
中外纪闻	北京		1895
时务报	上海	梁启超	1896
农会报	上海	张 睿	1896
知新报	澳门	康广仁	1897
蜀学报	成都	宋育仁	1897
国闻报	天津	严 复	1897
湘学新报	长沙	江 标	1897
译书公会报	上海	董 康	1897
蒙学报	上海	叶 瀚	1897
广仁报	桂林	史念祖	1897
求是报			1897
实学报	上海	王仁俊	1897
萃报			1897
演义报	上海	章伯初（字）	1897
算学报	上海		1897

格致新报	上海		1897
女学报	上海	黄瑾娱	1897
中国官音白话报	无锡	裘廷梁	1898
广智报	广州	倚剑生(笔名)	1898
昌言报	上海	汪康年	1898
湘报	长沙	熊希龄	1898
清议报	东京	梁启超	1898

⑧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 135～162 页。

又，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 90、98、199～206 页。

⑨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399 页，保国会章程。

又，张之洞：《劝学篇》卷上，第 2 页 B。

又，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1971), pp.253～254。

⑩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三卷六期（台北，1970）。

又，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五卷八期（台北，1972）。

⑪ 郑观应：《易言》卷中，第 15 页 A 至 16 页 A：“乃近日目见耳闻，凡洋人之到中华，每以言语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恫喝要求。以致交涉之案，层见叠出，而中国顾全大局，戒开边衅，遇事则官长过于迁就，土民不敢抗衡，洋人习以为常，愈无顾忌，如轮船于河道港口，驶行无忌，与华船相撞，小则船具毁坏，大则人货俱沉，被控到官，仍复强词申办（辩），或咎华人不知趋避，或诬华人桅灯不明，改重从轻，苟且结案，而华人之身家性命，尽付东流，负屈含冤，无可控诉。又如往来孔道，马车驰骤，行人偶不及防，无论蹂践死伤，竟策马扬鞭，不顾而去，倘旁人阻止，与之理论，反谓车来当让，大肆咆哮，即使扭赴公堂，亦仅以薄罚完结。又如洋行所雇华人，每月工金多寡，固有定约，给发亦有常期，而往往藉衅生端，多方扣减，少不称意，即行毆逐。甚至持枪恐吓，偶一失检，酿成命案。及事经官府，又复委曲调停，仅援误伤之条，予以薄罚。而尤为残酷者，则莫如粤省奸匪，与洋人串通，散布四方，拐诱乡愚，贩卖外洋，永为奴仆。闻古巴、秘鲁、亚弯拿等处，岁中可陷华人以千万计，其残忍刻薄，既大伤天地

之和，其暗骗明欺，复显背中西之约，惜路隔重洋，无人查办，莫为发其覆而斥其奸耳。”

又，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5页A：“至于华人之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颐指气使概，殊令人不可向迳，其待仆隶下人频加呵斥，少不遂意，辄奋老拳，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随其后矣。其游历内地也，亦如此，所以动至取祸。”

又，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第10页：“至谓外国所以待中国者，揆以交际常情，殊失公道。此事确凿，受侮正多，可为常太息者矣。夫中国自主之国也，言其民庶，天下无与比伦，论其冠裳，各邦无此文物。礼教则先于万国，纲常久炳于中华，似宜出则为外国所钦，入则为外人所敬矣。今也不然，和约各款，有大失中国之权衡者矣，然而不得可行也。苟求之事，有多违中国之意见者矣，然而不得不从也。中国所为，或于约章稍类不合，外国则严斥而切责之。中国不敢不速谢过也。外国所事，或于约款大觉相违，中国虽婉言而善道之，外国犹搪塞未遽持平也。盖一则视和约为一成不易之规，一则视和约为可有可无之物也。为上如此，为下可知。今中国人与外国人之交接者，应得之礼数，鲜可得之也。应有之体面，鲜能有之也。事之可为者，鲜见其准为之也。情之可谅者，鲜见其能谅之也。其待华人也，有以畜类待之，而不以人类待之者矣。其视华人也，有以鬼物视之。而不以人物视之者矣。欺藐原生于一国，偏憎遂及于万民，畛域久积于心胸，齟齬辄成于交涉。冤抑之诉，往往而闻，枉屈之端，时时习见。此则大为可悯，而深觉不平者也。”

又，《时务报》第68册：“西人客于中国者，其视华人如畜类，不复以人理待之，今于四明公所一案，法租界中枪毙无辜华人至十余人之多，睹于此举，而益信西人居心之毒也。呜呼！此十余人，何罪应死，亦曾经审定其罪状否乎？如不必待审定，而以死处之，此只可施于畜类者，曾谓人之与人，可以此理相施者乎？此十余人者，既以无辜而可以处死，则凡在租界之内之华人，彼西人皆可以处死此十余人者处之，且不待租界之内也，凡属中国之人，彼西人皆可以此处死十余人者处之。”

⑳ 进化论之输入中国，严复的言论与译著为极重要的先驱媒介。他的言论出现，立即引起中国官绅的广泛注意，并毫无犹豫地普遍接受，辗转申述，互相发明。在中国思潮中引发无数连锁反响。参考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1964), pp.43-80, 98-112。

又，有关存亡的自觉，参看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台北，1971），第1-46页。

㉑ 黄尊：学战会启：“昔者英扼罗马，该撒何以退兵。美辖伦敦，纽约何以立国。普蹶于法，何以兴民会。日本见劫，何以起藩议。凡此皆有学、皆有会皆得成群以至于今日。抑且有说者，回部奚为而没。况（波）兰奚为而灭。印度奚为而亡。朝鲜、安南、缅甸、琉球，凡此中国之属，奚为群群而渐灭。然则不有策，何自战，不有战，何自存。不有存，何自群。”《湘报类纂甲编》卷中，第9页A。

又，湖南龙南致用学会章程序：“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群则强，不群则弱，此古今万国之通例，中国之已事可睹也。士苟欲群，必资学会，习方言文字，群则声以迭审而明，求勾股几何，群则法以分研而备，况质疑问难，古有明言，孤陋寡闻，并垂法戒，独处则虽得不多，乐群则其效斯溥，诸子诵习先训，既宏且多，倪亦以为然否？”（《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65页）

㉒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四，第15页B至16页A：“抑吾尝闻之，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求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知，而不自安于愚。夫而后士得究古今之变，而不仅以旧德之名世为可食也。农得尽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畴之畝亩为可服也。工得讲求艺学，探索新理，而不复拘拘高曾之规矩为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虚，操计奇赢，而不复斤斤于族世之所需为不可变也。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泰西各国所以富且强者，岂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群之各自为谋也。”

又，严复译《天演论》（T.H.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卷上，第45页：“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卷下，第4页：“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

- ⑤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 19 页 B 至 20 页 A：“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

又，张之洞：《劝学篇》序：“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 ⑥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抄本，总论人类门。

又，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三，第 7 页 A。

又，《湘报类纂》乙集，卷上，第 23 页 B，谭嗣同讲演辞：“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

又，同前书甲集，卷上，第 1 页 B，毕永年语：“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

又，《清议报》第二十七期，欧榭甲云：“生天地之间者，自非犬马奴隶，皆有自主之权。此义在西国虽童子皆能识之，而在中国则罕有知之者。”

又，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五编，劝学篇书后，第 38 页 B：“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此性命之权。”

- ⑦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 3 页。

又，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卷下，第 85 页。

- ⑧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抄本，朋友门。

又，《湘报类纂》甲集，卷上，第 38 页 B 至 39 页 A，樊锥“发轫篇”。

又，同前书甲集，卷上，第 7 页，皮嘉祐：“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之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墨子一视同仁，摩顶放踵，利天

下为之，自谓爱无差等。孟子推其流弊，以为无父，等之已失，何平之有，不知正由爱无差等，乃可渐生平等。夫天下之心，尚同则公，公则恕，恕则和，和则无不理。天下之事，尚同则通，通则群，群则合，合则无不成。公也，恕也，和也，通也，群也，合也，要不外乎一平也。盖尚同为仁之起点，平等为仁之交线，起点既正，交线斯明。故佛法之开教宗，泰西之治家国，皆本乎此。”

①⑨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三，第7页B，“辟韩论”。

又，叶德辉：《觉迷要录》卷四，第32页，引梁启超语：“答问”：“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铺之掌柜也。”

①⑩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治事门：“官者，民所共立者也，皆所谓君也。”

又，同前书，君臣门：“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者，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是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又，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二编，第15页B：“质而言之，虽君主仍是民主，何则？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藉君以护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业方能护，则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其法令之不能行也，于是乎奉一人以为之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

又，《谭嗣同全集》，仁学，卷下，第56页：“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侔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之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①⑪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第22页A：“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观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

又，《皇朝蓄艾文编》卷十，第19页，陈玉树云：“民者君之始”。

又，《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下，第43页，张寿波云：“天下之势，自下而上。传曰：造端夫妇。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17页B至18页A：“鄙人向者所谓天地之创事，古今之变局，诚深忧之也。盖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胥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足下以为然乎否乎，所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也。”

又，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6页B：“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眇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

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六，第20页B至21页A，沈葆楨奏：“窃以为不特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又，《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22页，陈启泰奏：“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夷洋务置而不讲。”

又，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第12页A：“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又，汤震：《危言》卷一，第8页A：“间尝推古今之元会，观天下之大势，而叹互市之局，殆将长此终古。”

又，陈炽：《庸书》卷四，第4页：“以轮舟、铁路、电信三事观之，从此万国通商，遂将一成不变。”

又，《湘报类纂》丙集，卷上，第9页A，皮锡瑞：“使孔孟程朱生此时，不能舍西学不讲。”

- ③ 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四卷二期，第57~102页，民国二十四年（1935）6月，广州刊。

- ④ 王萍：《清初历算家梅文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第313~324页，1971年6月刊。

又，石锦：《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历算学家的治学态度》，故宫文献，二卷一期，第45~60页，1970年12月刊。

又，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73~76页。

⑤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长沙初版，1973，台北影印），第58~61页。

⑥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31~50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五，第47页B，耆英奏。

又，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14页B。

又，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二，第3页，“说群序。”

⑧ 薛福成：《庸盦文编》卷二，第39页A。

⑨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页。

⑩ 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台北，1970，第66~68、113~115页。

又，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78~80页。

⑪ 《湘报类纂》，甲集，卷上，第37页B，樊锥：“开诚篇”：“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又，同前书，第4页，易鼎：“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使敦槃之会以平等待我，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入万国公会，遵万国公法。庶各国知我励精图治，斩然一新，一引我为友邦。是欲入万国公会，断自改正朔易服色始。”

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

一 引 言

在我国说来，“知识分子”是民国以后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定义到今天仍在形成之中，还没有达成一种为学术上公认的界说。早期通用的形式，常是“知识阶级”四字，后来渐渐改正为现今的成词，大致已经固定了，并为大众所接受。本文采用这个成词，仍是习惯地沿袭现时共喻的宽泛的了解，只为使用方便，并无意解决定义上的问题^①。

讲到所谓的“清季知识分子”，这种形容，自然是后来的命义。因为清代人没有这种特殊观念，也没有如此身份的自我认同。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均不自认是“知识分子”，但后人讨论，总必会把他们一并列进去。

虽然“知识分子”一词是现代的命义，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物的了解，却是从古向来就有，只是用不同的词汇作表达而已。中国古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从一个反面的史例，可以获得大部要义。这就是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时所焚之书，包括诗书百家语，而仅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可以知道古代百家九流，凡为思想言论者均要禁绝。至所坑之儒，竟达460余人，却全为饱学之士，即当时之所谓“诸生”者^②。从这件故事看，可以知道秦始皇的聪明和用心。一个据天下为私有的

专制皇帝是最怕有思想能力的人，和培养传习思想能力的书。而这种有思想能力的人，因为被太子扶苏形容为“诵法孔子”^③，于是为后人传为众所习知的“焚书坑儒”故事。在数千载以上秦始皇所坑的“儒”，正大致相同于今日西方所沿用的 intellectuals。因为后世所沿用习惯，“儒”字常被概括地统称一些有知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却并不一定单单指儒家或仲尼之徒，这已经是数千年来所形成共喻的了解。一个有意义的旁证：就是明末人已称呼西洋学者利玛窦谓之“西儒”，当是最显见的代表，而且和西方的指谓，也是很有趣的符合。^④

自 20 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的发展转变，已经使“儒”字仍限制到学派的专门名词上去，在普遍形成的习惯上，已经不再把“儒”作一般知识分子之普通代称。这种近代学术发展经过，是很复杂的有重大意义的专门问题，这里无法追述。在事实上，学术上新的代称“知识分子”已在日益普遍的为人应用，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展，它所包罗的内容也比传统的意义更要增大。

照前面所说到的有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实际只能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并不等于定义的注脚。因为这种形容是太宽泛笼统，而显得与普通人无大区别。于是必须费工夫做进一步解释。单就学识修养来说，本来重在“识”的造诣。自古以来的了解，是不会把所谓的“学究”看做知识分子的。甚至对这类人形容为“瞽儒”，以作区别。单就有思想能力来说，似乎人人皆可包罗，然必定要达到能表达或介绍系统的理论才可以代表。

清季知识分子，自然大部分是传统社会中培育出来的人物。对于这类人的描述，可以帮助一般定义的形成与参考，并代表本文所涉对象的界说。第一，没有政治传统的阶级性，而是在个人凭藉各项有利的发展条件下成功为社会领导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却限于正统的知识灌输。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书算技术，优伶乐工的传习技艺，均不被视为知识分子。

第三，是传统职性分类中的“士”，即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对于身份立场，他们的自我认识，是有几项原则的条件，认为必然属于知识分子行为的表征。也就是他们身份责行的自省。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二，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这般的有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是传统的知识分子。^⑤

至于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自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但是清季知识分子对于“自觉”是否也有了自觉？也就是他们的自觉意识如何？在这里首先遭遇到，是必须讨论的。这不是自觉的内容问题，而是属于精神状态的反应。对于“自觉”一词，清季人士不甚谈及，而在广泛的言论表达中，却明显地道出一个集体的时代性的政治醒觉。这个政治醒觉指中国全体而言，自起始均不以个人思想状态为代表，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那时曾氏已预言中国将有未来的醒觉，并认为会步上这种道途。可以说确是时代先知^⑥。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自认为醒觉过来，实际还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

当清季知识分子自我感悟到醒觉的精神状态之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努力趋向，就是热切的更要唤醒全国同胞。很自然的他们就担当了先知先觉者的身份。最早的有两个重要先知，就是黄遵宪和孙文，他俩分别地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均引先知先觉自任。黄氏有谓：“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⑦而孙氏更自先知先觉的立场而草创其救国建国的思想体系，其撰民报发刊词谓：“此先知先觉之天

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这真表现了知识分子最崇高远大的宗旨。

继黄孙两位先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近半世纪的醒觉运动，广泛的发抒为先知们唤起民众的呼声。或在自觉觉人，而常以“醒”、“觉”、“苏”、“警”等字参入笔名以至本名。或在发刊报章而冠以醒觉警世名号。群志所趋，表现了知识分子集体醒觉的现象。^⑧

当然知识分子自觉的感悟醒的精神状态，是一个现象；而并不自觉地存在着的觉醒的事实，自当为时更早。因此探讨自觉的内容或所觉的问题与对象，自必顾及全面的知识分子醒觉的事实。譬如早期出现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著）、《盛世危言》（郑观应著）、《危言》（汤震著）等形式的言论。各书题署所表达的辞意，仍在予人以警觉。“抗议”本义在“位卑言高”，著者已明白言之，与今日所谓抗议（protest）一语毫不相干。“危言”，意在警人听闻，均为知识分子促人醒觉之用意。是以讨论清季知识分子，自当以自觉的内容为准，而不可以拘限于醒觉运动中的片段的范围。

二 存亡的自觉

清季知识分子之意识到中华民族临于危亡之秋，将不免有灭种之祸，以惶恐惕厉之警告，传布全国，唤起国人奋起。可以说是醒觉运动中一个强大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由来，至少是自三方面的成因所汇聚。一个是理论的，由于接受一种新观念而推衍得来，这就是西方进化论的输入，激起中国思潮上不可数计的浪峰。其中浪头之一，以物竞天择学说，引起国人危亡的警惕与争持生存的自觉。如严复子所著《原强》中即开宗明义谓：“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⑨而使人领悟到自然淘

汰的冷酷事实，和其发展的必然性。由此种天演理论，于近代思想方面启导出很多新的观念，连锁性的激荡，展现在知识分子群中。次一个方面的成因，是现实的，列强瓜分中国，促使知识分子产生亡国灭种的痛觉。面对此种现实，亦不能不惊恐于大祸将临，起而力拼挣扎。一种救亡的呼声，引导出保种、保教、保国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的成因，是一个战败的刺激，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这件事实，构成为对存亡意识产生的总爆发点。自此以来，激起近代思想上许多新的浪潮。即如以存亡为标题者，有严复的“救亡决论”，毕永年的《存华篇》，梁启超的“瓜分危言”等等，均系最明显的例证。

自天演论作出发点，以观进化之世界，反映出一个争杀的景象，弱肉强食的恐怖气氛，充斥其间，瓜分之祸，也觉得显然有必至之势。为求其不灭亡，进而导引出保种、保教、保国的民族意识，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其行动表达于“保国”、“保浙”、“保滇”、“保川”、“保路”、“保矿”、“保界”诸学会之组织。严复以申说存亡之界限：

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国量平泽若蕉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谓天之僇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⑩

杨概以争生存呼唤自救：

今请泣告天下曰：五洲震燿，种族纷歧，守旧必亡，求

新必盛。因渴而争蹄涔之水，因饥而烹肉食之兽，其所得者几何。然非此则饥渴者骷髅矣。此西国天演家所以力主争自存之说也。^①

麦孟华以保国家独立自主为求存之本义，保国与国权之基均在其中：

今夫人昂然于世界之上，必能保天赋之人权，享应有之利益，然后可以为人，否则举动食息皆待他人之指挥，而世不啻无是人矣。国翘然于大地之中，必能保自主之国权，享应有之利益，然后可以为国，否则经营纬画，仰他人之鼻息，大地不啻无是国矣。今日识时之杰，痛中国之不国，提倡独立之主义，固谓非是不足以立国也。然人必有志识才干，足自捍卫，而人权乃可保全。国必有人心士气，足自振奋。治体、政策足自经理，而国权乃可保守。是故独立者自存之基础也，内力者独立之根柢也。^②

梁启超亦悲嗟于中国地位殆沦为仆隶属国，而大声疾呼，求自救勿作傀儡：

中国者，傀儡之颀而硕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举之，则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犹曰我国尚存，我国尚存。而岂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实而取其材，吸其类而盐其脑。官体虽具，衣冠虽备，岂得目之曰人也哉。嗟呼，必自傀儡然后人傀儡之。中国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犹复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尽谋，为他人效死力。于是我二万方里之地，竟将为一大傀儡场矣。^③

而当时人士，于列强之昌言瓜分中国，反应极为敏锐而激烈。毕永年著《存华篇》，力促国人警醒，免于瓜分之祸：

抑余尤奔走喘泣告我黄民曰：瓜分之图，宇林西报昌言无忌，法外部并行文各国，示以天与不取之意。果尔，则太平洋为血战场，支那人为几上肉，欲求眉睫安，将不可得。虽然，殷忧启圣，恐惧致福，诚乘此伐毛洗髓，涤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如湘潭易氏，浏阳唐氏所云者，则雷动飏驰，而耳目改观，气机拨动，我士民益当血诚相与，共保阡危矣。存华之机，其在是欤，其在是欤。^⑭

即满族志士如寿富撰著《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亦详为陈说瓜分之害。其最清醒而可贵之处，是以中国为立场，而不抱狭义的满汉之见：

中国戎祸，始道光，一败于英，再败于英法，三败于法，四败于日本，失缅甸越南琉球高丽属国凡四，割香港台湾澎湖北徼属地凡四，无役不败，无败不失地，愿我兄弟知中国为至弱之国，兵力不足恃也。自和约以来，入口洋税，岁有增加，无穷漏卮，届六十年，赔兵费者凡四，货财之输于外者，何可胜计，愿我兄弟知中国为至贫之国，生机将日促也。同治时，德宰相毕士麻克，尝建分中国之议，诸国因中国地大民众，莫敢先发。自我败于日本，此说复起，近日诸国议论，半是此事，愿我兄弟知外人日日谋我，我中国将有瓜分之机也。^⑮

更可贵者，寿富因受中华教化之濡染，虽为满族宗室贵介，而自我体认，则视为中华民族分子。其持此立场有谓：“我中国，神

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⑩而并不谓满族之裔也，奴尔哈赤之遗也。可以见其深厚之文化色彩。

相对的外人昌言瓜分，亦言保全。实则同一意义，盖视中国之无能自立自主，而取共同干涉想法，则是一样。知识分子也同样深恶痛绝，痛切反省，进一步觉悟自保自存责任。如署名自强氏者（本名待考）有谓：

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存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惟人人知为己任，则自无旁贷之心，人人知尽其责，自无退避之心，众心齐力，众目共的，终未有不能达其点者。吾国民其扩充其爱国之性，培养其独立之气哉。^⑪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正在于其国民之独立精神，视之以为存亡之关键。故自强氏谓：

国家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之独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则国无弱小，必有兴者。如英德诸国是也。反是则亡，如印度土耳其诸国是也。是故观国在民，使吾国人皆发奋其独立之精神，扬溢其不羁之志气，传曰蜂蚕有毒，况广有四百余州之胜地，有四亿万同胞之神种，故将披靡地球，辉耀人表，固意中事也。安有以世界无上可恃之众，可用之地，而臣妾服属隶役于他人，摇尾叩首于红须绿眼之马前者哉。我四百余州之地宁可碎，四亿万人之头宁可断，而国民独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愿我同胞共誓者也。^⑫

国民独立精神之坚持，不惟须个人生死以之，且将为此宗旨绵延

于世世代代。陈天华的意见表露出其奋斗之勇气与决心：

各国若想瓜分我国，二十岁以上的人不死尽，断不任他瓜分。万一被他瓜分了，以后的人，满了二十岁，当即起来驱逐各国。一代不能，接及十代；十代不能，接及百代；百代不能，接及千代。汉人若不建设国家，把中国全国恢复转来，这排外的事永没有了期。^①

设如一旦被瓜分受欺凌，则必谋求独立，以图报复。刘桢麟则期以百世复仇之义：

春秋之义百世之仇可复。西人公法家言，凡受人非理之加者，必如其道以报之，如此而后合于公法。是以齐襄灭纪复祖宗之仇；子胥入楚，复父兄之仇；勾践沼吴，复己身之仇；德役于法，威良卑士麦复仇以虏路易；英挫于法，惠灵吞复仇以囚拿破仑。我朝太祖复二祖之仇，以遗甲十三伐明，而诛尼堪外兰。远征古史，近法圣武，旁验敌邦，未有不以忍仇事仇为耻者，来有不以申仇复仇为志者。世非大同之治，不能以忘恩怨，事当不平之甚，惟有重于报施，此盖天理之自然，人心之至公也。^②

清季知识分子由民族危亡，而反省到灭种之严重大患者，多数人都思考到吸食鸦片的病害，均以为最足以促中国之灭亡者莫过于此。严复即作此主张：

考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③

由此种认识作出发点，进一步引导广泛的戒烟禁烟观念。在行动上表现在光绪二十年以后由此种理想而组合的若干戒烟会。更进而发展为光绪三十年以后的各地戒烟局所。其思想的原始基础，即在于救种类之灭亡。如徐勤的《戒鸦片烟会序》所云：

不伤于身，不害于家，不损于国，不弱于教，不辱于邻敌，则尊之重之，饮之食之，其勿怪也。然而形羸骨削，面异人色，举动孱弱，有如土木，伤于身矣；破室荡产，流于勾盗，妻孥寒饿，呼号无告，害于家矣；漏卮之巨，敌于丝茶，国用日蹙，民力弥困，损于国矣；凡百衿纓，同罗斯毒，学尚废弛，等于土番，弱于教矣；妄干大禁，陷于敌刑，钳受毒物，鄙为异类，辱于敌矣。若夫官吏则误公，农圃则失时，工商则废业，行阵则弛勇，族里所不齿，戚友所摈弃，区区之事，靡可缕数。呜呼，中洲灵淑之气，亿兆神明之胄，岂天留此鸩毒之物，以贼其种类者哉？^②

当然追溯源始，不能不说是外洋之大量运销所致。在洋人者，旨在牟利，则不恤他人之生死，国人反省及此，自不免不对西人取怀疑态度，甚至于理性的倾向于排外，这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是最起码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志刚的意见，可以作为较清醒的代表：

鸦片流毒，甚于瘟疫传染之害，举世皆知。即嗜之者，亦有暴虎凭河，死而无悔之志。原情者曰：不有嗜者，谁复售之。然此而出于中国之自戕其类则无怨矣。乃出于最爱上帝，以爱人为怀之洋人，夫洋人之谆谆讲爱上帝以行其教者，有牢不可破之势。至于以坚船利炮以力服人之凶焰，犹不若鸦片毒害之深。而究其实，不过取其利厚而售速耳。然

其爱上帝者，固远不若其孳孳为利之心，与夫周孔其口而跲
踬其行者，有同轨也。^②

由于思想上的物竞天择的启发，加上事实上的列强瓜分中国的刺激，再加甲午中日战争败绩的耻辱。三力会合，激起知识分子存亡的自觉。由存亡的警惧，向消极方面发展，启导了国人救亡图存的企求，再由保种、保教、保国等思路推展，终乃强化了当时的民族主义。再往前推展，则入于权威主义的国家观念，以至于权力中心政府，开明专制之想望^③。这是消极方面思想发展的路线，也可以说是痛苦醒觉后的结果。但在积极方面，也产生了另一种新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自天演论的反应，导向于积极方面的思想，最直接的是一种有奋斗态势的“竞存”观念，连带的恢复了尚武精神，而以义战为合理的奋斗途径。这不但在行动上表现于“竞业”、“竞存”、“尚武”、“公理”等学会的组织，尤其强化了革命志士勇敢就义的理论力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传统的信念，固然是知识分子所通晓，而此种为民族争生存，求种族之延续，其所加的动力则更强大，其价值的了解也更简易。

竞存之国民，首须具备何样条件，自然就会联想到强的基础。先能强始可在存亡关键中竞争，而保种保国之义士，始可有所凭恃。由此而使斯宾赛尔（Herbert Spencer）的理论得严复的介绍与发挥，引进为中国教育精神之最高宗旨。不但为国人广泛吸收，殆至今已成为妇孺共遵之信条，此即德、智、体三育之来源。严复实为最早提倡之人，如其所论：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之高

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恟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于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⑤

近代之言德、智、体，以为强民保种之三要，其得自于吸收外来思想，得自于危亡煎迫之醒觉，其渊源自极明显。后来融会为中国思想信念之一部分，亦全无勉强之处，也没有傅会之迹。然而用之以比较中国传统思想，以观当时不同思路的知识分子之于救亡图存之反应，则会产生较有趣的对照。和严复《原强》篇相距三年左右，张之洞以《劝学篇》提出了为中国自救之路，以鲁之弱国为比拟，而推出孔子智、仁、勇三达德为手段，用以达成“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道途^⑥。两人同样以三个概念，以为“强”之基础，亦足见其想像之接近。但真正于后世有更多的影响力者，则是德、智、体的观念。这个事实，也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与吸收新观念的倾向。

由个体求强以竞存，很自然地会导入于整体范围，使当时思想自觉的反应，连带产生另一个新的认识观念，这就是“群”字的被提出讨论，和其在政治思想上发生广泛的影响。严复于群之一义有多方面的透彻的解说，实为最早倡导之人，他提出的基本定义，显然是代表对于西方知识的了解，构成一个重要的理论基

础，如其所谓：

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判而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以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⑦

谭嗣同则以事物比拟，取传统常识观念说群之要义：

今夫有物百钧，一人举之不足，数人数十人举之，斯举之矣。有草一莛，孺子折之有余，数十数百万莛，壮夫莫谁何焉。有书万卷，十年读之，莫能通其义，数十数百人分任之，可计日而毕业矣。万事万物，莫不以群而强，以孤而败，类有然也。^⑧

梁启超亦论群义之原始，虽不免傅会牵强，却深自笃信，而归趋于以群系乎存亡关键：

凡世界中，具有二种力，一曰吸力，二曰拒力。惟彼二力在世界中不增不减，迭为正负。此增则彼减，彼正则此负。于是乎有能群者，必有不能群者。有群之力甚大者，必有群之力甚轻者。则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譬如以针置之盘内，针受盘吸，则群于盘。引以磁石，则针离盘，转群于石。磁铁相群之力大于盘也。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种，种不一变。苟究极其递嬗递代之理，必后出之群渐盛，则前此之群渐衰。泰

西之言天学者，名之曰物竞。洪水以前，兽蹄鸟迹，交于中国。周公大业，在驱猛兽。今则寻常陆地，虎豹犀象几于绝迹，兽之群不敌人之群也。美洲非洲澳洲咸有土人，他洲客民入而居之，则土著日渐渐灭，野蛮之群不敌文明之群也。世界愈益进，则群力之率愈益大，不能如率，则灭绝随之。故可畏也。^③

自定义的讨论，会转而联系到整体与个体间关系的认识。比较起来，自是整体为重，个体为轻。如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讲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又谓“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此两语皆严复自言，并非译文）。就当时的想像，于是连带产生了“小己大群”的观念。严氏之说可为代表：

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繇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繇，非小己自繇也。求国群之自繇，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④

使个体与群体关系密切，即个体为整体中息息相关之分子，则人即应为群之细胞，为民族或国家之细胞。群之生存，即个人之生存，其义甚明。由此遂引进社会有机体学说，为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如前引严复所谓的“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固甚明显。推之为国、族之义，自然相同。如梁启超所谓：“国者何，积民而成者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自爱其身也。”^⑤如孙文学说，自序谓：“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

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存亡的自觉辗转达到社会有机体的认识，自救之途自然有了更开朗的道路，不但助长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同时在行动上更加强了知识分子组织的结合，有激烈的革命性的会党，也有温和的讲究团结的“群学会”、“同心会”之类的团体。要之在理论上，已广泛地认识了一种组织的重要性。在清季知识分子言论中间，这种群体的观念的流露与反映，相当普遍。同样的具有感染力的传播，使中国知识分子自思想的承受上直接引进了一门新的学问，就是西方的 Sociology。当时有一个中国化的译名，颇具有严肃的思维意义，这就是流行一时的“群学”，得自于严复的翻译。他声明是采用荀子的话，“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②。后日的发展，渐渐为“社会学”一词所代替。但是单就译名来看，也略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的态度。

三 人格的自觉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自觉，就近代来说，自是就某些重点关键着眼，却不尽在总原则上立论。因为就总体上说，人的自觉其地位价值，当在古代已有，这里不便涉及。如果谓只有近代才产生人格的自觉，必然会引起争论，所以特先在此说明，以免误解。

中国近代的人格自觉，不是自省的，而是由对待对象而得来，同样是西方知识思想与当前世局构成重要的启导动力。再浅近一点说，这种思想是模仿得来。这种自觉也与前者所论存亡的自觉不同，不是急迫的警觉，而是观察中的醒悟。虽然两者同样都表现了对西方知识的接受，而人格的自觉则更建立于稳固的理性基础上。

人格的自觉，由缓慢的观察与学习中产生，它的发展，当然

也是长时期地在整个清季逐渐的表露。而其有重大表现或者说有更广泛的表达者，仍在于 1895 年以后。在完全基本认识上，最明显而最感动人心的一个西方观念，就是人权天赋说。同时西方人士对之视为天经地义，家喻户晓。使清季知识分子也产生了领悟与接受的倾向。虽然有人在词面上曾加以曲解，如张之洞之所为论，意图泯灭其重要题旨，却也并未完全拒斥^③。但在正面的了解上，则已广泛地使人感悟出“人”的基本意义与价值。谭嗣同讲论人体生理，由其引伸于人权发生之原始，以为人权出诸天授之基础：

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④

麦孟华亦谓主人权傅于其自身，他人不可强夺：

夫权者，身所自有，固非他人可以侵窃之物。昔惟弃之，故人得而夺之，今惟收之，则人孰得而争之。得权者为天民，为强国，失权者为奴隶，为藩属。孰利孰害，孰苦孰乐，皆听我同胞之自择，我同胞其无畏难而自馁矣。^⑤

人人得天之禀赋，表现于其独立性。天之所授，无论种族大小，肤色体型，面所得于天者，则没有区别，无分厚薄。此一观念之获得，实予国人之争取独立之奋斗以更多的勇气，且使人自知其所以为人之重要意义。自强氏的意见可作为代表：

夫天之生人也，皆賦与独立之性，其分配最公平无颇。他性之稟受或有厚薄，而独立之性，则无厚薄。人种无论各色，其稟之于天一也。既人人皆同此稟受而无厚薄，则人人皆当有独立之責，必不可稍让他人半步。其不知独立者，是不知有己而弃天也。是之谓自失其为人。人而甘退于人类之列，而以牛马奴隶自居，则天地间仍得谓之有是人哉！^⑥

虽然清季人士之讲论人权天赋道理，自表现于理论之认识与承受。实则从外观事实的觉察，已早在人心中传播酝酿。这就是国人开始注意非洲黑人的问题，以及黑奴解放的问题。就保守的时间估计，中国人开始注意解放黑奴，实在美国总统林肯正式解放黑奴之前20年。也就是江宁条约之后，徐继畲所从事著述的《瀛环志略》。他的记叙，可以代表向国人介绍解放黑奴的开始。同时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必有的学识修养：

按阿非利加黑夷，好略卖人口。欧罗巴诸国，以其愤而驯，能力作，竞买为奴。迨欧人西辟亚墨利加诸岛国，苦于土满，本国流寓，不足以资耕作，土人又悍不受役，于是多买黑奴，驱之垅亩，如牛马然。葡萄牙尤以贩卖黑口为利，相沿数百年矣。黑人虽混沌，然与欧人杂居日久，七窍亦渐凿。西葡诸国，待之有恩，故未生变。佛人性高亢，视黑奴如草芥，践踏无忌，黑奴之悄悄含忿，欲刺刃于其腹中者非一日矣。一闻内变，操戈并起，万户聚歼，不遗噍类。语云：蜂蚕有毒，信哉！近年英吉利严申厉禁，以多金赎放黑奴为民，前后费银数千万圆，且以兵船巡海上，捕贩卖者。米利坚亦多赎放，并于黑奴故土，买地安插。固两个之好行其德，抑亦有愆于佛人，不欲欲怨于异族，沽慈惠之声，弭肘腋之变，其为谋诚深远矣。^⑦

对于黑奴解放问题，郭嵩焘的了解，已反映出基本人权的观念。他的意见当表达于光绪初年：

三百年来，欧之所以日兴，而亚之所以日微者，世有能一言能通其故者乎，往者湘阴郭先生尝言之矣。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③

至于基本人权之所表达，则藉人之基本自由而出。于是谈人权即必连带涉及个人之自由。而自由亦应出诸天授。如严复所谓：“民之自繇，天之所畀也。”^④邹容亦申明人之基本自由，为天赋权利，最为扼要清晰。故谓：“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⑤

自由既为人权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即为自主权，亦即人为自己之主人，主宰自己，表达于个人的自由自立。这也是很自然的被认为得之于天授。欧榭甲申论自立之说，以为人权之原始基础：

生天地之间者，自非犬马奴隶，皆有自主之权。此义在西国虽童子皆能识之，而在中国则罕有知之者。其原因亦有二焉：一由呻吟于历代专制政体之下，独夫民贼，务为严刑峻法，以收天下之权归于己，使其下战战受治，奉令惟谨，无敢异己者。苟其挺然独立，独行其志，往往不为朝廷乡里所容。若列国之兴民权，刎颈者数十万人，而后得之，而在中国，则以民权为大逆无道之事，此政治上灭自主之权者一。一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谬创‘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说，以为上可虐下，下不得违上，而臣子之含冤负屈，草菅

于暴君顽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毁家亡国者，不可胜数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妇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天赋自由之权也。^④

言自主之反面，随时又涉及于奴隶问题。麦孟华特于奴隶作一比较叙说，益显出自立自主之可贵：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挥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囂然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慄，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为本分，乃几不复自知其为人。^⑤

民之被奴役，取对待立场而观，自然连带引起政治醒觉。政治关键在于政权，政权之所归趋，即亦分别主从之所在。于是政权的自觉，即由人格的自觉引伸而出，亦即为人格自觉的一项重

要表达。而此种醒觉的讨论，已经不单就理论上谈个人自主权利的问题，大半则入于帝王与国民的对待立场作说。首先私天下的政治就遭到严重的批评。私天下之治，人权之被侵损，公民之被奴役，自不待言，邓实著《原政》篇，以攻斥秦以来之政治：

三代之政，以天下公诸天下者也。春秋之政，以天下私诸一国者也。暴秦之政，以天下私诸一家者也。是故三代之昌，昌于措天下于仁义，而材云布，而令雷行，而其诰玲珑，而其情芳香也。春秋之不长，不长于措天下于诈力，而下无风俗，而上无纪纲，而中国微戎狄横也。暴秦之亡，亡于措天下于禁令，而奸民啸，而乱民狂，而详告于堂，不详讳于床，以覆其邦也。呜呼，中国之政，由上古至三代，及秦而大坏。秦西之政，由希腊而罗马，当秦而渐兴。地球之运，由东而西，一盛一衰，一强一弱。神明之区，丁秦之厄运者，几三千年。水火刀兵，风雨盗贼，每十年而一乱，数十年而再乱，何民之生于秦以前者之幸，而生于秦以后者之不幸也。^④

严复尤为激烈，直斥秦以降之帝王君主皆为大盗窃国，专制政治自然在人心目中益加动摇：

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指韩愈），徒见秦以来之君，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

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④

然则政权所在实属之于民，而与帝王之权位实相倒置。由此，不但人之自主有与立，而政柄之以民为主亦有与立。严复乃援引西方民主规制，比较立论：

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于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且必因缘事会，而后成之。察其言外之意，若惟恐其权之太盛，将终不利于民者也。此西说也。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其行政也，乃行其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虽至纤息，终无有人以国家为不当问也，实且以为能任其天职。其论现行政柄也，方且于之而见少，又曷尝于之而见多。论者若曰，凡使吾之至于此极者，皆国家之勿事事致之耳，此中说也。以二者之悬殊，故学者据中说之成见，以观西书，辄莫明其意之所在。又每见中朝大官，与西人辨执，往往自谓中理不刊之说，乃为闻者所捧腹轩渠，斥其愚谬。不佞向谓中西义理大殊，深诚学者不可援一贯之陈义以自欺者，职是之故。夫彼是固各一是非，然必陈钟鼓以享爰居，则固臧孙之不圣耳。^⑤

邹容则进而明言，政权以民为主，乃世界公理，万国同此：

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⑥

进一步，反观帝王卿相之地位如何，则自然地于民为主之前，而应入于仆隶之列。如陈天华所谓：

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断没有袖手旁观，不管那船的好坏，任那舵工水手胡乱行驶的道理。⁴⁷

于是政治领袖实为众民之公仆。“公仆”之一概念，已在清季为人广泛传诵，严复当为最早介绍之人。如其借西法以立言谓：“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⁴⁸然则国为众民众庶之国，亦随之流播于士绅言论之间；而“中华民国”一义，已于其诞生之前在知识分子心中形成。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实代表观念成熟之重要阶段。⁴⁹

清季人格的自觉，自理论以至实体的表达，均以人的基本权利为中心。自是在传统思想中向来所未涉及的人权问题。这种人权的醒觉，当然可以看做一种近代新生的产物，尤其它的最后宗旨，表现在政治上的民权思想，自与历来政治思想有显著的不同。民自帝王专制政体中解放出来作为真实的主人，已代表近代的重大转变，此后将影响于政治制度，政治立法，政治风气，乃至政团的结合形式，均将循一新路以求发展。而基本人权观念，实为一切变化之根源。这就是人格自觉所带来的一般性的收获。

人格的自觉另一方向的发展，则转入于社会上一个特殊的观点，这就是妇女人格的重新估价，也就是妇女地位之重被重视。妇女人格为近代知识分子所提出讨论，其思想创因也是有多方面的感悟。也可以说在西方思想传入后，由各源头汇聚而成的总爆

发。这个思想之总爆发点，是以“不缠足”一概念为代表，而此“不缠足”一概念之内，实即包含近代妇女解放中诸般之思想，是以此一简单通俗之词汇，自不能全就表面“不缠足”三字去了解，或至予以轻视。

缠足为妇女显著的痛苦，就人格地位而言，即全国妇女至于无辜而受奴刑。就基本人权言，自是重大剥夺，和严重地违反人权。在人格自觉中，自然省悟到传统社会所加于妇女的危害。而“不缠足”就成为最响亮的解放之呼声。唐才常对于缠足之害，有很动人的形容和警句：

方足之初缠也，必用新布紧束之。其著鞋，或用敲火石之小铤刀撬上，痛必彻骨，不三日必溃而成疮，不疮则脚不能成，疮极败烂，其肉尽化红脓流出，而后血枯筋断，胫折皮燥，足底乃折作两湾形。其两足旁凸之骨，名曰髌子，髌最为缠足时害，必毕力削成之如笋直，而足乃纤小，可世俗意。故妇人恒髌本太息曰：此不知裂肠几许，挥泪几许也。至今思之，犹骨颤心悸耳。诗曰：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悲哉！天同覆，地同载，肢同四，官同五，而生人之乐，独不得而同之。吾之生也，幸而男子，不过数十寒暑耳。倘此数十寒暑中，肢体少羸瘠，手足少痿痹，即恨恨曰：此数十寒暑奚为也。彼女子则自五六岁以来，已天覆日晦，无复生人之气，天下古今之至不平者，孰有过于此。又况世乱兵燹之祸，凶荒颠沛之秋，更有不忍言不忍闻者哉。^⑤

梁启超于此等陋俗之形成，极加诅咒，而于首倡风气者，尤加挞伐。其为“戒缠足会”著叙有云：

缠足不知所自始也，其必起于汗君、独夫、民贼、贱丈夫。苟以恣一日之欲，而敢于冒犯千世之不韪。其行事则商受之剖孕断涉，其居心则刘铨之斗兽戏蛇。以孔教论，所谓作俑其必无后。以佛法论，所谓地狱正为此人。嗟夫！天下事良法每惮于奉行，而谬种每易于相袭，以此残忍酷烈轻薄猥贱之事，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择其妇，夫君以此宠其妻。龋齿未易，已受极刑，骨节折落，皮肉溃脱，疮瘍充斥，脓血狼藉，呻吟弗顾，哀求弗应。嗥号弗闻，数月之内，杖而不起，一年之内，舁而后行。虽狱吏之尊，无此忍心；即九世之仇，亦报不至是。顾乃以骨肉之爱，天性之亲，徇彼俗情，为此荼毒。呜乎！可不谓愚人哉。可不谓忍人哉。^①

千年来中国妇女之饱受残害，固足以启人悲悯之怀，而动同情之心。然此等醒觉，尚是表面的直觉意识。更进一步的推理，就省察到千年来中国之所以屡亡于异族，实由此种自弱其民族的恶习而来，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更使人领悟到不缠足意义之重大。谭嗣同即以此立说，入其所著《仁学》：

同一女色，而髻龄室女，尤流俗所涎慕，非欲创之至流血哀啼而后快耶？杀机一也。穿耳以为饰，杀机又一也。又其甚者，遂残毁其支体，为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者也。缠足不知何昉，据其见于诗词吟咏，要以赵宋为始盛。呜呼悲哉！彼北狄之纪纲，何足与华人比并者，顾自赵宋以后，奇渥温，爱新觉罗之族迭主华人之中国，彼其不缠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误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万万过于北狄者乎！华人若犹不自省其亡国之由，以畏惧而亟变缠足之大恶，则愈淫愈杀，永无底止，将不惟亡其国，

又以亡其种类，不得归怨于天之不仁矣。^②

黄遵宪与徐仁铸在湖南发起“不缠足”会，其公启亦在申明缠足陋习之为害民族及有伤国计之严重性：

凡有损于民生，靡不伤夫国计。迂儒曰：扶阳而抑阴。浅识曰：贵男而贱女。詎知算山泽之黔黎，众生已去其大半；沈烟霞之痼癖，完人又减其五分。居广土而无众民，自启四邻之覬覦；废蚕桑而耗衣食，难期万族之富强。且彼也萧娘吕姥，举趾而结奇兵；我也燕瘦环肥，裹足而成坐毙。即一端之自弱，恐百废之难兴。若是者害在天下，故我朝革故鼎新，即著禁缠于令甲；胡今日食毛践土，尚甘梗化于由庚。迩来多方辐辏于中原，哲士帆航于异国。遍览六大洲，无兹秽习；传播四瀛海，流为陋声。番妇则会开天足，恶瓜窃灌于梁亭；支那亦论著戒缠，妙笔争传于沪馆。通都大邑，风气渐开。僻壤穷乡，见闻仍陋。今特广约同心，共成嘉会。^③

消极方面之危害，固论者不厌其详，若再进而推展，则知妇女之强弱，有关于竞争民族生存关键。而当世为国人所广为呼唤之“保种”、“保教”、“保国”的奋斗立场，实以妇女为其本源。梁启超的讨论，就十分清楚而合理：

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今之前识之士，忧天下者，则有三大事。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国乌乎保，必使

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④

康有为以相同观点，据立国族竞存之本而陈之奏牍：

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其为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尫弱纤僂，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夫父母之仁爱，岂乐施此无道之虐刑于其小儿女哉，徒以恶俗流传，非此不贵，苟不缠足，则良家不娶，妾婢是轻。故宁伤损其一体，而免摈弃其终身。此为一人一家之事，诚有茹苦含辛而无如何者。若圣世怀保小民，一夫之有失时，以为予辜；一物不得所，引以为己罪。而令中国二万万女子，世世永永，婴此刑刑；中国四万万人民，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皇上能无惻然矜之，怒然忧之乎。^⑤

就社会责任而论，妇女若始终为男子附庸，为男子奴妾，则必累男子谋治生业。亦将因全国广众之妇女，累及国族之长久贫困。故是妇女地位之不加讲求，不但使国致弱，亦且为国族贫困之根源。然则求妇女脱离男子而独立，担当社会职业，则连带自然转入更多的妇女解放问题，而女子教育自为重大关键。是以凡有志创设不缠足会者，无不随时考虑并准备创建女学堂计划。在这种观念之下，更关系到男女受教育之机会平等问题。因为传统教育制度，一切惟对男子而言，虽有考试，而女子不能入场，虽有书院，而女子不能食廩肄业。此时兴办女学，正所以打破此种不平

等的陋规，在思想上同样是重大自觉之表达。梁启超立言，以推为国族贫困根本，而职业之平等，由是以出：

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以予所见，上而官、中而士、下而农工商兵，无论为何等人，则无时不皇然愀然，若重忧贫者，其受冻饿，转死沟壑者，更不知凡几也。其实以比例浅理论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必无可以贫之理，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虽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业或无业，盖凡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故即以男子而论，大率明达事理之人，谋业甚易，反是者谋业较难。然则学也者，业之母也。妇人之无业也，非天理宜然也。^④

虽然各地创设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卫足会，以为倡导。同时兴言是说为妇女呼不平者，也是抒论甚多。但此等醒觉多发自男性知识分子，至于女子自身如何，更是具有重大意义。以清季而论，女子受教育者极少，而能表达其醒觉意识者更是稀少。即有之，当可说是凤毛麟角，女中丈夫。清代女性知识分子，对于妇女社会地位之醒觉，自不始于末季。最显著特例，即乾隆间女子陈端生著《再生缘》，以讽咏其不平之气，借书中人物，表露女性之才学能力。可以视为争男女平等地位之代表^⑤。而晚清表达女性之自

觉者有 4 人，此处可举较重要者二人。其一是康同薇，她以天地自然之理为男女平等之说，是为女权所出之基础。如其所谓：

凡物无能外阴阳者矣。光有黑白，形有方圆，质有流凝，力有吸拒，数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轩轻者也。形质不同，而为人道则一也。^⑧

而康同薇所以推动唤醒中国妇女之手段，则是以创立女学入手，此种创设女学之意义，自亦在于妇女受教育之机会与权利，故立论着眼于整体之学制。其所谓：

今缠足之祸，虽或稍戢，然开会者不过通商教区，入会者不过通人数辈，行省之大，充耳不闻，毋亦知此理者尚少也。若欲扩其拯人之心，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曰：女学如此其亟亟也，然神州之大，行省之远，流风所邈，未易遍及，有其举之，条理奚在？曰：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起二万万沉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昌我圣道，复我不同，于嗟中国，其毋才壅智而自穷。^⑨

至于最特出激进，而充分表达其争取女权之思想者，则为秋瑾。她以署号“汉侠女儿”之名，著“精卫石”弹词二十回，以通俗说唱，演女子被侮辱之恶习，唤醒国人，以争女权平等，并共负国民责任。是已进境至于妇女之社会独立，与政权之参与。可以说达于妇女奋斗之全义。其自叙有谓：

余处此过渡之时代，吸一线之文明，摆脱阱笼，扩充智识。每痛我女同胞，坠落黑暗地狱，如醉如梦，不识不知。虽有女学堂，而解来入校求学者，研究自由以扩张女权者，尚寥寥无几。噫嘻乎怨哉！二万万姊妹，呻吟蜷伏于专制男儿之下，奄奄无复人气，不知凡几。呜乎！尚日以搽脂抹粉，评头束足，饰满髻之金珠，衣周身之锦绣，胁肩谄笑，献媚买欢于男子之前；呼牛亦应，呼马亦应，作玩物而不知羞，为奴隶而不知耻，受万钧之压制，百般之凌虐折辱而不知恨，衔羞愤激，脱离苦难。盲具双目，不识一丁。懵懵然，恬恬然，安之曰“命也”，“分也”，“无可奈何也”。积此痼疾，旁生孽障，遇有设女塾兴工艺者，不思助我同胞，仅从旁听痴男而摧折之，同类且相残，害人还自害，女界不知如何了局矣。^⑤

而在弹词正文中，更是通篇表露其争取女权之意志。兹举一段说白，以见其毫无隐饰的表达：

并且数千年传下来，一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重男轻女之恶俗，这些男人专会想些野蛮书籍礼法，行些野蛮压制手段来束缚女子，愚弄女子。说出“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话出来，欲使女子不读书，一无知识，男子便可自尊自大的起来，竟把女子看得如男子的奴隶牛马一样。殊不知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赋权利亦是同的，只因女子不读书，不出外阅历，不出头做事，惟晓得死守闺门，老死窗下，把自己能力放弃得一点都没有了，让男子占了优胜地位，一步一步的想法子来压制女子。你说可恨不可恨呢？^⑥

妇女解放思想，其基本理念，以人道为立场者，则须解除其痛苦，然出以同情心而已，影响尚小。而以民族危亡立说者，自足启人以警惧，以产生痛悟疾悔，效力自大。进之则由此以用为民族竞胜之根基，则使人更醒觉到妇女之重要，由是构成民族主义之一部分。此等发展已渐进而繁复。于是妇女职业问题，有关于国家社会之均衡。妇女对国家之责任问题，有关过问政治之责任与权利，种种观念之推衍，基本上或关联到人权女权，或关联到社会地位平等，或亦关联到妇女参政之最大要求。这些都自“不缠足”之解放观念发展下来，使妇女自此走出家庭，以观览世界，而分担国家社会责任。则人格的自觉，至此已达于完整境地。而后世妇女地位之转变，几至一日千里，无论婚姻、家庭、社会、教育、职业，以至参政机会，均不逊于世上任何先进国家。同时在国民普遍之思想习惯上，自然融会，顺应调适，潜移默化，已日渐视为当然必然。此种全属于革命性的转变，竟温和地完成于数十年之间，实可为中华文化与民族性格添一乐观的佐证。

四 知识的自觉

知识的自觉，是思想演变之根源。近代中国之醒觉，在知识方面有多样的收获，而且在自由扩展的气势之下，一直在开拓知识领域。其发展之乐观气氛与广阔自由之天地，真是无限美好。尤其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崇知之文化传统与渴求新知之动向，洗涤抒发而并合流，与知识界带来数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只待知识分子认清其使命与责任，贡献他们的心智与其国家民族。就各项环境条件工具来说，这个机会比先秦时代都要超过得多，优越得多。而结果会不会产生像先秦时代那样多的大思想家大智慧者，现在说来还很难定论，定论将会完成在后世大学问家之真正的研究。回头看辛亥革命之前数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苗放了

知识醒觉的萌芽，同样地激起了不少新的浪头，而使思想学术方面获得多项的衍生。连接上辛亥革命以后的重大进展，这前一期铺路的而且是奋斗的艰巨工作，就显得难能而富有意义，因为这是转变期中一个转折部分，需要先知先觉，也要具备坚强的毅力。

清季思想的变化可以说是多彩多姿，虽然显露出不少的浅陋处和不成熟，但却代表可贵的创意，发源于这个时代，并亦开辟后日更多的进展道路。思想的变化既是日新而纷歧，自是因为知识来源的日新月异。从知识的取得反应融会而达于新的创造，这个醒觉的过程，同样是更复杂而有更多的矛盾。也许这是过渡时代不可避免的一种经验，也许这是过渡时代思潮必有的一种特征，但这种现象颇值得严肃地思考它的合理性。

近代知识分子探求新知，自是开始在鸦片战后。但在日积月累中，求新慕新维新的情势，却包含着有一部分很浓密的复古趋向。这可以说自新思潮中反省得来的动力，尤其在反省自身本有的文化价值。同时这也是维新分子所面对的严肃问题。他们不尽是托古立说，而是直截了当地去发掘古学；他们更不是顽固的守旧态度，而是具备相当世界知识之后所作的开辟新路的探求。这时的古学复兴之现象，在全部大思潮变化中自不能算是主流，但与辛亥革命以后的古学批判连接，就可以观察出它的发展脉络。古学复兴，是知识自觉诸现象之一，它的动机自不同于过去守旧观念。在基本态度上是要追求古学之宝藏，特别是其中同于西方知识部分。他们已改换了观察的角度，扩大了治学的界域和视野。正统的经生博士注释家，乃至先圣先贤的代言人继承人，大致上已不足以构成求知范围，因为主要的他们要以古学为客体，照自己的需要做分析研究。

古学复兴之表达，是出以诸子学的复兴，其原始动机，来自于对西学的认识与联想。徐仁铸以为诸子合于西学，却清楚地以理性推断，未作任何附会：

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近人于西学一门考据颇详，西政则中国尚少讲者，曩者华人震惊西学，以为绝技，谓震旦之人所不能矣，固属自弃。近人有牵合比附，谓西人之学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习，致为无谓。要之，陆子静所谓：四海各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东西虽辽绝，而政学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西人艺学原本希腊，政学原出罗马，惟能继续而发明之，遂成富强。我中土则以六经诸子之学，而数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积弱，学者不可不自奋也。^⑤

欧榭甲则以为诸子百家之兴，正古代思想言论自由之表征，同样是从西方自由思想的世界，联想到诸子时代开朗的风气：

春秋战国诸子蜂出，其论政体，人持一说。春秋之作也，立三世。有专制政体，有立宪政体，有共和政体。专制者，拨乱世之政治也。立宪者，升平世之政治也。共和者，太平世之政治也。而孟子大同政治主义，荀子小康政治主义，庄生曰其递相为君臣，亦是大同政治主义。夫三古以还，列国相角，犹是土酋争长之世。而诸子以匹夫草泽之贱，备论政体如是者，理想之自由也。既构理想，而又著书晓晓天下，与在上者相冲突焉，是言论之自由也。夫理想之自由、言论之自由，日益发皇，聪智全涌，以是经理国家，组织政体，进入文明，何疑之有。^⑥

然则晚清之重新认识诸子，与历代学者个别之从事注释、考订与复原旧籍者，其宗旨态度则完全不同。此时的想法已蕴蓄着一种重大的观念上的转变，而且将要助成学术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滥觞的创意，透露了几点基本态势。第一，将要挣脱正

统观念之藩篱。第二，确定正统之外之学术价值。第三，付予诸子学与儒学以相等地位。谭嗣同宣称诸子为儒学之诸宗派，如其所谓：

绝大素王之学术，开于孔子。而战国诸儒，各衍其一派，著书立说，遂使后来无论何种新学，何种新理，俱不能出其范围。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门，道大能博，有教无类。太史公序六家要旨，无所不包，的是我孔子立教本原。后世专以儒家为儒，其余有用之学，俱撰诸儒外，遂使吾儒之量，反形狭隘，而周秦诸子之蓬蓬勃勃，为孔门支派者，一概视为异端，以自诬其教主。^⑥

这种说法自是十分牵强，而且违反常识，似乎不该如此立论。但谭氏自有深远的怀抱，也就是他正醉心于康有为孔子立教之说，而欲以中国文化遗产，藉传教宣教而光大发扬，于是竟强调此种统一教化之宗教形式。陈虬则取时势而倡言尊诸子之说，是用诸子以辅儒学之所未济：

学者生孔子后，皆称儒术，自秦汉来未之敢异。而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独曰儒者博而寡要，果何说也。盖儒道其常，而子权其变。故诸子之功教变与六经同。譬之于医，儒为梁肉，子为药石，无病而服药石，与病而强梁肉，人必无生矣。孔子曰：学在四夷，犹信。荀子曰：法后王，岂非以时哉。时也者，如四方、八位、十二节、二十四度。各有教令，顺逆存亡，皆意当为之消息焉，可慢也。国家自通商以来，局又大变，华夷杂处，巧力相高，有未可概以儒术治者，则诸子近法，亦将有取焉。夫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鏖鏖。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骖。循表而导溺，契舟以求

劍，自謂能法古，不知時已徙矣，而法不徙，烏在其能儒也。^⑤

清季知识分子有所取，而有诸子学的复兴，至于其所取资，在实质上是借重墨学。简言之，因为墨学更近于西方学术教化，子是则助长于墨学的复兴。其原始动念，自然仍是由西学的认识作出发点。

清季学者自西方兵工学科学知识相继输入，颇引起国人广泛用心，一些著述，多表现于此。1842年以后，整理、编译、介绍与重刊之兵工学著作，一时俱出，蔚为风气。同时连及科学方面之注意，自古学中追寻中国固有科学知识，论述者更多，辑古之作，亦同时形成风气，若《格物中法》、《格致古微》皆此中最完备者^⑥。同时这也代表古学复兴之轨辙。而在诸子学之认识中，墨学最能符合当时需要，乃使墨学得以昌明，有駸駸凌驾儒学之上之势。墨学之复兴，多藉科学源出于墨之观点，当时又演为西学源出中国之理论。此种傅会，固为后世学者所讥刺，而墨学之研究风气，实由此开。及至辛亥革命前后之十数年间，则俱已逸越此种牵强傅会旧巢。黄遵宪的意见代表早期理论，同此论调者最多：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当孟子时，天下之言半归于墨，而其教衍而为七，门人邓陵禽猎之徒且蔓延于天下。其入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也，十居其七。距之辟之于

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駸駸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⑦

严复则论其暗合西学，而用以辅翼儒学可也：

以我华今日人心风俗之浮伪，欲为谓何教使然竟无可傅。必欲取一以周纳之，则惟半边之杨教，盖皆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耳。杨之书教虽俱亡，其为人所窃取之半边，古今似二而一。自祖龙窃取其为我以行政，延及近世，遂无不窃取其为我而成俗。至今已如寒疾之四体皆冰，真火不绝如缕。苟欲起死回生，固非参苓中和之儒教所能，必得乌头姜桂之墨教。墨亡而适有西教暗合其兼爱。其教士之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又过我人。然则资其劝导庶化众人之偏私，而上智仍知涵泳于洙泗，以固其元气，岂非标本并治之良方乎。^⑧

严氏用心诚欲接受西教，以借墨立说，实正予墨学以建立信仰之基础。嗣后墨学日受重视，钻研者益众。至于民国建立以后，墨学更盛极一时，其发展趋势，则欲渐至取代正统学术教化之地位。^⑨

反过来再看诸子学中之儒学，本为二千年来中国历史上被拥戴的正统学术。至于近代，则因各种复杂的因素所驱使，而遭逢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它的造因固然复杂，而其变化之表征也不简单。有两个基本点须首先说明。其一是诸子学中儒学之遭际与墨学大致相反，似不得谓之为复兴。其二是儒学在清季一阶段是顺着被重视的路子，而为知识分子加以推戴。不过打破儒家独尊的旧传统之动机，亦发生于清季。及至辛亥革命以后，始渐展开对儒学的严重攻伐。重大转变均以后期为重心。此处仅论及清

季部分；并非于后世发展一无所知或有意忽略。

在清季六七十年间，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学术政教之反省，尚未有重大动摇。但由于西方知识的冲击，也产生了对正统学术的检讨。最初的重要反响，是维护代表正统的儒术，而模仿西方信仰形式以立孔学为国教。这种观念的背景，来源于非一端，大致要素：一在维护固有文化之民族意识。一在采仿西方政教制度之风气趣好。一在知识分子之传统想像习惯。康有为言倡最力，信从者则多维新分子。

孔子立教之形式，康有为自觉的产生嗣圣的责任感，然而实受西方知识影响，亦以西化为手段。康氏自觉以为如西方之马丁路得，即改教之圣人。梁启超对之形容，颇为切实详明：

先生（指康有为）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⑩

其最热心之信徒，若谭嗣同，唐才常，均主张以孔子立统，即所谓宗教之教化王也，若西方以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者，唐才常的议叙可为代表：

然而今日孔子之统，几几不足与彼族之耶稣衡，孔子所立之天之统，几几不足与彼教之耶和華衡者何也。彼教主耶稣以纪年焉，而师有统。我则不能教主孔子，又不以纪年，而师无统也。彼人人有徇教之心，与凭藉师统之权，以改制

变法。我则空言尊教，而究无可凭藉之权，以张师统而改制变法也。此以君统敌师统之万万不能争胜，而中国君师之统将两穷也。夫摩西之为君也，尚知创教统以垂世。谟罕默德之为君也，尚当窃教统以愚民。而况中国本有之大教主，而不立纪年之教统以翼君统，而行更陵夷，百十年后谁复知有孔子者矣。^①

立教自须宣教，则仿西方之传教与教会。若“圣学会”之创设，即本此构想。而立统之形式，则藉孔子纪年，以仿耶稣纪年，对清末最后 20 年影响颇多。梁启超于孔子纪年有专门论列：

史记子老子列传，大书孔子年后二百七十五年。而其余各国世家，皆书孔子卒。此史公开万世纪元之定法也。近经学者讨论，谓当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子生纪。至今各报馆用之者既数家，达人著书，亦往往采用，此号殆将易天下矣。用此为纪，厥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②

虽然这样的维护正统学术，无疑的表现了本位文化的主观态度；而其中则充分的透露出接受西化的自然倾向。这实在正是文化转化的生机，也是文化复兴以及吸收新血液必然的生理现象。这种默默运行中之生命力，自古以来中国就已存在，只是在剧变的近代史中易于察觉。从高远的角度看，这是永久性的客观事象。正是

学者们所应用心探究的根源。

清季知识分子对于儒学之一贯尊奉，并无二致，直迄辛亥革命前夕，毫未产生反儒反孔思想。然二千年来儒家独尊局面，则在自由思想之下，开始遭到怀疑。梁启超一谓其不适于当前世局：“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②一谓其不当定于一尊：“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③梁氏言论与立教初意完全相反，其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之前言已自表承认。但同一文中，仍充分表露其拥戴与宏扬儒学，并毫无反孔排儒之意。故有谓：“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以是尊孔，面孔之真乃见，以是演孔，而孔之统乃长”^④。另一可论之人，早期严复曾函告梁启超，以谓“教不可保，面亦不必保”之义，以启迪梁氏思想。梁氏受其影响固不待言，面在严氏本人，实亦并未产生反孔排儒思想。审察其所撰《有如三保》与《保教余义》两文，则知严氏仍于儒术笃信极深。

知识自觉的思想，发展之另一脉流，完全不同于古学复兴之意识，自然比诸于学之复兴更是显得众流庞杂，其自由奔放情势，也更是表现得活泼而有新生气息。当然汇成大的洪涛巨浸，乃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惟其思潮之滥觞，在清季已颇有显著的表现，堪以称得起是先知先觉。这里总括的形容这种醒觉现象，可以称之为启蒙思潮之契机。

启蒙的首要动机，在于反愚昧，反被愚自愚。面当时一般觉悟，以为科举与八股文，实为中国终古受愚之桎梏，乃至今世亡国灭种之制度。有识之士，多集中于对八股文与科举制度之攻击。徐勤以为举业实为帝王奴役士子最成功的愚民政策，然至今已足以达于亡国：

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举业愚民

矣。中国二万万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大地莫富强焉。而北托于俄，南慑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可国。原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愚民之术，莫若令之不学，而惟在上者之操纵。不学而愚之术，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事务，聚百万替者跛者而鞭笞指挥之，如牧者之驱群鹅鸭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趋赴惟恐后，乃得以呵斥杀戮，糗祭而奴使之。^⑥

而于科考制度之关限重重，八股文体之法制繁密，尤为闭塞心思，湮障智慧之妙法。徐氏亦同时指出：

且学额甚隘，考生甚多，试场岁有，割截之文法甚繁，一日不为，手生荆棘，于是终身业是而无暇稍窥文史焉。有民贼陟人路德也者，又密为三尺法以律之，谬种流传，高天广地，世界无限，为此文囚，以囚我二百万之士，以囚我世世二百万之士，梏其心，闭其目，务使二百万世世无知识，而有司从之，所谓殃民之贼，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夫童生者，秀才之父，举人之祖，进士之曾祖，而公卿之高祖也。种既坏矣，将奈之何。夫西方之教士，多方欲其民之智，吾中国之教士，多方乃欲其民之愚，至民愚已极，国无与立，虽欲有民有士，安可得哉。^⑦

邹诚亦指明八股文之流于空洞议论，徒具形式之作：

每慨由明至今，以制义时文取士，群益舍格致而专尚时文。不知就时文论，亦当按时势以立言也。试观三代上，语言文字，不分两途。以当时之人，为当时之文，即叙当时之事。或通今变古，或引古证今，经曲所存，昭然若揭。今人

作时文，只得代古人立言，好为推测杜撰，甚至油滑空腔，终不敢轻议时务，直是伪古文耳，非真时文也。^⑧

唐才常则于明以来帝王愚民之科举制度，极尽其咒诅愤恨之语：

悲夫！吾中国之塞志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往者读校邠庐抗议，见其摹绘明祖愚民狡计，以为言之过当。既而历验吾身受病之源，周见切著，讳之无可讳，饰之无可饰。语曰：三折肱知为良医，余之挟五寸秃管，批抹至庸狠至无理之时文，亦既堆垛等身，弥历年岁，不可谓非三折肱之良医。而由今观之，则断精亡灵，奄然死气，欲掏前此之心肝而尽涤之而不能。则盖以太息，痛憾于明祖愚民之术，而使吾四万万人，宛转圜牢，徐供刀俎，靡可解脱，盖诚滔天之罪，擢发难数者矣。^⑨

既然八股时文之愚民，则反愚之正面要求，自在废科举与八股文，而其在知识醒觉之表现，并自然地产生两个新的动向。其一，由于往者之蔽锢思想拘限知识；今则力求扩大新的知识领域，于是而有扩大翻译西书，以求取外知之动机。其二，由于往者之塞闭思路，以庙堂之八股文独占知识界；今则力求知识流通，与普及平民化倾向，于是而有语文合一之白话文运动。其于吸取西方新知而留心外洋文字者，如王之春的言论：

今之有自命为通儒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为可耻，有习其语言文字者，从而腹诽之，且从而唾骂之，甚至屏为名教之罪人。嘻甚矣，夫所贵于儒者，贵其博古耳通今耳。试问今之儒者，通各国文字乎，即叩以各国之名，能通知乎。徒拘拘于制艺之末，而学问经济尽于是而已矣。方今海

防孔急，而所谓熟悉洋务者，不过市侩之徒，正宜培养人材，攻彼之盾即藉彼之矛，谁谓西学可废哉。^⑩

曾纪泽亦指出，学习外文为知识分子所当为。而其自身亦是身体力行之人：

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以曾言，学者得以比例而平隍之。其饮食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宜所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驱儉之间，诗书礼义无闻焉，惟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以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⑪

至于译书，则马建忠更是有所见，有所为，而笃行至切，造诣至高之代表。如其所叙：

夫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类又皆驳杂迂讹，而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足当译书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则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之不得及时造就也，不待言矣。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江涛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

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派，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前者郭侍郎出使，随往英、法，暇时因举曩所习者，在法国考院与考其文字、格致两科，而幸获焉；又进与考律师之选，政治之选，出使之选，亦皆获焉。曾拟将诸国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异，以及教养之道，制用之经，货财敛散之故，译为一书，而为事拘牵，志未得遂。近复为世诟忌，排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

至于另一动向，则又衍生为两个不同的步骤，后日在发展，更演变为不同范畴的知识内容：一个趋向于白话文运动，另一个趋向于语言统一运动。也就是一个人于文学领域，一个人于语言学领域。但它们的渊源动因，则起于知识普化之动机。关于白话文运动之权舆，早期的先知有黄遵宪、叶澜、曾广铨、汪康年、陈荣衮、裘廷梁、丁福保等人。其中黄、叶、陈、裘均各个有提倡之论说传世。如叶澜批评固有之童子课，实使之愚弱而非启其智也：

蒙学之规，中国非不讲之久且精也。其散见于传记者，若曲礼，若少仪，若保傅，若学记，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职，详细具载，无待赘言。乃今之学究，渺不闻睹。其所奉为圭臬者，不知出于何典，起于何世。固执成见，胶滞难解。教童子自毁齿执业，其脑气未充，其筋肉未强，而先使

危坐以桎其四支，继用威吓以铄其精气，终且以大学中庸强之苦口呆读，逼之暗记无遗。夫“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中庸”者，性命之理也。义深文奥，皓首穷经之儒，容或讲究未悉。而顾施之于黄口孺子，可希冀其万一能解哉。明知其不能解，而忍为此倒行逆施之事，以致渎蒙勿告，厌倦益生，开读未终，奄然思睡。于是为师者转行其威吓之术，或扑其首，或摘其耳，或罚长跪，或令绝食，种种非刑，如鞠大盗。赤子何辜，受此荼毒。久且习为固然，顽钝无耻。甚或威逼受伤，体用俱损。学之未成，而身已先废。即不然，日幽一室，牛马之不别，菽麦之不辨，出见生人，辄面颊语涩若处女。中国之所谓循良子弟，不出此数类也。中国之父师所陶成子弟之才，亦不出此数类也。^⑧

裘廷梁提倡白话文最力，最有理想，直视文言文为愚民之具，而首倡废除文言文体：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⑨

并指出文字工具之基本要义，而主崇白话：

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闾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⑩

裘氏提倡白话，具体地道出其有益之处八点：①省日力，②除骄气，③免枉读，④保圣教，⑤便幼学，⑥炼心力，⑦少弃才，⑧便贫民。总归其旨趣，仍在于表现其严正的破除愚昧的启蒙思想。裘氏很强调立说：

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为无民。^⑧

白话文运动之滥觞，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之“蒙学会”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立之“白话学会”为重要里程碑。最值得注意者，其组成分子不单多为有理想者，甚至如文字训诂学大家丁福保，亦为创始人之一，可知他们在认识基础上之健全而且深厚。

关于语言统一的构想，出于古文学大家吴汝纶，而致力于语文统一之先驱稍早者为蔡锡勇，系同文馆出身，而以创办汉阳枪炮厂闻名。所著《传音快字》一书，为国语注音的权舆。^⑨而清季最重要而影响于后世较直接者则为王照与劳乃宣二人。现代注音符号，其基本形式完全因袭王照，而且仍有不少系直接采用王照所创之“官话字母”。王氏提出语文合一的理论，声言不以俗俚见摈于圣贤：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系指礼教之实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

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凡也、已、焉、乎等助词，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不啻今之白话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圣人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藉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无人觉悟矣。^⑧

劳乃宣亦言文字由繁趋简，系自然发展之势。故以此为其所著《简字全谱》之理论基础：

古之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者，所以为记语言之表识也。古籀而小篆，篆而隶，隶而真行。人事降而愈繁，则文字趋而愈简，自然之势也。今之字比之古籀、篆、隶固为简矣，而比之东西各国犹繁。何也，彼主声此主形也。主形则字多而识之难，主声则字少而识之易。彼字易识，故识字之人多；我字难识，故识字之人少。识字者多，则民智，智则强；识字者少，则民愚，愚则弱。强弱之攸分，非以文字之难易为之本哉。然则今日而图自强，非简易其文字不为功矣。^⑨

劳氏更有远大的想望，就是以语文合一为普及教育之根本：

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前数年，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

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与汉字相表里。一时风行，易识易解，性敏者数日而可通，即极钝之资，至迟数月无不解者。^④

及至吴汝纶的大力提倡，于是终达于国语统一运动的要求。语文合一的理论，至吴氏而完成一完整体系：

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其法用支、微、鱼、虞等字为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⑤

同时代人致力于语文合一的学者，尚有吴敬恒、严修、王璞等人，均足为国语统一运动之先驱。而在古文大家吴汝纶之声音“使天下语音一律”，尤为此一运动之先河。

知识自觉之另一发展方向，便入于史学范围，既不同于古学复兴，亦不尽合于启蒙思潮。但就清季而言，只在消极方面稍具态势，并无重大系统理论方法之创建，因是可以统形容此种知识自觉，为反传统史学之契机。

及晚清知识分子表达其反传统史学之理论，有四个重大的基本观念之改变。第一个是反循环论史观。此种观念发轫于西方进化论之输入，一反向所遵循的一治一乱之旧说。以严复为最早主倡之人，其动念尤其起于物竞天择自然淘汰之原始理论：

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无乱，何所谓一治一乱哉。夫此群中均身体弱智识昏之人，则其人愈多，为累愈甚，于是虽有善者，必为不善者所累而自促其生。积数十人或数百人以累一人。是不啻以勤俭自立之人，受役于游惰无业之人也。而有志者先死，因而劣者反传，而优者反灭。然若优者尽死，则劣者亦必不能自存，灭种是矣。^④

第二个是反天朝中心史载。其基本动念发轫于万国国际关系之世局，与公法理论，列国对等相待之义，以至大同主义之信念。于是往者鄙视四裔文化较低之民族，则颇反省其不合理。反应这种观念者有徐勤专著之《中国夷狄辨》。和者亦众。而创说较早者则为黄遵宪。如其所谓：

自儒者以笔削说春秋，谓降祀为子，贬荆为人，所以示书法，是谬悠之谭也。自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虏，南号岛夷，所以崇国体，是狭隘之见也。夫史家纪述，务从实录，无端取前古之人，他国之君，而易其名号，求之人情，奚当于理。^⑤

第三个是反帝王中心史统。其基本动念起于民权思想之引申，则往者之正史，被斥为帝王家谱，欲求转其目标注重民生社会之全般记载。创说较早者为徐仁铸。如其所论：

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

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今日欲考历朝民俗，求之于正史反不可得，而别史杂史之类，时复记载之。亦学者所当厝意也。^④

第四个是反笔削褒贬史法。往者治史，循孔子作春秋义例，寓褒贬于史文之中。然中下之材既无此超卓眼光，谄媚之士又必缺乏坚毅风骨。所能为者，反会尘蔽史实，多颠倒芜乱之主观评隘。此时反省，本于写实精神，务以实录为主。予人真实记载，即称史职。唐才常立言反旧史规制：

司马迁深于孔教者也。其文洞见本原，直刺时隐，进游侠，非好乱也，悼民权之衰也。称货殖，非逐末也，悯商学之失也。陈六家要指而评衡之，非等伦儒墨也，谓泥守弊生进于大同则有济也。而目论之儒，诮其是非，缪于圣人。呜乎，孔教微，无公理；公理微，无信史。后世史家，言例，言法，言闰，言正，言道学儒林，其上能整齐故事，藉资参考；其下则魏收作色，莽如乱丝。无他，二千年来政学汶阡，微独春秋文致太平之宏旨不可闻，即司马氏损益得失之微权不可复。读史者，习见夫唐宋以降规规旧制，方谓老成；拊会尊攘，方名忠义；务抑民气，方尊朝权；禁谈时务，方端士习；力遏新学，方正人心。于是事事求副于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网罗钳束之私心，身衿纓而心圈莛。曰是固宜然。^⑤

反传统史学，主要表现在于不满数千年来之史学规制形式，进而产生新史学创发之轨辙。其演进大要，一在于开拓史学眼界至于世界史领域。一在于吸收西方史学观点与方法。一在于扩大历史界域至于多面的深入探究，而不偏重于政治军事之记载。一在于

探求新史料之强烈意趣。凡此种种启念，均于辛亥革命后新史学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五 结 论

清季知识分子在反省中自觉，其始念诱发之来源，十分复杂。大致说来，导源于中西接触，实占最大成分。深一层说，时势之日急，外力之压迫，新知之了解，对人之模仿，均为思想醒觉之动因。至于思想醒觉之反应，其去向更是相当复杂。冲击来源如无数湍流冲下，而反溅之浪花，更是四向奔射，分投注泻，各自成流。兹仅举一单纯概念为例，可推知其余。进化论为自西方输入若干概念之一，其激起中国思想之反应，颇为复杂。可以推知者，大致有三个重大方向的推衍。其一如前述，由天演论而导致存亡观念，而竞存观念，而群体观念，而小己大群观念，而社团之组合，而强化民族意识，而国家主义，而开明专制政治要求，而强人领袖之想望，而社会有机体理论之形成。其二则会合中国古说之日新又新观念，而发展至“新学”，而维新观念，而“新民”、“新中国”，而进步主义思想，而至反循环论史观。其三则会合儒家公羊三世说，而发展为弥漫清末民初政治理论中的进化三段论。同时在反面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思想，不但毫无排拒与阻滞，而且引起广泛的兴趣、探讨与信服。为之广为播扬，作各种引申与融会。这里特别提出这个概念，主要还在于它是一个纯粹西方形成的概念，可以用之清楚地试验得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思潮新观念的真实态度，是排斥还是吸收。尤其在清季一阶段，这种基本了解，关系甚大。

实质上就较长期与广面角度观察，可以大体上了解，一种文化与异型文化接触日久，必定引起不少感染，而产生融会更新的创造。此种感染，或有意或无意的接受，却并不是原本移植，而

是渗合的同化。即使名义上作全盘移植，事实上也很难完全相同。特别是思想制度，即使有意移植，也决难期其毫无差别。例如西方民主制度之为亚非各国所因袭者，不一而足，然其彼此不同，固各如其面目，即勘验西方之原产地，亦难望其全合符节。是以文化之接触，重交流，重启发，足以促成一方文化之焕发趋新，而恢复其创造力，却并不是要求原本移植。

一个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异型文化所触，会自然地回观自己固有的文化，乃至重新估量其价值，提炼其精华，实是文化新生与复兴的契机。而此种回观之启念，系逐渐产生于对异型文化反应、认识、比较与迎合的很复杂的诸端动机。也可以总括说，此种回观，是对异型文化接触后相形之下面产生的一种反省。回观固有文化，其所持态度与回观之方式，也各表现不同，而具有多样形态。一则本评估动机去探测固有文化。一则本探究新问题新宝藏去发掘固有文化。一则本复古动机而从事剥除历代对古文化所加之蒙蔽与曲解。一则本信仰动机以塑造固有文化之偶像。一则由增入外界新形式规制使之具有新意义。一则本怀疑动机，以其新认识改换角度去研究固有文化。一则厌恶固有文化中之若干缺陷，而从事批判与排除。凡此种种回观固有文化之态势，实已充分表现出百年来知识分子自觉的一项特征，且予中国历史带来一个影响既深且广的古学批判时代。

回观固有文化遗产，在清季只是创意的起绪，也只代表文化学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一切重大的变动与发展，均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后。清季的时代意义，正足以符合醒觉二字，其重要性也正在这种先知先觉开创性的导向。同时可以考察而知者，有两个重大的脉流已紧随其后，至民国建立之后，而有全面性的发挥。其一是古学复原的动向，即对古学之起源重新探索。凡关民族之起源，文化之起源，诸子学之起源，文化之本质，社会之原型等，均被广泛讨论。其中产生重大动力与影响者，则为“原儒”

之辨别，其二是古学批判的动向，即对古文化价值之重新评估。凡关古代传说，文物制度，诸子学说，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等，多遭到理性的评判攻击，与非理性的诅咒讽刺。两者合观，实足以代表古学批判时代的全部内容，参与人物难于量计，留有文字传世者亦在千数以上。^⑤

再就向前向新的趋向而言，清季知识分子亦达成了思想与知识创新的始基。他们的醒觉，予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几个开朗的发展方向。其一是扩大求知领域，形成无限界扩张的趋势，而突破观念认识狭隘的束缚。其二是慕新趋新的动向，而形成强烈的吸取新知之要求。其三是打破一尊之教化，打破正统观念，以及思想之统制蔽锢。其四是开拓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美好天地。

清季知识分子据有近代先知先觉之地位，并能自觉其醒觉之精神状态，与自身应有之责任。此固已显示其重要意义，更有一点须加强此概括意义者，则为清季知识分子对于其所处时代也有其自觉的了解。这就是他们所共同体认的一个“过渡时代”。如梁启超所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⑥秋瑾所谓：“余处此过渡之时代。”^⑦俱可了解他们时代醒觉的意识。知识分子了解所处一个过渡时代，其观察，其抱负，其设身处地之准备，与致力之方向，均亦酝酿出一定的信念。表达而出者：一在确信一切思想知识文物制度正酝酿重大变化，并测知其未来革命性的变革。一在确信未来光明前途。或有形或无形地在心目中塑造光明的远景，以为奔赴之目标，力求实现。一在自愿献身于未来之奋斗，并尽最大努力。虽然自知在己身一生中未必能亲见所设理想之实现，但确信其必来，并信后代子孙必能达成。一在欣幸遭逢一个伟大的时代，千载难逢之机遇，即使是极痛苦的经历，也深信其价值与意义。因此过渡时代人虽必然历经千辛万苦，百劫魔难，而在基本信念上却一直是乐观的。此予后日辛亥革命之成功，中华民国之建立，均普遍地充实了坚定的心理因

素。

虽然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抱负，并能自觉其责任，是健全的一面，但就其基本原质来说，也有足以形成抵消的障碍与缺陷。最显著和在历史上出现最多的情形，那就是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政治领袖或领导者。即使热心政治，却不一定有才干。于是不免成为书生论政，于政治领袖多方苛求，成为发言空论的批评者，建策者，实际主政，则窒碍难通，反而扰乱政治步骤。是以往者之知识分子，虽然一般都会或大或小地达成社会有影响的人物，但未必成为政治领袖，大多数附着于政治军事集团，从事各种表现。史实所见，政治领袖与多数知识分子合作，引为同志，加以尊重，则能获其辅佐之力而成功。在知识分子更需要政治领袖之明达礼遇，依信护持。故就国家前途大计言，政治家之成就事业，与知识分子之表现才智，应是互为表里。

最后再必须略加申说者，即前代先知先觉与革命志士，所艰难开创此一美好的思想自由学术昌明之开放时代，后人的努力与贡献，是否足以追随？以不负此一数千载难逢之机会。并是否认清此一伟大时代之使命，和知识分子所担当之责任？乃至继起发展之成效如何？均要等待笃实好学之士，从事详细研究探讨。若就现有资料接触所得，其最显见而可确知者，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之思想界，其发生之问题与变化，实远较前代之 70 年间更要错综复杂。前代思想有许多矛盾，此一代则更是加深而尖锐。前代思想固已庞杂歧出，此一代则更是纷然而繁乱。前代思想已显示出变化之急遽，此一代则更是猛锐而激烈。总体上展放无数新的观念和思想动向，实质上仍不脱幼稚与夸诞。整个思潮大势，充满破坏的动力，却缺乏建设的信心。一般表现，自是欢欣踊跃，高视阔步。但是勇往而不稳健，夸诈而不切实，浮华而不潜沉。虽然产生一些可贵的创新的理论体系，实不足以副此一伟大时代

之所畀赋。比之清季，足称差强。若期望如魏晋以后之佛学高僧，五代以后之理学名家，以吸收外来文化而卓然树立一代新格局者，可明显见出，相差甚远。是以一般成就多在于介绍与模仿，应与前代思想同列于过渡时代。学界同道，可以严肃省察，回头自问，何项学术足以代表中国在本世纪之重大成果？恐怕只有“古学批判”可以照耀古今，以构成此一时代之精神特色，与学术进境。

1971年4月25日写于南港

注 释

- ① 近几年，不少同辈学者颇有兴趣探讨“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当然尚都在讨论阶段。在许多人的言论比较看起来，可以知道较为成熟深入而且具独立见解者为谢文孙所撰的《漫谈“智识之士”》，（*Note on the Intellectuals*）载《大学杂志》第四至六期。
- ② 《史记会注考证》卷六，《秦始皇本纪》，第50~52、56~58页。
- ③ 《史记会注考证》卷六，《秦始皇本纪》，第58页：“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 ④ Edward Shils 参考二十余种西方论著（包括他自己数种），对于“知识分子”，综合地作一概括的描述，在最上的原则上说，与中国古来所指称一般知识分子之“儒”（非儒家之谓），颇为相通。载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7, pp.399~414。
- ⑤ 以上各段议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解释描述，可帮助定义之形成，并不是要作定义之探讨。此外，张朋园所撰《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一文，载《思与言》七卷三期，曾专门作过定义的讨论，可以参考，但也只代表形成阶段中的若干解释。这个问题正方兴未艾，许多学者都有兴趣参与研讨，将来可能会使之完成一个普遍性的定义。

- ⑥ 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以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经颜咏经、袁竹一两人译为中文，收入《新政真诠初编》。
- ⑦ 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第67页。
- ⑧ 此一小段议叙，与谢文孙《漫谈“智识之士”》的观念相同，故不详叙。兹引其原文：“近代的中国智识之士好谈‘觉醒’，常以‘唤醒’民众自任，孙中山先生倡说的‘先知先觉’，更是风行。也有人以‘启蒙者’自居。至于二十世纪的中文杂志，采用‘觉醒’、‘醒狮’、‘醒世钟’等等为标题，据著者初步估计，当在二百种以上，实数也许更多。总之，四五百年后的将来，回顾二十世纪上半的中国思想界，恐会看到一种智识之士‘集体觉醒’的现象。这些智识之士当中，不免有优劣之分，存派系之见，甚至有争论、有诟谇，但是作整体的观察，似乎是一种共同的征候。他们都经历过一种精神上的‘觉醒’，都以‘觉醒者’自居，都愿‘自觉觉人’。”载《大学杂志》第五期。
- ⑨ 《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6页。严复《原强》一文，成于光绪二十一年，通篇发抒进化论思想。虽然以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理论起绪，实则主要介绍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社会进化思想。《原强》一文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甚大，为一重要文献。
- ⑩ 《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15页。又，严复译《天演论》（T.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上卷，第11页，严氏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与警惕：“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士人日益萧瑟。此岂必度刘腹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輊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 ⑪ 《湘报类纂》，甲集，卷中，第27页。
- ⑫ 《清议报》第四十一册，影印本，第2664页。
- ⑬ 《清议报》第九册，影印本，第524页。
- ⑭ 《湘报类纂》，甲集，卷上，第2页。
- ⑮ 《时务报》第二十七册。

⑮《时务报》第四十册。

⑯《清议报》第五十八册，影印本，第 3741~3742 页。

又，同书，第 3743~3744 页，又谓“今外人日日言保全，言瓜分，明目张胆，视为固然。噫！是显以奴隶鱼肉视我也。故我国民，闻保全瓜分之论而不发指眦裂者，必非人。闻保存瓜分之论而不兴起振奋者，亦非人。且天下间，惟反拒力足以破侵入力，反拒力比侵入力大，则侵入力自灭，今侵入日张大矣，而反拒力不随之而俱长，则不足御之。故今欲破保全瓜分问题，莫善于我国民提出独立问题”。

⑰《清议报》第五十八册。

⑱ 陈天华：《警世钟》。见《辛亥革命》第二册，第 135 页。

⑳《知新报》第四十册，见《戊戌变法》第三册，第 168 页。

㉑《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 21 页。

㉒《知新报》第五十一册，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462 页。

㉓ 宜壘：《初使泰西记》，第 32 页。

㉔ 对于中国近代思想中，由激进的进化论发展为权威主义，以至于开明专制政府，强人领袖之想望，等等一串思路推衍的探讨，美国学者施华滋 (Benjamin Schwartz) 在其所著的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中有很深刻的分析，贡献甚大。严复正是这个思想最首要的代表。徐高阮撰《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同时代人对此思想之批评》一文，一面作郑重介绍，一面并把这种思路的发展也扩大到梁启超。其文载《故宫文献》一卷三期。

㉕《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 9 页，严复在同卷第 7 页中，述及“潜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端，自应为德、智、体最直接而显者的介绍，实出于斯宾塞尔所谓的 intellectual、moral、physical 三字。

㉖ 张之洞：《劝学篇》序。

㉗《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 8 页。

㉘《谭嗣同全集》，第 145 页。

㉙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二，第 5~6 页。

㉚ 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Montesquieu: *Spirit of Laws*) 卷十七，第 5 页。

㉛《清议报》第二十二册，影印本，第 1397 页。

㉜《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 6 页。

- ③ 张之洞：《劝学篇》，第 22~23 页。
- ④ 《湘报类纂》，乙集，卷上，第 23 页。
- ⑤ 《清议报》第四十四册，影印本，第 2867 页。
- ⑥ 《清议报》第五十八册，影印本，第 3700 页。
- ⑦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第 24~25 页。
- ⑧ 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卷十，第 5 页。
- ⑨ 《严几道诗文钞》卷三，第 7 页。
- ⑩ 邹容：《革命军》，第 45 页。
- ⑪ 《清议报》第二十七册。
- ⑫ 《清议报》第六十九册。
- ⑬ 《皇朝著艾文编》卷十，第 33 页。
- ⑭ 《严几道诗文钞》卷三，第 7 页。
- ⑮ 严复译《社会通论》(Edward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第 174~175 页。
- ⑯ 邹容：《革命军》，第 6 页。
- ⑰ 陈天华：《警世钟》，见《辛亥革命》第二册，第 131 页。
- ⑱ 《严几道诗文钞》卷三，第 7 页。
- ⑲ 章氏文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
- ⑳ 《湘报类纂》，甲集，卷下，第 25 页。
- ㉑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第 120~121 页。
- ㉒ 《谭嗣同全集》，第 18~19 页。
- ㉓ 《湘学新报》第三十二册。

又，黄遵宪于妇女解放提倡最力。湖南风气之开颇受其影响。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知新报》所载一则新闻，颇富意义，以见黄氏用心。“又闻，黄廉访遵宪公度，新任湖南臬司。下车伊始，倡禁民缠足，风举雷动，以至秋闱诸生所有进场器物，俱标贴不缠足字样，风气之盛，极于一时。”另一有意义之举，即湖南创立不缠足会，为鼓励放足妇女，由会各赠银牌一面，上书“巾帼英雄”字样，以为旌表。

- 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第 41 页。
- ⑤ 康有为：《戊戌奏稿》，第 44 页。
- ⑥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第 38~39 页。

又，黄遵宪、徐仁铸等发起湖南不缠足会，其凡例章程亦表达出相

同观点，而主倡立女学。如谓：“泰西女子罔不读书，故能兼任外事，助夫相子，家道易昌，国势以振。吾华教化最先之国，女子识字者，大率十人中仅二人。缠足之囿于习俗，不明义理，皆由于不知学问。本会刻下力量绵薄，如仁人君子，慨掷廉泉，俟经费充实，当广开女塾，并延聘明通女士，传学四方。不骛辞华，但求明理，俾知毁体媚人之可耻，则恶习不禁而自绝。”（《湘学新报》第三十二册）

- ⑮ 陈寅恪：《论再生缘》，第 37 页（油印传写本），于《再生缘》作者之思想申论颇详。有谓：“夫当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为宰相，社会上最高地位为状元。此两事通常皆因科举之途径得之，而科举则为男性所独占之权利。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即应试中第，作官当国之可能。此固为具有才学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而在端生个人，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案寅老之论再生缘，其卓越超绝之创论，则属于文学方面见解。其一判定再生缘之结构，为弹词中第一。这尚为不奇，而更足以震惊文坛之见地，则为判定该书为中国长篇史诗之佳构。向之论文学史者，每以中国独乏长篇史诗，以为逊于希腊印度文学，学者久习故常，视为定论。寅老此说出，则中国史诗亦有其世界文学地位。且其自谓久蓄 40 年，齿暮始行吐露，可见慎重一发的态度。虽然，寅老生平著述，《论再生缘》并非上乘作品，近人关心注意者，多集中此书，实非正识。盖《论再生缘》一书，所论仅达绪旨，而并未作充分发挥。寅老工夫多集中于作者身世、学养、才华之考证，而于最重要之文学研探，则只点到为止。殆可说略除该书之文学结构与词藻、法义、意境之讨论。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至少亦觉其轻重不相配称。以拙见读书心得，则偏好寅老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确信其为当代文史学界最杰出之贡献。以寅老生平著述言，亦应以此书为最上乘之代表。盖其他诸作，后学者或能有超过之日，而《元白诗笺证稿》，则恐后人永难追摹。因其难在深广多面之学养知识，已足与唐人同其社会同其心思，非寅老从事，他人决难想望达成。然《论再生缘》为感慨而作，寅老故意把作者身世立为全书重心，书末并详叙一己颠沛流离情状，与目管后之痛苦。悲抑之情怀，殆亦融会书中。其与作者两两比照，明其会心之处，不下六七次之多，而直接引喻者亦有两次（一在第 35~36 页；一在书末第 49 页）。足见寅老借陈端生身世以表露个人沉痛心境之意。真乃才子自伤，古今一途。《再生缘》前 16 卷完

成，作者尚不足 20 岁，嗣后终其半生，仅续成一卷，一与十六之比，暮年岁月与韶华瞬息对照，是何等伤痛凄婉，真永世之遗憾，无可弥补者也。寅老若不病目，其著作当能十倍于今。故其于此处有谓：“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语虽徒呼奈何，实则心有不甘。此两语直蓄万钧之力，哀怨之气，上可格天。因亦可见书后题诗“绝世才华偏命薄”之句意。敝人同以目病之后而读《论再生缘》，至书末寅老自述其身世之际，不禁掩卷饮泣，数继始能终篇。本已草成识跋，自分俗浊庸浅，仅以同病，何敢妄附前贤，因是撕去。今于小注中赘语，尚乞读者编者谅我心情，以宽宥于此浪费篇幅也。

- ⑤⑧ 《知新报》第五十二册。见《戊戌变法》第三册，第 173 页。
- ⑤⑨ 《知新报》第五十二册。见《戊戌变法》第三册，第 177 页。
- ⑥⑩ 秋瑾：《精卫石》。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下，第 592 页。此作原著 20 回，今传世者仅 1~6 回，为清吏搜捕秋烈士时之残稿，使学界永不能窥其全豹。同一弹词，其遗憾殆尤甚于《再生缘》者。

又，《精卫石》自序之外，全书又冠以汉宫春题词，实已充分表露妇女肩负国事之雄心，与参政之必然要求，兹录一段于后：

可怜女界无光彩，只恹恹待毙，恨海愁城。湮没木兰壮胆，红玉雄心。蓦地驰来，欧风美雨返精魂。脱范围，奋然自拔：都成女杰雌英。飞上舞台新世界，天教红粉定神京。

- ⑥⑪ 秋瑾：《精卫石》第一回。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下，第 596 页。
- ⑥⑫ 徐仁铸：《稽轩今语》，载《湘学新报》第三十三册。
- ⑥⑬ 《清议报》第二十四册。
- ⑥⑭ 《谭嗣同全集》，第 128 页。
- ⑥⑮ 陈虬：《救时议序》。
- ⑥⑯ 《格物中法》为刘岳云所辑，最称完备。《格致古微》为王仁俊所辑，亦简明赅要。西方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平治中国科学史，竟未采用。近得杨联陞先生提示，始为学界注意，并已由出版界翻印行世，有益士林至伟。

⑥⑦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第1页。

又，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第19页，有谓：“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此书为光绪五年以前所作，当知其观念提出之时期。

⑥⑧ 《严几道诗文钞》卷三，第2页，除杨墨辨。

⑥⑨ 墨学的复兴，在辛亥革命以后，始有重大发展。当时一般学者，共趋于“赛先生”、“德先生”之崇信，墨学以经说中之事物定义，全属科学旨趣；并以兼爱尚同思想，有近于民主。乘借此种风气，墨学遂被广泛重视。清季之创意于墨学为西学之本源者，尚属傅会。而后乃渐转入于理性的探讨与了解，并亦步入学术研究之路，自形式章句，以至思想理念，甚至于宗教色彩，俱被重新估评，参与学者至夥，駸駸然有取代正统学术之势。时儒学正被严苛攻伐，因而有打倒孔家店，建立墨家店之一说。然此问题甚大，非本文所能讨论。因曾建议几位青年朋友，作正面的严肃的研究，以专论方式探讨“近代的墨学复兴”。

⑦⑩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六，第67页。又卷三，第55~61页，“论支那宗教改革”，通篇此议，均以立孔教为宗旨。

又，叶德辉：《郎园书札》，第5页云“西人一天主一耶稣，教会之名，至盈千万，此其结会相仇，兵连祸续，西人未尝不痛恨之。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揽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亦在批评康有为之西化孔教。

⑦⑪ 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四，第56页。

⑦⑫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九，第32页。

⑦⑬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52页。

⑦⑭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107页。

⑦⑮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九，第59页。

⑦⑯ 《时务报》第四十四册。

⑦⑰ 《时务报》第四十四册。

⑦⑱ 邹诚：《夷氛纪闻序》。

⑦⑲ 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四，第1页。

⑦⑳ 王之春：《瀛海卮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⑧① 《曾惠敏公文集》卷二。

⑧②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四，第22~23页。

- ③《蒙学报》第一册。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 ④倚剑生：《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卷首之三，第27页。
- ⑤同前注。
- ⑥倚剑生：《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卷首之三，第29页。
- ⑦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2页及第13页。
- ⑧王照：《小航文存》卷一，第28页。
- ⑨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二，第25页。
- ⑩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四，第1~2页。又劳氏对于拼音字之传习，有很乐观的估计，与其高远的期望。故有谓：“此字传习极易，至多不过数月而可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计之，一传而五十人。再传而二千五百人。三传而十二万五千人。四传而六百二十五万人。五传而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中国四万万，五六传而可遍，果以国家全力行之，数年之内，可以通国无不识字之人，将见山陬海澨，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人人能观书，人人能阅报，凡人生当明之道义，当知之世务，皆能通晓。彼此意所欲言，皆能以笔札相往复。官府之命令，皆能下达，而无所舛误。人民之意见，皆能上陈，而无所壅蔽。明白洞达，薄海大同，以此育民德，何德不厚。以此潜民智，何智不开。太平之基，富强之本，胥于是乎在。”见劳氏遗稿卷四，第3页。
- ⑪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6页。
- ⑫《严几道诗文钞》卷二，第7页。
- ⑬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 ⑭《湘学新报》第三十册。
- ⑮《湘学新报》第五册。
- ⑯此处所估数字，竟谓达千数以上，似颇惊人。同道学者或不免疑为夸大。然实际查考甚易，不妨各自核对。若就纯自批判意旨作出发，而探究古代文化学术之意义与价值，乃至真伪是非者，仅以论文而论，其作者亦在千数以上。可参考余秉权著《中国史学论文引得，一九〇二至一九六二》一书。其所收论著尚非完全，若再加专书著作，为数当更多。故此处数字，实为一不甚确切之保守估计。
- ⑰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六，第27页。
- ⑱秋瑾：《精卫石序》。

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

一 引 言

近代世局，中国亦正遭逢重大转变之际。自传统历史经验体察，则中国之所遭遇，颇如春秋战国之万邦林立。同时内部之严重性，亦恰如古代，即旧制度解体，传统礼俗崩坏，一切社会秩序，颇为颠倒错乱。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均已显现新旧脱节现象。但是春秋战国之文化思想，其发展出路，并无他途可循，而必须自破旧残余，酝酿生机。由中国民族自身创建新制度，安排新秩序。故在此酝酿期间，才智之士，颇苦闷焦灼，从事思考重建新制度之各种构想，思考安定天下之健全方略。而近代之中国，以西方势力之冲击，旧制度之破坏与消退，更为迅速而严重，但其文化思想发展方向，立即可群趋于西化，亦即西方文物制度，为最方便之取借效法之对象，无须为创立制度而彷徨思索。不过近代知识分子自有其更复杂之烦恼问题，并亦形成重大之困惑。其一，即中西新旧之观念，不但不易相容，而且驳杂万端。其二，西方制度习惯，在适应上有不少困难，至少亦有程度上之差别。其三，西方制度同样是随时变化，颇苦于追逐模仿。其四，西方制度未必是尽善尽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考验，予人类带来更多之彷徨与恐怖，人类全体，已濒于毁灭边缘。因此追随西方路线，亦颇使人疑惧迷惘。然则实质上，近代之中国思

想界，其感染于西方观念意识，已日见加深，其狂热向慕，尚未见有减退之征兆。

文化思想之嬗变转承，起伏迂回，藉时代潮流而推移奔放。然千里垂泻，自有滥觞源头；波涛汪洋，必有进趋方向。是以观察思想之发展变化，或见众流庞杂，端绪纷繁，而其终当须把握总体之动向，自可易见影响之结果，甚至尚可探测未来之趋势。今以总体动向而论，实非一单纯之直线路径，且亦不限一种动力源泉，其进展过程，当是辗转推移，蹀躞趑趄。推其大势，则各时期自有一定之递进阶段，计其总程，亦足可观。诚如近人贺昌群所论：“一时文化思想之盛衰，隐隐乎如百川汇海，时或波涛澎湃，时或渊邃湮住，皆有不得不然之势。所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者也。”^①此足为思想潮流发展之自然动向之写照。

探讨晚清思潮之动向，大体而论，可以粗分为三方面之发展。即保守、进取与调和三者。此三者动力，互相推移，而终于仍能循一定之总方向有所进展，此即三力汇合后而产生之总体动向，亦即构成近代思潮各阶段发展之大势。当然外在的时代时势，更为其有用之轨辙，与有效的动力源泉。事实上，保守与激进是文化发展必有的基本特性，实即文化发展本身之一体两面。换言之，文化成就之本质，必不缺乏保守，亦不缺乏进取。两者固然矛盾而不能并立，实则以先后之承转，隐显互换，而产生相辅相成作用。人类天性有保守倾向，以使之作习惯性蓄存维持，并进而发扬其所蓄持之文化特质。或即表而削弱，而潜力存在，以待异日之显现。人类复有进取喜新之倾向，以达成其吸收外来事物特色之愿望，并用以充实固有文化特质。进而消弭其两相冲突之性质，融会改造，而作更新之创制。至此种自觉性之消弭冲突，融会优长，亦并出于人类调和之基本性格，实相当于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之原始本能。今论晚清思潮之动向，虽分别观察其保

守进取与调和之各个源流，实欲以见其总体效果，与最基层之潜流。然后提供国人以较实体之参考。

二 保守的动向

保守的动向，在表现思潮之流趋，并不纯指保守思想，而保守主义当可以包罗此种动向之中。以史家讨论近代思想之保守一面，全无衡量价值之意趣，且亦无所抑扬，至浅薄之非笑，尤非所取。^②

一人物一时代之思想，其形成本极复杂，尤其不免无数之变化转折。即令执其一端而辨析之，其渊源、意旨、趣向、用心，均有不同程度之渗合，颇费寻绎解释。今之言动向大势，乃取其现象概略，绘其粗迹，用以表状时代思潮之特征而已。

就保守动向而论，即原存在于任何时代，惟近代最见显著。而近代之保守，实亦具有若干不同思绪概念之内容，可以供人探索研析者。

近代保守倾向之表达，最直接最易见之处，是对外族之反应。因为近代思潮发展，带使中国走向西化，其第一界限，即产生中西不同之差别，亦即相对分判本位与西化之对立。中国本位文化观念之强烈，系宋、元儒家提倡之结果，诸儒之强调本位文化，颇受彼时外族压力影响。自五代以迄明清，中国民族始终辗转挣扎于沦亡境地。若不以本位文化观念为固结维系，则不免覆灭沉沦，永无翻身之日。换言之，千年来中国数度沦亡于异族，颇赖一批坚毅有恒之保守派学者，在无论如何恶劣逆境，循各种不同方式，得以固守其文化信仰，传播后世。此项传统性格，遂遗留当世一坚闭固拒之保守动向。其严重者，若徐桐屡为稗史讥嘲，固不必重述。然果有他例以见其大概者，又有内阁学士文治，其于光绪间争铁路疏有云：“闻铁路面心惊，睹电杆而泪

下。”^③尤足见坚僻固陋之情状。其次至如叶德辉、王先谦之反对康有为，亦均自本位与西化之对立而言。叶氏有谓：

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改制之圣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启超）人尚笃实，信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④

王先谦有谓：

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域。^⑤

复次，保守倾向之另一表达，则为维护儒家道统之理想。中国三千年来，历经学者之提倡发扬，立儒学为正宗道统，沿承既久，普及亦广。自清末以前，凡识字知书，莫不以儒徒自居。近代中西接触频仍，西方学术渐次输入，不惟宗旨别异，抑且信仰不同。遂亦影响及正统儒术之崇奉地位，卫道之士，自不免起而拒斥其所谓异端旁系之学，乃至形成保守态度。此中道学之士，著名者如理学大家倭仁之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正为一时之重要代表。其所辩诤中西学术道艺之本末，正自居于儒家卫道之立场。如倭氏所谓：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譎，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

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⑥

复次，保守倾向之另一表达，则直就中国主观立场而言。此与前论本位观念，儒学宗统尚有小异之处，盖由中外不同族之区别，以为观念基础。其所持习惯之有力论调，或即声号夷夏之防，以为拒斥异类之壁垒。由是而并自蹈固陋，甘自抱残守缺。王闿运之理论即本此观点：

夫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假令法国布尧舜之政，读周孔之书，分置师儒，佐我仁政。则诸臣将束手坐观，望风赞叹，以为真圣人之国乎。扶教之行，教堂之立，但当问其可行不可行，不当问其教善不善。为法国谋者，若使中土贡六艺之文，陈先圣之书，入其国都，宣我木铎。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尧之义，明国无异政之礼。守死勿听，以为其主耳。^⑦

复次，保守倾向之又一表达，乃出于政治观念中恪守祖宗成法之信条，亦即不敢违背祖宗之旧规而有所更易。既不得更易，自遂进而为墨守局而。原其基本理念，本自泛孝主义推广而来，以孝治天下，自以步趋孝道而仪范万民，用为施治之准绳。其不背祖宗，乃至大至显之行为，泛滥其义，遂并祖宗一切，不敢稍移。孝行本为人伦之正道，然施之于繁杂政事，实难适应其变幻万端，与诡譎世局。国人沿二千年来传统，用以维系社会风教，盖屡见其效益。推之为政治理想，当亦不失为崇高原则。若事之为施政准则，自不免迂阔自缚。其于外交军事，尤难实施得当。且古之所谓大孝尊亲，尊亲乃宏扬先人业绩，若一成不变，只在鹄守，又何足以符孝道。往史制度行为之多见矛盾，若干因素，

颇原于此。至清人不易祖宗成法，为向来政论中保守派之有力武器，亦足知其有深厚之信仰基础。曾廉之理论，即本此立场：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皇上为祖宗持守宗庙，有万世不变之法，有随时修改之政，然其所以修改者，皇上度亦无以出列圣范围也。故必常以祖宗为心，兢业罔坠。盖为孝子而后为仁人，为仁人而后天下蒙福，后世昭其令闻。伏读今日诏旨，有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有曰开创百度，有曰参预新政。臣不谙体例，颇有疑焉。以为或是承旨诸臣，过事张皇，未能悉符圣意。不然，五帝三王，乃异姓受命，皇上上承祖宗，何以异姓为比。且皇上既自以为新，则必祖宗为旧，皇上自以为开创，则尤未知如何以处祖宗也。^⑧

复次，保守倾向之又一表达，在于固有权势地位之维系。此一论端，当代学者多有考究，而以陈荦最为强调。其以戊戌新政之遭受反对为立论主题，探讨出保守派所以构成反对势力，主要冲突点，尚不尽在观念政见之不同，实以固有权位与既得利益有极密切关系。陈氏议谓：“变法之举，首与最高权位之太后冲突，其次更不利于一般之守旧大臣。此辈为变法者所直接攻击之目标。非倾覆变法之举，无以自保。”^⑨

复次，保守倾向之又一表达，则为固有习惯癖好之沿承，无论有效与否，是好是坏，均不易改变。相反者则坚持维系其存在价值。习惯癖好，安于固守，乃人类本性之一而，而在中国农业社会，历代之施教，世风之薰习，均特别发展墨守固旧习尚，往往加深而成不可解释之惰性，一旦置身不同格局，遂觉坐卧不宁。盖人类共通之文化习性，于中国尤见强烈。近世风俗嬗变，制度衣冠，乃其显而易见者，实则至细如语言文字，亦日新月异。依固有习惯衡之，乃视为佶屈聱牙，不堪人耳。王先谦攻诋

当时新文体云：

自时务馆开，遂至文不成体。如脑筋、起点、压、爱、热、能、抵、阻诸力，及支那、黄种、四万万万人等字，纷纶满纸，尘起污人，我公夙精古文之学，当不谓然。^①

此外如叶德辉亦同样感觉碍眼，而加以抨击：

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①

近代文体之变，以光绪甲午为一显著段落，亦一新时代文体之滥觞。后世学者或不觉察，亦少考究，治史者徒见其最显著之政局变动，殊不知思想观念，社会结构，文风习尚，亦产生转变契机，并均在此一时期，展现曙光。当时保守者已有觉察，出而批评者尚不止王叶二人。

以上大要六端，概略可见晚清人士保守倾向之本质，虽未能包罗完全，固是当时大致趋势。然进而一论保守之意义，亦须作多角度层面之探讨，而予以公平衡量。

保守之实义甚为明显，即坚持固旧之态度。然此态度自以时代、地域、人物之相对比较而见其深浅强弱。统观文化发展大势，则任何一种民族亦决不缺乏其保守本质，实乃人类精神共通之本性。就此以论保守，殊无须多所赘辞。

进之以论中华民族，则就历史相传，保守实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项重要基础。此就自然趋势而言，尚不在历代学者之强调提倡部分。无论就文物制度语言风习各方面，均足以察出远古渊源

遗意，以见中华民族善保守之特色。近代人士之保守倾向，自是继承往古，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强化而已。

中国民族保守态度的传统习性，与历代异族入侵极有关系，南北朝、五代、辽、宋、金、元各代，有不少固执坚持之守旧派人物，用其殉道精神，在荒乱危亡之际，保存中国文化特色。首因其具有深厚之认识基础，与文化教养之习性，由深刻之热爱，而产生强烈信仰。遂至在任何恶劣环境之下，终能使中国文化有复苏重光之日，此固保守人物之重大成就也。后人因其人格之感召，言论之薰染，遂亦沿承此种保守特色，久习而不能觉察，实近代保守动向所必不可免之本质也。

中国民族保守之手段，是采取文化之一致，以维护民族之延续。此实为中国民族文化发展之重大特色，而自秦汉统一前，已由孔子及其门徒完成健全之理论体系。此即孔子孟子所极力称扬而提倡之三代礼俗相因，乃自尧舜历圣相传之道统观念。盖此理想发达，已泯除古代不同族类不同朝代之攻伐分割现象，遂以文化之一致，统摄民族之混同。中华民族之得以发展壮大，此种理想实为重要条件。然此保守动向之基因，当自有悠久历史，与重大意义。近代之中国，不过承其流弊，为进步之障碍而已。^②

中国古代儒法二家学者，提示“耻”字为其强调实践之德目，亦并为传统文化信仰有力之支柱。颇有助于民族文化色彩之自觉与强化，以及民族主义思想之形成。同时耻尚之理解与维系，大致在藉保守主义而有所发挥。盖政治体制，门第尊严，礼仪节度，男女冠裳，行动言笑，必各有其分，用以维持社会固有之秩序，而不凌躐替乱。严格耻尚，即在于肯定固旧之一切秩序价值，自然即形成为保守动向之有力信条。

保守主义之另一有效之表达，即同时存在光复心理。保守之信念，寄于往昔光辉之想望，与深切思古之幽情。渴望旧日繁华之重见。或至在一民族中发展为严正之信仰，若犹太民族之复国。

愿望。楚亡国后光复故土之信心，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坚定意志，均足沿贯千载，誓守不失，用之以为民族复兴之思想动力。

近代中国保守倾向，固若前述迹象，或尚有更多细节，不易觉察。而保守者之运用与讨论，尚有若干似是而非之信条，为其便利工具。虽不足以形成广大障碍，尚能多少发生消极作用。举例说，如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子夷者”，本在说明一种事实，而后人引申，却变为一种文化态度，又可推为圣人之言。此在晚清言论中颇为常见。又如《汉儒经传》有谓：“工不十不易器，利不百不变法。”《汉书》又谓：“利不十者不易业。”这些只是安故守常之口号，本不足以构成坚强真理。晚清言论中，亦复常见。类此细节信念，亦多少产生若干保守力量。

中国保守倾向有一个共通的想象，为其要求维系传统恢复固旧之认识基础。那就是社会退化观。其共同感觉所谓“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等等，则认为现时社会正在日趋衰败之中，于是以其使命感，出而力挽颓风，以拯救文化之沦丧。当然在历史中屡见异民族之入侵，其毁灭性破坏摧残，如迦太基与印加帝国之沉沦，则足令人怵目心惊，以鉴省惕厉，团结御侮。此在一民族发展振奋，固为必然。但世势之嬗变，其必不至永久坚守固旧而不移。递新之变化或足以充实原有文化质量，此类情势，粗观则只见其人事日非，即必视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适应或不能适应，遂并视为世衰道微。实本观察之错误，乃慨叹今不如昔，衡量社会之变动，又误以为转向退化，则不免自陷蔽锢。此亦反映保守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近代文人士绅，时见此类慨叹，盖此社会退化观有以蔽之。晚清如叶德辉之论文如此：

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有康雍之纯朴，而后有乾嘉之文

治；有戴段毕阮诸人之实事求是，而后有魏龚诸人之嗜奇争胜；有东塾之平实，而后有新学之猖狂；有桐城湘乡文派之格律谨严，而后有今日时务报文之藩篱溃裂。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何论文字之粗迹乎。^⑬

叶氏扼腕痛心其文体之溷浊鄙俚者，殊不知有一新文学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种把文化变迁现象视为退化，是历来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错觉，同时也正是一时代观念冲突的重要关键。

最后有一问题，须作严肃考虑。即1900年庚子拳乱之后，何以国人多由强烈之排外，一转而倾向于媚外，此特须就保守观念作考察。盖旧日之所谓保守固旧分子，多非由理性之认识确信惟能排外而始得保守自存，实多凭一种感觉意识，与感情之冲动，特别是由厌恶之反感，盲目排外。若郭嵩焘之所形容，见洋烟（鸦片）则争相吸嗜，见火车、轮船、电线、机器则协力以攻毁之，以为愚昧不可理解。及庚子拳变，反洋失败，狂热之火焰顿消，原无理性自信作支持，遂仍转旋于感情心理范围，一变而转为惧外，由惧外自亦不免尽施媚外之术。此亦保守动向纯由感情发展之结局也。

三 进取的动向

和保守相反的一个趋势，就是进取。无论或激或缓，或迟或速，其动向则是发展于转变的路途。求变求新，也就成为进取的原动力。当然在最初启念阶段，求变求新的动机，是由某种程度的认识所获得的结果。这也正反应出思想路向的选择。所以求进取之思绪，自亦经过苦闷之踌躇与严肃之抉择，且凡所举步，又未必真能踏上坦途。是以近代中国之思潮，千变万化，正可以表状此种过渡性彷徨矛盾之特色。唐才常之自述，足以显示进取思

绪在焦灼中之酝酿：

于是日与才常（谭嗣同与唐才常）谋所以变通之，激厉之。恒两人对座，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不得已，欲就一邑为新中国之萌芽。曾日月之几何，遂匆匆五六年，终无成议。日暮途远，人间何世，每一顾景，群伦在疚，万箭攒胸。我瞻四方，蹙蹙靡骋。^⑭

由于一种苦闷的思虑，终于会酝酿出求变的意念，一发而不可遏抑，遂亦构成积极的进取动向。唐才常基于进化论之理解，而提出求新求变的严肃问题：

余窃观地球全局，变幻无常。往往异族至而本族不昌，新族逼而旧族日亡，更变迭代，万事沧桑。日求其理，不可得解，则眊眊然悲，泫泫泣数行下。既而思之，霍然以寤，乃知本族旧族多狃于故习，惮于勤劬，始骄终靡，始妬终疲，既无一能一技，可以谋工商，参政事，则深山穷谷，渐为若辈栖游之所。至异族新族之能覓地植种者，必有震动之力，智巧之思，争自存而困拔擢。故其聪明艺术，即当驰布种族之先声。然则新旧种之迭为盛衰倚伏，人为之也，非天也。^⑮

谭嗣同亦同样表达其求新之意趣：

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莽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庄曰：“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嗚呼至愚，可不谓之天哀！^⑯

求新求变之热望，在晚清当有显著疾速之增长。至所欲变之路线，则如普遍影响于政治的变法之呼声。所欲新之事体，则如普遍为士人讨论之新学。实则其总体目标，俱以西化为指归。而西化实是当时进取动向的惟一出路，凡所变新，则无不以西方事物观念为效法标准。如汤震（寿潜）所提意见：

今天下一机械之天下也，必墨守旧说，愚奇技淫巧为厉禁，是广田自荒，而张口仰食于西人，奚为者。西人以机械治其国，事事标新领异，而舟车枪炮，尤为利用之大宗。非西人之才力聪明驾吾华而上之也，特其得一新法，弋名甚捷，获利甚厚。是以遍国中鏖肝铄肺大小各有所成。往往早作夜思，殚毕世之精神，始成一艺。父作子述，合教传之财力，始就一能。其所以倾家陨命而不顾者，以艺成能就，即举而白之于官，果为独出之奇，由官给予赏牌护照，俾独售此技若干年，即国家欲秘其技，不令另售，亦必给予巨资，以酬其劳，而偿其费。故莫不推陈出新，不惜炉造化而炭阴阳，以凿破其混沌之窍。中国宜亟师其意，以资董劝。^⑭

郑观应亦作类似解释：

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贤者蹈海而沉湘，不贤者颡颥而苟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反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持，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⑮

讲求西学，接受西化，不论晚清以至现今，实为进取思潮之主要路径。其表达其行动以至重大发展，则逐渐推及于方法、制度与习惯之全面改变。此种进取之形式，即若吸取西方之工业技术，经营方式，政府制度，并为显见之实证。即就社会组织而言，知识分子亦俱有根本改变。知识分子表现于进取行动，则组织学会，发行报刊，演说讨论，在在无不取法西洋形式规制，实正为社会结构西化之起始，亦并同时及于社会行为之变革。盖诸端显著之习惯若吸烟、缠足、奢糜、繁缛等等，亦俱为当时自觉性之改革目标。^⑩

凡为进取，必有相当激冲之力，其发展自未必能十分允恰，不免流为过激与极端。而热情沸腾之言论，其所推动之冲力，尤其难能把握方向，在此情势之下，所展现之激进观念，自亦不一而足。若樊锥之所谓：“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易鼎之所谓：“一切制度，悉从泰西。”^⑪则俱为激进之全盘西化论，亦并为此一观念之开宗先祖。若唐才常之“通种说”，易鼎之“合种说”，直欲媾通中外血缘，泯除种类区别，亦足见其思想激进之奇速。^⑫然此类思潮，基本认识，实建筑在西方进化论的理解之上。正为其西化意念之延伸。

进取之冲力，发展激烈，则随时亦并生破坏力量，亦必至以排除障碍，而作各种破坏之行动。当然此种破坏，实出自于某种认识之信念，或在反方面设想，自有其极正当并且建设性之理论根据。但如此思潮鼓动，必达成他一方面之遭受破坏，乃是事实。若张之洞之建议改变学制，对于新式教育之倡行，有极大影响。其创说基本，表面似甚稳健温和，然其发生之破坏力量，则足以于数十年内，倾覆佛教，而寄食书院之老儒，一朝顿绝其生路。张氏无意之建议，实带来近世佛学沦灭之浩劫。然其正而理由，又十足撼动人心。如其所论：

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又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②

激进之冲力，再度强化，发展高涨，自然就达于革命之要求，而至破坏暗杀，更成为自觉性的行动。晚清若邹容之《革命军》，陈天华之《警世钟》、《猛回头》，吴稚晖之《暗杀时代》，则俱表现激烈的革命意旨，实为最急进之进取动向。^③

激进的动向不单是向内发展，驱除内部障碍，同时更向外发展，以挣脱帝国主义之枷锁。而排外观念，则构成另一方向急进之思潮。麦孟华提出其心力排外之理论，为文明排外之先声：

中国人乌知排外者哉。排外之道有二，野蛮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排以腕力者，愤外人之逼我，视之如仇，防之如贼。外人之来我国也，必将深闭固拒。则外人之文化智识必不能资其益而取其长，而

一人腕力又非百十腕力之敌也。其力将必有所絀。力之既絀，则外人之来而逼我，将又百十于昔日，而更无术以拒之，且冒犯不韪，背公理而触万国之怒也。外人则贱为野蛮，愤为公敌，合诸国之力以为报复，且藉公义以纵其私谋，悍然无复顾忌。极其践踏缚压，皆视为待野蛮之公法所当然，而排外者力穷理屈，排无可排，遂不能不低首吞声，以受其压制。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礼貌有加，其善外交也仪节不失，虽世仇夙怨之国，受其逼辱，举国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来酬应，殷勤无以异于姻娅。且惟积怨怀仇之敌，则弥师其政学，输其文明，外奉其敌以为师，内善其国之政治。至于自主之内政，国家之主权，下及国民享有之权利，则虽至小至弱之国，必不容他人有一毫之干涉，有一事之侵犯。而外人之耽逐窥伺其傍者，亦惮其心力，为所抵抗，不敢施其干涉侵犯之谋。此二者排外之心虽同，而排外之术迥异，此国之盛衰兴亡之所以殊其效也。^②

急进的革命分子，如吴稚之高唱暗杀主义者，亦同样力主排外：

我同胞之稍具知识者，见外人之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奴我子女，莫不曰排外，排外。夫然，不排外则不得复我土地，不排外则不得还我利权，不排外则不得归我子女，国不可无，则排外不可不有。排外之系于国，不如此其重且大乎。予亦同胞中之分子耳，又焉能外我同胞之所见也。^③

陈天华更是激烈地呼号，热血沸腾，怒声若雷电：

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

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俗语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人，连狗都不如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有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④

当然在此时期之急进分子，其所欲驱除之进取障碍，内则专制王朝之压迫，外则帝国主义之侵逼，都是最显著的第一等目标。促使此等国民之采取如此非常手段者，无论就时势，就理想，就一民族之生存奋斗，此类激进侠士，均足以代表中华民族最高贵之光辉，其所为义行，尤足以为后世所崇奉赞颂。中国人民之早得脱于水深火热，实赖本民族中尚有不少激进之侠士。

至于在思想上之发展，过激而又过激，竟至不幸发展为虚无主义之信仰，于是理论上认为凡固有之事物，俱为进步之障碍，亦俱在破坏扫荡之列。同时并相信凭空可建立新天地新世界新文化之虚空理论。自晚清《新民丛报》、《民报》相继鼓吹虚无主义以来，此种排除固旧之意念，开辟新天地之遐想，遂注入中华民族激进派之血脉。虽不是人人信为真理，实确为时时备受利用。70年来，若排山倒海之势，凡为固旧，玉石俱焚，破坏打倒，

迤邐相继，数千载文化遗产，遂遭空前浩劫。此种有自觉性之破坏动向，正不知何日或已。盖进取之不已，终以原始人类为最后目标，人复丧失其语言、智慧、行为、能力，以为茹毛饮血之世界。但他方族类，不作此想，保留文化，发展文化，正以宰割奴役此种退化之民族。

激进之冲力，足以驱障碍，若姜桂起疾，达其猛济之效，近代剧变之中国，自不可缺少，亦不能避免。然其破坏打倒之余势，亦产生意料不到之副作用。其一不能料知之效果，即破坏时已良莠不分，而坏恶处又颇多保留残余。他者无论，举一端可知，即特权思想，于此民权发达时代，亦同时存在人人骨髓之中，隐然支配政治、经济、社会之发展。其二不能料知之效果，即打倒权威却再建新权威，推翻正统却再建新正统，破除迷信却再建新迷信。60年来思想界，极显现此种矛盾之特色，正待冷静之学者思考追索。其三不能料知之效果，即医方乱投，真病难除。激进者之取决神速，不惜大刀阔斧，杀伐从事。而建策之方，进取西方不同国度，驳杂零乱，矛盾琐碎，样样尝试，不免遍罹刀割（此如民初梁启超之就医，初断患在牙齿，遂拔牙七只，病未除而七齿已不复存；继断患在肾脏，遂割一肾，病仍未除）。大抵激进者救国理论，多相信旧者除尽，新者必来。实是自误误人之天真相像。盖当世非、澳、美等洲，原始民族不一而足。原即受西方列强统治，绝不乏接触文明机会。本无文化可言，自不待有除旧之烦，又何尝有蓦地创出新文化或移植他方文化之奇迹。在理论上说，当知旧者除尽，新者未必能来，实为理性之了解。且沿历万代，中西古旧文化，全为后人役使，进之可启发创新思想。惟在乎智者能者之活用。至虽鞭挞古人尸骸遗物，置之粉糜，徒耗日力精神而已，何补于当世之文化。

进取思潮，表现不断之变动，有各种情况具备过渡时代之特征。其一即人物新旧之转化。晚清人物接触变幻之世局，有所感

悟警觉，多是由守旧观念，转变为趋新观念。由是一人物前后思想，有守旧与维新之不同。晚清最著名守旧领袖醇亲王奕譞，在同治八年表达其极端闭关思想，直建议驱尽洋人，停止邦交。其中关于西方新事物亦表示彻底摒除，如其所谓：

玩物丧志，自古皆然。从前岛夷入贡，原系震慑皇威，输忱献曝之意。今则抑勒中国，勉强通商。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思将洋货投畀水火。且其货物，惟自鸣钟、洋表、洋枪均可有用，然亦现在中国能造之物。其余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不才如臣，从未以洋货为尚，况抱负不凡者乎。^②

然在光绪六七年以后，醇亲王则一变为推行新政之首脑，凡关铁路之兴筑，兵船之购置，海军衙门之创设，台湾之建省，均以其有力支持，而获得实现。其他经转变之次要人物，当复不少。

其二则同一进取人物，因其不断转变，遂至自我攻伐，以后日之所谓是，再事粉碎前日之所谓是。即同一进取或激进，而在同一人物思想之嬗变，亦表现诸多矛盾冲突。如由激进而发展为过激者，若梁启超之自我检讨，最足代表。其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附述有谓：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③

如由过激而转变为稳慎者，若章太炎之自我检讨，最足代表，其致柳诒徵书有谓：

顷于史地学报中得见大著，所驳鄙人旧说，如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以有弟兄唬之语，作逢蒙杀羿之谈。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说向载民报，今丛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乌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征。且古人往矣，其真其伪，不过据于载籍，而载籍之真伪，则由正证反证勘验得之。墨家亦述尧舜，并引诗书，而谓是儒家托古，此但可以欺不读书之人耳。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称为伪托，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无其人，今亦何从质验。转益充类，虽谓我生以前无一事可信，无一人是真，可也。此其流弊，恐更甚于长素矣。足下辞而辟之，正如凤鸣高冈，鸬鹚不能以啁噍相对。此一快也。^②

其三则为全面性之连锁批判，正足代表过渡时代之特色，且有广泛之发展。连锁批判，表现于当时代人对于稍前一时期之思想论说行动之批评攻击，甚至讽刺戏侮。当然稍前一时期人物，应同是革新领袖分子，惟以彼等之学说理论，在稍后者视之，觉其幼稚浅薄，夸诞错误，遂即予以驳斥非难。虽出之于个别表达，而实际则显示进取程度之不同，整体性不同观念之分野。就时代观念而论，一项新学说风靡一时，而不久为人识出破绽与弱点，加以批判，更创新说。新说之后又生有更新之新说，以推翻前一新说。如此连锁发展，批判不止。此既表现不断进取之动向，且亦构成过渡时代之特色。晚清前一时期，新派人物与守旧势力争辩，费尽笔墨，焦思苦索，以维新变法，当其救国救民之初志。

然以时局进展，乘时会而广得信从者之拥戴。然进取之势，不久即飞越于另一阶段。在清末最后十数年间，维新派的学说理论，变为不合时宜，被人渲染为腐臭过时，且遭到多方面之批判讥讽。前期维新派批判守旧党，今者有更激进之言论以批判维新党。这里必须澄清一项观点，即此等论争，并非是政党政论派别之分野，如清末立宪政论与革命政论之不同理想者。而实在是思想上纵方面的发展，以梁启超之批评维新派，为最清楚的代表：

新党也，新党也，吾为之举其大略，白其心迹，约舍数派而表之。民贼派：取泰西之新法可以压制防范吾民者。利禄派：借新政新学以博取功名富贵者。名誉派：但博维新之美名，不必求实际者。制造派：专言制造者，中国言算学者尤众，可以制造括之。科举派：科举既变，不得不转移者。风气派：随风气转移者。无耻派：专以媚外为主义者。^⑩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旧式维新党人尤其没落，遂更成为洋场学士嘲弄戏侮的对象，一时“老新党”之名词，纷腾于士林之口。甚焉者，攻弱捣昧，专以诋讥过时人物鸣高，以示进步。民国初年，此类文字流行既多且广，一时少年，颇为风靡。^⑪然而，稍后更深入新进之学者，又把这些浮薄夸诈的言论，一概斥为假洋货的虚声盗名。^⑫如此连锁批判，一直向前推演，变化不止。

总观其进取思潮，虽不免花样繁多；而发展趋势，终不外惟其求新之一途。一般文化心理反应，认为凡新者无不善，无不美，无不高妙，无不有用，亦并无不悦纳。实自清光绪中叶以来惟新思想之无限推展与翻新。新新不已，直迄当代。以新名词之冠以“新”字者论，现代文献中，不难以万千计，盖可确知进取动向基本动力源泉之所在。

四 调和的动向

调和之思想动向，并非是介于保守与进取之间，尤其不是两可之主张，而会认为保守也好，激进也好。调和之思想，实自有其一定之认识与信仰基础，并且对于文化态度，救国方策，提出若干特立的理论，综其若干不同重点不同立场之论调，实足以见出一种调和之思想动向，可以并立于保守与进取思潮之外，独立汇为潮流者。^③

若以人物为主体，以论思想流派，此种调和思想，自然被视为新派人物所有。然因时代转变迅疾，一人物之思想，前后多有不同，甚且矛盾冲突。而即所谓新派云者，又必被再分为温和派若立宪之类，激进派若革命之类。甚且革命派又可再分为极端分子与中和分子等等。实则思想之分歧，应以思想观念为主体，乃比较少有杂乱而难统一之病。故是讨论保守、进取、调和思想之动向，单以观念之性质分别，于厘清近代思想潮流，实较为简易醒目，尤其可省却类多人物前后思想矛盾之位置安排问题。

调和思想在表达各种程度性质之意见，而根本基于一种兼容并包之理解。此处自无须考论诸家论说之真实依据与信仰之深度，惟在此时代一抒所见者，自足以流露观念之趋向，即足具参考价值。

调和思想表露一个基本时代认识，是对于近代变局的觉察，与提出运会说之具体理论。特以中国门户之洞开，中西人文之交会，中外混同之日进，世界同轨一致以趋大同之未来远景，中国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后半，多已有所见而迭加讨论。变局之认识，言者甚众。^④最早者如魏源所论，以为天地运会，自西而东，世变之乘，已自然而至：

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賂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无一登于王会，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⑤

严复举以为运会之必然：

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⑥

皮锡瑞则自运会而说及其必变之势：

今五大洲通而为一，乃古来未有之奇变。天地之气运，一变至此，人何能与天地相抗，能迎其机而自变者，其国必昌。不能迎其机而变者，其国必亡。至于国亡之后，必别有人代为之变。俄之彼得，日本之睦仁，能迎其机而自变者也。既有其物，而人见为利，则必不能废而不用。必欲遏之废之，不肯自变，将来亦必终归于变，此天地之气运如是。^⑦

以云运会气数，今人或必疑讥为迷信之一端。当时人必自此故旧信仰基础，发抒所论，固不免有其时代局限，未能卓然独论世界局势之必然。然新论之有重大意义，乃为真实，其开拓眼界思域，则尤为真实。其能就此以观测出未来世界混同一致之大势，则更为可贵之远见。世界大同之理想，向为中国思想传统，近世之万国荟萃，学者尤多趋此调和同化之见。欧洲文明诸邦，虽亦早有，而真正觉悟，当在第一次大战以后，尚只为少数先知先觉之意见。^⑧

调和中西异同之见，以中国自身立于主位，而取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之传统观念为根据，如此则异同之间可化除内外主客之疑虑，以达成吸收融会之目的。李鸿章即以此观点，明言接纳新事物之必然性：

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开辟之初，生民浑噩，所需于世者盖寡，其后不能无以自养，不能不相往来，即不能无争斗。圣人者出，于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数千年来，土宇日辟，智巧日生。吴楚秦越，昔之所称戎蛮者，今皆为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边患者，今即是蒙古外藩。而天复使泰西诸国，研精器数，以通我中华。于是有农织之机器，有火轮之舟车，有洞铁之枪炮。盖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然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欲求取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

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固然。来书谓世界日开，其机自外国动之，其局当自中土结之。实为远识至论。其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也。^③

由礼失而求诸野之固有认识，进一步即自然发展为当时代之西学源出中国说，晚清知识分子多乐为谈论，蔚为一时风气。可举皮锡瑞之言论以为代表：

今之学者，有汉学，有宋学。讲汉学者，有西汉今文之学，有东汉古文之学。讲宋学者，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近日又以专讲中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学者党同伐异，总以学自己是，人家不是。平心而论，汉学未尝不讲义理，宋学未尝不讲训诂。同是师法孔子，何必入室操戈。西学出于中学，本周秦诸子之遗，庄列关尹诸书所载，是其明证。史记汉书，皆云七国之乱，畴人子弟，分散海外，大约此时中国失传，而外国得之。今仍传入中国。仲尼问官于郑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据圣人之言，西学苟可采用，不必过分畛域。总之，无论何项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派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妨有异同，不必争门户。^④

再进一步之考究，更转于中西基本观念原无不同之理解。实据宋儒理论，解释当代。则往哲之所谓东海圣人，西海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者，正乃今日中西会同之写照。中西基本观念既然无有二致，则圣人之制作，彼此自多不期然而会心暗合者，如此互相因袭发明，其文物自必益臻于善境。谭嗣同即据以修正西学源

出中国说：

说者谓周衰，畴人子弟相率而西，故西人得窃中国之绪而精之，反以陵驾中国之上。此犹粗浅之论，未达夫性善之旨，与圣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同生于覆载之中，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彼即无中国之圣人，固不乏才士也。积千百年才士之思与力，其创制显庸，卒能及夫中国之圣人，非性善而能然欤？又以见圣人之道，果顺天之阴陞，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非以所本无而涂附之，故阖合而悬同欤？就令如说者之言，西法皆原于中国，则中国尤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复于古矣。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况穷变通久，如西法之为圣人之道乎？不然，且日贫日弱，长为人役，圣人之道乃终亡矣。故嗣同以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①

严复并言中西相通理论，但明判其各别生成实然：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Sir Isaac Newton）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

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②

郭嵩焘在光绪二年，送别卫廉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回美国之诗。有云“尘中世界原同趣”。则据中西理念原本相同为言，皆中国知识分子言笑间所自然流露者。是以郭氏论中西本性，多自同发，而瞭然世势，若在指掌：

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利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不乐阻遏其气同。贤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顺之，亦未尝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于理，强者亦可使退听。^③

虽然诸端众说，在解化歧异。融会中西不同观念，出之以调和理论。然此调和理论之基础，实本之于一项中国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理性修养，理性实为自上古以来贯串中国历代思想之一支重要脉流。在中国思想史上，理性时时沉浮于思潮之激荡，甚或一时全被淹没，然仍常有再放光辉之时。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确立一理性之思想世界，历代知识分子承此传统遗产，多有发挥，用以清除一时代之迷惘、狂妄、放荡、浪漫、神秘、独断之时髦风气，而终获最后胜利。晚清据理性以观当世大局者固自不少，郭嵩焘则特别举出此项管钥，以为决事之基础：

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汉唐以来，控御夷狄之规模，有得有失，而理势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后可以制一时之胜，而固数十年之安。南宋以后，议论胜，而士大夫之气器，此道遂绝于天下。数百年天下大势之功效，亦略可睹矣。阁下之言曰：一诚可使豚鱼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岂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群生，胥是道耳。昔贤谓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东之行，伤之久矣。君子之所谓解事者，是非得失之机。世俗之所谓解事者，祸福荣辱之末。与世俗人相处，足以消弭道心，韬蔽知识，某之于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④

曾纪泽亦同样据事理而观测中西交通之新局面：

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⑤

国人以理性为依据，处世接物，应付时变，虽或闻见不足，而其行为举措，大体不至失之过远。于晚清所见，若干知识分子，虽受传统教育，甚少习闻域外，而类能于当前局势，提出其适应之方，其普遍觉察于变局之见解，可为显著代表。至随潮流而迎合于新适应者，更是不一而足，例如：吴汝纶以古文大家而首先提倡国语之统一，丁福保以文字学大家而首先提倡白话文，足以见出基本理性之所恃。诚亦可见有丰富学养，高深知识，其行为之选择，是非之判断，固不在于新旧，实在于其理性基础。须知无

论新旧知识分子，均必有不少糊涂虫假冒滥竽，不管其已读多少古书洋书，如果只是浮泛夸诞，得不到真识，徒以误己误人，俨然浑迹于学术圈，若蠢鱼之肥且硕然。

以上所论，皆就调和思想之要质分析，总体所见，此类言论，自是以中西并观作出发点。然俱在于调和思想本身所反应之色调。至在此范围之外，亦并有自觉性为调和宗旨立说者，盖即自我体认立于调和之地位。以显著形成调和思想之外在形式。杨子玉著《息争说》，其宗旨即在调和新旧之争执：

故吾愿新学旧学，各顺公理，化其私见，时殊势异，学有不同，政有不同，独扶孔教保种类之心，则无不同。心既同矣，天下事无不可同也。今欲扶孔教，保种类，则老者不必为新学也，提创可矣，少者壮者之宜为新学也，求实可矣。^④

张之洞亦自觉性地以调和新旧自居，如其所吟咏：

璇官忧国动沾巾，朝士翻争旧与新，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⑤

晚清调和思想之表达，大致考虑到中西双方文化之优点，即使有强调本有文化优越之嫌，实质上则绝无拒斥外来文化之意。此外则若干立说之委婉，又多不免出之以许多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之论理。若一时形成之“西学源出中国说”、“运会说”、“托古改制论”、“中体西用论”。俱在此时期中代表群体共通之概念。实足显示同一时代中大致之理想趋向。后人或不免非笑反对，当为居于另一时代潮流之立场。甚至若干人据一厢情愿想像，施之评判，大放厥辞，直是头脑不甚清明所致，反于后世多出许多争论。第一，须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特色，任何贤者均无法超

越太远，尤其更受到个别与全局知识之所限。第二，凭事后之聪明，没有资格非难前一代，更无权利就当代经验多一纠正与非笑之举。此理甚浅，早在清末梁启超已作清楚之说明与举例。第三，后一代人所自认为进步、高明、正确者，同样是基于主观假定，乘时代思潮之风气。实质上是否真的进步、高明、正确，均颇成问题。此在思想家自己并看不出，而治思想史之学者，由其洞悉古今之通识，可以其比较而测知。

至于彼一时代何以有彼种思想，后人研究，自不应存有应该不应该之想像。即使探求考察，进而解释，当只是多几分澄清之程度，助人了解其现象。实亦不能保证十分完备正确，具有充分之说服力。试观晚清调和中西之思想，每一概念均颇有其复杂之形成因素。如以“西学源出中国说”而论，谓其为表达思想之一种形式可也。谓其为近代人胡乱附会，或为积弱国势下之自我解嘲，或为近代人思想所特有，恐均不免隔阂之推论。须知在同样外来文化输入，有同样之思想表达者，这个概念之出现已是第二次，却并没有迹象显示它是模仿第一次者。第一次是东汉佛学输入中国时，影响最广远之老子化胡说与“化胡经”，其基本意旨，在证明世尊原即老子化身，佛学原为中国所创。（后来化胡经又被佛徒窜改，面目已非。自此，佛道二家各造假说，争持先后，达数百年之久）此思想之原旨，功能，故事之演绎，殆与“西学源出中国说”完全同一格调。如此则有一点结论必须承认，就是：这正反映思想传播之文化心理。恐怕必须列入人类思想传播之一种必有之途径，在中国史上特别具备完整之证明。如此观察探讨，则会达成人类文化传播最基本之理论与解释。尚不止是历史或思想史之成就。一个有力的持续之主证，那就是接着而来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与“中国文化西源说”。这种观念，在实质上和“西学源出中国说”，是同血脉兄弟。只是戴着反方向的面具而已。要作真实了解，自然更需要从文化心理方面着手。

如果只从表面性质的相冲突相反对之观点讨论，恐怕只会流于思想进步或落伍之浮泛的分判，而无法了解问题根源。须知高唱全盘西化并不能证明其思想进步，却非常容易被人发觉只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口号，甚至于说是一个新式的虚妄之迷信。因为它的文化心理之价值方向，和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教所谓：“信了就必得救”，是建立在完全相同的假想基础之上。^⑧

五 结 论

晚清政治思潮，以论发展源流，本各有其分歧，甚至保守与进取二者之态势，又未尝不是对立与冲突者。然则诸种动向合并而观，尚有一更强大之潜在动向，带使各时期各阶段之思想仍循一总体方向归趋，此即最强烈的西化之动向。此盖与今日世界思潮合流之总趋势，举世动止，息息相关，西方文明，已两三世纪居于领导全球之地位，世界各民族文化，隐显之间，多受其影响。中国无论保守或激进，主动或被动，感染西化，已为不可避免。正如皮锡瑞所谓：“使孔孟程朱生此时，不能舍西学不讲。”^⑨即令纯以维护古来道统而论，亦终不能免其西化。如组织孔教会者，其所为教会，乃受西方观念启示。所为组织结构，并亦采基督教之规制。所倡孔子纪年，实仿耶稣纪年。发行报刊，出版书画，以为宣扬道统，实则亦尽循西洋方法。若其他标明宗旨之“圣学会”、“国学保存会”、“古学保存会”等，当谓其纯为维护传统，均无可疑。而此类学会组织，一切活动，又无不取借西方，并深相效法。盖西化为总体之动向，有浸彻之魔力。诸般观念，均承此潜流向前发展，或并无意中建立于此基础之上。

在另一方面看，即使同时代思想，一直存在中西观念之歧异与冲突，发展方向颇不一致。而在酝酿新思潮之过程，又均构成吸收融会之素材，各被灭裂面再造，遂可因混熔而新生另具特色

之思想。大抵古今思潮嬗变，奔流无止，而各时代各阶段亦均具有其自有之时代特征。此种总体之动向，实因思想发展必然而有，此古今中外所历验不移之现象也。^①

再前进一层探索，近代思潮总体西化之动向，就中国知识分子基本立场而观，其本质亦并非为西化而西化，而不自觉之西化，在观念上自然更远一层。然则何者力量使此潮流汹涌澎湃？推考近代思潮之原始动力，则自 1840 年以来，各时代思想特征虽十分不同，流派纷立，各据理说，个别概念之琐屑，复不可胜计。而最基本之原始动力则是完全一致。此即百余年来贯串中国全部思潮中心之求富求强思想。近代中国朝野，富强之想望，实为思想发展之核心观念。所有各时期展放五光十色之言论学说，门户分明，其中心理念，最终愿望，无不在以致中国之富强为目标。中国近代思想，万途同归，其原始基础，实以富强为中心主流。然此富强观念之发生，则西方文明之刺激，列强侵逼之压力，又为此种启念之动因。近代中国，患贫而又忧弱，知识分子所醒觉，与所最关心热望，梦寐以求之远大目标，即在要达成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之理想境界。所有思想理念之酝酿，政治社会之创制，唤醒民众之言论，奔走呼号之行动，在在无非为此最基本之富强目标所吸引。是以百余年来中国思想之发展嬗变，自以谋求富强为原始动力，并为支配此时代所有观念潜流之核心。

1972 年 5 月 24 日写于南港

注 释

①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 54 页。

② 当代学者研究近代思想，自潮流之反面入手讨论者，成就至丰，若陈荃、

全汉升、吕实强、李恩涵、郝延平等多有专文专书论述，无待赘叙。此节则略申其未尽之若干观点，或稍可补充前议，自以不重复旧说为准。

- ③ 《知过轩谈屑》卷二。
- ④ 叶德辉：《郎园书札》，第2页。
- ⑤ 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一，第36页。
- ⑥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第24页。
- ⑦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二，第40页。
- ⑧ 曾廉：《鼫庵集》。据《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90~491页。辑录。
- ⑨ 陈荃：《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学报》第二五期。陈氏举证甚多，自不必在本文重复引括。
- ⑩ 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一，第38页。
- ⑪ 叶德辉：《郎园书札》，第23页。
- ⑫ 中国以文化之一致，维护民族之延续。此一观点，因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书，感悟而得。往日读其书为时已将20年，旧时札记，尚全在手。兹录其前书第12~13页所论：“复次，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其后书第50页所论：“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此意非此书所能详尽，要为论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此后又在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第293页云：“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观陈氏探讨唐代文化，再三反复言及此一重大关键，实用以解释唐史之管钥，由是并进而领悟中华民族文化之扩展，乃循文化道统之一体，为其中维系重心。
- ⑬ 叶德辉：《郎园书札》，第2~3页。
- 又：贺昌群论及此种社会退化观颇为中肯，见其所著《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26页云：“大抵衰季之世，世变湍急，前代之士风家法，既经毁败，而新起之秩序，又不能树立风声，纳之轨物。老师宿儒，复渐凋谢，后起之秀，未尝薰习前代礼法，故易为新兴风气所鼓动，而驰骋于新潮之中。世之论者，遂认此为风衰义缺之征矣。”
- ⑭ 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四，第30页。

又：《沅湘通艺录》卷三，第41页。唐才常亦流露同样之启机：“今者，天下之民之心，久病思起，久郁思嚏，新机勃然。其洞观世局者，且人人构一意、法、希腊之民之心于胸臆而不可遏。使当轴不乘其句萌之机骋以康庄之路，而犹欲圈豢之，槛繫之。窃恐局其身者不能局其智，忠其国者不必忠其君，而秦皇明祖之藩一溃而忧且剧也。即令民不智，防不决，而事变奇横，土番糝米，抵制无策，将伯谁呼，则是举四百兆民，拱手而贻他人以奴隶也。”

⑮《湘学新报》第二十五册。

又：《湘学新报》第二十七册，唐才常更明白表达其热切求变之意志：“在昔皇王之典章文物，民种之聪强悍劲，国执之豫大丰亨，苟不淬以汤盘日新之学，策以姬宗无逸之志，则岂待火山爆裂，热熔冰迂，始睹所谓无穷之变哉。今夫以亿兆年不相闻问之域，数万里绝无繆葛之人，造物沟通，雷轰电掣，斯奇变矣。奇变而无以善之，而反逆之，是欲断羲和之辔，绝昆仑之纽，遏星球之行，以构成奇殃也。今者遍美洲皆白种，其土种直鹿豕然，而天不哀之。洪辩子（唐才常笔名）且无暇哀美种，独自哀我生以来，于天地人诸学毫无窥见，独规规然绳墨中腐儒，视所谓红皮土番者，不过多数行八比业耳。”

⑯《谭嗣同全集》，第36页。

⑰ 汤震：《危言》卷三，第28页。

⑱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一，第13-14页。

又：王韬：《易言》跋云：“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故西人在今日所挟以轻藐我中国者，即他日有圣王起，所藉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类此模仿西法之言论，晚清文献中，数量颇多。本文列举一二代表而已。

⑲ 参看拙著《中国近代学会约论》，《食货月刊》一卷六期，1971年9月刊。

⑳ 樊、易两文，俱见《湘报类纂》，甲编，卷上。

㉑ 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三，第51页：“乾父也，坤母也，凡同受乾坤之气者，既不得有中外夷夏之疑，又乌有并为人而无可通种之理。”易孺：“莫如以诸王郡主宗室县主，下嫁于俄、德、法列邦之世子。王公、臺吉、贝勒、贝子，复广娶列国之公主郡主。并下一令曰：上自官绅，下逮庶民，愿嫁女于泰西各国者听。愿娶妇于泰西各国者听。国家联姻，尤贵择西人之有智力者，既联翁婿甥舅之亲，即可从其中选用客

卿，自当竭力为我用，此所谓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也。”（《湘报类纂》，甲编，卷上，第6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8~9页。

又：《沅湘通艺录》卷三，第19页，何绍休云：“曰：减寺宇以厚积藏也。夫天下寺宇，不下百万万所。于国家无所裨，宜省之，持其费纳人会中，以补此项之阙，以培利用之源。”

又：就王闿运之两通函件，可以了解在前后世代嬗变之间，某些人必然流于没落情状。其致湖南巡抚赵尔巽云：“窃以为国家学政，本有专官，上失其职，咎不在下。今之改学，即务在糜费，官款无出，专恃民货。以有事之秋，兴不急之务，并心外国，特聘倭师。就一学论之，堂舍器具，费至万金，教习监督，薪水数千，购置书器，钱亦千万，一县物力，必不能供。常德夺产杀僧，郴州遂至民变，湘潭盖归侵蚀，宁乡徒事铺张，以此开宗，何能造士？且汉儒称盛，良史讥为利禄之涂，宋学广开，先儒尤憾科举之士，儒为国蠹，有由然也。今须先明廉耻，分别士民，次整儒官，以修专职。谨拟学规，聊备瞽说，人存政举，则在明公。”又致湖南矿局总办云：“昨过清泉学舍，垣墙尽圯，水亭倾倒，昔年觞咏地，遂成泥坑。亦不待裁教官，改学司，费青年英雄立宪也。端抚一来，湖南全省，化为异族。昔与郭筠仙（郭嵩焘）论王文韶不能亡湘，今端方竟能变湘，弟之无能如此，亦何颜更设臬比，再列小脚？唯有拜受康子之药，饱啖阳虎之豚，以卒余年而已。”（两函俱见《湘绮楼书牍》）

③ 邹容、陈天华、吴稚晖诸人著作，俱见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一书。

④ 《清议报》第六八册。

又：同书，麦孟华更提出其清晰之理论基础云：“天下之国未有不排外而能独立者也。排外乌乎起，起于界限，而为原人天赋之公同性质者也。界己之身，而名人曰外人，界己之家，而名人曰外家，界己之国，而名人曰外国，界己之种，而名人曰外种。既划此身、家、国、种之界，则用情行事，自不能无厚薄于其间。故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同室有斗则纓冠，乡邻有斗则闭户，虽圣人亦昌言而不能讳也。故夫野蛮之世，则排外之心最热，而排外之列最严。家族部落之时代，无不仇待外人，外人非得内人之保证，则不能居其境内，而礼貌与刑律轻重，必极其不平。罗马开化最早，固尝定公共之律以保护外人，而外人之受

其保护者，犹不及罗马之半。今世欧洲日以文明号于天下，其民法刑法同一定律，而不以内外人之界限为轻重矣。而关于国法者则例仍极峻，其公民之权惟内国臣民所应享，而外人必不能与其分毫。且其民之移居他国，及出嫁于外人者，则必除其国民之籍，夺其公民之权，屏之于外人之列。呜呼，排外者天赋之公性，人道之必不能已，既有国界，则虽耶稣为君，墨翟为相，亦岂能泯其界而引而内之哉。”

⑤ 吴稚遗书（即暗杀时代），《辛亥革命》第二册，第 381 页。

⑥ 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 121 页。

又：陈天华《警世钟》又云：“有人口口说打洋人，却不讲洋人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经事到临危，空拳也要打他几下，平时却不可预存这个心。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鸟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其余洋人的长处，数不胜数。他们最大的长处大约是人人有学问，（把没有学问的不当人）有公德，（待同种却有公德，待外种却全无公德）知爱国，（爱自己的国，决不爱他人的国）一切陆军、海军，（各国的将官，都在学堂读书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艺无一不精，军人亦很有学问）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那一项不应该学呢？”可知陈氏虽激烈排外，却并不反对西化。

⑦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四，第 5—6 页。

⑧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九，第 50 页。

又：《清议报》第一百册，梁启超亦有相类之表达。如云：“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作者当时承乏斯役，虽然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覆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浹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学识、思想、经历，其固陋浅薄，不足以当东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则数年前之庸滥愚谬，更何待论，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呜呼！伤哉，吾中国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于此极也。”

⑨ 《学衡》第七三期。

⑩ 《清议报》第九七册。

又：梁启超又于《清议报》第一百册云：“观其论说，非西学原出中国考，则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也。展转抄袭，读之惟恐卧，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此亦表达对维新派言论之讥讽。

盖时代在前进，维新派言论，多已失去影响力量。

- ⑳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01页，吴稚晖记述其思想变化之五步，其第三步中见康有为经过，颇为绘形绘声的讥嘲旧派维新人物：“丁酉（光绪二十三年）冬天，我在北洋学堂教书，放了年假，到北平去看廉南湖。其时火车尚停在永定门外马家坡。于十二月十七那一天，南湖约了绍兴陶杏南，同我三人，到米市胡同去看康有为。大家论到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八股、小脚、鸦片三害。我说，八股，我们可以自动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缠；鸦片，可以相戒不染。康就用两只手伸了两个大拇指，狂喊：‘好极了呀，好极了呀。’那种气概，现在是三四等政客都优为之，当时我们却从未见过，不觉惊异是天人。”
- ㉑ 宗白华、魏嗣銮抨击一时自命提倡新思潮之学者，极为严正深刻。参看郭正昭撰《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所引宗、魏二人原语。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 ㉒ 参看拙文《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收入《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 ㉓ 晚清之觉察近世之大变局者，言者甚夥，拙著《清季兵工业之兴起》第三章及其注四七，提到有李鸿章、丁日昌、瑞麟、王文韶、杨昌濬、王韬、曾纪泽、黎庶昌、王先谦、张自牧、汤震、康有为、张之洞。拙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2、193、215页，提到有黄恩彤、黄钧宰、恭亲王、郭嵩焘、薛福成、夏燮、吴可读、张裕钊、欧阳炳荣。
- ㉔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总叙。
- ㉕ 《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1页。
- ㉖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第28页。
- ㉗ 韦尔士（Herbert George Wells）在第一次大战后，立志著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其主要宗旨，在以世界全史之认识，为人类共致大同之重要途径。其导言发抒此种主张，至为痛切。“吾人对于全世界人类史中普通之事实宜具共通之知识，其需要在过去数年之惨变中极为显著。交通愈便，人类间之关系，无论为善为恶，亦愈为密切。故战争之事，已成为普及全世之大灾，自然肆其可骇之破坏。摇篮中之婴儿为其所炸，非交战区及中立国之粮船为其所沉。吾人已知今日世界苟无公共之和平，即无和平可言；苟无全体之福利，即无福利可得；而除具公共之历史观念外，即不能致公共之和平与全体之福利。世界之各人种各民族，若不集合于此等观念之下同力合作，而犹循其狭隘自私及互相冲突之民族习

惯，则惟日趋于争斗之途以自召灭亡耳。此理在百余年前已为大哲学家康德所见及，此即其世界和平论之主旨，今则路人尽知矣。吾人今日之国内政策与经济社会观念等皆受人种起源及社会阶级之历史关系诸谬妄观念所败坏。历史为人类全体共同前进之观念，实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之必要条件也。”

⑳ 《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2~13页。

㉑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第三页。

又：冯煦：《蒿庵随笔》卷一，第8页据史记历书以说中法西传之故事。云：“史记，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后此回回之于历，欧罗巴之于算，皆原从中土流散，在彼而衍其传者，此可为西法袭中法之一证也。”

㉒ 《谭嗣同全集》，第396页。

㉓ 《严几道诗文钞》卷四，第2~3页。

㉔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二，第8~9页。

㉕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九，第11~12页。

又：陆宝千撰《郭嵩焘之洋务思想》（载《广文月刊》一卷三期）提出郭氏思想以循理观念为基础，实是确当不刊。

㉖ 曾纪泽：《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一，第8页。

㉗ 《湘报类纂》，甲集，卷上，第42页。

㉘ 《张文襄公全集》，诗集，卷四，第8页。

㉙ 自清末以来之全盘西化论，有其时代之代表性，自然有研究之价值。但须就其广义着眼。此处所举，只就此表面之口辞四字而言，因其既无理论架构，亦无实际思想路线，仅以高呼口号标榜进步而已。文中所提在指此类。

㉚ 《湘报类纂》，丙集，上卷，第9页，答问。

㉛ 近人贺昌群论思想演化之大势，颇为鞭辟近里，足资参考。见其《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1页，有谓：“每一时代皆有其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继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他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

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一 中国传统民族思想之渊源

中国人之怀有民族主义思想，就历史渊源，可以上推至先秦，甚至更早。在长期传衍中的意义，包含了族类的自我确立和文化的自我确立。这两个重要特质，三千年来一直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

就族类的区别言，应该是最早出现的民族意识，在上古已有长期的酝酿。现在传世的古代纪录，自然不少，而其中表达得很清楚明白的，多在儒家经传之中，如《左传》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礼记》云：“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荀子》云：“先祖者，类之本也。”均表现了族类内在的固结，与族性群体的判别。春秋时代之所谓“族”与“类”，固然有不少在指宗族派系而言，但一个种族或民族的自我体认，也有文献作了不少很清楚的表达，其中诸夏与夷狄的分辨，是再显著不过的实例。如《左传》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论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都是很显著的成熟的种界群类区别的观念，当是无庸怀疑的事实。

至于文化的自我体认，实比种界分判较为复杂。首先自是基于相沿长久的礼俗习惯，特别在最浅显的衣服饮食上表现出不同种性的文化特征。而到了成就更繁复的礼制习尚之时，文化的自

我意识也就同时存在。统观孔子一生所重视的礼，所述论夏、商、周三代礼制精神，可知文化特征在纵的演变上有很显明的轨辙，而文化的自我意识之确立，当然更早。孔子有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正充分代表了文化的民族意识。后日历代的发展，又有更深的强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重要特色。

合观族类的与文化的两种特质，族类的观念并不及文化观念之深入人心。历代学者虽然随时注意种界的差等，却一向更强调教化的意义。由文化而泯除种界的区别，是自先秦以来政治理想的传统。王道中心以中国皇帝为代表，对四裔的关系，并不专靠征服，而是多靠同化。代表接受同化的形式，不是设重兵置总督，而只是奉行中国的一册正朔就可以。至于对待临边的藩邦，其间道义关系，多少仍保存着春秋时代的精神。制度形式虽然演变变得复杂，而维持这种形式的，却一直为礼部所主持。虽然没有发展出外交部，却也没转变为殖民部。因为维持中国中心教化的是人——帝王，而不是一个国家。帝王领有天下，自上古即已形成王畿与五服^①的观念。普天之下，无论广土众民，均属王有。众民之中只分有教化与无教化二种，帝王高高在上自是不平等，而中国有教化之民和四裔准教化与无教化之民之间，并无不平等。在这种概念之下，一切是以帝王中心维系，使中国政治制度不易产生出国与国间的对等国际关系。众民参与共同教化，即受同等尊重，所谓“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至于“中国”一词，在历代传统的了解，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意思，而是重在有文化的邦土之体认。这也是古旧的学说，如章太炎所谓：“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②柳诒徵所谓：“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③至于权利观念，向来淡漠，无人提及，而文化意识却一直增强。往古有两句话足以形容所谓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儒家的中国中心理想，《公羊传》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正是表现了文化的与族类

的差等程序。

二 近代民族主义之发轫及其特质

关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其内容其发展，显然与三千年来的传统有相当差别。自1840年中西接触频繁开始，半世纪中的酝酿，使中国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成分，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特色。充实这种特色的重要观念，就是主权（Sovereignty）。中国主权观念之产生，显然是受西方知识直接的影响，即使不是全学习得来，至少也是因列强的刺激而重视并探求这项问题。

寻绎主权观念的发轫，至少必须提到清季5位先驱者，就是首先必须探讨王韬、郑观应、黄遵宪、曾纪泽、何启等5人的意见。由于他们分别地认识了主权的重要，而为中国民族主义增添了一项重要的特质，使之具备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意义。

关于王韬的思想，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他的民族主义观念，而以同治三年（1864）上李鸿章书所提的“握利权”和“树国威”两个对外纲领作为起点。但真正能清楚的代表他主权观念的言论，应该是他光绪年间收回“额外权利”的提倡与建议。“额外权利”名词，是王韬所创，他把外国所获得中国一切侵及主权部分的特权，都视为额外权利，而认为必须用外交方式与列国争回。同时这种意见是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所提出的。^④

关于郑观应本系洋行买办出身，一生从事于口岸贸易事业，对于列强侵占中国主权十分了解，而于商权商利之丧失，尤其敏感，是中国近代提倡重商思想的特出人物。郑氏表现主权观念之处，着重在海关事权，关税自主以及独立的关税壁垒政策。他的独立定税的原则有谓：

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

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⑤

他的关税抵制政策有谓：

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为两国互立之法也。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⑥

关于黄遵宪的主权思想，当始于其编著《日本国志》之时。遵宪于光绪五年（1879）开始编纂。至光绪十三年（1887）完成。^⑦书中讨论到“治外法权”问题，为中国文字中最早出现这样的新词汇。遵宪的认识有谓：

泰西诸国，互相往来。凡此国商民寓彼国者，悉归彼国地方官管辖，其领事官不过约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亚细亚，理事得以己国法审断己民，西人谓之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治外法权始于土耳其。当回都全盛时，西灭罗马，划其边境与欧人通商。徒以外政纷纭，遂令各国理事自理己民，固非由威逼势劫与之立约者也。故其弊犹小。而今日治外法权之毒，乃遍及于亚细亚。余考南京旧约，犹不过曰设领事官管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而已。未尝曰有犯事者归彼德办也。盖欧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约之始，犹不敢遽施之我。迨戊午岁（1858）与日本定约，遂因而及我，载在盟府，至于今而横恣之状有不忍言者。^⑧

遵宪提出收回斯项法权的意图有谓：

不公不平之事积日愈多，则吾民之怨愤日深。通商以来，三十余年，耦俱相依，猜嫌不泯。而士大夫细民论外事，辄张目裂眦，若争欲割刃于外人之腹而后快心者。虽由教士之横，烟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权有以招之也。此亦似非外国之利也。虽然明知其不便，今欲改而更张之，彼外人者习于便利，狃于故常，必有所不愿。且以各国人情、风俗、宗教、政治之不同，一旦强使就我，其势又甚难。而现行条约，隐忍不改，流毒之深，安有穷期。窃以为今日之势，不能强彼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别设一词讼交涉之条，凡彼以是施，我以是报，我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横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囁然以为不便，然后与之共商，略仿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圈禁罚赎代徒流笞杖，定一公例，彼此照办，或庶几有成乎。若待吾国势既强，则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约，悉使商民归地方官管辖，又不待言矣。^⑨

关于曾纪泽的主权观念，也提出甚早，他首先注意到最惠国条款的不合理。在其任英法公使时，于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三日（1879年4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向巴西驻英公使的表示，有谓：

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缘有时乙国以事求于甲国，而蒙允许，丙国亦欲同沾利益。其实交际情形并不相同，无益于丙国，而徒有损于甲国也。^⑩

光绪十二年（1886）纪泽以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提出改约收回中国主权的意见，有谓：

中国道光年间，一战之夙怨久已消释。至战后所立和约，未能平允，则其怨难消。盖所立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今不能不设法改订。比如咸丰六年(1856)间，欧洲诸大国与俄国订立和约，其中黑海一条，碍俄之体统，随于同治十年(1871)在伦敦商酌废去。中国亦必如是，所云有伤体统，即通商各口租界一条，暨今不及备载诸事，若此者，却夺中国地主之权，不能置之不问，今拟于第三次十年换约之期，将此条废去重立，以免后患。^①

何启因批评曾纪泽之“中国先睡后醒论”，亦于光绪十三年(1887)论及国际地位之不平等，与中国自主尊严之损辱。有谓：

至谓外国所以待中国者，揆以交际常情，殊失公道。此事确凿，受侮正多，可为常太息者矣。夫中国自主之国也，言其民庶，天下无与比伦，论其冠裳，各邦无此文物。礼教则先于万国，纲常久炳于中华，似宜出则为外国所钦，入则为外人所敬矣。今也不然，和约各款，有大失中国之权衡者矣，然而不得可行也。苟求之事，有多违中国之意见者矣，然而不得不从也。中国所为，或于约章稍类不合，外国则严斥而切责之。中国不敢不速谢过也。外国所事，或于约款大觉相违，中国虽婉言而善道之，外国犹搪塞未遽持平也。盖一则视和约为一成不易之规，一则视和约为可有可无之物也。为上如此，为下可知。今中国人与外国人之交接者，应得之礼数，鲜可得之也。应有之体面，鲜能有之也。事之可

为者，鲜见其准为之也。情之可谅者，鲜见其能谅之也。其待华人也，有以畜类待之，而不以人类待之者矣。其视华人也，有以鬼物视之，而不以人物视之者矣。欺藐原生于一国，偏憎遂及于万民，畛域久积于心胸，齟齬辄成于交涉。冤抑之诉，往往而闻，枉屈之端，时时习见。此则大为可悯，而深觉不平者也。^⑩

以上5位民族思想先知，就其所受教育环境而言，除何启是留学英国以外，其余全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而黄遵宪、王韬、曾纪泽且是科场中出身人物。可知新观念之产生，并不因先有的教育根基而受到阻碍。其思想上重要的转变关键，多在于接触的机会，和新环境所加予的刺激。这5人中生平际遇的共同点，是均在西欧列邦直接住过一段时期。他们觉悟到列强所加于中国的凌辱无理，并不是西欧列邦对等国际关系所能容忍。使中国主权受到剥夺，即是破坏中国立国尊严，而使他们共同产生国格的醒觉，与争持国际地位平等的意识，由是而提出维护主权，收回利权的呼声。在这种思想演变的中间，首先是认识了对等国际的世界，抛脱天朝中心的等差观念。进而领悟到有权利表征的“国”的意义，而掩盖了文化帝国的想像。由是而展现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契机，与传统民族思想就有显著的区别。

三 学会与族类的自我体认

清季学会，振兴于甲午以后，反映出全国官绅之思想醒觉。其组织形式，多袭西方规制，代表充分的西化程度，而活动旨趣，则五花八门，显露出多样的观念姿态。实于中国近代思想之转变与士绅之结合，均具有重大意义，并为极丰富之问题源泉。单就民族主义之反映而言，有多数学会以之为建立宗旨，如强学

会之设立，本即因民族醒觉而发，其后兴起者尚不止此。再细为分别，民族主义观念之中，种界区划，为先天自然条件，若干学会也提出了他们族类的民族主义观点。

强学会创立于光绪廿一年（1895），会址在北京，组织成员，多京中官绅。而上海地方亦于同年组织上海强学会。其共同明显宗旨，即在于振弱图强，而保存种性与延绵族类之意，亦涵概其中。如其强学会序云：

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官，今作贾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而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余土著，畜如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黠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却郤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⑬

至于上海强学会，其立会章程，开宗明义。就是“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因而要“考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要自强仍自在乎救弱，并为自救族类之弱。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说得明白：

彼马基顿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罗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虏掠凌暴，异种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然则天道无知，惟佑强者？易首系乾，以自强不息。洪范六极，弱居极下。盖强弱势也，虽圣人亦有不能不奉天者欤。然则惟有自强而已。^⑭

南学会创立于光绪廿三年（1897），会址在长沙，参与分子，大多数为湖南地方官绅。其立会旨趣，项目虽多，而于族类的分辨仍极重视。南学会的重要活动在于讲演会和发行湘报，并设有“学长”，专门主持这些活动。学长皮锡瑞在会中的讲演，可以作为他严格种界的意见：

今红种黑种为白人剪灭殆尽。取其民，据其地，夺其生理。生理既失，种类遂微。数十年来，红种黑种之人日少一日，惟白种人独盛。所以各种皆微而白种独盛者，由于强弱不同，实由于智愚迥异。红种黑种皆野蛮不知学问，虽性情犷悍，能以力强，不能以智强，故虽竭力与白种争，终为白种所剪灭。强以智，不以力，如徒以力强而已，牛马有力，而为人服役，虎豹尤强，而为人擒获。其所以为人服役为人擒获者，由无智也。古之时，草木榛榛，鹿豕狃狃，殆与红种黑种无异。而老子庄子，皆以乐其俗，安其居，老死不相往来为美谈。然则红种黑种，正老子庄子之所推许，何以并不能保其种？以此言之，保种必先开智，开智方能自强。老子愚民之旨，历代用之为长治久安之秘策。而施之今日，为灭种之法。使老子庄子生于今，当不为此说矣。我黄种之人，聪明才力，不在白种之下，凡白种所能为之事，黄种无不能者。东洋一切制造，皆能仿效西人，今中国亦有能仿西人制造者。中国人出洋学习，其智慧多为西人推服。然中国虽有此智慧，未能讲求开通，智者自智，愚者自愚，其智者足与白种抗衡，其愚者亦与红种黑种相去不远。若不急开民智，恐不免为红种黑种之续。春秋左氏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情莫不自私其种类，歧视异种异类。春秋张三世之义，太平之世，远近大小，用心若一。此惟太平方能若是，今天下尚未到此境界。西人奉耶稣教，耶稣爱人如

己，出于墨子兼爱。而西人虽讲此种道理，犹未能化畛域之见，一视同仁。其待属地人与本国人不同，自罗马即用此术。盖深防其强，而欲其弱，尤深防其智而欲其愚。惟恐人智则必强，势将不为之下，而将与之抗。^⑮

知耻学会于光绪廿三年（1897）创立于北京。立会宗旨，固在知耻，而其所耻者，则在于辨别愚蒙阉弱，以促醒国人之民族自立精神，学会创始人寿富著《知耻学会后叙》，仍在借种界立言：

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我不若人矣，可奈何？如耻之，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强则大国亲我，小国畏我。不学则愚，愚则弱，弱者大国鄙我，小国犯我。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不思与英、德、法、日并驾于五洲，而坐视黑人红人之为奴，思执鞭而从其后，吾不可复见五大洲豪杰之士矣。^⑯

以上诸学会创立之时，其发起宣言，多就族类的分野有所发挥，实欲唤起人心，奋发振作，而自卫其族类，免于危亡。其所以创此学会组织，并代表民族思想之醒觉，士大夫从事团结的具体行动。就种族之观念言，这是清季沿承传统固有民族思想之一端。更新之义虽少，而能辨析列强乃至文明邦国之排斥非类，亦足以使传统观念获得润色。

四 学会与文化固守的意识

文化特色为中国传统民族思想最浓厚的部分，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同样保存着这种传统精神。清季各学会的组成，有不少是

专在维护文化宗旨。较早的所谓“圣学会”，“味经学会”，较晚的所谓“国学保存会”，“古学保存会”，都是这种意思，其他学会也多半并不偏废对传统风教的绵延。兹略将有关学会列举于后：

圣学会于光绪廿三年（1897）创设于广西桂林。其发起组成，全由地方官绅主持，自巡抚监司道府，以至地方巨绅，均有参加。原计划创办之后，于广州、梧州皆设分局，以之为两粤圣学会。当知其用心抱负之宏远。今举《圣学会缘起》，可以知其宗旨：

今欲推广，专以发明圣道，仁吾同类，合官绅士庶而讲求之。以文会友，用广大孔子之教为主。夫欲广传圣道，则必有学，今学校颓废，士无学术，只课利禄之业，间考文史，不周世用。又士皆散处，声气不通，讲习无自，既违敬业乐群之义，又失会友辅仁之旨。宋明儒者，每讲一学，皆合大会。今泰西亦然，会中无书不备，无器不储，既僻居散处，亦得购书阅报，以广观摩。故土有才业而教日以昌，国籍问学而势日以盛。今本堂创设此会，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门之法，以扩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中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下以开愚氓蚩陋之习，庶几不失广仁之义云尔。^①

蔡希邠著《圣学会序》，亦说明继承往圣渊源，其活动之强调文化意义可知。

今桂之士夫，追同善、证人、志学之坠绪，发先正、涑水、阳明、念庵之余风，大陈图书，广开学会，庶几传孔门大教，而不坠春秋彝狄之贬，其将传之天下，吾乐从之游而

观其成焉。^⑧

关西学会，于光绪廿三年（1897）创设于北京，是由一些在北京的陕西官绅所组成，计划由北京而推展至陕西地方。这个学会的规章，开宗明义在说明“以经术言变法，为本原中之本原。当发明圣制，探讨微言，勿尚琐碎支离之汉学，勿骛空谈无根之宋学”。而其更重要之特色，在以孔子纪年。用“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四十八年”并列于光绪廿三年。此会在创设《关西学会缘起》中，说明了维系文化的立场：

夫保种之道，曰仁与智。智以开物，仁以乐群，两物相切而热力生，两心相援而吸力固。爰呼将伯，共事讲求。惟会友以辅仁，先尚通而去塞。通其耳目，通其心知，通其血气，通其财力。远师希文忧乐之怀，近宏横渠胞与之旨，深怀亭林匹夫之责，相勖南雷待访之业。以绵我孔子二千余载坠地之教宗，酬我圣清二百余年涵濡之厚泽。^⑨

群萌学会于光绪廿三年（1897）创设湖南浏阳。组成分子全为湖南地方绅士，甚至于只是浏阳一区的官绅士庶。群萌学会宗旨固是合大群，发展群策群力的团结功用。而言此群者，实在于共同教化之群体，故亦甚重视文化意义，观群萌学会致南学会公函可知：

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一家之中，而父子兄弟群。一都一邑之中，而乡邻宗族群。人孰不群，而群固有道焉。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大同之世，大小远近若一。惟吾孔子为广大教主，惟吾孔子之言仁，足以综贯地球各教，而宏大一统之实际。春秋之义，夷而进于中国

则中国之，中国进夷则夷之。斯道也，仁道也，亦群道也。无大小远近之分也。今吾人群萃州处，尚且术业不通，性情不洽，肝胆胡越，覩面千里，欲不谓之麻木不仁而不得矣。孔子之言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故立群莫大于群仁。^④

蒙学公会于光绪廿三年（1897）创于上海，虽是以教导幼学为目的，而其立会宗旨则以传习传统教化为重心，观其《蒙学公会公启》可知：

蒙养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是以屯难造物，受之以蒙，圣经遗制，规利宏远。某等痛愤时难，恐善良种子播弄零落，受人蹂躏。用是仰体圣心，立为蒙学公会，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为主。^④

以上诸学会，大致均重视传统教化，其立会旨趣，强调固有风教意义，志在宏扬儒学，维护圣教，以谋免于文化灭绝之悲运。实亦传统民族思想之延续。近年欧美学者颇注意到在近代民族主义中这种文化固执之特色，而称之为文化的民族主义或文化的保守主义。^④但此处须进一步指出，单就学会活动而言，如圣学会之清楚立场，固无须置疑。然其若干维持传统文化之手段，则已走入西化门径。学会组织本身之西化固不待言，如其活动项目之“庚子拜经”，系明仿西洋“七日一行礼拜”之制。发行《广仁报》，系仿西洋报刊之制。“广购书器”系明言仿西洋图书仪器室之制。“开三业学”，系仿西洋农、工、商学校之制。由是可知文化固守意识，固为沿承传统民族思想之一端，而其内容，则已无形中增添不少现代的影响。

五 学会与主权完整的观念

清季学会的组成，无论其形式或内容，都是广泛的表露思想之转变，以及吸收西方知识之动向。只就民族主义一项概念而言，也并不止在维持延续固有的族类与文化两大特质，而有进一步以恢复主权为其活动宗旨。这类学会如“公法学会”，“保国会”，“国权挽救会”，“国民拒款会”，“路权研究会”，“河南保矿会”，“山东保矿会”，“路矿联合共济会”，“广东保路会”，“四川保路同志会”，“戡界维持会”，“云南保界会”等等，多半起于对主权观念的觉醒而组成。兹举早期的几个学会之言论宗旨，以作一具体了解。

公法学会，于光绪廿四年（1898）创立于湖南长沙。其活动中心虽然是在探讨国际公法，而最终目的则在于使人认识主权之重要，从而作法理的争取恢复主权。唐才常著《公法学会叙》云：

昔日本明治之初，税务律法，权利规则，皆失自主权。其大侯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洞察环海情形，日夜谋更订约章。十一年遣使议于华盛顿，不许。十二年请于大阪之英商会，不许。十三年又将拟更约稿，分致各国政府，仍不许。然曩岁以来，各大使终与更约，视平等例，而日本乃昂然表异于环球，不齿公法之支那、土耳其、朝鲜、暹罗、波斯、埃及、阿富汗诸瘠国。而曩者马关条约，擱然以前此之不堪于各国者，施之中国。若曰：吾今而后，得野蛮土蕃彼支那人焉。而中国士夫，夷然不之知，不之耻也。今子（指公法学会创始人毕永年）与诸君子毅然讲求是学，将以收自主之权，振尸居之气。上体素王改制悲悯救世之苦衷，下规日本大侯锐意更约顶踵不辞之

热力，则生死肉骨，未必不基于此。^②

而公法学会章程更是开宗明义地说出为注意历来中外约章之弊端，与将来增改的预备：

此会专讲公法之学。凡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议增，何者议改，皆须细意讲求，不可稍涉迁就，尤不可故立异同，庶为将来自强之本。^③

保国会于光绪廿四年（1898）创立于北京。创始人康有为著《保国会序》，说出丧失主权与将濒于亡国的危机：

夫弱而割地，则我堂堂万里封疆，犹可为大国也。筑路用人之权皆失，则是国土夷于属地，君上等于仆隶，岂得为有国者哉？春秋书梁亡者，公羊谓鱼烂而亡。夫吾今鱼烂也哉，但未纪侯大去耳。两月之失地失权如此，呜呼！无冬无夏，何以卒岁。我海疆我民眚，人不自保；我妇女，我婴儿，人不聊生。皆不自审为何国之民哉。抚印度埃及之狂澜，念安南缅甸之覆辙。远怀波兰分裂之巨祸，近睹高丽戕贼之惨刑，呜呼！我士我大夫，何蹈于斯哉！^④

若观《保国会章程》，更可以看出争取主权自立的意义：

第一条：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第二条：本会遵奉光绪廿一年五月廿六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第三条：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

第四条：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第五条：为保圣教之不失。

第九条：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

第十条：凡来会者，激厉愤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这七条章程相当重要，充分显示出争取主权的意义。当然保国会宗旨并不限于此点，同时并表现了族类的和文化的自我维护，可以说代表近代民族主义之全义，值得加以研究。在《保国会章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词汇，使得此一文献具有更多的讨论价值。章程中引到“国地”，“国权”，“国民”，“国教”，“国耻”等词，在今日看来平常，在当时却是具有新义的体会。首先，保国会是代表“国”字一义的认识之成熟。晚清人士了解之一端，所不同于往古的观念，是把中国认作一个有明确领土主权界限的国家，同于当时西方的 nation-state。这个“国”字的自觉，在晚清酝酿成熟，在保国会有重要的表达。“国地”（在今日沿用为国土）一词，同于西方的 territory，“国权”（在今日沿用为主权）一词，同于西方的 sovereignty，“国民”一词同于西方的 people，合之足以代表民族主义观念之成熟。“国教”一词形容传统风教文化，今日虽不再采用原词，而引申繁衍之新语，不知凡几。如清末流行之所谓“国学”、“国粹”，今日习用之“国文”、“国语”、“国故”、“国乐”、“国画”、“国术”、“国剧”等，是在无形中深入人心的文化自觉意识。“国耻”一词今仍沿用，其来源亦于古有征。“耻”为自古儒法各家立教之德目，后代学者，多有发挥。“国耻”二字，并见于《礼记》、《左传》、《后汉书》各书。而近代国难频仍，遂为家喻户晓最通用之词汇。保国会之复兴旧

词，灌输时代命义，实为开此先河。

有关主权问题，除法权之外，通商利权同样也被学会重视，南学会会友熊崇煦在《湘报》发表论说，对于利益均沾与商税自主均有所论列：

江宁议约以后，续议约章，樽俎之间，口舌俱敝。然每立一约，即他人受均沾之益，而中国加无穷之累，以其受逼迫而成也。今许增通商口岸，彼欲求而未得者，今一旦得之，是与以绝大之利益。而中国亦必要以利益，首在立彼未我往之商约，则不至蹈昔日和众轮船受亏之害。次加增税，则其权必归自主。立约既善，而交涉即免辩论之烦，将来即以通之者为塞之之术。^⑦

六 结 论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族类、文化、主权三方面的思想反应，构成其基本要素。而其中主权观念又足以表现近代民族主义之特色。三者连环关系，虽可谓鼎足并峙，而清季知识分子之醒觉，则颇侧重于主权观念。此处并非强调，就当时人之思想反应可以找到证据。如张之洞所论：

吾闻欲教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⑧

其道理已申说得明白，而张之洞更有决定性的结论谓：

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子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②

至于实际行动的例证，光绪二十年以后，有关主权争取的活动，全国上下，难以缕计^③。

至于晚清民族主义之观念，当发生甚早。显然的事实，民族主义之词汇本身，并不是由西方 nationalism 一字直接译来，最早习惯沿用，也并无“民族主义”一项词汇出现。这种思想，实际是一种时代的醒觉与反映，而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外来的知识，与西方民族国家之榜样，提供了重要的启导作用，和学习的模式；国势的阽危，外力的侵逼，加深了国人切肤的痛苦感觉。民族主义观念在不定的形式意义之中逐渐茁长而成熟。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报》创刊，孙文著发刊词，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使与当时中国思想合流，遂构成全国共喻的固定观念。是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达于成熟，完成其定义与界域之重要代表。

1970年2月23日写于南港

附 记

本文讨论到学会，其“学会”一词，系采取清季共喻之通义，自不尽同于 learned societies 之词意。至所探讨范围，亦如拙作《清季学会汇表》所作之界划，即革命性与职业性之会社，

俱不在讨论之列。

注 释

- ① 五服者，据《史记·夏本纪》：“今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此即以帝王为中心向外推移的差等关系之理想，为古代中国中心诸说之一。
- ②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民报》十五号。又，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第1页：“‘中国’之云，本以对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
-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第50页。又，“中国”一词重在文化界域之意义，最显著之代表是《公羊传》所引：“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此处“中国”一词，显然以诸夏领域为范围，共宗周王为文化中心之代表。当时人共喻的意义，自然相当普遍。可知中国在行政上虽然尚不是一统局面，而却早已形成了文化的一统观念，这是研究中国史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 ④ 关于王韬的民族思想，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 A. Cohen）曾著专文讨论，题为“王韬与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载于《亚洲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二十六卷第四期，1967年8月刊出。柯氏把这种思想的萌芽自1864年算起。但我个人则特别注意王韬的主权观念。曾在1966年撰“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引证王韬一段收回“额外权利”的论说，本文则对此从略。
-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1页。
-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2页。
- ⑦ 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记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笔谈：“公度（黄遵宪字）：近来方编日本国志，恐至明年此时方能脱稿，为目十有二：曰国统，曰邻交，曰天文，曰地舆，曰职官，曰食货，曰兵，曰刑，曰学术，曰礼俗，曰物产，曰工

艺。成书约有五六十卷。”黄遵宪：《日本国志》叙：“乙酉（光绪十一年）之秋，由美回华。星使郑公（郑藻如）既解任。继之者张公（张荫桓）仍促余往。而两广制府张公（张之洞）又命遵宪为巡察南洋诸岛之行。遵宪念是书弃置可惜，均谢不往。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篋，重事编纂。又几阅两载，而后书成。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

- ⑧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七，第 21—22 页。
- ⑨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七，第 23 页。
- ⑩ 《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 2156—2157 页。
- ⑪ 曾纪泽著《中国先睡后醒论》，为颜咏经、袁竹一两人译为中文，并被收入新政真诠初编中。又，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后，颇引起西方人士注意。李恩涵于其《曾纪泽的外交》一书中，有专章讨论，甚为详细。
- ⑫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第 10 页。
- ⑬ 康有为：不忍杂志二集，卷五，第 35 页。
- ⑭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二十六，第 9 页。
- ⑮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第 13 页。
- ⑯ 《时务报》第四十册。
- ⑰ 《时务报》第三十册。
- ⑱ 《时务报》第三十一册。
- ⑲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 426 页。
- ⑳ 《湘报类纂》，甲集，卷中，第 24 页。
- ㉑ 《时务报》第四十二册。
- ㉒ 1970 年 1 月 19 日，中美人文科学委员会举办中国思想与近代史讨论，美国学者郭适（Ralph Croizier）提出其所注意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有很平情正确的看法，“文化的民族主义”就是他所提出。他就文化问题的角度，去讨论中国民族主义，自必有其重大意义和收获。但若探讨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当必抉发其近代的特色，则主权观念实更为重要，并且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真正之醒觉，以及思想上之重大进展。反之，若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只偏执于种界、文化方面之讨论，就会使一些浅薄的读者误解，以为中国又是样样因袭传统。
- ㉓ 《湘报类纂》，甲集，中卷，第 8 页。
- ㉔ 《湘报类纂》，丁集，上卷，第 18 页。

- ⑤《清议报》第十六册。
- ⑥《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99页。
- ⑦《湘报类纂》，甲集，下卷，第44页。
- ⑧张之洞：《劝学篇》卷上，第2~3页。
- ⑨张之洞：《劝学篇》卷上，第4页。
- ⑩清季自甲午，特别是戊戌庚子以后，全国民族主义观念勃发极盛，并侧重在主权问题。除报章言论之外，其争取利权之组织活动，风涌一时。若挽回国权，收回利权、路权、矿权、航权、商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等等，全国各地，波及甚广。而在反一方面，又有抵制特权的观念与活动，若文明排外，拒约，拒款，不购买洋货运动，也是表现得十分激烈。本文仅是讨论思想，其落在实际问题，可以另看其他专书。如于利权挽回方面，可参考李恩涵的“晚清收回矿权运动”，王玺的“中英开平矿权交涉”。于利权抵制方面，可参考张存武的“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一 绪 言

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之发展变化，日益趋于承受工商业冲击之影响。欧美进步富强国家，其立国大致以工商业为基础，国家大政，国人活动，多以工商为首要。举国上下致力于工商经营，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由于原料与市场之需求，遂进而发展为体制完密之对外贸易，向国境之外作各种情势之扩张。由此工商业发展动机之推展，自然容易转变为殖民主义之扩张，与国外领土之侵夺。由是欧美国家以工商业动力之影响，遂即冲击其他国家之历史动向，被动接触承受之国家，或至国势衰弱，如中国、波斯、土耳其等，或至沦于亡国，如印度、缅甸、越南等。世界上工商业落后国家，既承受工商先进观念之引诱，自亦进而以工商业动力改变其国家历史动向，19~20 世纪日本之转变，为最清楚例证。其他所谓落后国家者，亦莫不急起直追，竞相仿效。

近代百余年来，中国备受列强工商动力之侵害，外国特权与势力范围，构成无情枷锁，使中国国力损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实为历史上相当悲惨之一页。然中外关系之建立，以通商为起始，其不能及早觉悟通商利害关键，无形之损失无边无涯，难于计算。至于中国人在对外通商关系中有无觉悟？觉悟之程度如

何？性质如何？进而思考因应之对策如何？因应之能力与条件如何？以至成效之展望如何？均值得加以研究探讨，以进而了解某些时代意义，特殊情势。能够洞悉诸般问题之关键，正所以给予今日国家经济求取发展之重大参考。

盖自 19 世纪以来之世界，所谓文明进步国家者，实即指其工商业发达，国家建设有广泛之成就而言。所谓强国者，亦即指工商业发展迅速，军事设施与器械之优良而言。所谓落后国家者，不在其文化悠久若印度、波斯与埃及之文明古国，而在其工商业并不发达，生产力迟滞落后而言。而中国之被世界公然视为落后国家，正以其工商业不足与列强诸邦争骖比靳。故今日之世界，凡衡量文明进步，富强贫弱，惟以其工商业之成就为重要标准。其他诸类成就，均不免视为次要。此即 19 世纪以来，欧美列强所领导之世界新趋势，虽为一种普遍观念，但在中国初始接触，则为闻所未闻之新遭遇，有待于酝酿醒觉而采取行动。

19 世纪欧洲工商业发达，对外贸易加速拓展，推向世界各地。此种虽为商业行为之组织与活动，受到国家之保护与支持，自然联带产生殖民扩张之需求，而在欧洲以外之落后地区，亦形成各大国间强烈之殖民竞争。领土为列强所分割，人民为列强所奴役。地球五大洲土地物产，殆已成为欧洲强国之外府。此一世纪之欧洲，实质上已成为全世界之主人。一切活动，在在支配世界各地之命运。

中国自古代创建农业国家，熟于农务，精于农事，留有丰富而健全之农业经验，国家基础，文化创制，乃并建立于农业成就之上。虽然如此，亦并不免有商业之活动与发展。当都市聚落形成，就实际需要，自难免商业之逐日繁盛。汉代而有抑商政策，当起于商业发展过甚，财富集中，贫富不均之现象；重农抑商，原有其历史背景以至重大成因，并非一朝而突然施行。推其重要目的，一则政治上削除豪强势力，以避免危及皇权。一则经济上

避免垄断专利，以便国家经济趋于稳定（如盐铁公营，即在杜绝私人垄断）。一则社会上有平均财富之功用，使不至有敌国之巨富，以及贫富之悬殊。然其贱商之政令，使商人不得乘舆衣锦，则未免流于矫枉过正。^①

中国自汉以来之重农抑商政治传统，与贱工轻商之社会风气，历二千余年之传承，以至 19 世纪，实为不争之事实，共喻之常识。即此全面共通大势而观，凡一社会之中，风气趋势虽已形成庞大压力，但仍不能缺少工商经营之家。惟使工商业者居于社会中辅助地位，而政治上则毫无地位可言。中国传统之职业功能分类，民有士农工商四种，本不应有所轩轻，而人们价值等差观念，对于工商职业，实颇有轻视习惯。至就工商职业而言，固为流俗所轻，而轻视之程度并不严重，实未能影响此一业者之社会地位与尊严，非若倡优之为人所鄙薄不齿者。就业商者而论，除牟利营利之总目标以外，亦自创有一定之德行操守规范，乃至广泛信守商业道德传统。凡商人教养，技艺传习，交易规矩，信约制度，以至中心理念，中国商界，固早有创制，但如此重大问题，尚待学者有所澄清，在此不敢妄议雌黄。

中国轻商传统之严重后果，不在当时对于商人之态度与待遇，事实上工匠与商人本身及其子弟均可参加国家考试而转人仕途。轻商风气之不良后果，实在于观念上之漠视轻忽，既不重视，自难有积极鼓励，研求精进发展。历史上亦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鳞半爪之出现，均不免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真乃中国文化史上之重大缺失。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此即轻商风气所影响最严重之恶果。

相反而言，中国虽有轻商风气，并难于创建商学体系，然就

历代经商经验本身而观，中国商人亦自保有丰富之商界传统。行商坐贾，各有规制。19世纪中国商人之适应世界工商竞争潮流，自不免据固有商业传统以为手段。然则其不足以抵挡列强工商业之压倒优势，而遭承严重冲击，相继失败倒歇，实为自然趋势所使。中国虽有经验丰富之商人，悠久之商业传统，同样经营工商，而终难能与列强工商家竞争，此正因为双方之背景条件各有不同，胜败关键，实系于此。须知此种冲击不惟中国商人不能抗衡，而即历代千余年来操海上通商霸权之阿拉伯商人，已先为欧洲工商家所压倒，完全丧失其沟通东西之中介地位。比较昔时盛况，亦可想见其失败之惨烈。据此亦略可知西方列强工商业扩张之动力，已足使世界现势全而改观，中国当此强力之冲击，又适轻商传统之足以自我锢闭，适应无方，自不免全面惨败。至使国力衰颓，经济崩溃，社会解体，人民颠沛流离，真中华民族最惨痛最不幸之百年劫运。

西方列强现代工商势力之冲击，常人固不知若何由来，若何抵御。即专业之商人，亦只能供人驱使，无力抵御。华商向来缺乏国际贸易经验，固然无力抵御，即向有丰富经验悠久传统之阿拉伯贸易商人，亦竞争无力，抵御无术，终至断送东方贸易大权。胜败关键，端在于现代之商业组织与技术。尤要者，列强工商竞争，实系乎全体国民组织力之发挥，以及技术能力之高度表达。故贸易竞争，乃凭恃一国全体能力合作之效率，商务本身以外，自政治、军事、外交，以至社会、教育莫不通力配合，息息相关。由是以观，不惟重农轻商观念须有改变，即传统商业技能知识，亦均必须有重大改变，甚至政治制度、政府组织亦必须有重大改变。适应此一工商竞争之冲击，自须首先在观念上有彻底转变，而一一觉察各个关节配合之需要，继在行动上因应而急起直追。中国积二千年固有之习惯，承受此种冲击，其反省觉悟自不免缓慢艰难，相对比较，已遥遥落于日本之后，但亦并非完全

麻木一无省察。其在思想理念之转变，尚足以追索若干富有深思的创见，足以反映当时人士的觉悟与努力。

二 “商战”及“寓兵于商”

中国历代既重农轻商，士人漠视不问，商人知识浅陋，而竟产生“商战”观念，实为颇费思索探究之问题。“商战”一词之提出，在中国史上是近代产物，依文献所知，最早出现于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函中，其意旨表现，即为对西洋工商国家之反应：

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怨道焉。^②

曾国藩为传统知识分子，向以儒学为修身立命治事处世之原则，并以儒家自居不疑，在其脑中何以会生出“商战”意念，实令人更费思索。而且“商战”一词向无成词可供援引，国藩提出此二字之联骈，亦为中国史上重大之新创。以当时时势背景推测，自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1860年6月17日）国藩始得到四月十九日授任两江总督的谕旨，自此开始肩负地方重任，而英、法、美、俄通商新约亦成于同年，故国藩过问中外商务，最早亦不能超过1860年。事实上，国藩与长江下游重要口岸上海地方人士加深接触，当更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5日）安庆克复以后。安庆克复，湘军建立大功，国藩勋威远播。遂移驻安庆为大营，始向长江下游广布檄文，征召贤良。而太湖沿岸沦陷地区以及孤立被围之上海等地人士，始来安庆求援。当时江

南人才集于幕下者已日渐增多，但能通晓商务了解外情者仍为极少数。故国藩得以咨询外洋通商问题而获得相当了解者，最早亦不能超过1861年。今国藩于1862年提出“商战”一词，其本人固仍在安庆驻地未动，江南各地糜烂未复，上海亦在孤立无援远隔千里之外也。国藩酝酿此一观念，予近代中外通商情势以如此形容，真乃一语中鹄，反映一新时代之新局面新景观，深澈清明，透辟入里，诚为表达同时代现势简易概括之重要观念。

至论曾国藩“商战”观念之提出，其产生之自然渊源，不免仍由传统旧学根柢出发，而古老典籍之熟习，尤以灵活应用面有创新启示。商鞅耕战，即其直接引括。创机渊源，实甚明显。以秦之富强印证西洋各国，以耕战政策，抽绎商战词旨，用此对比古今致富强之方术，自为“商战”词汇创造立旨之先导。而后推衍百年，固显见其愈发愈明，颠扑不破。

然则“商战”观念之于19世纪以至20世纪，实为中国人共有之观念，反映同时代共通之理解，自非曾国藩一人所可代表。惟此“商战”二字之提出，知识分子辗转引据，发抒议论，警惕国人，国藩先驱地位自不可埋没。后人援引申论，亦并可寻绎其直接线索。光绪四年（1878）御史李璠即引国藩成说，更详细分析中西通商局面。实为当时重要之“商战”理论，李氏出以奏折云：

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势，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③

以对战论商情，李氏指出核要之重点。有谓：“夫轮船招商，坚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贸易，直捣中坚之策也。”^④于“商战”之功能，贸易之意义，均已清楚标出。

约稍后李氏一年时，薛福成亦提出同样观点。由古代商鞅“耕战”政策，引申拟论当时西方列强工商竞胜之大势。提出其商政之策画，较李氏更具体周密。薛氏自同治四年（1865）加入曾国藩幕府，最留心洋务，并常时搜集曾氏言论，当必见及同治元年函牍，故薛氏实亦为直承国藩观念而审思拟议商政对策者。兹参考薛氏著“商政”篇有谓：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迨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⑤

自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提出“商战”一词，以至光绪五年（1879）之间，李璠、薛福成各有直承抒论之宏扬推广。而同一时代有心人士，自不免留意体察，警悟其言。或助其传布意义，或更引伸发挥要旨，当即自然形成同一时代知识分子之共同观念。其中以“商战”为题旨，直抒“商战”专论之重要代表，则首推商人出身终身经营商业之郑观应。郑氏著《盛世危言》，“商战”占其中二篇。（其他若“商务”五篇，“商船”二篇，可不计列。）中国近代商务思想醒觉之先知，郑氏当为首要前驱。郑观应是广东商人，自17岁始，即到上海学英文而入商界，服务于英人各大洋行，前后20年之久。后半生又为国家经营招商局电报局。可谓毕生从事商务，尤于中外贸易了解深澈^⑥。郑氏

虽为商人，而热心国事，洞悉时势，同治初年即著救时揭要行世，继著易言二卷，传布更广。惟问题周备，言论宏肆，思虑成熟，影响尤其深远者则应为《盛世危言正续篇》九卷。“商战”二篇，即出其中。

“商战”之意义，经郑观应之分析发挥，立即显露其时代精神，与其丰富深远之内涵。以对积弱积贫之中国，正足指出当代与未来应当努力追求之方向。在此仅就郑氏申论“商战”之界说，即已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就西洋立国，以见“商战”之整体性，郑氏有谓：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帑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①

至立国于列强纷争之世界，以论建国重要效益，以及来往势力之消长，则与“兵战”比较，而“商战”实最重要。郑氏申论谓：

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

战。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⑧

今世商为立国之本，富为国力之源，健全工商实为无形之战，修整武备实为有形之战。即图讲求有形之战，自必恃工商为资本为基础，此“商战”意义尤其重要也，郑氏就立国本末以言商战：

我中国标本宜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而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⑨

“商战”所表达，即在为整体国力之发挥，故商务自为国事而非私事。通商乃关系全国生存强弱之关键，非仅为商家私利之发达与衰败。若明此“商战”意义，则商业固须加强经营。工艺亦当力求精美。农产亦须力求丰足。进至教育素质尤须提高而普及。各业息息相关，国家自成一血气灵活体质壮健之战斗体。郑氏步步以兵法形容提喻，组成其十分精辟之商战理论：

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廪饩以优奖之，赏赐丰匾以宠异之。或具图说请制作者，则借官本以兴助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

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从人舍己。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然后视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责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靡贵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⑩

“商战”不但关系整体国力之强弱，而在时间上言，又为最能持久并且最需持久之一种较量，现代国家尤不能不明悉此点。总而言之，商战者，并非商家之战，而系一国内各行业，全力支援之对外贸易力量。并非一时一事之角力争雄，而系长久以往，时时存在之一种竞争。为此，郑氏更进一步引申出“心战”一词：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⑪

至于“心战”之定义，盖即以知识竞胜之意，郑氏申论甚明，自由商战一义，诱导而出：

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⑫

然则，以论年代先后，“心战”一词，尚非郑氏所首倡，更早者当为王韬之倡言“心战”。王氏亦就通商一途立义，二人创思之出发点完全相同，惟郑氏就“商战”引申，王氏则就以商立国之功能引申。通商为富国之宗旨，贸易为通商之实质，商约为贸易之依据，公使领事为执行商约之代表，兵船炮舰为保护商人之武力。是以国家代表之公使领事，其笔舌之经营，胜于兵革火器，无形中以收兵战之效，故谓此不兵之战，即为“心战”：

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而交际之道寓焉。盖亦以礼维持之而已。使臣以忠诚外结异国之知，内为朝廷耳目之寄。诸国有意外大事，立即奏闻，其职綦重焉。领事则在保卫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理，或有不行，则稟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此其大略也。惟是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而远卫使臣领事，使其威令得行者，则水师兵力也。水师陆营以兵战，以力战，以出奇行诡战。使臣领事以笔战，以舌战，以心战，此所谓驾驭于无形，战胜于不兵。^⑬

专就“商战”为论题立说者，郑观应以外尚有汪康年。汪氏浙江

人，进士，自为科甲正途出身。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于时务报发表《商战论》，充分表达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工商立国重要性之深切了解，汪氏言论，多次深论中外商务之胜败关键，而《商战论》则尤见清晰简明：

国立于地球之上，咸以战争自存者也。以战自惕罔不兴，以不战自逸罔不亡。战之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然则商之持筹握算，以与他国较锱铢，犹其被甲执戈而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也。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糗粮也。国家之待将卒，必厚其粮备而予以利器，岂偏爱此将卒哉，以为是一国存亡所系，百姓生命所关，不敢不致谨也。^⑭

同时商为农工生业之运用，足以联接贯串一体。对外国争竞胜负，商战尤优于兵战。就国家需要，商实有广泛功能。汪氏论列诸点，均颇简明有力：

今夫农尽力田亩，或植材木，以出地中之所产，然非商则不能运而致之远。工取五行之精，而制为器用，非商则不能炫于肆，以得他人之贲。且商之为事常，兵之为事暂，商之为事繁，兵之为事寡，商所赴之地多，兵所赴之地少。兵者备而不必用者也，商者无日不用者也。然则国家之当加意于商，岂不甚重矣哉。^⑮

近代“商战”观念之创生，本之古老历史实例之“耕战”，循曾国藩、薛福成之对比立说，确据甚明，自不待言。“商战”一词，既经流布，辗转思维探讨，居然又引申出“心战”之新

词。以“商战”之竞胜，凭恃知识学问之精进，根本实在于智力之竞胜。然智力之培育，因教育与学习而见增长，遂又自然引申出“学战”观念。故由“商战”观念意旨之深入思考，寻绎重点，终究又创出“学战”观念。其直接衍生之机，甚为明显。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龙南致用学会立会章程，明白表示，“商战”所基，在于“学战”，其序有云：

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⑥

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善化黄崑发起“学战会”，亦清楚标明以“兵战”“商战”不如“学战”之旨：

至夫学，至夫战，至乎会，不予以戈矛，不受以甲冑，不务壮士之所行，不聒舞蹈之所习，津津欣欣，张口鼓舌，坚坚冰冰，致敬尽礼。曰：志在新学强学焉尔。曰：善战于不战，善不战于战焉尔。曰：其所恃惟在博通西学者，往往揭出兵战商战不如学战之旨。而所为勤勤恳恳，尸我种教之自存于群与群战，人与天战，公私交战，人物交战焉尔。^⑦

由此两项证据显示，当可略见“商战”意旨发展引伸之不同方向，其于近代思想之创生，实更具重要意义。

清季自 1862 以来，“商战”观念已普遍反映当时中外情势之醒觉，对外通商局面决非单纯之交易经营，实代表严重之国力损耗。各国通商竞争，将使中国加速民穷财尽，土裂国亡。“商战”之认识，“商战”二字之提出与流布，正表现知识分子所感觉之严重意义。同一时代辗转提到“商战”一词者，为数已逐渐增

多，足以反映出其普及面，兹就所见此项言论，列表明之：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曾国藩	(见前引)	1862	《曾文正公书札》第十七卷,第44页
李 璠	(见前引)	1878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166页
郑观应	(见前引)	约 1884 - 1892	《盛世危言正续编》第二卷,第35、37-38页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与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酿酒制糖,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纱,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六在遍开五金,煤矿钢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七在广制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整顿磁器,应务以景德之细窑,摹洋磁之款式,工绘五彩,运销欧洲,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宁之机法,仿织外国绉绸,料坚致而价廉平,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更有无上妙着,则莫如各关鼓铸金银钱也,分两成色,悉与外来逼肖无二,铸成分布,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各色银锭,概令赴局销毁,按成补水,给还金银钱币。久之,市面既无各色银锭,自不得不通用钱币,我既能办理一律,彼诿能势不同从,则又可战彼洋钱,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	同前	《盛世危言正续编》第二卷,第36-37页

续表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鄙人于甲午年,尝与有心世道者论,我国与外国通商以来,非但兵战屡败,而商战亦不如人。设长此不变,实业利权恐尽为外人所握,受人挟制。	约 1901 ~ 1904	《盛世危言后编》第四卷,第 51 页
	当此竞争之世,商战最烈时也。昔者商务之广,工业之盛,首推英国。近则欧美各国,靡不振兴农工商务。皆孜孜讲求。有树艺学堂,有工艺学堂,有商务学堂,有矿业学堂,有铁路学堂,有格致学堂,人材日出,新器日多,精益求精,所以有优胜而劣败矣。	约 1902 ~ 1906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 33 页
	夫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长。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无形,譬如油尽灯灭。有形者易备,无形者难防。而人反畏兵战而不畏商战。吾知二十世纪因商战之败而亡国者,必较兵战为尤甚。兵战恃船坚炮利,火器巧捷猛烈,为战胜品。商战之制胜品则在扩充实业,振兴商务,推广制造,以维持国货也。我国士夫矜于世界之趋势,而不知以此为重,仿效改良,虽口受外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为耻。	约 1905 ~ 1909	《盛世危言后编》第七卷,第 28 页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惟志大才疏,未酬夙愿。	约 1905 ~ 1909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 43 页
	本会之设,为广东农工商商业之代表员,凡有益于农工商商业之事,必尽力团结,整顿提倡。择其有损益于农工商商业者,代诉地方官,设法兴除,以副商战主义。	约 1905 ~ 1909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 27 页
	公司不发达,乌能与泰西争商战之胜负哉?	约 1905 ~ 1909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 49 页

续表

人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p>鄙人投身于商战场中已三十余年矣。观海关报册,进口货年多一年,漏卮日大,生计日绌。民安得而不穷,国安得而不弱。考中外亡国历史,当罗马称强于泰西,元帝称强于东亚,非不顾盼自雄,有席卷六合气吞八荒之概,无如骄奢淫逸,黷武穷兵,知用财而不知生财,图敛利而不图兴利。路政不修,矿业不开,农工辍手于野,商贾罢业于市,嗚呼胥谗,民乃作慙。终致四海困穷,一败涂地。良可叹也。列强有鉴于此,咸知处今日之舞台,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p>	约 1906 ~ 1909	《盛世危言后编》第十四卷,第 49 ~ 50 页
	<p>吕氏东莱曰:地之于车,莫仁于羊肠,莫不仁于康庄。水之于舟,莫仁于覆塘,莫不仁于溪涧。夫康庄岂虑覆车,溪涧岂患沉舟,而往往不免者,误于所忽也。商战之亡人国者亦然。二十世纪之天下,一商战竞争之天下也。其间富强之速者,莫如德日。商务也,实业也,工艺也,均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果操何术以致此,盖亦在广设各种学校,教育各种人材而已。</p>	1910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 53 页
	<p>今观中外贸易调查表,而知中国商战之失败如此其甚。亡羊补牢,未得为晚;见兔顾犬,岂可谓迟。宜上下一心,改良政治,一面广设学校,以育人材,一面设法振兴商务,推广实业,研究工艺。</p>	1910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 53 ~ 54 页
	<p>当此竞争之世,非徒强兵利器,更有以新法亡人国者。见其积弱可欺,即外托和好保护之名,内怀蚕食鲸吞之志。靡不先施玉帛,而重言甘,假通商传教借款承办路矿,握人利权。而后藉故兴戎,得寸入尺,乘人之危,据人土地。所谓智取术驭,始则以商战吸其脂膏,继则以交涉侵其利权,终则以兵力迫其归并。如俄普之灭波兰,英之攘印度缅甸,法之据越南金边是也。</p>	1909	《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续表

人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盛宣怀	我中国史册所载,管仲相齐,霸诸侯一匡天下,以民为贵,严定法律,振兴农工,擅鱼盐官山府海之利,亦尝以商战弱人国。可知古今兴亡之故,非兵强不足以保国,非商富不足以养兵。而商战之利器在农工。	1909	同前
	是商战有术,方可驯致富强。惟从来富强之国能久存者,君上有公天下之心,知国家非一人之私产,开诚布公,立宪法,讲道德,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1909	同前
	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	1887	《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卷,第15页
	今朝廷举千载旷废之政,特开曹部,将以振起商战。足国足民。一俟款议大定,所冀上衷周制,下鉴列邦。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市,兴农工以溥商源。阻格胥蠹,职事可举。	1900	《愚斋存稿》卷五,奏疏,第21页
	伏查商约一案,历经遵旨,在上海办理。其已订各国,均经妥定约章。其未订各国,尚无日期开议。当此商战时代,关系固非浅鲜。臣虽办理有年,愧无成绩。兹复溥蒙恩谕,仍畀是差,助以妥协之方,冀收经理之效。如臣愚陋,诚惧弗胜。窃维商约以加税为宗旨,当与枢臣部臣面商机宜,并与各国驻使略事周旋,而催开办。	1908	《愚斋存稿》卷十四,奏疏,第11页
即如招商局本属藉华商资本与洋商竞争,乃近来用人之权,邮部仍蹈本初覆辙,悉用官派,侵渔商利,年年亏本,以一千数百万之商产,欲取给商息四十万而不足,各省华商,咨嗟太息。李文忠所创实业数端,只剩此一事,垂数十年而不特无以扩充,且日削坏之,窃不料朝中日言商战,如此其殆也。	1909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202页	

续表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刘铭传	五行百产之菁英,地球中惟吾华称最,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此所谓商战从容,坐镇而屈人者也。夫不聚敛于民者,不能不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者,不能不与敌争利。	1889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49页
经元善	追随明公,一如海外刘将军(指刘永福)。再与外人商战一场,为国家补偏救弊,固所愿也。	1895	《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二册,第493页
谭嗣同	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一战能了者乎?	1895	《谭嗣同全集》,第292页
	西人谓中国之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方欲前出,乃从而曳之、窒之、倒筑之,使不得呼吸。此商脉之所以绝,商战之所以败北,中国之所以贫且弱也。	1898	《谭嗣同全集》,第121页
江康年	(见前引)	1896	《时务报论说汇编》,第14-17页
徐 勤	方今列国并立,其无事也,则以商为战。中国所与立约者一十六国,洋货之人中国,岁至有三万万有奇,纵群天下之商,合举国之力,聚行省之财,振刷精神,互为犄角,以为内守外敌之计,犹恐其弗克胜任,而终于败绩也。况徒泥成法,声气不通,中外之变,懵然不觉。彼众而我寡之,彼通而我塞之,彼合而我离之,则乌得不为人弱哉,乌得不为人贫哉。	约 1895 - 1897	《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十卷下,第18页
	盖列国并立商战之世,势力悉敌,方可自立,吾既日与彼相通,而仰给其器物,乃不思所以兴技艺,自制造,而防制之,其不至上下束手,竭我利源者弗止也。	约 1895 - 1897	《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十卷下,第18-19页

续表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麦孟华	今日立国,首在商战,甲弛乙张,此起彼仆,故西人之谋国者,恒比例其输出输进之多寡,为其国之贫富强弱差。我国所需,必使其尽出于我,我国所产,必使其广输于人。豪族而谋,争及豪末,其商务之持之于上者,监以领事,助以国力,国家保护,若营己私。	1897	《时务报》第二十四册
江 标	凡格致诸报之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者,皆具有学治相关之理存乎其间。观国者至以此卜其人才之振奋,物理之精研,商战工程之机要。呜呼盛矣。	1897	《湘学新报》第一册,例言
唐才常	怵世变者,辄曰商战商战,不知以学战者之尤铲元气旺血肉于无形也。	1897	《湘学新报》第三册
	况如去岁万国公报,载英人葛洪之论,则直波兰我,(虽未必然,然可寒心。)如每年商战,输英人五千余万两,则直印度我。	1897	《湘学新报》第四册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土俄黑海之约,蹶忿成盟,保全亚欧大局之数。交涉者光明俊伟,全球瞩目,获睹葵邱萧鱼之盛。其余或会议,或单盟,或连横,或约纵,事故日繁,机牙日甚,军制日新,商战日烈。虽彼中仁人善士,倡平等尚同之义,而政府阴谋,齟齬辄见。	1897	《觉颠冥斋内言》卷二,第426页
陈为镒 李钧庸 鄢廷辉	古者取人国以兵,至周而一变其局。齐太公以表海之雄,劝工极巧,通鱼盐之利,冠带衣履天下,而海岱衿衽往朝,盖已变为商战矣。其后中衰,筦子犹修其术以为轻重九府,亦成九合一匡之烈。由是言之,商之取人国于不觉也甚于兵焉。	1897	《湘学新报》第一册
	中此五弊,而欲以商战胜天下,是犹缚足而求前也。英吉利天下商战最强之国也,而独行平税,未闻有损,是为明证。	1898	《湘学新报》第三十二册
涂儒霖	人知西人以枪炮船械战中国,不知其以商务战中国。	1898	《湘报类纂》甲集,卷下,第26页

续表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令天下知商战之毒甚于兵战,商战之利亦胜于兵战。而幡然改图,十年以后,吾华之兴,或有几希之望。失今不图,十年之中,如驹过隙,恐他人之竭泽而渔者,不稍留沾滴以苏涸鲋也。其余之何。	1898	《湘报类纂》甲集,卷下,第27页
	余闻莞子家言,其灭莱、弊燕、瘠楚,皆持轻重之术制人死命,固疑商战足以兴邦。今泰西以商立国,越重洋数万里,冒风涛不测之险,争利蛟龙之窟,而国势蒸蒸,纵横海上,莞氏之言不谬也。	1898	同前书
黄 熙	商战于外,农战于内,国恒强。商息于市,农嬉于野,国恒亡。湖南农战之区也。	1898	《湘报类纂》甲集,卷下,第49页
黄 弼	此会取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之义,故以学战命名。	1898	《湘报类纂》丁集,卷上,第11页。 “学战会章程”
王凤文	查泰西各国商战之说,门类繁多,几于无从入手;然提纲挈领,则曰银行而已。	189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9页
杨祖兰	窃维泰西重商,搜拓全球之利,以为侵占各土之阶。中国大小利权,皆为彼族所夺,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策,是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	189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0页
严 复	至今英人侈口动目,辄言商战夸海权。而其实非英之自致,皆欧洲各国使之然也。古者六国纷争,秦人得蓄其全力以制天下,近者甲午之役,东亚之势,坐以鱼烂。古今东西世局,若重规矩如此。列强林立之世,勇于战守者,皆善内政而不轻言战者之贤也。	1900	《原富》,第321页
袁世凯	臣维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经营董劝不遗余力。	1903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七八,实业一,第11241页

续表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浙东市隐 (真名未 详)	当欧洲十九世纪中,商战最剧之时,而大陆之东,支那之地,忽有不学无术,恃其天真烂熳之身,以出而与环球诸巨商战者。鬻(鬻)何人?鬻(鬻)何人?其惟我浙之胡雪岩(胡光墉)乎?	1903	《晚清文学丛钞》下册,第420页
	夫以君(指胡光墉)之冒险进取,能见其大,使更加以学问,而又得国家保护之力,以从事于商战最剧之舞台,我中国若茶、若丝、若金银镑圆,商业之进步,必大有可观,岂必一蹶不振,竟至于于是乎?	1903	同前书
张 謇	以余利已丰;提公积保险外仍提折旧,以蓄商战之力。变例也。股东有谓省折旧之名,不若以折旧之数并入公积者,是又一说也。从之。	1904	《张謇实业文钞》,第126页
	商战方殷,未容多让。绅等具有身家,甚惜名誉,讲求实业,不敢架空。现蒙商部奏请华商自立码头,自开航路,业奉谕旨允准通行钦遵在案。绅商闻风兴起,但使创办有人,股款可以立集。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道在于是。	1904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二卷,第21-22页
	中国顾何如乎?商战日剧,商利坐失,近且经营一切路矿实业。鉴于借款非计之已事,于是民间自办者达之于部。部臣上闻,别其名曰商办。夫既商办实业矣,则其所储积,或称贷之款,必得银行为之归束。而此项银行者,必为商民所信望,而后得商民之信用。以英德法各国之政体,其组织银行之机关,政府尚自处于股东之地位,而银行之性质,纯然一私家公司,所以坚商民之信,而利商业之用也。	1906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四卷,第9页
	自欧战停后,世界商战,将在中国。中国形便,必在上海。	1922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九卷,第22页

续表

人 物	“商战”词汇之引称	大致年代	资料出处
沈敦和	孙武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不独兵战然也。即商战何莫不然。通商之局垂百年矣，其始两不相知也。其后外人习知我之性质，而投我以所好。我方炫异惊奇，趋之若鹜，而不虞厄之漏源之濶也。	1910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54页。 (沈敦和字仲礼)
	欲商战之不败，莫如谋工艺之改良；欲工艺之改良，莫如师人所长，以弋我所短。吾团员之投袂而起，横海而东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1910	《盛世危言后编》第八卷，第56页

综观上表所示，“商战”观念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广泛之醒觉。其意趣所归，有多方面之含意，内容颇为丰富。可藉以了解当时人于“商战”一概念之确实诠释，乃至并反映同时代思潮共趋之宗旨。

自上表所见，25人物之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至以状元出身之张謇作为商人，笔名浙东市隐者，则可能为在上海之浙江商人，合计不过4人。约占20%。至谓“商战”观念之觉悟与提出，80%出于传统科甲出身之知识分子，即切实审察，亦可知决不为过分。惟其中郑观应可谓为最杰出之中坚人物。是为此一时代“商战”思潮之先知，商业竞争之导师。郑氏自述生平，自17岁至80岁，亲身从事经商凡60年，并自称：“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足以见出其自觉性之体察^⑧。“商战主义”亦并出于郑氏所倡议，立为创置商会之宗旨。^⑨自更可见郑氏信念之深切。以其所抒论之透辟完备，与亲身从事商战，挽救国家权利，拯救民族生存之奋斗。百折不回之精神，奔走呼号唤醒国人之热忱，当可与古今百代英豪贤哲，同争千载光辉。

“商战”观念自19世纪形成，人于民国，遂成为普遍之词

汇，而所反映思想醒觉，渐化为通行常识，其时代代表性，亦渐为他种观念所取代。故自民国六年（1917）黄炎培、庞淞合编《中国商战失败史》一书出版，实可代表“商战”观念之成长成熟之总结。^②

再进一步观察，除以上所列 25 人直引“商战”一词者外，同时代之知识分子怀相同观念者仍广有其人。若何启、胡礼垣于光绪二十年（1894）所言：

吾谓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战屈人。^③

若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所言：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牟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④

若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言：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西人之始来也，非必欲得地也，灭国也，通商而已。通商万国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国之利十，未或以为害也。害恶在？中国人士，处暗室，坐管井，懵不知外事，又疲散茆耍，苟欲弥一日之患，而狃于千岁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胁，而

我之迹彼也，如丛神与奕秋博，无着不谬，无子不死，一误再误，以讹于今。^②

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言：

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彼列国之所以相对者姑勿论，至其所施于中国者，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以传教政略为侦探队，而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③

诸人虽未直引“商战”二字，而辞旨所示，则与“商战”同义。凡属此类，实并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商业竞争之认识与醒觉。亦即同时代先知先觉者对于工商国家强烈冲击之反应。

“商战”词汇之外，尚有一创新词汇，具有同等意义，却不及“商战”传播之广远。此即“寓兵于商”观念。“寓兵于商”观念之创发，实更早于“商战”。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耆英谈到英国在五口通商时，即已提出：“该夷寓兵于商”的观点^④。此一观念之自然产生，当然种因于英国商业对华之冲击，所引发知识分子之反应，一方面凭藉敏锐观察，了解工商国家之立国根基，一方面反省中国固有立国根基之“寓兵于农”，遂自然联想而出以“寓兵于商”观念。

“寓兵于商”观念，至同治六年（1867）六月，周星誉有更清楚之论述。实在进一步建议中国之改变重农途径，可谓为当时最清醒最占机先之言论：

外国商贾之事，宫中无一不预闻。中土往古寓兵于农，西人皆寓兵于商。故兵餉则常盈，商利则日厚。中国以逐末为耻，以与商同利为戒，虽有平准、均输、市易诸古法，皆

偶举即辍，不能精求。此则自明以前，以中国治中国可也，今西洋数十国麇聚海洋，而犹守古之常经，势将有所不可。^⑧

光绪初年，郑观应亦并于“寓兵于商”有所发挥。当时郑氏抒论，尚未提到过“商战”一词。更显见其发生之早，而足证其比“商战”一词较易创发。盖以郑观应一人之前后言论，即足以明验其发展之不同阶段。郑氏之论，载于《易言》：

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其未通商之始，划疆自守，不相往来。今则百货流通，各商云集。设此国之财，竟任滔滔而去，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莫塞漏卮，久将坐困。^⑨

然至晚期，亦有言者，如汤道所论：

外洋各国，自来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⑩

虽然，“寓兵于商”乃一成词词汇，而此一观念，当亦不限于此简化之词汇，至具其同意旨之言论，为数实多。若薛福成所言：

查西洋立法，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所以船数虽多，而餉项无缺者，职是故也。^⑪

若李璠所言：

夫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中国官与商

分，商之势单，故日趋贫弱。外国以商养兵，取资于邻国，故其力厚；中国以农养兵，取资于本国，故其力薄。诚使内外臣工知中国之大势如此，洋人之诡谋，中国之受害，实在于此。官民同心，联成一气。实力举行，逐渐推广，二十年后，彼将纷纷四散矣，尚何口岸之增，税厘之减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④

若王韬所言：

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设官置守，隐若敌国。而官之俸糈，兵之粮饷，皆出自商，国家无所糜其帑项也。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如英之于阿美利加洲，于五印度，何尝不如是哉。^⑤

若宋育仁所言：

工商远适，其势甚孤，易为人所遏制。故商之所至，随之以兵，商之与兵，合为一事。公司轮船即兵船，船主即兵官，水手即兵卒，无事则行海载货，一如商船，藉熟海道，以为操练，以兵力护商，以商财养兵，即富即强，如影之于响。^⑥

若陈炽所言：

西人之治兵与商也，如腹背之相倚，兵以护商，商亦为兵。^⑦

若罗应旒所言：

西人以商为国，凡利之所在，皆设官主收其租税，故官民之气常通，众人之心常一，国家之用常足，商与兵相依互进，所见者甚小，所为者甚鄙俗，然足以剥取人之利而弱人之国。^④

凡此俱在申述西方列强兵与商依存关系之密切，结合并用，足以灭亡人国。中国当提高警觉，唤醒民众，以肆应此一“商战”之新局面。

三 商战之对外表达——挽回利权

“商战”观念之创生，因西方工商动力之冲击而始有，故凡言“商战”宗旨，论商业竞争者，其第一优先对象，实即对外国而言。此为至明之理，亦为当时实情。“商战”之对外表达，首先在迎战外国工商之冲击，挽回中国利权之损失，拯救中国之贫弱败亡，真乃民族奋斗自立竞存之正确方向与重大使命。且凡抒论立说，皆由中外间实际利害关系之苦痛经验中获得，故而具体详实，深中要害。

通商之来者既为西方列强，对此等工商国家之了解如何？亦需先作探讨。一般而论，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与英国直接接触，客观判断，认识此一重商国家之立国基础，讨论分析者为时甚早，为数甚多，评估亦正确。早期者若萧令裕所论：

番人（实指英人）近利尚功，以海商为世业，沿海埠头，竞思垄断，转相贩鬻，算及毫厘。其有别部杂港，思商中国，率为遮阂，用擅专利，又叩关之舶，珍货山积，来自本国，例讥重税，国主藉有税入，用供餽俸。^⑤

颜斯综所论：

广东有通洋之利，恐有通洋之患。诸国熙熙，皆为利来，而英夷尤专为奇技淫巧，以易取中国之财。彼国无税亩之征，行什一之法，首务商贾，税课特重。^⑧

徐继畲所论：

逆夷（指英人）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贾其货物耳。^⑨

黄恩彤所论：

夷（指英人）居西北极边，地冷人稀，向无田赋，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虽添设码头，如槟榔屿、噶喇吧、新嘉坡等，多至二十余处，而尤以广州为第一。其所以呈缴鸦片者非畏法也，虑绝其通商也。其所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其所以滋扰他省而不肯蹂躏广州者，非畏靖逆也，自护其码头也。^⑩

稍晚者若王韬所论：

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阴鸷桀黠，其天性然也。其律重商而轻士，喜富而恶贫，贵壮而贱老，厚妻子而薄父母。知俯育而不知仰事。其国地小民聚，事易周知。然所恃不专在国也。属埠之在他地者非一处，皆以舟车为联络。货迁货物，便于转输，故国易于富。然一旦生事，通商之路

绝，即生财之源涸，故其贫亦易。^③

左宗棠所论：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壹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固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招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④

郭嵩焘所论：

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通致数万里，货物遍及南洋诸岛屿。权衡出入之数，期使其国所出之产，销路多而及远。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国家用其全力以护持之，岁计其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院。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⑤

薛福成所论：

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于，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也。^⑥

宋育仁所论：

外国以工商立国，工之制器，待商而行，商之牟利，宜于远适。故其工作服用，凡以备行客所需，无不周备精良，沿为风气。^③

凡此均可显见，西方列强，前来通商，其立国基础为工商业国家，中国知识分子自早有认识，并相当普遍。比较中国立国历史，亦并显见其风气精神之不同。然此属于一般性情况之了解，如其仅只是双方接触，而不产生重大冲击，当亦甚为平常，不足以刺激中国商业竞胜之观念。惟来华英商，牟求大利，于本有之健全组织，细密之企业计划，原已可占尽优势。再加近代条约之种种进展，不但充分突破中国政治上之限制与阻力，而且更从政治上收到不少特殊权利。无论政治外交，亦并占尽优势，为商业利益开拓更多有利条件。

列强在华通商，虽已取得条约所明定之各种特权，足为其赢取大利之方便。然商人欲壑难填，贪望永无止境。工商发展，本无限量，特权要求，自一再扩张。欺中国官府不谙外情，乃至恫吓愚弄，无所不至。列强在华特权，既一再增加，工商利益，亦好景无限。然所直接承受其影响者，则中国工商业之破产，人民濒于饥馑，沦为流丐。所谓中国国土，不过为列强工商家之工作场，中国国民，则不过服役于列强工厂之廉价小工。列强在华之经济势力范围，实际早已实现了瓜分中国之想望。在此种工商扩张之冲击下，中国人士如毫无醒觉，一无发现，则直可视为豕鹿牛马，任人宰割。无须费笔墨探讨。然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并非麻木不仁，亦曾提出警言，唤醒国人。如薛福成在光绪五年（1879）所形容洋商欲壑之贪饕，并其影响领事公使乃至其国家政府对华作种种无理要求。其间关系，甚为清晰。实表现高度之警觉：

总之洋商于已得之利，则习而忘之；未得之利，则变幻百出以困之。充其无穷之欲壑，虽尽去商税，犹未以为足也。众商日聒之领事，领事日唆之公使，公使非不知事之难行，姑肆其恫喝，以尝试中国。幸而得请，可以要誉市恩；万一中国必不能允，彼亦有辞以谢众商矣。然则应之者，在洞烛其情，始终勿为所摇而已。^④

郑观应更清楚指出，列强以商立国固人人能知，然其重要关键，若国家设公使领事，议订条约，虽明为外交之事，实一切均为其本国商利而设。此种情势，真中国亘古以来，前所未闻者：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己利，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⑤

其尤为使人闻之惊心动魄者，则以通商而足以灭人之国，更为中国往史所未经见闻。郑氏固已言及，而陈炽申述尤详：

英吉利立国，在蕞尔三岛间，四面际海。而鹰瞵虎视，屡执牛耳于欧洲。西并美利，南兼印度，东南括澳大利亚。属地之广，方二千万里。而遥挟其利炮坚船，遂以纵横四海者何哉？商之力耳。英之得美洲也以商会，后因加税激变，华盛顿率商会以叛英，相持八年，竟自立为国。英之得美也

以商，美之拒英也亦以商，今美之北境加拿大，犹然英土。美虽自立，然举国皆英商也。英之得印度也亦以商会。初由商会派人代印度筹海关，所谓公班衙（company）者也。印度土王，兄弟争国，残害英商，商会举团练之兵，踞海关之餉，三战而入其阻，覆其军，灭国擒王，摧枯拉朽。而印度八百万方里之地，八千万户口之民，俛首而托他人之宇下矣。澳大利亚之地，大与中国相若，内皆沙漠。惟沿海膏腴，商会据之，不费吹毛之力。自余缅甸各国，非洲一洲，南洋各岛，莫不发蒙振落，席卷而囊括之，商力之雄如此。商会之能灭人国也，又如此。^④

此种认识，自较一般性质之了解，易于发人深省，以回观中国之承受西方工商业冲击，是否即难逃亡国命运，亦如印度缅甸之续，自更引起中国之人切肤痛觉，而不敢等闲轻忽，以蹈灭亡之遗恨。

19世纪中外通商，其最浅显而直接之事实，足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对列强商业剥削之恐惧感者，十分清楚的了解，是来自海关漏卮，海关漏卮之所以使人感到可怕可痛，乃在于数十年来恒常的外贸之入超，亦自表现巨量外货输入与巨量金钱之外流。当时人之所了解所比拟，亦似人体之血液，终必有枯竭之日，而国家必然民穷财尽。其去灭亡之日自亦不远。

国人了解漏卮，并不甚难，洋人之纷至沓来，鸦片与洋货之充斥，所为何事？当略可概见，中国金钱之被吸收外流。惟此乃普通现象之常识，自不足为言论依据。自光绪元年（1875）起，海关贸易册，广为流传于朝野官绅之间，有心人士从事搜集，或随时录入日记，并撰著成书，如杨楷之“通商十二表”，张謇之“棉铁表”，沈敦和之“中外贸易调查表”，钱恂据杨楷所编扩充而成之“光绪通商综核表”，均广泛流布于知识分子之间，最足

以直接了解漏卮之严重，启发商业竞争之痛觉。至少亦即起而呼号金钱外流，国家困穷之惨烈状况，用以唤醒国人，起而防御。一时论者，皆据实指陈，若光绪二年（1876）陈兰彬所言：

窃维洋人远来中国，通商谋利，无非削我货财，厚集兵力，以肆其狡谋。而害之最切近者，莫如轮船，缘轮船转运捷而脚费省。又有保险公司，设有意外，照价赔偿。视民船滞笨，时虞漂泊者，相去霄壤。商民争利趋便，附搭恐后。计十余年来，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获利之后，得步进步。始而海滨，继而腹地，终必支河小水，凡舟楫可通之处，皆分占之。中国民船日销月蚀，渐归于无有，是彼不烦兵力，藉以生财，而尽据我土宇之利也。获利之后，愈进愈深，是愈畅其要求之路也。洋船所至之处，洋案愈多，是彼收其利，而我受其扰也。^⑦

光绪八年（1882）张培仁所言：

自与西人通商以来，中国之银溢于外国，而中国日穷。其大宗不过二端：鸦片烟外，厥惟洋布。查近年各省所销之洋布，每岁不下三千万两。外洋之织机日增，中国之行销日盛，以至中国所产之布滞销，小民生计愈艰。^⑧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所言：

考之通商贸易册，布、纱、毛布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销银将及五千万两。查洋药一项，中国向有丝、茶两宗足以相抵，则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起而争利，遍植茶桑，所出

几与中国相埒，华货因之滞销。是丝茶本为中国独擅之利，今已成共分之利。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⑩

光绪十六年（1890）马建忠所言：

昔也，以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即上有所需，亦不过求之境内。是无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环周复，而财不外散。今也不然，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而各直省之购炮械，购船只，又有加无已。于是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竭不罄，民曷不贫哉！^⑪

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炽所言：

夫邻之厚，我之薄也。中国开埠通商，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廿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犹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⑫

然则漏卮之甚，其尤为知识分子所痛心疾首者，实在于鸦片之输入，迫使中国民敝财竭。而获大利者，则为英国。若光绪十四年（1888）钱恂所言：

贸易以英商为最巨（原注：居十之八九）。然来者非尽其国所产，往者非尽其国所用（原注：关册云：船悉某国

旗，即列入某国教内)。徒以轮船繁多，属地辽阔，为诸国雄。而懋迁亦遂为诸国冠。非果物产之运输不竭也。惟印度所产洋药，流毒中国，英擅其利而无其害。是彼倚印度为外府，以饵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又不当以通商论。罄各国茶价，不足偿此鸩毒，可胜慨哉！^②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论及鸦片输华，亦痛心愤慨：

案欧人之拓外属也，既尽其利，必残其民。此不仅西班牙波陀嘴尔（即葡萄牙）然也，英荷之所为，有过之矣。顾英治降而日修，而西波之改革者寡，此近所以有古巴斐利滨之事也。鸦片之贻害泰东，英人虽有三尺之喙，其无可辞。论其功罪，彼前救黑奴，与此仅相抵耳。读斯密氏（Adam Smith）所言，专利公司之害，辞气于英人不少假借如此，乃知论事者顾私失实，则其书可焚，又何足与言明理也。^③

洋纱洋布之输入，夺小民生计，大量金钱外流不论，且足危及全民生存。而长期以金钱换得大量鸦片输入，则吸尽中国人之膏血，更足以毒毙所有民人，终必招致亡国火种大祸。此当时知识分子所以感到急切而震恐，并不免大声疾呼，唤醒国人。

中国对外贸易，历年漏卮，为量至巨；而漏卮之门在于海关进口。何以进出不能平衡，大病关键，又在于海关税则之不能自主。海关为中国内政，然中国政府不能自定税则。凡进口出口一切税则，均须先与通商各国商酌，订为通商约章，依为征税准则。大违背现代国家独立自主之尊严，对中国主权实为严重之侵损。然此恶例早开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耆英在广州与英人共议之“税饷章程”。实自五口通商开始，亦即所谓“协定关税”恶例之创始。

“协定关税”，乃近代人形容 1843~1942 年百年间丧权辱国之重要历史名词。创始之初，中国全国不明西方国情规制，主持交涉者以为方便，此乃时代知识所蔽，自难于深责前人。英人初则循其趋势，继则据为条约权利。使此中国内政权力，流为外交处置之交涉问题。尤可痛愤恨恶者，初订十二年修约一次，咸丰十年（1860）改为十年修约一次。然修约乃一般性，列强竟据此迫使中国海关税则既定，非到修约之期不能要求议改税则。牵掣混淆，恃强蔑理，欺蒙中国人之无知。继后中国渐觉悟受殆受亏之严重，遂有人起而大加抨击，然欲挽回此权，实已大费奋斗之力。钱恂先言西方关税公例，以明中国早期创例之失，有谓：

溯自道光壬寅（1842）定值百抽五之税，咸丰戊午（1858）量减货价渐杀之税，而立则焉。维时西国政令，既未闻于上国；而洋使恣睢，又不受我范围。凡所为裒益而更定之者，故徇彼请，无暇研求。抑知西国征商之例，恒重进轻出，遇人殖己，意至深也。又或察其缓急利害，以时其轻重之宜。^④

继则提出修改税则，收回利权之建议：

夫日本援西例以权洋商，彼无词也。中国驯抚远人，圣恩宽大，未予加科。窃谓法与时为变通，畴昔海舶尚希，不妨轻税额以示国体。今则利趋于外，正宜参取西例重进口而轻出口。顾百五之例，载在约章，骤议增加，夫岂易事。然公法自主之国，皆得损益税则，保护利权。商于其国者，不能阻也。则转移补救，事在人为。马贵舆（马端临）所谓：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者，其亦商政之铨键也欤。^⑤

郑观应亦先言当世各国关榷公例：

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其税必轻，或免税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其税必重，以其靡费于无用之地，欲民间恶而绝之。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鸦片之类，不准入口。至于税则，随各国自定，而他国不能置议，欲增则增之，欲禁则禁之，以其货为内政而不妨由己订也。^⑤

进一步，亦提出订定海关税则办法：

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能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也。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⑥

马建忠亦据西方公例，提出修改税则之建议：

外洋恤商之策，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中国之税反是。是宜及时按茶身之高下，以科税则之轻重。厘金亦视此递减。税轻厘减，则价贱，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

增，则税厘更旺。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初若小收而见绌，终必多报而见盈。近来各处关卡，办理成效，率以宽大而比较日长，严密而比较转短，得失之林，彰彰可考。况通商税则，原非不易之经，俟修约之时，凡洋货税轻者皆可按价酌增。至吕宋烟、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则，皆以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倘使总署王大臣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④

陈炽亦申叙当代国际关税订定之理论原则：

税则者，国家自主之权也。非他国所得把持而挽越者也。泰西诸国，虽弱小如瑞士、丹马、比利时，至弱至小如塞尔维亚、门的内哥之类，苟尚能守其社稷，则税则之或轻或重，无不由国君自主之。何项应增，何项应减，只须先期一年，知照各国，各国之商于其地者，帖帖然无异辞也。各国使臣之驻其国都者，亦唯唯然无异议也。即或赋敛繁重，商旅裹足不前，惟有婉与商量，讽其更改，从无用兵相挟，下旗竟去之事。盖西例然也。既已商于其国，受其保护，分其利权，自应静候稽征，输纳税课，此人情天理，非可凭恃势力强人以所难也。^⑤

并亦详细分析中国受害之由来，与要求修改税则之急切：

税则者，商务盛衰之根本也。均是物也，我之税重，而人之税轻，则我之成本昂，而人之成本贱矣。其价均也，则人之获利多，而我之获利少矣。其价不均也，则人之货销路畅，而我之货销路滞矣。此亦自然之理，必然之情，不得不

然之勢也。英國向有保業之法，慮他國之物，奪本國商民之利，乃禁其入口，重稅以困之。如中國絲茶白糖瓷器四宗，皆值百抽百。本國出口之貨，徵稅至輕，或有竟不徵稅者。如印度之烟土茶葉，海關均不徵稅。欲暢其銷路，俾本國商人之獲利多也。嗣各國營其不公，本國英倫三島乃改為進出一律。惟烟酒不在此例。然此外之值百抽十抽數十者仍累累也。印度之茶，日興月盛，已較中國多至一半有餘，至而今仍不徵稅也。美國進口之絲茶，值百而抽六十，出口棉花洋布，稅數甚微。自余俄、德、法、奧、日、意諸邦，均于本國出口之貨，或輕稅或免稅，以保利權。于他國入口之貨，雖不禁之，而收稅終較本國為重。如某貨來自某國，入口過多，慮本國商民日久失利，則于一年前知照各國，謂本國于某貨將加抽若干之稅。出貨之國，不敢不從。即使所加過多，只能仿商人不運不售，不能阻其加稅。蓋收稅一事，凡有國者自主之權，即使小若彈丸，弱為藩屬，苟尚能保其位號，即不應听命他人。此萬國人情天理之當然，即一國國計民生之所系，而決不容以勢力橫相侵奪者也。惟天下萬國，亦从未有以稅則一事列入約章者，蓋稅則者，一國之私權也。約章則譬如合同，互議互商，各執一紙，兩國之公權也。中國甫議通商，情形隔膜，誤將稅則載入約章，由是私化為公，能自主者不能自主，英人陰謀相劫，盛氣相陵，太阿倒持，六十餘載，中國之受虧也深矣。英人之攘利也亦至巨矣。英人議論，輒謂華人因循猜忌，不信外人，致通好多年，而彼此邦交仍難澆洽。即請以稅則一事論之，英人之欺天欺聖，以欺我中國四万万之人民也，固已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天下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英人既以洋药之毒鸩我华民，又以收税之章欺我中国，转将禁奴琐事欲倡公义于人间，是犹持一钩之轻金，赎万钧之重罪也。^①

麦孟华亦就国际公例，指陈中国之受欺受愚：

两国通商，所定税则，重外轻内，以资抵拒。此万国之所同，天下之公理也。我国定税之始，为强敌所胁，为狡邻所愚。洋货土货，收税如一，已为天下所笑。上海机器纺织等局初立，大吏奏请免征半税，仍值百抽五，与洋人运货内地值百抽七五者小示区别，盖于利权尚有小补焉。乙未（1895）马关约定，准洋人一律在内地制造，于是华商制造之权遂与诸国共。^⑥

然则就具体意见，海关税则应如何订？所取标准如何？大致必然一一取借西方已行规制作为参考。郑观应已早在光绪初年建议若干原则：

曾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为制，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又有全不取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即如烟酒，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开洋酒店者，尚须纳规领牌。而每年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其数甚巨，竟充伙食，概不纳税。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今宜重订新章，仿照各国税则，加征进口之货，并重税烟酒鸦片虚费等物，以昭平允。又如珠玉锦绣珍玩，非民生日用，饮食所必需，虽倍税加厘，无损于贫民，无伤于富室。且计须我国之所无者，则轻税以广来源；有者则重税以遏去路。权其轻重，卫我商民，倘虑率尔更易，齟齬必多，惟于期满换约之时，重定税则，据理力争，务使之就我范围而后已。^⑦

陈为镒、李钧鼎、鄢廷辉等，更建议详分类别，作为定税标准：

倘能变法，宜分入口货为六类：一有益类，一有损类，一有实用类，一无实用类，一能自造类，一不能自造类。有益类宜免税，如书籍药料牛乳等物是也。有损类宜值百抽百（极重税），如鸦片烟、吕宋烟、葡萄酒等物是也。有实用类宜值百抽八（轻税而稍重者），如洋布洋绒洋呢等物是也。无实用类宜值百抽六十（重税而稍轻者），如钟表珊瑚象牙玻璃灯及各色轻裘等物是也。能自造类宜值百抽十（平税）如糖食火柴绸缎纸张瓷器等物是也。不能自造类宜值百抽四（极轻税），如风雨表显微镜德律风化学电学之仪器农家矿家之用器等物是也。依此税法，庶几无弊。自我一国言之，颇近于私，而合大地各国计之，则仍为公理。何也，盖天时地质，不能钟美于一邦，此有所长，彼有所短；彼有所碍，此有所利，补偏救弊，赖此税法而后得其平。^③

以上种种要求修改税则之言论，出发点起于漏卮之严重，中外关税之不能持平。然重要归宿，所有人追求之最后宗旨，实在于中国之关税自主。打破“协定关税”枷锁，是当时挽回利权之必然途径，并在外交上亦为争取中国自主权一致之呼声。

修改税则，原为单纯商务问题，一独立自主之国之当然主政。惟在当时之中国，早已因为昧于外交，而使此单纯权益，变为中外共问共管之外交问题。凡欲更改税章，随时无不牵连到商约修改问题，是此商战之奋斗，自然并转入于外交上不平等条约之奋斗。修改商约是一急切问题，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尤为更重大更广泛之外交问题。在此不便牵涉更广，惟在商约范围，略见其关系条约问题之讨论，光绪五年（1879）马建忠已就和约与商约二者基本性质不同，说明商约之修订，论情与势与理，均无不可修改。是就外交范围，亦必当修改商约，另议公平税则：

夫和约之与商约有异，在我不背和约，决无开衅之端。而所定商约，则固有以十年或十二年为期，如欲修约先行知会之专条。今于每国修约期前，先为知照，以一年为限。届时会议，坚持应加数条之税，彼习见中国办事有前茅而无后劲，不能坚忍，势必极力争辩。如或限满，税则犹悬而未定。不妨仿照西国，展限一年。若彼仍然抵难，则豫告之日：俟所展限满，犹未定议，所来商货，当照通共税则纳税。而通共税则，先为酌定给阅，较拟加之税更重，迫之使不得不从。是亦寓刚于柔之术也。夫不许通商，或可藉以启衅，欲行增税，断难因之兴戎。不然欧洲瑞士比利时，蕞尔弹丸，介于大国之间，将无税之可加，而国非其国矣。然犹可自立而度支不窘者，弱于势，犹强于理。中国据理以争，何畏不情之请。美国税则最重，未闻有以加税与他国决裂者，此理光明正大，质之万国，无可置喙。盖通商足见邦交之谊，加税乃我固有之权。不得谓税章之利洋商而害华商者历有年所，中国习惯自然，势难变易。正当谓税章之损华商而益洋商者历有年所，外人从旁窃笑，急须更张。今宜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使运洋货纳洋货之税，运土货纳土货之税。且许其运土货与华商同一纳税，不过征以他捐，稍示中外商民之异。华商为我国之民，故轻其税赋。洋商夺我国之利，故重其科征。固与各国征商办法情理势三者皆同，彼又岂能以己所习行者为不合，而藉词以启衅端耶？⁶⁹

郑观应亦就外交立场，条约性质，申言商约之随时可以改废：

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修改，以图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饷则例，本由各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

而擅断之。宜明告各国曰：某约不便吾民，某税不合吾例，约期满时，应即停止重议。其不专为通商者，则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两国比较，同者彼此通行，异者各行其是，无庸越俎代谋。其介在异同之间者，则参稽互考，折衷至当，勒为通商条例，会立盟约，世世恪守。^⑤

以上即就外交条约立论，商务乃其中一项，其他若法权，若租界种种问题，均甚复杂，非本文所欲探讨，故皆从略。

至于广泛之条约项目，其包罗甚广而与商业有极大关系者，则尚有最惠国条款，在当时人醒觉后而加以强烈批评者。单就商务一端为范围，最惠国条款之影响亦至为深远。近代外交规制，最惠国条款通行于文明列邦之间，甚为平常。惟对中国则构成极为不平之侵害。此一恶例，创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虎门条约。所谓“利益均沾”，为后世列强辗转援引予取予求之方便口实。中国原来基于善意、传统习惯与信念，对外商利，取自由开放政策，来者一视同仁，此“利益均沾”一念之所由生。然既列人约文，列强视为既得权利，凡有特权，无不要求均享，终至举国受害。亦并成为 1843~1942 年，百年间丧权辱国之外交条文。就商利范围，光绪四年（1878）李璠批评其所为害：

今中外税则已定，不能骤变，条约又有“各国均沾”等语。于是日用之需，及奇技淫巧之物，纷至沓来。下则工费吃其亏，上则税厘受其害。今日求开口岸，明日求免厘金，一国既去，一国又来，循环无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有不任其扰者矣。此中国通商受害之实情也。^⑥

郑观应亦论及其不能平等：

各国初订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⑤

钱恂亦就洋商获特优之惠，而批评“利益均沾”：

西人经国，首重通商。然各以口岸相酬答，未有许他人入内地贸易者。中国通商之始，曲意抚循，未加阻止。年来悔前计之失，于日本立约，始申禁入内地之令（通商章程第十四条）。盖必先去利益均沾之语，而后余事得以挽回，修约得此，良非易易（日本于沿海贸易概归自主，戊寅日美约第五条，则内地可知）。中国于泰西各国既已许之于前，岂能绝之于后。原夫半税之设，萌芽于壬寅（道光二十二年江宁约），成议于戊午（咸丰八年天津约），创行于辛酉（咸丰十一年通商章程），增定于丙子（先绪二年烟台会议条款）。运洋货而入有税单，运土货而出有报单，二者征半税，免厘金，税既视厘为轻，又无叠征之烦，无候验之苦，所以优洋商者至矣。^⑥

虽然中国给予列强“利益均沾”之最惠国待遇，却只是片面奉送，而中国任何民人亦无法在列强各国享受一毫之对等利益，尤使知识分子十分不平，深恶而痛绝。郑观应出而争此不平之气，有云：

我中国海禁大开，讲信修睦，使命往来，历有年所。又开同文馆，习西学，译公法，博考而切究之。如此详且备矣。然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

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又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在外国则身税重征。今英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久住者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⑥

汤震亦指斥列强虽享最惠国待遇，而其对中国商人则并不以对等之礼相待：

中国之所以被各国要挟者，病在约中利益均沾一语。遂至连鸡彘狗，牵率偕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今议因所梗而通之。中国之利益，各国共占之，久占之，而独不令中国共占之乎。而反不令中国自占之乎。光绪六年十月，招商局和众轮船运货至美，海关税我百之十，其国虽旋饬商部查核偿还，卒不果。其商人尤群訾之，致我折阅无算。值百抽五，来而不往。礼乎非礼乎。夫西人之不愿中国运货至彼者，亦预虑喧宾夺主耳。前者英使威妥吗（Thomas Francis Wade）以我拟抽收洋货厘税，至纠集十余国公使，麀聚都门，肆意要挟。彼方喋喋请减，我反贸贸议加，几疑与狐谋皮矣。^⑦

事实上，在光绪五年（1879）曾纪泽、薛福成曾不约而同的就外交条约与国际关系立场，分别加以批斥，并主张尽早修约，取消此类“利益均沾”条款。^⑧

列强另一种因外交而获得之在华特权，为沿海及内河自由航行停泊之权利。若在各列强本国，决不允许他国船舰有此自由。虽然各国在中国得此特权，亦不允许中国在任何列强本国有同样

特权。各国在华，据此特权，遂竟尽夺江海航运之功，中国商船反而必需费尽心力在本国土上与洋船竞争。在野绅商，尤其痛心疾首。自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成立以来，立即在中国沿海与英美船商展开激烈竞争。光绪二年（1876）陈兰彬申述其竞争情况：

夫中国之财富，固外人所觊觎，而中国之民情，实外人所畏忌。惟外国官与商合，商力厚而易强。中国商与官分，商力单而易弱。今招商局为官与商合之发端，亦为隐制洋人之根本。万一中止，洋人将乘锋而起，将来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国制造船炮，彼人毫无猜忌，且愿悉心指授，冀我成功；惟招商局之设，则群怀隐忧。洋船在中国者，以美国旗昌行资本为最大，现因招商局既设，亏折大甚，欲减价出售，该局甫立三年，洋商之至强者亦敛手退让，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而时之不可失者也。^②

沈葆楨亦于同年申述其竞争之意义：

查各口通商以来，轮船之利，为外国所独擅，华人无敢过问者。间或赁一二船以尝试焉，辄为所排挤，不胜其亏累而止。上海洋行轮船最著者，美国曰旗昌，英国曰太古。旗昌捷足先得，几以长江为专家之利，太古继起，互相倾轧，装货搭客，随时跌价，虽亏本有所不计。揣其意，非并吞不已。迨同治十一年，直隶督臣李鸿章奏明设立招商局，初议仅止承运江洲粮米，逐渐推广，通行各海口，于外国洋行轮船外，别树一帜，于是太古、旗昌两洋行，又合力以倾我招商局，各项水脚减半，甚且减三分之二，该洋行意在陷人，不遑自顾。陈兰彬折内所称“三年来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

一千三百万余两”，非虚语也。^②

然在本土竞争，原非治本之道。解铃系铃，关键实在国家主权问题。中国丧失此项主权，自须谋求收回，故自然而有郑观应之呼吁收回利权：

查泰西国例，通商之船，只准迳到一埠，其余沿海沿江各埠，乃本国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夺。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甚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日本昔年拟改国内各海口运货章程，凡有洋货已抵本境，均由本国商船运载分售，广开利源，免致喧宾夺主。西人以日本船数不敷，改制太速，且日境水道属海洋，非若中国之扬子江、美国之米西细比、巴西之亚马孙江，贯注国中，绵长数千里，本国得以独擅其利也。今日本已如愿以偿，收回利权，已无洋船转口于境内各埠，我朝廷亦宜设法保护商民，振兴商务，并换去关口洋人，庶无偏护。^③

钱恂之倡议保我利权：

公法于江河之归一国专辖，不与邻国分辖者，其轮帆之利，本国擅之，非他国所能分。则我国沿江海运载货物等事，亦可改归自主，以保我利权。此与西国通例未尝不合者也。^④

王韬则申言中国自行主权：

此外则内地之利，亦惟我中土所独擅而已。西国不得以此为藉口，不能断然与我争也。试观泰西之利，别国进口之船，惟得至通商口岸而已。而已国之船，则无处不可到

也。此例何以能行于泰西，而不能行于中土耶？亦惟在中国自行其权而已。^⑧

惟自 1842 年中英签订江宁条约，开放五口通商。而 1872 年即已创立轮船招商局，以为收回航权之实际行动。中国对航权损失之反应，似并不迟钝。又何以他项工商业其反应不及轮船之速。在此均须略加澄清。

首要原始动力，五口开放通商以来，上海商利迅速发展，自广东以至长江之海道运输，首见重要，抑且发生重大改观。即外洋贸易船只，迳直放五口，而自广东北上货物，亦迳改由洋船运载。如此一来，向日占有沿海航运势力之沙船航商，蒙受严重打击，歇业倒闭。水手失业尤重。自 1843 年五口相继开关，以至 1853 年，短短 10 年间，已形成严重压力。沿海数十万水手，流亡于各口岸，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当知 1853 年何以在厦门、在上海分别发生小刀会之暴乱，尤其是上海，居然杀官劫库，揭旗建号。须知凡此等起事分子，多为闽粤水手，码头工人。领导分子，亦多行海肩客，失业无聊，亡命冒险。中国政治社会之安定，受到严重破坏。尤其上海之役，前后二年之间，不但使清政府大费兵力，而且亦使英法两国卷入其中，推波助澜，影响到外人租界之扩张，租界内外人武力之扩张，以至中国海关行政权亦因而丧失。皆此小刀会一役复杂发展之后果。向之学者，或谓小刀会众秘密会社，喜与政府作对，故而乘机暴乱，闻者以为至论。然竟不知沿海航运之衰竭，航权之丧失，外洋轮船之倾挤，实造成此等历史发展之原始动因。小刀会秘密会长年存在，其分子各有自身营业，何以必在此时暴动，学者尚须细心考察，始明渊源线索。往之学者徒论秘密会社之暴乱造反，而竟向无一人探究其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下，对工商业特别是各口岸运输贸易之重大安定力量。是平时维系工商业一项重要之社会组织。在此

题外略言数句，以盼后之史家留意及之。兹叙至此，以知沿海航运为百业中首先承受冲击，而且最为严重。事实上，轮船招商局之成立，实已为航权醒觉之结果。而早在同治三年至七年间，江南地方之航运先驱，容闳、许道身、吴南泉等人，实均已采取行动，购买轮船，与洋人竞争航利了。

中国与近代西方列强交际通商，由于不谙西方规制，不明外交惯例。在无知中受到西方外交家之欺骗愚弄，使中国丧失权力，承受无理之侵夺，百年间，生命财产之损失，无从量计。此诚谋国者缺乏世界知识，而至因应不善。惟其尤不善，并自表现其愚昧之甚者，莫过于海关行政权亦并落人列强外交陷阱，百年间不能摆脱。十足显示主国政者之闾茸误国。关权为国家主政，中国历代无让人代庖之例。而一国征税，与外交问题毫无牵连。至浅之理解，亦不可由外人代操政柄。凡一政府之组织，税赋实居要政，既谋国政，岂能省却。然自 1853 年小刀会破坏上海海关之后，海关行政权遂渐由英人操持，而后各关渐增其他各国之人，以英国最占优势，法国亦占相当优势。英人赫德（Robert Hat）为海关总税务司，各口海关正副税务司全由外人担任，甚至各口之头等以至四等之正副帮办亦全用外人，甚至勘验商品之扦子手亦全用外人。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在各方呼号压力之下，始有数名中国人被提升为税务司与副税务司。而最可耻可痛者，乃在满清政府自委之各口海关道，不但无权过问洋税务司之任何行政而坐拥虚位，抑且成为洋人嘲骂取笑之对象。^⑦中国知识分子醒觉之后，无不极力倡议，要求收回海关行政权。吴广霈详申外人之越俎，中国政府之丧权，与华商受害之深，建议收回自主：

迳县吴剑华（吴广霈，字瀚涛）续罪言，其税务司一条云：按海关之制，既有老关以收商课，又有新关以收洋税。税课总归海关，而洋税则另用外人掌之，名曰税务司。积各

海关之税务司而辖之以一总税务司，亦用外人，滥觞已久，无有悟其非者。吁！何其悖也。夫创始之时，实以洋人货价非华人所谙，故不得不藉外人之力以助其成。今日大非然矣，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司，可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自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伊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齟齬。而所用洋人扞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视华商，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价。于是华商怏怏而控之关道，关道皇皇而问之税司，税司茫茫而委之扞手，率从初议，使纳重税。关道瞠视之无如何也。于是转贿囑洋商为护符，而华商之货皆洋商之货矣。华商既贿托洋商，则货本较重，不增价则本亏，价增而华商之货日滞，洋商之货畅销矣。且广东各口，往来港澳等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俟税关人役下舱查验，如系西人船主，则无庸候验。何薄于土人，而厚于外人如此，而要皆一税务司阶之厉也。方今天下洋务日兴，不乏深明税则畅晓条规之人，苟使任关道者留心人才，时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员而荐举之，以为税务司之副，责其学习数年，有效则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然税务司乃总税务司所辖也，不先去其总，则必多方挠阻，而关道终无事权，各税务司必存私心，此议卒不能行。彼日本小国耳，昔海关榷税亦用外人，今则悉举而代之以本国官矣。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奸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⑧

郑观应亦以洋人垄断海关行政，袒庇西商，政权商利均失，力言收回关权大政：

当日海禁初开，华人不谙商务，一切船只之进出，货物之稽征，皆委洋人经理。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权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扞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启，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或谓华人诚实者少，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窦，不知税则既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观瞻所系，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虽有奸胥，安能舞弊，应请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权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尤大也。^⑨

麦孟华论之，痛心疾首：

传曰：狡焉思启，何国蔑有。又曰：戎德无厌。夫举税入七千万之关税，而握之于敌人之手，已为可危。况于托抽税之名，而勘验我，查核我，设储栈以节制我，出执据以操纵我，养扞手以鱼肉我，索经费以剥耗我，举一切仿造洋式参用西法之工艺，皆归其统辖，以束缚我。亦何异富厚之家，雇仆役以司出入，而为之仆者，必参主其家政；他日噬脐，其何及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天下固未有不保民而可以立国者。信强敌之誓言，斲邦本之元气，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勿曰无害，其祸方大，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⑩

郑观应晚年致伍廷芳书，就当时海关本身各方面实情，指出其恶

劣弊端，俱显见洋税务司欺侮中国之甚！

查海关税司，不论何国人皆可充当。惟中国人则资格虽深有此才调者，亦不准任。此不平者一。前税务大臣唐君少川（唐绍仪），所设税务学堂，为教育海关人才，将来充任此职。不料总税务司多方压制。查税务学堂第一次毕业生，入海关学习，月薪六十两，今减给五十两，须学习四年，方准加薪。而未入税务学堂读书者，考入海关学习，月薪三十两，年一加十两，到第四年亦有五十两，与税务学堂学生无以异。如日后论资格，则未入税务学堂读书者更胜一筹。显见总税务司之欲推倒税务学堂，不顾吾国有此等人材矣。此不平者二。海关出入口货，每日每月均有洋文报单，分送各领事，惟华人则须第二年方得阅。此不平者三。凡进出口西洋货，如税务司与验货者系欧洲人，多不验看，准即放行。若东洋货，该税务司及验货者系东洋人亦然。至于土货，则大不然矣。必倾箱倒篋，诸多留难，此不平者四。且印度锡兰茶末，运至汉口，与中国茶末搀合，改装出口，亦照原货报关出口免税，此不平者五。洋人在海关当差，可衣黑絨，中国人则须衣黄絨，视如兵役巡捕。此不平者六。洋人在海关言论自由，中国人则否，如有言论登报，须经税务司阅过。窃思我国竟受我之用人掣肘，与治外法权所失相若，不平之极，为士商所共愤，不过敢怒而不敢言耳。^⑧

除海关行政之外，何启、胡礼垣并亦指斥列强迫中国海关担保债务之恶虐：

不知国之有海关，犹家之有管钥，店之有帐柜也。几曾见居家开店，而有以管钥帐柜给人作按者。以管钥帐柜给

人，是自不有其家，不要其店也。以海关税饷作按，是自不有其国，不要其民也。且以大势而论，中国欲决行至计，大展经纶，将来所费之财，非数万万不得定尔功而收厥效，今乃千万之款，而担保者海关，百万之款，而担保者亦海关，而还期辄俟至数十年之后乃可清偿。吾恐旧债未完，新债复作，海关入息之数，不足以敌国债利息之数。势必授外人以国政之权，而取偿旧欠。准外人以媵民之法，而再借新财。则是数十年后，外人无取中国之名，而有得中国之实。外人无治中国之苦，而能收中国之财。是中国之君，将欲求为守府之君，而有所不得。中国之国，将欲求为自主之国，而有所不能也。越南之祸，金边之变，事之已然，迹之灼著者也。不谓中国竟若踵其后而步其尘也。是知借贷一道，成败利钝之所由分也。存亡得丧之所由判也。能行之于民，则其国兴且强，不能行之于民，则其国弱且废。^⑧

然则近代中国内政之关樞，落入列强外交陷阱，行政人事，中国丝毫不得自主。而列强政府，公使领事，反斤斤争较其国人在中国海关之职位人数，视为既得权利，理直气壮，随时随事，出面干涉。直视中国为殖民之外府。此帝国主义者之蛮强本色，中国人何至不觉其可恨可恶？凡具天良人心，而非麻木无灵，何至不奔走呼号唤醒国人，以作挽回利权之努力？

就历史发展趋势观察，中国近代既不免与西方列强接触，既不免承受西方工商扩张强力之冲击，既不免有因无知而应付不善以至丧权辱国，在此种恶劣环境之下，若无清醒之先知，若无痛觉之时会，此一民族岂不完全与猪狗无异，甘心任他人宰割？盖因外来冲击，而必产生某种性质之反应，乃必然而有，为历史发展所不可免者。只是中华民族之反应，与他种民族实并不同而已。

四 商战之对内表达——振兴实业

“商战”观念因外力冲击而产生，其主要之适应方向，大致表现在利权之损失与挽回，外力之侵夺与抵制。就整个意义而言，显然是全部对外之反应。这虽然并无疑义，但在对外之致力而言，对外之准备而言，凡此一观念之向外表达，遂亦自然发生副作用，或为次要之功能，而有向内取向，而检讨自身，而整齐内部，而强化本有。然其价值，其意义，亦并须与向外之表达，同时作平行探讨，方可见出“商战”观念之整体意义。

“商战”观念之产生，与其理论之适向，虽然均以对外为主。而在求中国自身之工商业醒觉言，此一观念实亦发生巨大功效。至对一工商发展之国家而言，思想醒觉，尤为全面转变之健全基础。很显然，“商战”观念所反应于对内之需求，即在于渴望中国急起直追，发展工商业，以与西方国家争竞先后。在最初虽然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希望，但亦足随时构成催促工商业发展之原始动力。故而“商战”之对内表达，实并具有正而的重大意义。

有一现象必须首先指出，即大多言论之趋于中国本身工商业之检讨与建议，其立论基础，十有八九是以对外适应，特别是对列强工商业抵抗与竞争作为前提。一则显见对外为先行之主动力，一则反映此时代之思想特色。所以在此特先说明者，盖本论为节省文字，凡有引证诸家议论，自必删略大量有关对外之前提引论或陪衬语，盖非本节所需要，但又不欲使人误解其立论启意之如此单纯，此固必要先为略作说明。

一种对外致力之讨论，反求诸己，往往很自然地亦产生对内之检讨，更进而至于产生要求之压力。清季知识分子亦不例外。若李璠所议：

以商制敌，大要两端：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如是而已。商往贸易，则自行贩运也。^③

若钱恂所议：

西人遇事要求增索市埠，益于彼必损于我，溢于外必耗诸内。不待智者而决也。然而闭关绝市断不能行于今时，则惟有因我固有之利而扩之，规彼窃攘之利而杜之。联官民之心以推究商务。贾山曰：民有余力，则君有余财，其言可深长思耳。^④

若马建忠所议：

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则工役之散不出中国，宝藏之聚无待外求。而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自无不足矣。^⑤

若郑观应所议：

我国通商数十年，出口货少，入口货多，民间日用之物，无不来自外洋。各矿各制造厂所用矿师、工师、机械师、轮船驾驶及海关之税务司，均聘用外人，已数十年，尚无华人可代。非但金钱外溢，权亦外操。亟应步武德日，诱掖后学，并开农工商专门学堂及驾驶学堂，务使人材日出，百艺俱兴，驾驶有人，税由自理，无庸借材异域，庶几漏卮

可塞，富强可望也。^④

凡此言论，皆由对外起意。而必自然回头落于自身之反省、检讨与努力。此即充分显示一观念内外表达之相关性。而且此种向内要求，自然会引发观念之转变，以形成新方向自动自发之努力与进取。由是则一切本身之改革改造与创新行动，均自此获得基本动力，亦自此而产生新的充实。当然这也正表现出“商战”观念向内表达之积极意义。外力冲击强烈严重，国人亦更内省危机，而急切力求振作，此亦自然之趋势，梁启超所形容即足以见之：

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夫事势至于若彼，则我民族其无噍类矣。^⑤

既见外国之富强，又鉴于本国利权之丧失，百业之受困，于是仿行外国致富之术，用以强化本国生产，实亦自然趋势，若王韬在 1868～1870 年间所议：

西人自入中国以来，所有良法美意，足以供我观摩取益者，指不胜屈。今造船制炮次第举行，所惜者行之犹未广耳。顾利之最巨者，则在乎用机器以织呢布，开矿穴以足煤铁。英国贸易大宗，首在织呢，观其贩运至中国一隅者，一岁中消流银数不下三千万。此外佐以铜铁锡铅数百万。于中国女红之利，不无有所坊夺。曷若亦设机房自为制造，俾其利操之自我之为愈乎。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之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其材质本为中国所固有，方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何必借资于异国。近世之所以不敢轻议开矿者，特鉴于前弊，不以为裕

国，而反以为扰民。不知善理财者自必有利而无弊。今一切以西法行之，以责其效。矿利既兴，煤铁之源自裕。然后电线铁路可以自我徐为布置，何必事事恃西人为先导，被其所掣肘。所谓兴大利者此也。^⑧

若 1884 年徐承祖亦提议对策：

查洋人因我国地广人众，货物销路甚广，是以视为利藪，纷至沓来，莫可阻止。鄙意宜飭令各海口税关，查明进口洋货，以何物为大宗，即按照销售最广各货，择其出产相宜各省，责令地方官，劝令商民广积股分，多购机器，延请西洋工匠教授，悉心仿造。总期物色与外洋无甚低昂，则销路自不愁其壅滞。兼之我国出产庶富，物料价廉，制成品物之后，关税既轻，运费又少，其价自较西洋运来者贱多矣。数十年后，各省厂商林立，出产丰足，则外国运来之货，成本既昂，销路自减，彼贩运而来者，不特无利可图，并有亏本之患。泰西人以谋利为先，不得利则来者不来，更无须闭关拒客，而财源可聚矣。^⑨

若郑观应所议：

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之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外洋进口之

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入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且中国地居温带之中，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无如中国优于天工而绌于人力，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人巧夺天，竟成美货。在华人以为洋人购此无用之物，可以得利，而不知洋人成货之后，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④

很显然，诸家虽立论不同，而仍然归趋一致目标，就是预防国家漏卮，其计自须抵抗洋货之倾入，此乃向外之适应。然欲抵抗洋货之倾销，首则必须能用西洋机器改造土货，使之亦如洋货品质，此乃向内之需求。由是“改造土货”之构想，遂成为朝野一致之努力目标，亦并表现商战对内反省之重要观念。兹用张之洞所论，以代表此一理论之大致轮廓：

盖论中外通商以后之时局，中国民生之丰歉，商务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与夫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之多少为断。近数年来，洋货洋药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支。现在洋货洋药之来源无可杜遏，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产土货以救之。此乃王道养民立国之本源，并非西商争利会计之小数。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且土货率皆质粗价廉，非多无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原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堦，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豎、女红之所成，皆可行

远，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⑧

“改造土货”观念，固然为健全自身工商力量之有效而实际之思考。但在当时列强工商冲击之中，其先进之工商业技术，庞大之企业组织，既已先占优势，且又夹带优势之条约特权，外交为其铺路，军事为其后盾。在此非常状况之下，如何使中国工商业有能力与之竞争，则自然产生对内之另一新的需求，此即保护政策之提出。于是而“保商”、“护商”观念即同时应运而生。然另一具有重大意义之关键，亦必须加以说明，即此保商护商思想，实由取法西方列强，模仿共见之事实而得，盖亦西方工商冲击之结果。同治三年（1864）王韬已有所言及：

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⑨

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亦因保护轮船招商局而有所论及：

查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故于本国轮船，莫不一力保护。使其可以坚守，不至为他船侵夺。其维持之法，各有不同，英、法、美三国公司轮船，其国家每年津贴一二百万金，法美则除津贴外，只准他国之船一进一出，不准将此口之货运至别口，以夺本国商利。日斯巴尼亚则于他国轮船照则收税，该国商船照七五折算。近年日本创建三菱公司，亦仿西例，他国轮船只准在通商口岸三处往来，惟三菱轮船任意沿海揽载，计十有三处，即使三处洋商挤跌，尚有十处自家口岸弥补，法至善也。今招商局先后借拨官款一百九十

余万，每年再加拨漕粮装运，似与英法美国家津贴之意相合。至各国条约，均订明洋商由此口运彼口，未便自乱其例。华商减折收税，亦办不到，惟日本办法，尚可比照通融。或谓不通商口岸，既不准洋船贸易，若准华船任意揽载，恐洋商援例渎请，此未认明中国自主之权，故易为摇惑。^④

同一年马建忠亦自法国上书李鸿章，有所陈明：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⑤

由以上资料所示，当可略知，保商护商观念，实因认识西方现时情势而学习得来。然另一因素即外商在华之特权利益，亦并足以启发中国之保商护商思想。若郑观应所论：

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着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缪轶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腴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兴振也，良以此耳。^⑥

孙文上李鸿章书，亦有所论：

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若国家不为体恤，不为保护，则小者无以觅蝇头微利；大者无以展鸿业远图。故泰西之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护卫；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相与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故英之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盖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人之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天生之材为废材，人成之物为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④

汪康年著《商战论》有谓：

缚勇士之手足而使与人斗得乎，桎梏勇将，縶维健卒，而使与人战可乎。今置商人于牵掣拘挛之地，抑郁之乡，欲其能与各国之商争胜，是犹南行而北辕也。夫以中国之商，受中国之法，以理论之，固当尽行折阅，无可牟利矣。顾观华商亦颇有积日月之力，以获贖者。盖华商性能俭约刻苦，无多求利，不敢效西人之奢阔。故拾遗掇剩，稍能步西人之后尘。且又有意外之幸焉，盖法不准情，于是所司有行法外意而潜减货值者。又有因此较严切，两卡争厘，因减厘以招致商贾。又有船户与司役通同，或减名数，或常年包贿若干以漏厘者。又有托官船试船夹带以邀免者。又有挂洋旗托洋人报关以免苛政者。呜呼！使商人失利于彼，而得策于此，

此岂谋国者所忍闻乎？^④

陈炽著《续富国策》有谓：

国之所立者政，政之所举者用，用之所需者财，财之所入者税，税之所出者商。今天下商税六千万金，不能保商，何以立国。以贫商敌富商，以小商敌大商，以愚商敌智商，不败何待，不贫何待。比年各省无一巨商，而小民之生机日以穷蹙者，职是故耳。^⑤

汪大钧亦纯就商贾立场而建言保护：

孔子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吾愿谋国是者，恤小民之身家，培闾阎之气，免苛派，禁抑勒，删款目以杜舞文，节员役以绝中饱，利之所生，鼓舞而振兴之，弊之所丛，改弦而更张之。凡中国平时已有之商业，如盐、茶、丝、布、油、米、烟、酒、典质、汇划之类，与夫行商坐贾，百工群艺，通都大邑，比户皆是。稍事整饬，略加保护，获利之易，如竿见影。每家岁增千金，万家即增千万，三五年后，康阜可期。由此富者固可操奇而计赢，给食于富者，亦得仰事而俯蓄。^⑥

至凡考虑及护商问题，当自然在实际需要上并能思考到设领事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向无境外护商之官，近代列强在华之驻公使设领事，无非为商业利益着想，国家政府如此用心于商务，真非中国官绅所能梦见。此种外来冲击，并因护商观念而启导中国自设海外领事之建议。向之力求南洋设领事若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皆为前驱，其主张最力交涉最勤者，则为薛福成。若

薛氏所论：

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之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例，随时驳阻。所以旅居乐业，商务日旺。即游历之员，工艺之人，亦皆所至如归。而西洋各国领事之在中国，权力尤大。良由立约之初，中国未谙洋情，允令管辖本国寓华商民，与地方官无异。洋人每有人命债讼等案，均由领事官自理，往往掣我地方官之肘。从前中国各口之枝节横生，亦实由于此。然即在他国不理政务之领事，仅以保护商务为名者，各国亦视之甚重。稍有交涉，即筹建设。盖枝叶繁则本根固，耳目广则声息灵。民气乐则国势张，自然之理也。^⑩

陈炽主张设领事馆言之尤沉痛激切：

华人之在外埠者，统归西官管辖，虽设领事，亦苦事权不属，受制于人。然领事以护商为职，不理民词，此西国之通例也。护商之事，不在铢铢而校之，寸寸而度之也。在平日通达外事，联络商情，潜收中国之利权，隐系远人之观听。苟得明通公正之才以久任此职，则上维国体，下顺民心，其补救于深微隐暗之中者，实非一二端所能罄也。且华人之出洋者，其苦累也深矣。其拘囚屈辱也亦甚矣。始也由于匪徒串通洋商，诓诱乡人之愚拙者，名曰猪仔。至澳门左近，拘入洋船，载至南洋各埠，售之于垦地之西人。虑其私逃，羈以铁索。朝牵而出，暮牵而入，少情则加以鞭撻，贱之如奴隶，役之如马牛，狃语猥声，食不果腹。其载运出洋也，数百人闭置一舱，昏闷而死者已三之一，抵埠以后，饥饿疾病鞭笞而死者又三之一，仅苟延残喘者不及一成。其稍

有技能，作工勤奋，能得主人之欢心者，因而积渐致富，不过千百中之一二耳。然挟资而去，既忧异族之羁留，出险而归，复苦同乡之讹索。控诸地方官吏，复从而鱼肉之。当九死一生之际，幸脱虎口而博蝇头，乃转棘地荆天，欲生无路，此可为寒心酸鼻者已。而其所以致此者，则因出口之际，既已不及稽查，抵埠之时，复苦无人管辖，以致进退不得，去住两难，而各埠情形不同，有巨贾殷商自设轮船行棧者，有仅有小康之自食其力者，有全系工役仰食于人者，论者欲设领事，辄以就地筹款为辞，冀括彼私财，以充公用，而兵船不至，威望不孚，华民受亏，毫无挽救。操守不谨，中外所轻，更有各省赈捐，敛财海外，比年常驻新架坡者，至有十三局之多，乞贷卑猥，益为远人所笑。嗟乎，天下事尚可言哉。虽然东南洋数百万华民，固中国之苍生赤子也。西人开埠，必招华民，华民既多，其埠之兴，可立而待。否则荒凉寂寞，太古荆榛，如英美之新旧金山、墨西哥、巴西、秘鲁、古巴各埠，蔓延至西贡、缅甸、印度、锡兰。及西人新辟之非洲，南洋万岛开辟之始，皆广招华民，华民工作勤，食用省，薪俸廉，百产蕃昌，陡成富庶，然后其本国及他国之工人从而嫉妒之，残害之，驱逐之，天下之不平，孰有过于是者。然而逐者自逐，新辟之埠仍不能不招也。^⑩

由设领事制度之实践，则保护商贾观念，自然即成为政府所考虑承担之责任，随后在政府制度上，亦将会有更多改变，亦并逐渐为国家商利开拓新路。

再进一步思考更切于实际之问题，工商竞争能力之强固，实在于工商业本身组织之健全。由于西方列强工商业之冲击，中国固有之工商组织，显见得分散孤立，零星微弱。在应付西方一种新式庞大组织，挟其外交特权以俱来，如此强力倾轧，中国工商

立见败溃破产，一一转为洋商附庸。于是工商家不能不首先思考组织制度之适应，而严密健全之西方公司制度，由是得以引进而一力效法，而公司制度，遂即成为中国工商业近代醒觉后一项急切之需要。讨论公司之言论，仿习公司之行动，遂亦与日增多。若钟天纬所论公司：

尝观西洋军餉，全出于商税。商人经商万里，涉历重洋，牟境外之利，以养其本国之民，故国日富，而兵亦日强。华商则仅鬻贩于本国，楚弓楚得，利害维均。此岂才力聪明有不逮哉，由于华商势分，分则力薄本微，不能经营远略。西人势合，合则本大力厚，而无往不前。所谓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则公司是已。^⑩

又建议云：

为今计，宜查照西洋成法，凡立公司，必经商会派人查考，酌定其程章，务使总办不能独操其权，而悉以各股东公论为断。则凡铁路、电报、开矿、制船诸务，胥可藉众力以成矣。^⑪

若马建忠所论公司：

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有大兴作，大贸易，必纠集散股，厚其资本，设有亏累，则力足持久，不为外商牵掣。^⑫

若薛福成所论公司：

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终古隔阂之涂，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创开苏彝士河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⑧

又云：

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成城，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成城，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由于风气之不开，风气不开，由于朝廷上之精神不注。西洋旧俗，各视此为立国命脉，有鼓舞之权，有推行之本，有整顿之方。明效应之，捷于影响。中国骤行此法，无力者既瞽然试之，当轴辄瞠然置之。风气岂有自开之理，是故风气不变，则公司不举，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⑨

若麦孟华之论公司：

东西洋诸国，其商业之稍大者，无不鸠资招股，从无独力任之者，故不行公司之法，虽荡猗顿陶朱之产，不足以持久而及远；行公司之法，则中人之家亦可兴大工而谋大利。

中国商人日论西人致富之术，而公司良法，曾不仿效，是羡渊鱼，而不思结网也。^⑧

由是中国工商组织，遂因此种倡议而逐渐采行公司制度。中国工商结构之转化，于此亦足以见其痕迹。

公司制度纯为西方产物，自有一套完密体系，经历多年发展，各个关节，严密配合，彼此息息相关。中国因袭其一，自不免必须牵涉其他。今既欲仿行公司制度，于是自然更须接受西方保险制度。盖维持商利安全，实不可缺。国人论及改进商务，有识者自必建议创设保险公司。若至王韬所议：

设保险以广招徕。西商贸易之利，首在航海，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得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有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中国既设轮船招商局，虽至于运粮北上，而客商货物亦赖以转输。其中岂能尽占利涉，则招商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夫运粮不过在春时数月耳，其余专恃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可行之久远。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中馁，今惟赖西人保险，则徒寄人篱下，权自彼操，无以独立门户。且其言曰：必以西人为船主，则保险乃可行。是则将来不无多所挟制，今当轴者业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官商踊跃，入局众多。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保险公司例可二三年间创行。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⑨

若钟天纬所议：

外国经营商务，不外两端，有公司而力量始厚，有保险而意外无虞，而商务乃有恃而无恐。保险之法，非真能保危险也。特遇险而失事，则照数赔偿耳。其法维何，则假如有海船出洋，报明其船货货本值银百万，则保险行不必查其某值此价与否，但即抽其百分之一以为费，而给以保单。万一遭风遇礁，意外失事，即照百万之本，如数偿之。不居功，无吝色也。一岁之中，所保千艘，而船之沉溺，货之漂失者，恒不过千中遇一，除赔偿百万外，尚有九百万悉饱己囊，是保险家不费一钱，徒手而得九百万之赢余也，斯亦可谓天壤间第一贸易矣。在船商重洋涉险，仅费万金，即可高枕无忧，永无折阅之虑，何乐不为。若华商之为海船生理者，每遇风涛，终夜彷徨，虽拥资千万，一夕可以赤贫。由于独力为之，而无保险之法也。自有此法，而洋人放胆经营，无远勿届，而华商则畏风畏礁，偏促一隅，不能牟他国之利，而中外商务，遂天渊之判矣。^⑩

若严复所议：

民所最重者，性命而外，则产业也。以其最重，十八世纪（century）以还，文明之邦，皆有保险之设。此远古至今，保民政术一绝大进步也。水火刀兵，疾病机诈，凡可以致倾覆死亡者，则莫不有险，保者所出至微，而所全至巨。此中相剂之数，计算之事，皆始粗而后精，至十九世纪，其计利折秋毫矣。造舟之术日良，驾驶之技日善，测量图绘，遍于员舆。此水险之所以日销，而保者之所以日有利也。标载至明，周防至密，故火灾之算，百失一二焉。他若微积分术之用，人事奇偶，皆有可推，则保命者亦常握其胜算。^⑪

事实上，自招商局创设之后，就实际之需要，与外国保险公司之排斥，中国亦很快自设保险公司，光绪初年，仁和保险公司之创立，即全迫于此种情势应运而生。并且极见发展与成功。^⑩

西方工商发展，原具健全体系，公司与保险制度，尚只是商务运用之枝叶。其尤为工商生长之命脉源泉，则建立于银行制度之基础。国人既展开工商体制之改造，且以接受西化为手段，此种工商命脉之银行组织，自亦不免一并被提议接受。若郑观应之解析银行之大利：

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而维大局。兹略举其利民利国之大要言之。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国中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须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货，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有此种种便益，是民生国计所交相倚赖者也。况银行获利之丰，更有可得而言者。中国银行钱庄资本不过数万，开拓场面，联络声气，能者可岁获余利二三方

金。银行资本既雄，流通中外，其获利之可知者一也。殷商富户，银行存项，例定一年期者息五厘半。半年期息四厘，三月期者息三厘，时有往来者息二厘。若转放各处，则七厘一分不等。不到期即取回者无息，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外国存款甚多，不过三四厘息，遇有要需，均可互相补救，其获利之可知者三也。银行钞票，通行市面，百数十万，视若现银，不费来源之息，而得无本之利，其获利之可知者四也。提单来自远方，见票一二月利息连汇水统收，其未到期还银者回头息只付一半，其获利之可知者五也。汇票押款，过期一日仍作一月计算，其获利之可知者六也。银行所置之铁门石栈，堆放所押货物，计出栈租火险，其费视他业甚廉，其获利之可知者七也。况银行生意，较别项尤为稳当，只有汇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钱庄借银，必用殷实庄票，限期不过数天，押款必须的实，照市价七折至五折为限，不论何处汇票，先收银而后付票，事事踏实，处处认真，其获利之所知者八也。便于人者如此其多，获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⑭

光绪十九年以前，郑氏并力主仿照西法创设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

应请先设官银行于京师，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拨作银行成本，约得库平银九百万两。其外省分行，仍由藩司督理以专责成。此官银行之法也。设票十万，每股百金，不分官兵，悉听入股，各督抚札飭府县，劝谕富商，集办尤易。此商银行之法也，至于一切条规悉仿西方。^⑮

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即奏请创建中国银行，其制度几全

同于郑观应所议，其基本思考，仍在挽回丧失之利权：

银行昉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欲委重西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咄嗟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师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闽浙沪江汉各海关银号之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及银行之事。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以其独开之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备随时兑现，各省官司向银行借贷，应照西例，由总行禀明户部批准，以何款抵还，方能议订合同。欧洲国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办，印发借券，应收年息，归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嗣后京外拨解之款，可交汇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款，可暂存以取子息。官造银元，尚不能通行尽利者，可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银行用人办

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⑩

同一年陈炽亦提出开设银行之急需：

中国既无银行，又不思急行创立，故上欲筹恤，则人易我难，下欲经商，则人通我塞。譬之一身，他人则百脉贯通，血脉同流，精神焕发，无论登高履险，无难色无戚容。我则手足惰窳，筋络痿痹，血多之处积而成痼疽，血少之方枯而为瘫痪，不和不活，不均不平，如以病夫敌壮夫，岂能与之絮长而较短哉。故中国自问此后而果能不与通商亦已耳，通商而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乘马而无辔，登山而无履，遇飘风急雨而无寸椽片瓦以栖身，则断断乎其不可矣。^⑪

事实上，中国通商银行，即因盛宣怀之奏陈，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正式在上海开办，而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分行，亦陆续创设，实为中国有西式银行之始。^⑫中国既创设银行，而论银行之效益者，尤方兴未艾，其利用乃渐扩渐广也。若严复所论储蓄银行之利益民生：

较近十余年，欧美诸邦皆有积累版克。积累版克（savingsbank）者，其受人寄贿而与之息也。其数极于甚微，其时极于至暂，此所以劝小民之节蓄，而祛滞财之害，至于锱铢者也。往者小民有财，谓其数微，每不甚惜，则费之于不偿之地。自积累版克兴，于是手民乐蓄聚，数稔之后，往往由穷檐而为中产之家，既富方谷，风俗渐美。由是观之，则版克者不徒富国之至术，而教化之行寓之矣。后有君子起而施

其政于中国，功不在后稷下也，岂特转贫弱以为富强也哉。^⑩

他若光绪末年张謇、郑观应并于银行性质功能有所分析。^⑪嗣后口岸商埠，竞设银行，中国金融基础，经济结构，亦并开始改观，而国力之复苏，至此始见曙光。

银行与币制密切关联，币制尤关系商务之简繁，流通之迟速。有清一代币制，可谓最杂乱无章。盖以银为本位而又无银币流通。凡用银锭，虽能化一重量，而散碎银块，反更适用市面，所惟一凭准者，不在钱币本身，而在天平之使用，交易一次，即须衡量一次。即此天平而论，除国定库平之外，各省各区均自有轻重自有标准，名色繁多。单此平色之不同重量与名目者，有清一代，号称不下千种之多。而今日研究近代币制，其有名目、成分、重量可稽者，亦在数十种之多。^⑫真可谓十分紊乱，使交易徒添困难，妨碍商业发展至巨。然此尚只在于中国本身之市场紊乱，问题犹较单纯。五口开关通商起，洋商来华者日众，贸易主动权渐为洋商所夺，初期尚保持银块为主，及一旦对外贸易形成入超，中国则须向外洋输出白银，洋商对此银锭银块，全然不承认其为货币，反而视为一种金属货色，运回其本国。如此一来，外洋货币价值高涨，中国货币毫无估定市价资格，通行百物之间，犹须降格为一种普通货品。则其贬抑与受损之大，可想而知。中国商人承此冲击，损失惨重，叫苦连天。有识之上，自然要起而呼吁，迅速改定币制，以免中国金融枯竭。若郑观应所见：

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行市眇变，又遭明折。^⑬

论及银行，郑氏亦自然提论货币行钞之便利：

中国如设银行，行钞票，亦当先定妥善章程，用顶厚洁白纸为质，以铜板镌刻精细龙文，上列满汉文字，以及皇清宝钞字样。钞既造成，盖用部印，并盖银行钤记，以示信于民。民间以钞易银，可随时随地向银行支取，绝不留难，俾知存钞无异于存银，且携银反不如携钞。盖钞票有一两银一张，有十两银一张，有五十两银一张，有百两银一张者。进出一律。有轻斋之便，无耗折之虑。如妥议钞章，尽杜流弊，奏请朝廷，颁示天下官民通行，合十八省计之，不难销流数千万两，得此巨款，腾挪生息，利莫大焉。^⑩

若宋育仁所论：

今中外并立交驰，外国物产不饶，则广铸金钱，倍值以奔走中国之民，收其地产。既不能遏止，即不得不与争利权。云南既设矿务铸铜钱，广东用机器铸银钱，而无金币。外国上市用金钱，一金钱换银钱二十。以金银较重才十五换。铜钱十二枚或十枚，当银钱一枚，以银较铜轻重，才十换有奇。我益铸铜钱，钱多而银值益昂。土货交易，皆用铜钱，通商交易，始用银钱。银聚于通商码头，不流通于内地，土货之利益微。徒役贫民以便末商之兼并，供洋人之垄断。于是中国钱币出纳之权，归于洋银行数家。悉以洋商在中国贸易之赢，买中国之金，运还欧洲。而中国钱币之轻重，举听命于金磅。适足为彼所役。议罢铸铜钱以铸权量百器，专用黄金白金二品。铸金钱以持其轻重，饼金多而铜钱不加益，久之价当自平。金银价减，则彼入货如常，而出价当增。又有金钱与之等式同重，则彼不得诡价以抑中国之银，而利权归我矣。^⑪

宋氏更就币值转折论及中国民商受害之深：

外国富强，在工辅之以商，而提纲在钱币。钱币无实用，本为通工易事交易有无作据，与质剂无殊。但钱币之数少，一时并兴大工，则周转不及，通商远国，则接济有穷。故必广钱币以资周转，顾银重值低，不利行远，金值昂运转省费，与别国通商，大宗货用金磅交易，则财力厚，足以垄断，而不受制于人。用金以抑银价，则实出金币数少而易入。银币数多，凡贸易皆聚零成堆，物值不及磅金者，必以银钱交易。则用金币者出币少而入货多。今欧洲各国，皆用金钱，彼此相制。惟中国土产饶而无金钱，兼用生银。食物土货，率用铜钱交易。银价既为所抑，土货更不值几何。洋人来中国，持金磅以兑银，化少数为多数，更以银合铜钱，买土货，则本轻而利厚。以土货载还伦敦，或南洋各埠，加制造还鬻于中国，易银数十倍，悉寄于洋银行。银行以一纸汇票合金磅寄还欧洲，而用各商所寄顿之银，买生金运回本国，以资铸币。彼国币愈多财力愈厚，我国金日少，金价日昂，银价日贱。铜钱交易之利益微，是役操本业出土产之良民，以益食洋业逐末利之商。复聚中国之商财，以助洋人之兼并，直举国之民，为洋服役耳。^⑭

若严复所论：

近十余年间，东亚金银贵贱之变，实为亘古所未有，以金为况，则银之降贱，殆倍于十稔以前。而铜之贵，则古二而今三。此其故粗而言之，银矿所出日多，一也。东西诸邦，悉弃银而用金准，二也。中国立于其中，无力改作，遂为天下之下流。国中物价，今昔绝异，此其世变，岂异美洲

新得时耶？^④

中国受币值折价之害，乃无形之侵损，即使双方持平交易，中国已居下风，何况更有他项有形之侵损。且此等损耗利益，其情若何，约值几许，皆无从查考。所有各类统计资料，原均不列计交易过程中之折算率，百余年来之中外贸易，中国究为币值丧失利益多少，实为冥冥中一未知数。只是百余年来，中外贸易史上留一名词，即所谓“镑亏”。惟此各年“镑亏”之值，或可约略据以推算。至“镑亏”一词之实义，即英镑对中国现银，兑换值时时涨价，涨后之差率，须再以银折价补足市价之值。此一名词流通于中国贸易市场，达百年之久，亦正代表中国膏血暗销之实情。

由讨论银行讨论货币，同时必思考到借债问题而联带讨论。以当时中国情势言，借债与银行极易于联想一致，相提并论。尤其观察西方富强之国，若英、法、德、俄，皆有国债，皆非因贫举债。于惊奇之中，并生歆羨之心。于是借债之论，乃公然言宣。若钟天纬之论国债：

查国债之法，创自欧洲，实开千古未有之局。不敢谓永无弊端，而终觉其有大利而无大弊。何则？古来国用不足，无非加派于民，或算缗钱，或榷酒酤，或税间架头会箕敛，无非取济一时。甚或搜括富民，鬻卖官爵极矣。然倘岁比不登，内江外寇，则此苟且不终日之计，亦有时而穷。观胜国末造，加派练饷，民不聊生，至斥宫中器用以抵饷，而哗溃时闻，明社卒屋。此无他，强括民之脂膏，而不予民以应得之利，则小民安肯毁家纾难，以济国用哉。乃观西洋，每有大工大役，必告贷民财，而复予以操券之息，按期应付，晷刻不爽。倘有兵事，不必强民捐输，而百万之饷，咄嗟立办。而从未有延诿抵赖者。若一经爽约，则将来虽有急需，

民皆袖手，而自蹈驪山举烽之覆辙，故不敢也。^⑭

若郑观应之论国债：

昔周赧王欲拒秦师，军资匮乏，称贷于民。厥后兵溃无偿，人民哗噪，乃筑台以避之，至今传为笑柄。故中华以为殷鉴，向无国债之名，有之自泰西各国始。凡兴建大役，军务重情，国用不敷，可向民间告贷，动辄千万。或每年仅取子金，或分数年连本交还。隐寓藏富于民之义。如本国无款可借，则转贷于邻封，习以为常，殊不之异。中国自同治六年间，左伯相以西征需餉，始借洋款。系沪上银行经理，由八厘至一分五厘行息，将各海关洋税拨抵，分年本利清还。该银行分售中外商人，每股计银百磅，岁纳息银八厘。况其借也，以彼国之磅数，折我之两数。其还也，又以我之两数，折彼之磅数。暗中折阅，吃亏甚多。经手者大获厚利，实以军餉紧急，相需甚殷，于无可如何之时，为万不得已之举耳。考英法德美诸大国，借贷行息，多不过五六厘。而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公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为他国所挟持，国势浸形贫弱。我中国舆图之富，矿产之饶，关税之盛，远胜泰西。帑藏多而借贷少，不必出八厘重利，始可借得巨款。闻中国之股分借券，中外人争购之，十不得一，每股九十五磅至九十八磅，涨至一百零四磅，珍重收藏。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⑮

若马建忠之论国债：

债者所以剂盈虚通有无，与市易之道并重。其始民与民借，未有国与民借者也。国债之说，仿于欧西之希腊。周时

波斯来侵，餉匱急不能筹，告称于民。罗马因之。往往募豪富，人相假贷，无所取信，民不乐从。越千有余载，英法奥等国构兵，兵费浩繁，其君能信用其民，民乐输借。故康熙五十五年，诸国借款负至七千五百兆佛朗之多。又七十余载，负至万二千六百四十兆半。又二十余载，负至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兆。然此犹国与民借，未有国与国借，国与他国之民相借者也。乾嘉以后，此风浸炽，计道光二十七年，诸国之负，积至四万三千二百七十六兆。然此犹借债以筹餉，未有借债以制用者也。而咸同之间，欧美诸国铁道机厂电报之属，日新月异，动用浩繁，专事借贷。于是同治九年，诸国之负积至九万七千七百七十四兆。近今十年之际，事变益烦，外洋国债积至二百万兆有奇。其间印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兆，日本香港四十三兆，新金山八百九十四兆，亚非加州九百九十一兆余。皆为欧美各国所欠。夫此各国者，论幅员则不广，论生齿则不繁，而遇有乞借，则借之人不可胜数，借之银不可胜用，沛乎如泉涌，浩乎若江河。是遵何道以致此。曰取信之有本也。告贷之有方也。偿负之有期也。此三者，借债之经，而行权之道，则存乎其人。西人云：取现在之银，偿将来之息，谓之债。恃将来之息，致现在之银，谓之信。故凡乞借于人者，必有所恃，豪商恃其蓄积，素封恃其田庐，国家恃其赋税。^⑩

若严复之论国债：

国债一事，为中国从未所未有。国家当全盛之日，边事如准噶尔，如西藏，皆以司农之财供之而有余。至道咸之间，忧贫乃始，然未尝加半文之赋于民也。粤匪之乱，诸公筹餉，始创厘金，谓为权宜之制。而兵食大舒。又是时，海

禁方开，始于上海，继而有十三口二十余口海关之权。考中国今日之岁入，比嘉道以前盖数倍不啻矣。而忧贫之象，日加乎前。徂于旧说者，辄以通商为绝大漏卮。甚且拟之鬼魅凭人，摄吸膏血。如其言，与往者印度那博之语正同。究之此皆无所知者之滕口。读斯密氏原富之书，而其胸中如是之见，犹洗除不尽者，则无庸发其墨守而箴膏肓矣。同治以前，边衅常起，然所谓赔给兵费者，至数十百万为最多。中国之力，犹足以及。无举洋债而表分偿也。以政事之闕于外情，而疆史绸缪之不固，于是乎有甲午中东之役，朝鲜台湾皆割，而赔款至二百兆有余。而关权为指偿之赋税，幸而边氛不起，海内和乐，三十年间，可以子母皆复，而百姓不必加赋也。本年庚子五月，瞥然有拳会灭洋之事，其人谋之不臧，殆前志所未有。七月乘舆西狩，至十一月而十二款之和议画诺，后此所赔之兵费几何，颇闻分年以复所举之债，须岁三千万者五六十年。（此书成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故云。）如此而益以前负，则中国财力不其殫欤。自西人观之，彼固夷然以为未甚也，盖彼见英伦者天下之富国也。而庚寅辛卯之间，其国债为六百八十四兆镑，以三十七兆八十万之民数计之，每民所负盖一十八镑有奇，至法兰西则尤骇耳目矣。庚寅辛卯间以三十八兆之民，而积一千二百六十五兆镑之国债，以每民计，盖各负三十三镑有奇，其岁出永息，亦三十七兆八十一万镑。然未闻英法二国，遂因此而贫，抑由是而不振也。中国后此之债，要不外一千兆两银已耳，此不过二百六十兆镑，而其民号三百余兆，是不足人一镑之债也。复何忧乎。虽然有辨，是二国之债者，大抵举之以治军，则有拓国攘利之饶，以之兴功，则又有便民通商之益。故国债虽重，国财日休，此犹斥母以来赢息耳。至于中国，则十年之中，丧师者再，其举贷者皆国外之款，其所偿者皆

敌国之费，故债重矣。其息利既不在民，于国财又无所增益，而一切通商惠工之政，若铁道、若矿政，方务剿其发生之机。是中西之负债同，其所以负债者大异，而后此之所以偿逋散息者又殊。西国之债以利，中国之债以害，是又乌可同而论之乎？继自今，设不取财政一切而更张，抑更张矣，而其权皆操于外人，吾诚不知国之何以堪命也。^⑩

众论所趋，无不关联到中国本身借债之性质，而惋惜其丧失利权，损耗国力，十分警惕人心。

光绪二十年以后，因承西方学会之影响，各省各埠，颇热心于组织学会。惟于职业性之商会，因为不同性质，其反应尚不普遍。抑且中国职业性之商帮，本有悠久之传统组织，各业早已自有公所会馆。故更不易迅速联想到另外创设商会。在商业思想之醒觉而言，此为最迟发生。同时在中外贸易行为中参考西方规制，商会组织亦远不及公司、保险、银行、币制之直接而显著，故不易于体验其功能效益。于是商会观念之产生，反而因学会之发展，承其推动而渐次创立商会。光绪二十年后开始萌芽，而光绪三十年（1904）后，则已成为全国商界最普遍之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湘学新报发表《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申明组织商会之意义：

本总会因憬念中国商业之简微，商务之蓄踰，商智之抑塞，商艺之不务兴大务，商权商利之将促蹶渐灭殆尽。而被矫虔攘跋于外人。为此发大砥砺心，冀在合中国全国经商之爱力以为商力，条最中国全国之商财资本以为资本，群中国全国之智度材量以为商智。本总会炯念有为必无惮于开先，而任广必端资于握本。本总会非取弋天下之善美，总会尤不敢笼天下之俦侣，惟共体中国一家之大义，常怀同舟暴颶之

险惧，肩宏毅而推暨于引重致远之涂，和天衷而励赞国家底于国富民殷之域。^⑭

光绪二十七年（1902）张之洞以札文指示湖北汉口创设商会，并申明成立意义：

照得商务实富国之基，泰西以商立国，有商学之考各物制法，各货销路，各国嗜好，各业衰旺。有商会以集思广益，互相联络。故能力厚旺，广设公司。若华商因仍旧业，随人作计，盈亏听其迁流，凭诸运数。既无商学以探制造销行之源，而且志小力薄，各谋生理，甚至彼我相忘，囿于近利小数，又无商会以收同心合力之效。现欲挽回利权，亟应创设商学商会，以资启发。本大臣奉旨督办商务，自以开商智培商力为亟，况汉口东西为长江上下之冲，南北为铁路交会之所，实为中国商务枢纽。是欲讲求商务，尤必先自汉口始。现经会同湖北抚部院筹商，应飭令商务局，劝集商款，于汉口地方，创设商务学堂、商会公所，以立其基。^⑮

职业商会之创立，虽由知识分子在下呼吁，而始终并非出于商人自觉，以主动组织。湖北固由张之洞自上领导推动，江苏方面实靠状元出身之商人张謇所推动。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设立总商会。二十九年政府颁布商会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政府更主动指示各省各埠成立商会。张謇申述各商实况，与心理反应，辨析最为深刻：

中国之商，不能与外商敌者在势散，会以聚之是也。然弊之所从来，久而不可稽矣。凡为商者，非独不知散之害，或且以散为利。利者商之的，百世而上，百世而下，可推而

知之。今欲其聚，而不先立一已聚者，示以相形之利，无聚之望也。此商务之未易遽行者。知散之害，知不散之利，知散之若何而害，知不散之若何而利，在智。智必若何而能明，在学。有学，则有人为之讲公德，讲群理，讲中外商业历史。自然知当聚不当散。中国今日，商无专学，安有商智。此商智之未易遽行者。持散而聚之必用力，力则大商包小商之说也。然必先相信，今责商自持，则非独大商不信小商，小商亦未必尽信大商。若官为商持，则商久不信官。故已聚，则合众人之力以成一力，未聚，则须一人之力以汇众力。今环顾南中丝茶大商，孰具是愿而发是力，小商无论矣，此商力之未易遽行者。^⑩

商会之组织所以由上推动，而非由下要求，其重要因素，诚应归咎于中国商人缺乏远见。商会并非商人所直接需要，往往有形式而无实际行动，功效不能发挥，并应归咎于中国商人之不善利用此种组织。若宋育仁介绍西方商会功能，强化运用之效，中国商人之志虑更远不能及，亦非自来所能梦见。^⑪实亦正为中国永无殖民主义思想，且为中西传统之基本差异。

中国商业思想之醒觉，最后亦并推动政治制度之改革。盖为一国商务发展，政府终须有一定之主持机关，户部之功能不足以适应，当即有双创机构之要求。此类机关之要求与设计，并亦随时流露于发展商务之言论中。其中仍以郑观应为先知之倡议人。创设商部，实即出以郑氏首创：

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总局则令各处行

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务之绅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如有要务，亦准其迳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而后商情自不壅于上闻矣。夫如是则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危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⑧

光绪十三年（1887）张玠亦主张设立商部，职司画分，十分清楚：

诚能分户部之半，设立商部，专司关税厘金之事。而以南北洋大臣，兼充尚书侍郎职衔，颁给敕书，申明职守，务以拓兴中国工商生计为其专责。凡各省海关道各关税务司，皆隶于该部。各工商请领部帖，各洋船请给船照，均归该部职掌。即工商有习成一技一艺，考得新理新法者，皆由该部颁给执照，准其一家专擅若干年，始准他人仿照。各大埔均各设通商公会，凡各业各帮，公所会馆，各举首人，充该公会董事。如有关系工商之事，邀众会议，如有不便于商情者，许其据实上陈，请商部大臣设法保护。务使工商勿被洋人所欺凌，官府所鱼肉，庶可自立耳。^⑨

陈炽并议速改商部，定商律：

泰西各国，皆设商部。另有商律，专主护商。岂好为是纷纷然不惮烦哉。盖国用出于关税，关税出于商人，无商是无税也。无税是无国也。不立专官定专律，则商情终抑，而

商务必不能兴。况中国积习相沿，好持崇本抑末之说。商之冤且不能白，商之气何以得扬。即如控欠一端，地方官以为钱债细故，置之不理已耳。若再三渎控，且将管押而罚其金。前此矿务诸公司，亏闭卷逃，有股诸人，控官之准，而此后招股一事，通国视为畏途。虽苦口婆心，无人肯应者，职是故耳。商律之法良意美，其他不必言，即以控欠不追，无罪受罚二事论之，中国商人之屈抑何如乎。国家厘金洋税盐课三宗，岁入逾六千万。正供常额，大半出于各商。然则商之于国也，国之于商也，固已共戚同休，迥非昔比矣。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护商。不于各城各埠广设商务局，遍立商务学堂，何以激扬鼓励，整齐教诲诸商。假使无商，何以有税，何以济用，假使无用，何以为国。燃眉之急，切肤之灾，殆不得置之膜外矣。^⑩

在实际行动，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向朝廷奏请设立商务衙门，专门主持商务，以与外交画清界限：

国家筹餉之多寡，皆视一国商务之盛衰为断。考之各国，皆有商务衙门，与户部相为表里。而与外部分清界限，故于有约之国向本国议涉商务，外部莫不诿诸商务衙门，即如中国与英国筹议加税，彼谓须询商会，不似中国抵到总理衙门，便无可推宕矣。至如各处出产货物，应如何整顿运销，皆得与各处商会联通消息。凡有中外商人，皆可随时函禀，亦可使服接见，下情莫不上达。现今中国商务，只固自己未能兴起，而外人恣意要求。一入总理衙门，辄归交涉，无可挽回。喧宾夺主，日甚一日。将来商利商权，尽归洋人，恐军餉更无可筹。拟请先在各省各商埠，选举华商绅董，仿照西人商会之意，设立华商公所，以求利病之所在。

西人所到之处，虽仅数十人，亦有公会，不似中国商务局，派一候补官员，与商民全属隔阂，而有其名无其实也。¹⁸

而创设商部之酝酿，终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实现，以贝子载振为首任商部尚书。以徐世昌、唐文治分为左右侍郎。由是商务思想之醒觉，终于达到了国家政制之改革。商部之建置，为中国史上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制，当然充分显示重商意义，亦足以见出对内要求与自身整顿之成果。1903年，适可代表中国商业发展一个重要起点，实足代表醒觉之成熟，与自救行动之开始。

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之另一关键，必须在此申述。即商战之对内表达，充分表现近代思想动因之连锁互摄现象。由于对外表达之挽回利权，乃立即反射回向，而产生对内之要求充实与整顿。既有对内之急切要求，动力内趋，启念为内求本身之健全。则此种充实之种种条件，又须转向外求，无论公司、保险、银行、币制、国债、商会，以至商部、商律，无一非求自西方固有成规，为中国取而仿效。此实一变而为向外吸取之动向。既已向外吸取，然模仿得来，不惟在使向内获自身之充实，正确而言，则其动向必向内驱使固有观念、制度、组织、行动一律有所改变。归趋于最后终局，固使工商结构全面改革，亦并使工商结构全面西化。换言之，工商全面西化，与西方采取一致之制度、组织与行动，其宗旨又实为强化向外争竞之能力。其间连锁因应，动因向内向外之转换，俱可清晰考察。再事细绎其另一综合意义，则为我辈研究思想史者所当省察。此实反映思潮激荡之轨迹，所谓时移事异，史实重心转换之根本线索。学者从事研究，当以致力于此为首务。

五 重商思想的形成

中国传统以农立国，知识分子向少纯然言利言商。但凡为政治实践，关心国脉民命，历代政治家又往往必以利民便民为职志，虽口不言利，而其作为又不能不为利打算。惟言关商人商务，则多取放任态度，从来少有鼓励营商之政令。故传统轻商习惯，于中国政教社会风气，实有深厚之累积。在此历久形成坚固风习之下，其为商为利，言商言利，则多与他类事项混并而论，如言权沽言墟市，皆指商利情势。对外贸易，亦随他种制度而依存。如随封贡随马政，皆必联带大量之边界贸易进行。凡此皆中国史上重大问题，在此不便妄论雌黄。

重农抑商，为汉代已有之政令，世人无不熟知。历代轻商习惯，浸成风气，演为传统，亦决无可否认。积此二千余年之固习，欲其真正有所转变，则惟有最严重之冲击，足以使人显见其受害之深并危及生存者，自不能不力拯危亡，而转思对策。由是而重商观念之契机，始能发生，始能逐渐酝酿，以促使普遍醒觉。而后再由醒觉者之辗转呼吁，抒为言论体系，以更成就一代思潮，遂亦反映国人醒觉之心声。然先知先觉者，更早在数百年前，已透露些微言论，虽为可贵之创见，实不能激起众人之共鸣，若流星之穿越夜空，倏忽一现，复归岑寂。明末大儒黄宗羲曾略抒所见，以矫抑商观念之非，有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所途者，盖皆本也。”^⑧实当视为重商观念之前驱。

历代传统习惯，由抑商轻商观念遂并讳言牟利，自不免因噎废食。近代承西方工商之冲击，无论谋国谋生，无往而不从事思考利害，且尤不能不避害而趋利。此近世环境已成之情势，除非甘为奴役，甘为他人鱼肉，有识之士岂至无所知觉。今世言利

者，固亦时代之先知，乃所谓圣之时者也。黄遵宪就当世各国之兴盛败亡，提出警惕：

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以聚敛为戒者也。虽然，鹿台之财，武王因之。琼林之库，唐祖因之。失国者以聚敛，得国者即以其聚敛散之于民。而四海犹不至于困穷。事变之极，逮夫今日。乃有祸患百倍于聚敛，至于民穷财尽，虽有圣贤，实莫如何者。是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料，所不及言者也。是何也？曰：金钱流出海外也。鞞近之世，弱肉强食。彼以力服人，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财，以供我用。如狐媚蛊人，日吸其精血，如短域射影，日中其荼毒。以有尽之财，填无穷之欲，日朘月削，祸深于割地，数倍于输币，百倍于聚敛，又不待言也。既经明效大验者，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欧洲大国，皆知其然。必皇皇然合君臣上下，聚族而谋之。欲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则日讨国人以训农以惠工，于是有生财之道。欲我国所需，悉出于我国，不必需者，禁之绝之。必需者，移种以植之，效法以制之。于是乎有抵御之术，欲他国之产，勿入于我国，则重征进口货税，使物价翔贵，人无所利。于是乎有保护之法，凡所以殚精竭虑析及秋毫者，诚见夫漏卮不塞，十数年后，元气剥削，必将胥一国而为人奴矣。^⑭

郑观应建议由政府主动争利：

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览之利，思何以分之。扼此三端，则利权可复矣。^⑮

郑氏后日，更申明论财之义，关乎国运之大：

实业者，财之母也，财者国中凡百庶务所藉以振兴也。无实业，则无财，无财则国日即于贫弱，贫弱之国家，断不能存在于二十世纪竞存之世界。波兰、波斯、五印度其前车之鉴也。^⑩

陈炽倡言利，以为义之所藉，即圣人之所宗：

夫天下滔滔，大抵皆中人耳。惟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圣人立身行义，舍生取义，而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且日亟亟焉，谋所以利之者，圣人之仁也，即圣人之义也。盖为天下之中人计也。公其利于天下，溥其利于万民，即以食其利于国家，享其利于百世。故天下之工于言利者，莫圣人若也。因益恶夫后世之贤人君子，不以中人望天下，而以上智责天下。使天下之人，既不能为上智，又不敢为中人。乃曰：皇皇焉趋利避害，狗苟蝇营，举世政敝俗偷，甘溺于下流之归而不自恤也。噫！世无圣人，斯言难信，愿仰而质诸好生无上至诚不息之天心。^⑪

陈氏并论生财求财之道，正乃古今圣贤体天心而立民命之最高宗旨：

若生财之道，则必土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农也、矿也、工也、商也，为华民广一分生计，即为薄海塞一分漏卮；为闾阎开一分利源，即为国家多一分赋税；为中国增一分物业，即为外国减一分利权。此伊古圣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大道也。天生民而立之君，百姓足君

孰与不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养民之道，富国之源，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矣。^⑩

汤道亦以理财为圣王养贤聚民之资：

治今日之天下，而谓不急于理财者，此妄人也。夫财者，天之所生，地之所产，民之所以养也。匹夫无财，则不能有其家；天子无财，则不能有其天下。故财者，圣王所以养贤聚民畜众而致天下于义安者也。^⑪

麦孟华论生财之道，已取西方原理以为解说：

吾闻西人生利之要矣，曰地利，曰人工，曰资本。地利不辟则不尽，人工不习则不精，资本不集则不厚。合此三者，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任也，夫以一二人而举一事，与合千百人而举一事，难易之数，昔者知之矣。合资本以聚人工，聚人工以兴地利，民力能举，民权能逮，人无遗力，地无余利，所谓生财者此也。^⑫

中国近世醒觉，承西方工商影响，公然言利言财，视为兴国安民致圣贤之大道，其与传统抑商观念比较，自有重大转变。且牟利生财观念，实为重商思想所不可缺少之重要元素。

国人既不讳言牟利与求财，更进一步，又能倡言经商。在商言商，原不足奇，实即在官在绅亦多不惮言商。何以会有如此现象，自亦由于时势所需要，环境所迫促，有识之士不能缄默不言。刘铭传本以盐商私枭起而从军，亦可视为经商出身。故其能大胆建言，视经商为富国首务：

言者又谓，外洋以商务为国本，自强在经商；中国以民生为国本，自强在爱民。不知商即民也，商务即民业也，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臣更有请者，恒心必根于恒产，足食方可以足兵。中国生齿日繁，有田可耕者无几，谋生乏术，缓急堪虞。故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⑭

薛福成论商之意义功能，谓虽圣人必起而善加用之：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因思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齐太公劝女红，管子正盐筴，而诸侯敛袂朝齐。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圣贤，有用之者矣。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⑮

郑观应亦申论商之意义：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子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⑯

至重商之道若何？郑氏亦有所建白：

或曰商之宜重固如是矣，其重商之道果何如哉。曰：非国家重视焉不可也。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何则？古之转运维艰，一方不稔，则有告籴之劳，比岁不登，则有大饥之患。至于今，则轮舟火车飞輓无难，电报邮传捷如影响。商务所趋，给民之食者十之一，给民之用者十之九也。迩来谋国诸公，知金钱流出之为患，亦亟思所以补救之法，而无如归咎于国之未富，或归咎于兵之未精，或归咎于条约之不公，徒慨于税权之不能揽。是以议练兵，议购械，议开矿，议筹餉，议办理交涉，作育人才。勤勤恳恳，无一非力求抵御之方。而无如皆困其大而未察其微，言乎远而未及乎迹也。观西人之商于中国也，立公司、立商会、设博物会，皆商民之自为筹画，而所以保护之者，不过因商之所利而利之，所欲与聚，所恶勿施，言则听，计则从而已。非必事事赖国家为之经理逸制也。^⑭

若孙文所建言：

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⑮

若陈炽所建言：

夫中国旧制，崇本抑末，重农而轻商。今日厘税两宗，数与地丁相符。京协各餉，挹注所资。假使无商，何能有税。民力竭矣，国计随之。必执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之词，苦相诘难，恐膏脂有限，悉入外洋。他日之患寡患贫，有出于寻常意料之外者。无财不可以为悦，徒法不能以自行，富国强兵非商曷倚？^⑯

若徐勤所建言：

农以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故商者，农工之枢纽，而操天下相通之权者也。^⑭

阎志廉以戊戌之变法改制，为重商之实践：

中国重本抑末，故商有富实，亦有贱名。外洋赋出于商，兵出于商，故议院之中，以富为上。夫外洋重商，而中国贱商，则其理不足以相抵矣。今奉明诏，令裁撤大小官员，胥于矿务局、铁路局、农工商局安置，是亦重商矣。可令各局于接待商人之处，优以礼貌。则向来官商隔绝之习，可以渐除。又京师冠盖之场，九州人物所萃，官商往来，与有桑梓之谊者，尤易深信。如今各省商民公举一官绅为董事，则情谊相通，而商务之振作将赖乎此也。^⑮

汪幼安言重商，竟亦驳论儒家重本抑末之说：

往者儒家警言重本抑末，乃以本专归之农，而末视一切。流极则田卒污莱，农亦不治。力耕不足粮饷，纺绩不足衣服，而国乃大困。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才匱少，而山泽不辟矣。四者民衣食之原。小则富家，大则富国。是故鱼盐臕行也，而钓叟始张营丘，轻重小术也，而桎囚再霸小白。计然积著，而越以沼吴，李悝尽地，而魏以抗秦。其在匹夫匹妇之业，则猗顿用盐豎起，乌保以畜牧名，寡妇清以丹穴显，蜀卓氏以冶铸富。近则凿空贱工，而华侨以雄南洋，卖浆细业，而来其以歆巴黎。此非空言也。海通以来，中华当从事

实业，以与世界为工商之逐鹿。^⑭

严复言重商，并论本末一体，不可偏轻一方：

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为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或谓区二者为本末，乃中土之私论，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虽然，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然二者之事，理实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尝误也。特后人于本末有轩轻之思，必贵本而贱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后成体，而于生均不可废。夫啖蔗者取根，煮笋者择梢，本固有时而粗，末亦有时而美，安见本之皆贵乎，必本之贵者，不达于理者之言也。^⑮

此即纯就商务立场，而论重商意义，实为最基本之理论认识。重商思想之形成，于此显示其全面发展之趋势。

至于中外通商问题，亦并产生理论性之讨论或诠释，即对外国通商之理论分析，亦属此种重商观念之一部分，并为重要认识基础。早在 1860 年代，冯桂芬已提出其见解：

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⑯

夏燮亦言通商为中外共有之利：

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儉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善夫范蔚宗

之言曰：“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情之常，何足为怪。一自贪吏侵渔，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之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倭，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⑭

李璠论及当日洋务，实皆以通商为内容，盖洋务因通商而始有：

窃维洋务之兴，数十年矣。兵衅迭开，上下交困，然要其大指，通商二字尽之。初次用兵，请五口通商；二次用兵，请长江、北洋通商；云南之案，先求探路通商，后亦不过多开口岸通商而止；其他要求百变，皆通商事也。^⑮

王韬谓中外通商之局，有终古不变之势：

呜呼！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真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尝见俞君廉石与张少渠书，其言曰：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及今而不图，一旦高辛先我，悔之晚矣。^⑯

郑观应释“通”与“商”之本义，以明其所当重：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

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以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是宜设商务局，以考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精进。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布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来百工之条。通商惠工之学，其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⑭

陈炽亦论通商为洋务本原：

夫难能而可贵者时也，稍纵而即逝者机也，可直而亦可以曲者理也，可得而不可失者势也。今之言洋务者，兢于海防而不知其本原乃在商务也，汲汲于东南，而不知要害乃在西北也。^⑮

唐才常并谓通商为中外公理：

通商传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彼通商于我，我亦可通商于彼；彼传教于我，我亦可传教于彼；不自充拓通商传教之抵力涨力，相为应付，而徒咎人之通商传教为阴谋为外道，为瘡种噬脐之鸩毒，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⑯

彭名寿亦就天地自然之理立说：

国于地球之上，而相与通商，固天理之自然，古今之公义也。且通商之例，大半以货易货，故本国每年出口之货皆

由外商运货入境，交易而去，非必俱以实银也。一往一来，合相通之公理，则关市不乏，而国必富矣。夫众人之所集，大利之所归也。孟子语：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王之市。商之藏于吾市，吾之利也。人情之所便，即天意之所通，顺天者存，违天者亡，先天者兴，后天者废，持迂执之说者，其自绝于天乎。而举中国之人胥锢绝其生路，尤不仁之甚矣。夫天假手于西国以通商，而成此万国交通之盛，是不啻为四万万人增广其生业也。故西人论通商公例，利于主国者九，而客邦之利仅有一。今通商既数十国矣，我自不设商部，不兴商会，不立公司，不遍驶轮舟，不广修铁路，不大通邮电，使中国所产广输于人，而外国所需亦出于我，则我自不平其政，终于利源不辟，漏卮不塞，又何惑乎人之以不平加诸我也。故善富国者平其心以平其政而已。^④

凡此俱可见出时人于中外通商之意义与效益，均有深刻了解，抒论甚为透辟。此正所以代表重商思想之充分内容与坚实根基。

重商理论亦并涉及外国情形，世界万邦之风气趋势。虽谋本国之重商，而立论基础广阔，布势宏远。比较列强国势，亦必能启发聩聋，警戒固守孤立。且就列强立国实力而计，自亦不能不见贤思齐，以图努力仿效。外国既以重商而强国富民，实亦使国人健美倾慕努力以赴之最大引诱。分析当前世界大势，则中国之必须重商，正乃识时务顺潮流之明见也。若陈兰彬所论：

洋人欲图强兵必先富国，欲先富国必先联商。官商联则集费厚，费本厚则财力雄。获其赢余，从而练兵制器，以侵扰邻国，此又海疆多事之本源，而轮船尤害之切近者也。^⑤

若薛福成所论：

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⑭

若郑观应所论：

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盖见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督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出入之多寡，销数之畅滞，月有稽，岁有考，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则悬金牌以鼓励之。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或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⑮

若钱恂所论：

海禁未开以前，民安其俗，乐其业，享地利而无虞不足。自西人航海求市，遍历奥区，履我户闾，擅彼懋迁。其势如百川灌河，堤防一溃，莫之能遏。甚且以商务之盛衰，征国势之强弱，则赢绌之数，一衡量而较，然有不恟然动色者乎。^⑯

若马建忠所论：

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

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彼英美各国皆通商，而进口货不能两盈。故开矿以取天地自然之利，以补进口货之亏。至地利不足偿，乃不惮远涉重洋，叩关约款，以取偿于我华民，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矣。^④

若康有为所论：

臣推洋货所以能越数万里畅销者，盖其国中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统之，有商律以齐之，有商会以结之，有比较厂以励之，有专利牌以诱之。及其出国也，假之资本助之，轻其出税以便之，有保险以安其心，有兵船以卫其势，听其立商兵商轮以护其业。又有领事考万货之情以资其事。官商相通，上下一体。故能制造精而销流易，视万里重洋若枕席，情信洽而富乐多。故筹兵饷重款，若探囊取物，民足而君足，国富而势强，职是之故。^⑤

若梁启超所论：

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无余，人咸畏之。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媚之蛊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犹昵之。今各国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姑无论其利用政府疆吏之权，以政府疆吏为彼奴隶，而吾民为其奴隶之奴隶也。即不尔，而握全国平准界之权，已足使我民无复遗类。何以言之？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嗇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为不国。此中消息，不待识微者而知之矣。^⑥

凡此提论万国大势，列强雄图，各商业竞胜，繁杂纷乘。其对中华之冲击，亦皆可归于商力之扩张。中国土裂瓦解，民不堪命，立足此竞争世界，以求免于灭亡，而不被人奴隶，参证国际间之强弱，足以引为借鉴者，则惟有取重商一途，始得以与列邦颉颃，以渐复国家元气，而开建保土佑民之基。

中国既知本身立国之需要，复见世界大势所趋之普遍重商。当必然立即思考急起直追，固为自然之理。然此一思想动向，实须连带检讨中国人本身之条件，有无能力从事？其具备之优点如何？缺点如何？有无竞胜之可能？而重要关键何在？均为承此重商言论所要提出检讨者。若郑观应之检讨分析：

夫贸易之道，固以土产及土产所制之物二者为之纪纲。而国政民情，未尝不与商务相维系。明乎此而后商务可得而言矣。英吉利商国也，恃商以富国，亦恃商以强国。曷为曰商国也。专藉商舶以覓新地辟新埠，纵横五大洲，遍布于中国沿海沿江地方，其与国政相维系者如此。艺术家日益精良，化学家日研新质，创耕稼新机以教农人，得粪溉新法以兴树艺。其与民情相维系者如此。窃尝究英国商务之所以兴旺者其故有十三端，有为中国之可及，亦有为中国之难骤及者。曰地气清和，曰矿产甚富，曰国内水陆便利，曰海口多，此四者中国固有之无不可及者也。曰百工技艺娴熟，曰首创机器擅利独多，曰资本甚巨，曰程法尽善用人得宜，曰商船多，曰五大洲皆有属地，曰言语为商务通行，曰通商历年最久，曰近日出口货无税进口货亦不尽征，此九者他国亦有难兼，中国所未能骤及者也。^②

若麦孟华之检讨分析：

夫中国制造，举办非难，例之泰西，实有三利：物产蕃衍，运近货廉，一也。人性勤俭，工奋价贱，二也。西国成法，便于仿行，三也。能行公司之法，泰西之获利五者，中国之获利十。⁽¹¹⁾

惟诸人之中，王韬最具信心，且提出其观察与检讨最早：

夫西商之经营虽善，计画虽精，而用度廉俭，安能与华商并驾而齐驱。然此犹其小焉者也。通商者非一处，即与英人争利者非一国。普商之精明强干，未亚于英人，而其忍辱耐烦，食廉用节，则在英人上。其入贾中国，今多于昔数倍矣。即此一端可证也。⁽¹²⁾

而王氏观察敏锐最为大胆卓越之论，则为其《西人渐忌华商》一文，略举其语云：

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浹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藪。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贖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资。迨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

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来年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仍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也，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⑩

严复虽值英国国势最盛之时，中国最受欺凌而国弱民贫之世，乃大胆预言英商独霸之势必不能久：

西人尝谓商市欧洲最盛，而欧洲又英国最盛者，虽曰人事，亦地形为之耳。设分地球为二半，其一为陆半球，其一为水半球，则英岛实处陆半球之中央。欧洲海岸，出入海线最长，而英为岛国，无地不可与水通。当墨西哥湾温溜(Gulf Stream)之冲，气候深燠。总是三者，此所以能独握海权，牢笼商务，驾万国而上之，非偶然也。顾谓十九稔前，英以地势，其商业宜甲天下，是则然矣。第必曰其事将恒如此，则自诎之论，殆未可信。往者世治初进，埃及、印度、安息，实为奥区。浸假而希腊，而罗马，而英伦，则过是以往，势将又迁，汽车大行，而海线之长，不足孤擅。故二十稔以往，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⑪

须知此时适西方列强如日中天之盛世，又值国际间强权横肆，殖民竞争之激烈时代。诸人言论，最晚亦不出 1911 年。乃有如此冷静清醒之深入分析，纵览世局之敏锐观察。且在中国最贫苦衰弱为列强眈眈环视之际，而大胆评论，预言未来，为国人鼓舞生存夺斗之勇气，足以表现中国民族苦难时代坚毅不挠之精神。实亦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素养之所寄。

重商观念尤且表现于商智商力之充实，当时之言商智者，盖为商人之教育教养以至技能之充实而言。国人既悟世界商界竞争大势，而知其组织严密，策画周详，技艺精良，谋虑深远。盖知实非传统营商故智所能抵御，且非研求并学习西方经商之一切规制方法亦不足以抵御西方商力之冲击。为百年长远大计，自不能不从商人教养之充实人手，然此实反映重商思想之具体实践。且亦见出当时人之缜密思虑。若郑观应所议商智充实之必要：

或谓商贾之事，只须略知贸易情形，即可逐蝇头之利。岂知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欲知此道，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如各种货物增出愈多，则新法更为繁琐。盖懋迁有无之事，匪独一家之利钝，并关一国之盈虚。古者交易，但贵布帛菽粟。后世工艺，大半弓冶箕裘。此其中但有工于会计识见过人者，则获利较优。故知市面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此格致之学言商务者不可不知也。^⑧

郑氏并建议创设格致书院：

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

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并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恤商惠工，奏请朝廷，颁示天下。悉如前篇所论，如有新出奇器，准给独造执照，及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务使官不能制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以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庶商务可以振兴也。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挽回利权，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数年来工商生计愈见其絀，若再不悉心考究，徒效皮毛，仍如隔靴搔痒，有名无实，或言不顾行，势必至国困民穷，不堪设想矣。^⑩

商力藉资商智，欲增进商智，自当加强商人教育。由是重商之宗旨乃更进而推动教育之改进。

重商观念之进一步冲击，抑且更足以改变科举制度，以为商人辟名利之途，盖用名利之引诱，以鼓舞商人日臻进境也。当时言论，俱袭西方专利权而立说。若钟天纬所议：

泰西工艺之精，甲于天下。而考其致此，全由国家鼓舞而成。犹中国诱之科举利禄之途也。其道何由，则在于颁给牙帖，即西语所谓丕登（Patent）也。丕登者，如士人考得新理新法，工商创成一技一艺，即献诸国家，由商部考验，上者锡以爵禄，中者酬以宝星，下次亦准其擅为专门之艺，或传为世业，或专利数年。国家给以文凭，以杜通国工商剽袭仿造，即国家欲仿其新法者，亦与本人商购，偿以重贖。如创造汽机轮车纺织机器诸人，各国无不颁赐爵秩，廩以终身，至今劳名永世。是以西人无论仕宦缙绅，农工商贾，无

不梦寐思得新法，为取富贵，贻子孙名利两全之计，寝食俱忘，不惜倾家试验。西人因此享大名获巨富者不胜俚指。每年美国发给牙帖数万张，其通商工艺之精，根柢全由于此。彼其言曰所贵乎士者，非徒高尚其志而已也。必须创立新法，有益子国，有利于民，斯不愧为四民之首。故西国之儒者，不徒抱诗书谈仁义而已也。有商中之士，有工中之士，有农中之士，皆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日出其新法。中国诚能采用其意，不必驱天下儒者而尽出于一途，各听其天资所近，不论农工商贾，考求新理新法，以利国利民，每省由督抚考验，给以牙贴，以能自出心裁者受上赏，变通西制者受中赏，步趋成法者受下赏。准其一家专擅其利以酬劳，不准他人仿造以夺其利。甚或破格奏奖，荣以功名。^⑧

若郑观应所议：

然则制造一事，终不可兴乎，曰是有术焉。为民上者，以名利二字驱使天下，而天下之民趋之若鹜，奔走恐后者，无他，术为之也。泰西于制造一事，自少而壮而老，穷毕生之才力心思，以制造一物，其祖若父有志未成，则子若孙接踵而起，复专心致志，惨淡经营，自少而壮而老，穷毕生之才力心思以制造一物，必使豁然有得，大功告成而后已。此其驱使之者谁也，曰名也利也。泰西立法，无论士商军民，有能自制一物者，以初造式样上诸议院考验察试，以为利于民便子民，则给领凭票，定限数年，令其自制自售，独专其利。他人有依傍仿效以争利者，惩究不贷。彼制造者于数年之间，既已独专其利，而获利无算。所呈式样什袭珍藏，后世有摩挲斯物者，以为创于某人，犹相与叹赏不置，是利之中有名在焉。此所以泰西制造之精，且新者层见叠出，炫异

争奇，日新月盛，而岁不同也。我中国人士，于名利二字蟠据固结于胸怀间，终其身不可解，积习相沿，牢不可破。仿泰西驱使之法行之，又何患天下有志之士，不殚思竭精研几以从事于制造也乎。”^⑧

若薛福成所议：

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数万卷，试练数十年，然后能为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创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子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锡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莫不与分庭抗礼，有欲然自视弗如之意，则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励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见谓与今之中国相反，吾谓与古之中国适相符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工贵士之心，是在默窥三代上圣人之用意，复稍参西法而酌用之，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乎。^⑨

以名利号召，以爵秩吸引，使国人踊跃务商，为重商之具体实践，固不待言。实由此倡导，则足以改变千年来抑商之旧习，扩大所谓士绅结构之性质，其所影响之后果，自尤具重大意义。

若使国家开利禄之途以鼓舞经商，其直接宗旨，即在提高商人政治社会地位，且亦必能提高商人地位。而其结果自在崇商而非抑商，人既得厚利，复获高名，终并能膺崇爵荣禄，由是而营商一道，自不免一变为人群中最为有利途径，亦自不免为众所共趋

共慕之行业。然再进一步思考，今既声言以名利禄位相号召，而何者之名利禄位为最宜于商人，则须有更具体之检讨。在当时原议专利、爵赏、禄位云云，无一非模仿西方，尤其是仿习英国。英商如何参与政治以列名于上流社会？实多由选举而进于国会以为议员。参考英商之从政活动，即亦自然引为中国商人政治出路之参考。于是论者多出议会一途。若宋育仁介绍英商参与国会之实情：

下院虽以才能举，然岛国重通商专言利，故趋重商人，积势使然。兼以用财皆自商出，国所仰给，商以财结人，则举者尤众。今下议员类皆富商，西商或明制器，或多涉异国，必明事理，长算计，国无礼教（耶稣教有戒而无礼，且薄商人，故为商者往往不信教），惟计利害甚明。商多更事，有才辩，虽专谋利己，而食于此业者众，民心所仰，为利于下，而国即因之富强。故上院虽偶有诘驳，不能夺。结党相持，亦不能胜也。偏重之过，则废尊卑上下，君如守府，上院如赘旒，百官如傀儡。^⑩

郑观应则就另一角度，辗转推理，申言中国商业之不振，当归咎于无国会以监督政治：

中国地本肥沃，物产丰饶，天然之优势。商界人才，亦莫不勤勉刻励，具有优等之资格。近年来海外之商业既已不能扩张，内地之商业又日见摧萎，全国商权几尽在外人之手。凡我商人，将并陷于劳动之地位矣。揆厥原由，盖缘外人之商业有政府以为后援，我国之政府对于我商人非惟不知保护，反多障碍。如币制之不定，商法之不行，关税之不速改良，金融机关之不完备，无一不足以绝我商人之命脉，而

阻商业之进步。此我国商业所以日居于失败也。夫国家对于商业，何以无确定之政策，则以政府无确定行政之方针；政府何以无确定行政之方针，则以无监督政府之机关，而政府不负责任故。此即行政之关于商业者言之，不可不速开国会。^⑩

由重商观念辗转而推及民主议会政治，固多半由于参仿西方政府所使然。但就自然之势，凡发展商务，健全商业组织，以及商人之政治醒觉，对于政治参与之要求，终必会产生。西方既开其先，中国尤易较早领悟，顺理成章，以作议会之建议。

商战观念刺激中国之重商意识；重商趋势即必推动中国之商业化；而商业化之中国，自然使教育良好之秀异分子转趋于从事工商，并自然会使工商家政治社会地位提高。再以工商家之实力与组织，自必更要求广泛参与政治，由是民主政治之制度，即不期然应运而生。

六 结 论

近世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商战观念，为关系全民族生存奋斗之重大醒觉，具有深远意义。一在于对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之反应，以及列强经济竞争之仿效。一在于对于中国贫弱之自励自救，唤起奋斗意志。一在于对经济消蚀、缓慢之衰惫灭亡而产生之痛觉。至其尤为可贵可重之点，则在于理性之警觉与自我充实，采行一种持久性、非武力性以至全民性之对外竞争途径，以为中国国家民族争生存于现世之方法。商战一词一义，实足为近代知识分子深具时代意义之文化遗产，决无可疑。

“商战”一词，不创发于中国史上任何时代，而发生于19世纪，当然是出于近代西方工商势力对中国之挑战，被动而激发此

种反应，原动力乃发自西方之冲击。至于此一观念之不创发于其他民族之头脑，而发生于中国人之头脑，即面对西方冲击，而中国与他族有不同之反应者，盖不在于种族禀赋之天资，实由于文化累积之不同。换言之，“商战”观念，并亦反应中国民族之文化素养。中国历代先知，倾其智虑，创造文化遗产，实供后世子孙之长久立足于世而参考应用，启发新智。一民族之创造能力，固以禀资为重要条件，而文化累积尤为更重要条件。文化之深浅，更较禀资之优劣关键尤为重要。西方学者之滥调，恒因近代之文明进步而夸称白人之超优，本为自欺欺人之论。若果白人为天生优种，何以上古中古并不超优，必至于近代始突然变为超优。人类文明历史，本为多角多样发展，乃事实所显见。至各地古今盛衰不同，其原因实甚复杂，亦并无关于民族禀赋之优劣。学者明理，当审慎观察，以破此狂瞽欺人之说。而中国明智之士，实早在西方列强鼎盛之世，并中国方积弱积贫屡败于外族之时，在 1900 年严复已驳斥白人妄论：

今之欧人，动曰天生白种，所以君人者也。嗟乎，此与云匈奴天之骄子何以异乎。自不佞观之，黄种之权虽失，固当有自主之一日，特其事非庸粟自弃者之所能为，尤非木强自大者之所能为耳。^⑩

其理智，其信念，其超卓宏远之识力，正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之智慧。

以对西方工商业之冲击而言，商战观念实为最直接最正确之反应，亦并启发最清醒而理智之觉悟，表达出对于当前西方乃至世界全面发展之最根本了解。当然此一观念实亦具有广阔而有深度之内容。

中国人何以会提出“商战”一词？当然是在表达其“商战”

之感觉与想像。何以会产生此种感觉与想像？自然是种因于近代西方列强所加于中国之冲击。商业为殖民扩张之动力源泉，商人富于冒险，活动与远游为其天职，能作海外贸易与冒险试探，并即有海外新市场新领土之发现。抑且商品须加采集，原料须加寻觅，在在又迫使商人活动不已。商贸宗旨在获利，虽种种危险，重重困难，亦必须设法突破，不达获利目的不止。凡此商人基本性格，中国人并有所知，若郑观应所描述，甚为清晰：

商贾者，专为牟利之计者也。苟利可图，不惮千里之跋涉，终岁之勤劳。所制之物，除本国自用外，皆思鬻利以售人。何处肯出善价，则向何国销售，甚至善价不得，反多折阅。以今比昔，昔之价昂，今之价贱，昔之捐轻，今之捐重。夫以至贱之价，当至重之捐，而各国仍勇往直前不肯作退步想，盖势处于自然，有不如此而不得者也。^⑭

由此当知，此一冲击动力实持续而不歇，利愈大而欲愈奢，其突破阻难之冲力亦愈强。在被动中之中国朝野，岂尽麻木无灵，如豕鹿牛马之驯顺，既受宰割，岂无痛觉；既丧货财，岂无怜惜；既受冻馁，岂无哀号。其欲起而防御抵阻者，则立见中西冲突磨擦之发生。而西方列强，使领为商人之后盾，政府为使领之后盾，兵轮大炮为最后之手段。来者既挟以工商、外交、政治、兵力，防御者何以不会产生而临“商战”之感觉。直截言之，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领土，乃19世纪所共见之事实，即全地球土地亦不能满足强权者之欲壑，凡此占领、瓜分、划分势力范围，推其原始，亦多以工商扩张为原始动力，盖亦当知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商战”观念之时势背景，实乃其必有之天然条件。

殖民主义者之扩张兵备，惨杀争夺，亦乃商业性之大投资。以国家为赌本，牟海外之赢利。此种动向所及，中国固首当其冲。

国人身有所受，实亦眼有所见。严复比较中西民族之不同性格：

不惮艰险而乐从军走海上者，欧洲之民，大抵如此。而图敦（Teuton）日耳曼之种尤然。此其风气，与中国所甚异而绝不同者也。欧罗巴能雄视五洲以此，支那常恐为其所逼蹙而终不足自存者，其端亦在此。观于斯密之论，斥为鹵莽之愚，可以知其根于性习者至深，而非由乐道而夸大之者矣。呜呼！用诗书礼乐之教，奖柔良谨畏之民，期于长治久安也，而末流之弊，乃几不能自存。此岂立治扰民者之所前知者耶！^④

郑观应赋诗而讽白人之贪欲无穷：

待鹤（郑观应号待鹤山人）昔感白种惨杀别种，曾赋五古有云：“日月无私照，君何畛域分。下民殊五种，上帝视同仁。掠地非仁泽，佳兵起恶氛。皇天惟德辅，大道本无亲。霸业看罗马，愚黔笑暴秦；须知抚则后，慎勿虐其民。诋疾人皆侮，贪求国更贫；王师不嗜杀，普告大将军。”当时为此诗者，盖有不禁感慨系之。夫有强权无公理，为列强各野心政治家之口头禅。由是虎视鹰瞵，弱肉强食，中国濒海诸省，久在列强之势力范围圈内。近来瓜分之说更轰腾于耳鼓。行将由议论而变为事实，千钧一发，岌岌乎殆哉。^⑤

而此等商业竞胜观念，无论中国或在西欧地区，终必自然激发民族主义思潮。这个必然趋势，可自梁启超的言论中看出：

或曰：今后之天下，既自政治界之争，而移于平准界之争，则我辈欲图优胜，宜急起以竞于此。嘻！此又不知本末

之言也。夫平准竞争之起，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不然，中国人货殖之能力，岂尝让他人哉！而今顾若此，毋亦梗其中者多所囊，而盾其后者之无所凭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不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④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其创发源头固非由于商战观念，而商战则实构成其渊源之一支。思潮激荡，其趋势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或左或右，纯出于自然，诚非人力所能预测与控制也。

进一步言，若就民族主义而言中国之重商思想，则此实表现中国民族醒觉最理性之一面。重商与商战之表达，俱倾向于现实利益之保持与竞争，乃有计划有估量之竞争途径。加紧自救，亦必加紧西化，亦可谓加紧现代化。重商动力之影响，表现中国对外竞争之决心与勇气，而此勇气则以冷静计算为准备为基本。由理性估算而加强自信。自构成理性之排外力量，而所排并必针对不合理而接受其合理，故其本质上不反对西方，不排斥西化，反而加速接受西化，甚至一切商务制度，充分西化。最终目标，则以真正之西化抗拒西方不合理之侵夺压迫。再回头合观 1840 年代魏源所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间有何差别？亦足见出魏氏言论之不刊。

1975 年 7 月 14 日初稿

注 释

- ① 汉代重农抑商政策，为历史上重大之经济问题，自非短短数语所可尽明。吴章铤：《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思与言》七卷三期，台北，1969年刊），李陈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三期，台北，1972年刊），必均略叙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思想，亦均稍备常识了解而已。
- ②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第44页。
- ③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页，李璠奏。
- ④ 同前书，同册，第166页。
- ⑤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 ⑥ 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第二期合刊，台北，1970。
- ⑦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8页。
- ⑧ 同前书，同卷，第35页。
- ⑨ 同前书，同卷，第38页。
- ⑩ 同前书，同卷，第37页。
- ⑪ 同前书，同卷，第38页。
- ⑫ 同前书。
- ⑬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23~24页。
- ⑭ 汪康年：《时务报论说汇录》，第14页。又，同前书，第5-6页：“西人之所以腹削怵吓我中国者，以兵商为大宗。而其所以羽翼兵商者，尤能坚忍刻苦，联络党类，棋布星散于人之国中。彼将力护其从我者，而深斥其不从我者。贵人能扶己者，深奖誉之，其异己者，力毁谤之。借己之国势，以压人之官长，复借官长之势以压齐民。夫如是，故吾国利弊纤悉尽为所得，而从者益众，彼又能取其国之善法以教养人，不数年则才人学士将出其中。且我民有为所长养者，有为所生全者，方感激效死之不暇，而我民犹宽然宴娱，谓彼之说何足动人，彼之为此者，特为谋食计耳。岂知彼之设心立法，上之则欲执人之国权，大之则欲制亿兆人之死命。逮至彼势益盛，方思起而谋自立之策，则人联络，而我散漫，人坚忍，而我疲倦，彼欲去我若风之振槁。呜呼！不自立而坐以俟者，

其效固必至于是也。”

- ⑮ 同前书，第14页。
- ⑯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65页。
- ⑰ 《湘报类纂》，甲集，卷中，第10页。
- ⑱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第42~43页。
- ⑲ “商战主义”一词，为郑观应拟立商会所提出。两次分见于《盛世危言后编》卷八，第22~27页。
- ⑳ 黄炎培、庞淞合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共22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原译英文名为：*History of China's Failure in Commerce*。
- ㉑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二编，第39页。
- ㉒ 康有为：《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卷二，第5页。
- ㉓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梁启超序。
- ㉔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四册，卷十，第26页。
- ㉕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第8页。
- ㉖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第38页。
- ㉗ 郑观应：《易言》卷上，第7页。又，葛士藩：《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一六，第12页，所载李东沅文，实乃抄录《易言》，文句全同。
- ㉘ 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卷四，第59页。
- ㉙ 薛福成：《庸盦文编》卷一，第22页。
- ㉚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7页。
- ㉛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22页。
- ㉜ 宋育仁：《采风记》卷一，第37~38页。
- ㉝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19页。
- ㉞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79页。
- ㉟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 ㊱ 颜斯综：《海防余论》。载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二，第4页。
- ㊲ 徐继畲：《松龛先生文集》卷三，第6页。
- ㊳ 黄恩彤：《抚夷论》，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56页。
- ㊴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第20页。
- ㊵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七，第18页，左氏奏折。
- ㊶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第17~18页。

⑫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三，第 18 页。

⑬ 宋育仁：《采风记》卷三，第 6 页。

⑭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 39 页。

⑮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 19 页。

⑯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 2 页。

又，此一认识，严复亦提论之，谓为中土向所未知，固必须力求西方知识，方足以应世有本也。其所论者如下：“夫以商得国，其事为中土所不经见。今之学者，于印史未尝考问。每谈欧亚交涉之事，动为逞臆之言。以中国旧理，例西国时事，无怪其为外人齿冷也已。夫欲为今世通才，于变端之至，而知所以控御之方，非博读西书又乌得乎？”见《原富》，第 751 页。

⑰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 9 页。陈兰彬奏。

⑱ 同前书，第一册，第 478 页。张培仁撰《静娱亭笔记》。

⑲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六，第 6 页。

⑳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 1 页。

㉑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 2 页。

㉒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 10 页。

㉓ 严复译《原富》，第 634 页。

㉔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 2 页。

㉕ 同前。

㉖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 1 页。

㉗ 同前书，第 2 页。

㉘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 4 页。

㉙ 陈炽：《庸书》，外编，卷五，第 5 页。

㉚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 10 页。

㉛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上，第 26 页，麦孟华：《榷署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

㉜ 郑观应：《易言》卷上，第 5~6 页。

㉝ 《湘学新报》三十二期，“商学”。

㉞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四，第 8~9 页。

㉟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四，第 9 页。

㊱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 165 页，李璠奏。

- ⑥7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八，第12~13页。
- ⑥8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7页。
- ⑥9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四，第8页。
- ⑦0 汤震：《危言》卷二，第13~14页。
- ⑦1 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
又，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2页。
- ⑦2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1页，陈兰彬奏。
- ⑦3 同前书，第12~13页，沈葆楨奏。
- ⑦4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27页。
- ⑦5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7页。
- ⑦6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一。
- ⑦7 刘声木：《莪楚斋三笔》卷六，第2页载：“同光之间，江阴沈品莲方伯保靖，任江西分巡广饶九南道兼九江关监督，俗呼九江道。告先文庄公（刘秉璋）云：西人侮辱中国官吏，无所不至，面与伊言：九江道头上所顶者乃是乌龟。又有某廉访曾任关道，亦告先文庄公云：关道虽然缺好，全受西人之气，所得者乃受气钱耳，云云。”
- ⑦8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3页，引吴广霈《续罪言》。
- ⑦9 同前书，第2页。
- ⑧0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上，第26页，麦孟华：《榷署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
- ⑧1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四，第59~60页。
- ⑧2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之第17页。
- ⑧3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7页，李璠奏。
- ⑧4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3页。
- ⑧5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2页。
- ⑧6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第50页。
- ⑧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第34页。
- ⑧8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第10~11页。
- ⑧9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36页，徐承祖呈。
- ⑨0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23页。
- ⑨1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五，第12~13页。
- ⑨2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8页，《代黄达权上李鸿章书》。

⑬ 李鸿章：《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七，第23~24页。

⑭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第6页。

又，同前书，卷四，第6~7页。覆李鸿章：“中国幅员最大，居温凉之道，而百物悉生。得地脉之精，而五金悉备。于我无所乏，自于人无所求。但宜通商以收各国之利权。无事通商以给民生之食用。乃欧洲各国，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搆兵恫喝，乘我未及深悉洋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輊，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咸丰八年所定条款，虽在英法二国定税之先，然为时未几，咸丰十年，英法之税则已为欧洲各国轻税之嚆矢。尚有远过于中国者。则当时英法与中国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数十年吸中国之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今何幸中国渐悉外洋情势，且又设立招商局以分其利，由此推广，而机器织布开煤炼铁，渐可收回利权，以为富强张本。乃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篋翻箱，负累不堪言状。与我朝轸恤商民之至意，大相刺谬。律以西国勒抑外商庇护己商之理，又不啻倒行逆施矣。”

⑮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15~16页。

⑯ 《国父全集》第五集，第6~7页。

⑰ 汪康年：《时务报论说汇录》，第17页。

又，同前书，第15页载：“今吾中国与西国交通以来，兵则屡战而不一胜，条约则屡定而权利愈失。西国之货，销行者岁亿万计，而有损无益之物，虽阑入而莫之能禁。财货日失，利源日涸。然犹幸商人能忍受艰苦，节啬勤力，以与西人相搏相持。虽不能相抵，然尚十得五六。而闽粤民之工商于南洋及美澳诸洲者，每岁寄回之银，又十得二三。故中国虽困乏，尚得支持，而国家关税，亦赖以取盈。而且赈饥则捐之商，御敌则捐之商，有大工大役又捐之商，而报效之款尚不在此列。然则商固无负于国家也。”

⑱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18页。

⑲ 《时务报》第六十四册，汪大钧文。

⑳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上，第21页。

㉑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13~14页。

- ⑩ 葛士澹：《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一六，第6页，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
- ⑪ 同前书。
- ⑫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3页。
- ⑬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三，第38页。
- ⑭ 同前书。
- ⑮ 《戊戌变法》第三册，第118页，麦孟华文。
- ⑯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〇，第22页。
- ⑰ 葛士澹：《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一六，第9~10页，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
- ⑱ 严复译《原富》，第755~756页。
- ⑲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77页，光绪七年二月，张培仁记：“近日我中华之利藪往往为西人所占。虽明知而不能与之争者，以西人之举事也殚其心力，竭其资财，专心而为之。且君民有通财之道，朋友有假贷之情，故西人之举也易，其成也易。中国则不然，创一谋利之事，旁人已窃窃焉议之，一有不成，汕之，笑之，及其将成，妒之，忌之。财则无可通，力则无可假，故中国之举事，视西人为难。乃仁和保险公司不畏其难而成效已彰彰可据若此。虽曰由于众股之赞成，而经理其事者，亦可为胆识兼全矣。他若香港之东安保险公司、常安公司、万安公司，保险之利，其效如此，则招商局轮船之益也大矣。夫轮船与保险事属两歧，而实则归于一本，有如许保险生意，则必有如许轮船生意。第轮船所获者为水脚，与保险所获不同耳。近年招商局轮船愈行愈远，有至英国者，有至美国者。西人所取于中国者，即可取之于西人，其获益岂有涯哉？”
- ⑳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五，第15页。
- ㉑ 同前书，第16~17页。
- ㉒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一，第14~15页。
- ㉓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16页。
- ㉔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第30页。
- ㉕ 严复译《原富》，第302~303页。
- ㉖ 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第9~10页载：“謇谓今日为中国筹财政者，莫亟于养国家之信望，俾渐通官商之邮。除国家银行由国家飭令设立予以特权外，国立银行定政府入股之制，用人办事之权，由股

东选举报部立案。不愿遵新制者听，此上策也。筹集官款，并招集商款，为商业模范银行，作中央银行之预备，此项总理，诚如原奏，应由股东内选举，此中策也。”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第49～50页载：“查外国所开银行，各有职务。如中央银行，是专发纸币，管理国库，为金融总机关。如农工银行，是用发债券方法，专收低利长期存款，用不动产抵押，放与农工人做本钱。如商务银行，是专做汇兑，使出外贸易商人便利，以提货纸抵押。如储蓄银行，是专收零星小款，等穷人有地方放钱，社会又得游金作用，各有专章，关系甚重。至欲振兴工艺，尤宜仿照日本维持补助，令其公司发达。我国地大物博，矿产极富，反不如日本出口货之多，因技艺拙，捐税重，上无奖励，亦无保护，下多盗贼，动辄掳人。大资本家不敢轻于人股，而各省又无农工商银行利便商家故耳。前时德日两国，亦如中国贫弱，不知振奋，其后一切改良，不惟讲求武备，火器日精，凡外来品无不研究自行制造，且青出于蓝，价廉而工巧，近年出品渐多于英国矣。”

①⑨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海，1955），第22～23页，附表；第27～30页，附表；第31～34页，正文；第34～36页，附表。

①⑩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6页。

①⑪ 同前书，卷五，第17页。

①⑫ 宋育仁：《时务论》，第26～27页。

又，同前书，第27～28页载：“谓宜大开矿禁，听民得自采，而官收铸。驱游民以归工，用金钱以制币。币愈多地产愈昂，则彼之人民为我役，而不致我之人民奔走于洋商。彼之利器为我收，而不致日输我之地产以为彼奉。一转移而强弱贫富之形立相反。夫钱币用以交易有无，而无实用。古时中国一家，故捐金于山不为过，今中外交争，则广铸以遏其流，而令返本，其义一也。”

①⑬ 宋育仁：《采风记》卷一，第31～32页。

①⑭ 严复译《原富》，第428页。

又，同前书，第206～207页载：“中国以银为易中本位，十余载以还，金铜皆日贵，谷价亦日腾。甲午至今，其腾弥甚，无虑所增三分之一。说者谓往者西国悉弃银准用金，独印度、中国、日本三者用银，今印度日本亦用金准。用银之国，独有支那。故中国银多进口，金多出口，

此银贱所由然也。顾吾闻商贾言，各口都市，见银仍不见多。则又何说。不知自甲午以来，中国如铁路诸事，率作者多，故需银亦广，以需之广，故散而不见多，而银之贵贱，则五洲之市，合而为之。他所既贱，则支那不能独贵也。至于米价之贵，其故一由户口之蕃息，一由外国之采买。大抵国进，其谷价莫不由贱趋贵，未尝由贵趋贱也。吾闻长者言，咸同时以银买物，已不敌雍乾时三分之一，至于今日，又不及咸同之半矣。总之，各国既用金准，而中国不变，其受病之大，终有所底。而一时欲弃而从金，力又不逮。此事所关极巨，上自朝廷之制禄，下至商贾之交通，皆蒙其害。有心宏济者，不可不广览而熟筹之也。”

⑫ 葛士澹：《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一六，第6页。钟天纬文。

又，同前书，第6~7页载：“今之洋债，其息为百分之九，与其本国几为加倍。而我中国未尝无财，何必受其盘剥，而岁输重息于外洋。若自借本国之国债，每年偿利若干，由各海关经理，刊给饷票，以抵现银，而即由海关付息，庶商民取信，尽出其藏镪，以牟什一之利，则市面流通，经商易于获利。万一有闭关绝市之时，而民皆肯倾囊以献，不啻取之官中。当安危呼吸之际，而始收其效。故曰有大利而无大弊也。”

⑬ 郑观应：《易言》卷下，第24页。

⑭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21~22页。

又，同前书，第20页载：“夫借债以开铁道，所谓挹彼注此，非若借债以偿赔款，而贻偿息之累。况借债另有变通之法，其法维何，曰：铁道专由商办，而借债则官为具保。如是则阳为借债之名，阴收借债之效，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

⑮ 严复译《原富》，第943~945页。

又，同前书，第937页载：“君子读斯密氏此篇之言，而反观吾中国之为何如国。为此乎，为彼乎，盖不待不佞之斥言，夫已各知其攸属矣。数载以还，国亦多故矣。工商之业倏然，而国债弥重。且其债非贷之于民也，官贷之于外国，而外国转而贷诸吾民者有之矣。岂尽民之无良哉，民无所恃于官，而外国无所畏于中国故也。往者亦尝贷之于民，则昭信之股票是已，然其事之何若，又不待不佞之斥言也。庚子之岁，行将尽矣。和议十二款出，国之通负益深，后之财政，将必有越樽俎以代吾庖者。使继此而民以病，其事固可悲，使继此而民不病，其事尤可悲。曩有谓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昔闻其语，今见其事矣。”

又，同前书，第 959 页载：“英国自斯密氏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目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而弃其疾以从其利也。于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阻之通商。既有其利，辟土四洲，移虚实而通有无，故斯密氏之言所以不验者，盖由闻其言而即以其道自救耳。而我今日之中国，固何如乎，甲午庚子两战以来，国债之加者不知凡几，而其财又皆贷之于外国。他日和议既成，以外人而操吾计柄，区赋税以为贷者之岁收，年增数千万无名之赋，此非取左手而畀之右手也。大抵夺吾民衣食之资，以为谋国不臧者之罚而已。哀哀下民，逢此百罹，吾真不知所以维其后矣。”

⑩ 《湘学新报》第二十七期。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

又，同前报，第二十八期，续前章程：“本会愿宏事重，肇创伊始，气力绵薄，推行遽未能畅利。我大清帝国同国同朝同种类同志量诸巨公，闾德大人君子，靡不恫异族之交侵，悯生民之匱艰，知非兴商之无以救患，无以富国兴商，非结会无以材万物，乡方略，合大众，明大分，期于功百姓之力，和百姓之群，成百姓之财，安百姓之聚，长百姓之寿，共乐富贵而羞汗漫，以商裕国计以养民，以商趋时以弭难，以商御外侮，即以商务器械以开财源，上下均辨，寿帝室鸿祚于箕翼，安中国丕基于磐石。”

⑪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一〇五，公牍，第 7~8 页。

⑫ 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三，第 15 页。

⑬ 宋育仁：《采风记》卷三，第 1~3 页载：“社会与公司相表里，联交结党者为社会，鬻财谋利者为公司。一社会每兼有公司数家为联比，其家产剖为股分，亏则益本，贷则公摊，为无限公司。数人鬻股，不关家产，程本亏尽而止，为有限公司。国中除工匠、佃农、负贩、小业、佣役、车夫，食于教者，食于官者，此外类有公司。股分如大营包小营，互相联结。故工商之业，为举国身家所系。凡得与议者，皆仰食其利。通商为其国根本，故于争海口，占埠头，不惜全力。商之所表，公家必行；商之所至，兵即随往。其一国即是一大公司，一大社会，推之则英国联邦诸岛、印度、澳大利亚、阿非利加、北亚美利加诸属地，合为一大社会。德国日耳曼列邦合为一大社会。荷兰瑞士列邦合为一大社会。美利坚联邦合为一大社会。罗马教皇与法国奥国合为一大社会。又推之则泰

西各国与南北亚美利加澳大利亚合为一大社会也。美之开国，本为英之商会，后乃拒英自主为国。英之有印度，始亦由于商会，初时英之印度商会，得专制其地，通使出师。英主鉴于美事，急收其权，否亦化而为国矣。公司主利，社会主名。周礼九两系民，八曰：友以贤得名。九曰：蕝以富得民。最为难解。今至西国，推求其所谓社会公司，始悟系民之义，既裕才力，又通声气。本国之势，自然完固。圣人用之，为富教所关；末世用之，为纵横所本。故战国游士，诸侯倚为轻重；汉初游侠，尚有遗风。所谓剧孟之来，隐若一敌国。譬如敌国之众，人居腹心之地，则其本国自然受制矣。西国之君权日轻，民权日重，其原在此。而其据人地，灭人国，夺外邦之利，得力亦在此。西人行之得计，已视为轻车熟路。俄日群起而效尤，实彼本国之大利，而邻国之大害。其于中国情形，则并通商诸国为一大公司，并同教诸国为一大社会。中国政教已弛，而孤立无助，不可不亟为谋矣。”

⑬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16页。

又，同前书，第20~21页载：“欲求利国，先祛二弊，欲祛二弊，先自上始。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如种茶树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纱制造毡毯诸事，倡立鸦片煤铁磁器火油诸公司，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而又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至于下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辘轳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再由各府州县札饬各工商，设立商务公所，须如王君子潜（王韬）所云：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所举商董，或一月一会，或一月两会。会日洞启重门，同业咸集，藉以探本业之隆替，市而之赢绌，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勿作浮谈，勿挟私意，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以类相从，各抒己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一存会所，一存商务局，每年每季，仿外国商务工艺报刊印成编，分遗同业，户各一本，俾考市尘之大局，知趋避之所

宜。夫而后百货通百废举矣。商务局凡有所见，咨禀于南北洋通商大臣，倘遏抑不通，即迳达商部。一年一次，汇报情形，商部统计盈虚，上达天听。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又，同前书，卷五，第18页载：“欲设银行，仍必自建立商部始。盖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务通例颁行天下，保护商人，使商务日新月异。而后银行可开，钞票可设，上下通用，自然大获利益。且同一钞票，中国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无弊者，无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虽君上之威无济于事，民情信之，虽商贾之票亦可通行。中国前行之钞，立法未尝不善，其后吏胥因缘为奸，卒不取信于民者，无商部以统率之也。故欲用钞票，须先设银行，欲设银行，须先立商部。”

⑬ 《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卷，第28~29页。

⑭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2~3页。

⑮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第61页。

⑯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台北，1969），第21页。

⑰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第28页。

⑱ 郑观应：《易言》卷上，第9页。

⑲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47页。

⑳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20页。

㉑ 同前书，自叙。

㉒ 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卷四，第59页。

㉓ 《时务报》第三十册。麦孟华文。

㉔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49页，刘铭传奏。

㉕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卷一，第19页。

㉖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16页。

㉗ 同前书，第41页。

㉘ 《国父全集》第五册，第7页。

㉙ 陈炽：《庸书》卷五，第5页。

㉚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下，第17页，徐勤文。

㉛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10页，阎志廉奏。

㉜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四，第48页，录汪幼安文。

㉝ 严复译《原富》，第144页。

⑮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 99 页。

⑯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第 20 页。

⑰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 165 页，李璠奏。

⑱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 23 页。

⑲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 36 页。

⑳ 陈炽：《庸书》卷八，第 8 页。

㉑ 《湘报类纂》，甲集，卷上，第 12 页，唐才常文。

㉒ 同前书，卷下，第 28-29 页，彭名寿文。

㉓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 9 页，陈兰彬奏。

㉔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 10 页。

㉕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 17 页。

又，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第 29-30 页载：“若夫货殖之工，懋迁之大，駸駸乎横馭六合，并吞八荒，依古以来，莫之与京者，惟英吉利一国。其余若美、若法、若日本，若俄，若德，若意大利，皆有羡慕于英。今则德日商货多于英国，令人惊愕也。盖商能富国，国富则兵强，国富兵强，自可多置兵船，遍赴各埠，以保其商民，不为外人所欺侮，而商权愈拓，国势愈雄，其效固相因而至也。”

又，同前书，第 45 页载：“今之世界，一商务竞争之世界。商务盛之国则强，商务衰之国则弱。我国商务不能及泰西各国者，固由于缺商本，无商学，乏商才。其彰明较著也。然其中不及西人之点颇多。”

又，同前书，第 29 页载：“夫我国自变法维新而后，言政治者，靡不谓中国非立宪不能上下一心，非上下一心不能固邦本，非固邦本不能图富强。不知外国之强由于富，外国富之由于商。”

⑳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 9 页。

㉑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 1 页。

㉒ 《戊戌变法》第二册，第 245 页，康有为奏。

又，《湘学新报》第四一期，陈为镒等所论：“泰西各国，皆以经商为立国之本。故国家之视商人，不啻父兄之视子弟。寒则衣之，饥则食之，疾病则嗷咻而抚摩之。一旦国家有大兴作，大战争，经费不足，不得不贷于商人。则商人视国事如家事，亦无不各尽其力，各出其财，以尽区区报效之忧。数千百万之资，不难俄顷立集。此无他，国与商联为一气，相依为倚，无或睽隔，故能如声息之相通，指臂之相应也。中国自汉以

来，不重商务，涉历仕途者，既不屑于商务，略一措意，而峨冠博带之儒，且从而轻鄙之。谁复计及商之与国，固有绝大关系哉。况时至今日，五洲万国，通道往来，以有易无，操奇往利，咸视为切要之图。而我默守前规，仍蹈故辙，又何怪洋货之进口者年盛一年，土货之出口者日少一日，银钱外散，补救无方。”

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13页，冯秉钺奏：“第生财之道，通商为先；商务之原，集股最重，泰西诸国，其各致富强者，莫非以商务为大宗。”

⑩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一〇，第32~33页。

⑪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21页。

⑫ 《时务报》第三〇册，麦孟华文。

⑬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第4页。

⑭ 同前书，第1~2页。

又，同前书，第2页载：“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闾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断断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

⑮ 严复译《原富》，第620~621页。

⑯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17页。

⑰ 同前书，第22~23页。

又，同前书，第20页载：“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羸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私囊虽充，利源已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

⑱ 葛士潜：《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一六，第8~9页，钟天纬文。

⑲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17页。

又，同前书，第16~17页载：“且夫西学之所当效法者，有缓急有本末。当今之时，谋人家国事，必以通商练兵二者为尤亟。通商以为富，练兵以为强，国富兵强，于西学乎何有。所谓通商者，岂商贾懋迁舟车通达而已乎。所谓练兵者，岂枪炮储备步伐整齐而已乎。间尝探其原图其要，以为制造一事，为通商练兵之纲领。泰西通商所以致富者，在材货之充盈耳。泰西练兵所以致强者，在器械之精利耳。材货器械非制造不为功，我中国所产之材货，所用之器械，由泰西制造者为多。将使我中国袭其故智，效其成法，泰西所制造者我中国皆能制造之，则可以尽制造之能事乎，未也。心思愈用而愈出，机括愈变而愈精，天下之物无穷，天下之理亦无穷。而吾心之灵遂求其间而入焉，必也。取泰西所制造者，求其理而穷其故；因泰西所已制之物进而求泰西所未制之物。我中国地大物博，将见青出于蓝，冰寒于水，驾泰西而上之。制造之道，于是乎得焉。不言富而富在其中，不言强而强在其中矣。虽然是必使天下有志之士，皆殚思竭精，极深研几，以从事于制造而后可。”

⑩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三，第41~42页。

⑪ 宋育仁：《采风记》卷一，第5~6页。

又，同前书，第11页载：“其议绅虽多富商，然皆少学于书院，长有专门才艺，通达事理，优于议论者，始得举。实彼国之士流。惟中国贵农，士兴于氓；外夷贵商，士选于商为异耳。”

又，邹容：《革命军》，第15页，以中外商人比较，颇怨此政治上受扼也。文称：“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

⑫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三，第5~6页。

⑬ 严复译《原富》，第611页。

⑭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39页。

⑮ 严复译：《原富》，第126页。

⑯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四，第53页。

⑰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第35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应变之自觉

一 绪 言

近世欧洲势力之扩张，自西方所谓地理发现为起始，酝酿数百年之久，并有日渐加速趋势。扩张动力，自始与工商出路有密切关系，其原始目标，多在于海外通商关系，由是而形成以欧洲为中心推向远方之人口大移动，殖民领地，遂亦应运而生。凡亚、非、美、澳各洲，无不承此冲力，而一一化为欧洲世界寄居取资之外府。然则所谓旧大陆之亚、非，新大陆之美、澳，岂尽为无人之境，而其人又岂尽毫无文化素养。盖承西方强烈冲击之下，比较优劣，力不能抗，势不能敌，不免于败亡，遂至多数族类邦国，亦不免于永世沉沦之悲剧。

欧洲之海外发现，殖民扩张，日渐发展为全球性动力，亚非美澳各大洲，林林总总，无数民族，无不被动承受冲击，当不免各拼死力，抵御挣扎。然其结果际遇之各有差别，主要因素，实在于各国文化素养之不同。在一时期之遭遇突变，各族类惟恃其累积经验，文化遗产，以为应变之工具与手段，自为当然之事。而遇变即能观变，观变即能知变，知变即必采取应变之方，自更是表现各民族反应能力之差别。

全球人类，承受欧洲世界性之扩张冲击，所有遇变之来源相

同，机会相等。但能观变而觉察变之到临，知变而做应变之准备，有其能力者终为少数。澳洲棕人，美洲红人，渐灭殆无子遗，上天不悯，世人不恤，其族人若存良知觉悟，岂不悲愤痛哭。非洲黑人，汶汶暗暗，沦为异族奴隶牛马者达400年，终于在近20年中始有自立之机，虽稍幸于美澳土人，然400年悠悠终古，其经历何次于黑暗地狱。

虽然，美澳土人初级文化知能，其传统经验，实不足以抵挡欧洲人之冲击。但远在美国具有辉煌文化遗产之中南美洲古国，与欧洲人侵者遭遇，亦并不免亡国灭种，其历史文化绝息于天壤之间，并为人类史上之最大悲剧。而今史家所罗掘之一鳞半爪，屋础残垣，不足以述印第安史实亿万分之一，徒令后世猜测其如梦境之繁华而已。

然则高度文化古国，世界文物声名之最，若非洲之埃及，亚洲之印度，亦并难逃欧人冲击，一一沦亡而附庸于英国。旧世界之遭逢世变，其际遇同为不可幸免，然其事犹在知变与应变之能力表现而已。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埃皆能乘机复兴，盖亦信其文化之蕴蓄仍存，复国之志节未丧。其自立与应变之能力，终能持久表现，力抗欧洲之冲击。

19世纪以来，中国承受欧洲人之冲击，百余年间，实为中华民族最悲惨之经历。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剥削，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割地赔款之敲骨吸髓，鸦片之流毒遍地，国虽未亡，而我全国民众之劳心苦力，奔走终日之工作，无非直接间接供列强充实府库而已。然则中国当此重大变局，有无醒觉？如何适应？中华民族对于欧洲人之挑战，其感觉，认识，以至于适应之思考，因应之方式，均当一一探究，用以了解中国人应付世变之知识能力，以及未来之展望，乃至更可确定中国人在现时世界自立自存与应变之信心。

二 当前变局之认识

近世中西接触频繁，始于道光中期之中英贸易。至道光二十年（1840）之鸦片战争，则尤其构成历史上重大关键。自此而后之中外关系，乃西方史家所艳争之“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时代，而在中国史家省察，则亦视为不平等条约时代，或竟谓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之时代（如刘彦之专著，即题名：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就中华民族之历史遭遇而言，实为开天辟地以来所未经见之巨大变局。中国近代史以此划分为转变之起点，自然有其重大意义。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江宁条约签订以后，已有敏觉之士憬悟变局之来临。然其普遍醒觉，产生警惕呼号，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即所谓英法联军之役以后。直迄 19 世纪末叶，一直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所遭逢时代之了解。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提起所遭遇之时代，不但十分注意，而且颇热心探讨；不但议论频繁，而且颇感叹惊惧；不但关心时变，而且颇分析其内容；不但明白变局之事实，而且一致相信变局是由西洋势力之东来而产生。统计当时提出变局之言论者不下 81 人，就思想概念之传播而言，能有如此人数之言论见诸文字，实可谓影响频仍。何况若干人物申论变局意义并不止一次，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三人，生平言及变局之处均不下 10 次之多。李鸿章、陈炽二人亦均不下 5 次，故对一般读书人之影响，一定相当普遍。兹列表举证各人之言论内容，以备参考。

自表中所示观察，其时代分布之意义甚为明显，盖除黄钧宰之言论早过 20 年外，国人普遍之时代醒觉，当启于 1860 年以后，大抵历年频见，关心变局之探究者无时或忘。至其所承受之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黄钧宰	先是乾嘉间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机,即法兰西之转音。道光初,江湖贫民张画于市,幕以布而窥之,谓之西洋景。民间喜寿庆吊,陈设繁华,室宇器用侈靡,金曰洋气。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颯,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	1844	文士(秀才)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四,第3页
徐继畲	南洋诸岛国,萃抗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两地言之较详。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记载,然地名国号,展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转不如近时闽粤人游南洋者所纪录为可据	1848	福建巡抚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一,第1页
冯桂芬	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	1861	翰林(榜眼)中允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第38页
王 韬	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儿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宠羁縻之,概与之通和立约。近闻吕宋日本又将入请矣。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王氏论及变局之处,不下10次)	1864	文士(秀才)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2页
黄恩彤	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下。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覬覦,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	1865	在籍(原广东巡抚)	黄恩彤:《抚夷纪略序》

续表

人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夏燮	盖自通商议抚以来,中外之一大变局也	1862 - 1865	知县	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七,第18页
薛福成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薛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10次)	1865	文士(秀才)	薛福成:《庸盦文外编》卷三,第13页
李鸿章	日外国猖獗至此,不啻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鄙人一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李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5次)	1865	两江总督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第37-38页
恭亲王奕訢	自古中国与外国联和,从无善策。况今日外国逼近于中国都城,而又滨海沿江要害之区,节节盘踞,实为创局	1867	军机大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26-27页
瑞麟	伏查本朝之洋务,乃古今之创局,前代所未闻	1867	两广总督	同前书,卷五二,第16页
丁日昌	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日见其利,而且身受其害。当事者奈何尚斤斤为一身之利害毁誉计,不速通上下之情,而变因循之习乎(丁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3次)	1867	苏州布政使	同前书,卷五五,第25页
王炳燮	当今天下,实千古一大机括	约1871年以前	文士(秀才)	《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第31页
吴可读	前岁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东而南而西,包中国1万余里,创千古外夷入中国未有之局,其措置甚大,其处心积虑甚深甚毒	约1872	御史	黄潘:《花随人圣盦摭忆》,第131页
杨昌濬	查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30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祸心,莫不有耽耽虎视之势	1874	浙江巡抚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第34页

续表

人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王文韶	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变既出于创见,议论遂无所适从(王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1874	湖南巡抚	同前书,第52页
李宗羲	目前各国通商,耦俱无猜,实千古未有之创局	1874	两江总督	李宗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六,第62页
周盛传	历代备边多于西北,近来边防移在海疆。群夷糜我腹心,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逾千万里;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城头,渺无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1874	提督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一,第1页
醇亲王奕 譞	窃惟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海防为军旅非常创举,今日立辨,固非先著,若再因循,将何所持(奕譞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三次)	1875	醇亲王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16页
礼亲王世 铎	窃思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亦天下臣民所共愤	1875	礼亲王	同前书,第118页
刘锡鸿	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治之,今互市之局,千古创见,所以衙勒诸夷者,必惟中堂(指李鸿章)是赖	1875	刑部员外郎	同前书,第275页
郑观应	今泰西数十邦叩阙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人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3000余年来未之有也(郑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十次)	1875 ~ 1879	商人	郑观应:《易言》卷中,第22页
吴 云	火轮车路,乘坐者以为安稳快速,极口称扬。此千古未有之奇境,天方启之,人力焉得而遏之。特时会有后先,远或在于数十百年之后,近在转瞬之间,未易逆睹也	1876	在籍(原苏州知府)	吴云:《两墨轩尺牍》卷八,第18~19页
董佛翰	窃惟轮船招商,创千古未有之局,实因时事变迁,不得不为此以收中国之利权	1877	御史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9页

续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张自牧	今夫数千碾来未经见之事,数万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盘踞于腹心之地,往来于堂阙之间,此古今运会一大变局也	1877 -- 1878	驻英国二等参赞	朱克敬:《边事续钞》卷六,第1页
曾纪泽	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5000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曾言,学者得以比例而平譬之。其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曾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三次)	1878	出使英法大臣	曾纪泽:《曾惠敏公文集》卷二,第1页
王先谦	及咸丰末,泰西诸国,纷至沓来。俄人起交乘要约互市。迩来倭国狙伺,日甚一日,合十数国之从以搆难中上,实为千古未有创局。敌则求请无厌,我乃应接不暇,此亦智勇俱困之秋矣	1879	日讲起居注官	《道咸同光奏议》卷十六,第10页
罗应旒	各国之人,在吾中国者,如附骨之疽,不能剔去。出入我所,若履户庭,既不等前朝边患,有彼疆尔界之可守,则亦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使各国相通有如周列国之世,而成此大列国矣	1879	贵州候补道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70页
盛 康	仰窥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何尝一日忘其害。而遇有横逆之来,仍饬在事诸臣虚与委蛇,密修武备。此我朝所以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而安如磐石也(盛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1880	武昌道	同前书,第207页
曹中人 (真名未详)	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也	1881	未详	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第813页

续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张裕钊	若今日其尤世变之大且剧乎,天实开之,人之所不能违也。而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犹尚鄙夷诋斥羞称其事,以为守正不挠(张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1882年以前	文士(举人)	张裕钊:《濂亭文集》卷二,第5~6页
黎庶昌	中西交涉为古今一大变端,所贵审度彼己,择善而从,庶不至扞格增患	1884	出使日本大臣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五,第6页
郭嵩焘	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而50年来办理洋务,日趣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	1884	在籍(原出使英法大臣)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二,第20页
朱一新	今日之时势,从古未有之变局,非合群策群力,无以挫外夷之凶焰而折其谋,而其端则必自海军始	1886	御史	《洋务运动》第三册,第32页
于恭寿	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天地循环之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今沿革之运。至于合无可合,天乃特开一千古未有之奇局,通海道以火轮,联五洲为一轍	1886	文士(秀才)	《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卷,第11页
钟天纬	查国债之法,创自欧洲,实开千古未有之局	1888	广东候补县丞	葛士澹:《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一六,第5页
欧阳炳荣	自海禁宏开,而火船辐辏,实古今一大变局	1888年以前	未详	同前书,卷一〇三,第5页
钱 恂	自海外大小各邦,越数万里来庭,使臣互驻于国中,商船纷驰于海上,创千古未开之局,发千古未泄之奇。圣天子曲意怀柔,相与周旋盘敦,而谋国者安不忘危,一切飞艘横海,巨震逾雷,墨守输攻之技,靡不采择。盖不必斗而备固修矣。独是官礼浸亡,市廛失政,输转居积,粗绘主之。在昔中外阻绝,	1888年以前	候补县丞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2页

续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 年代	倡说时 身份	资料 出处
	或靡或绌,不逾域外,往来熙攘,一任黔黎。今则环而伺者夥,不有以应,曷补于匱,不善其术,又曷以应,则所谓时用知物者尚矣(钱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钱志澄	自道光季年,中外通商,帆樯所至,无苑弗届。创千古未有之奇局,辟千古未有之奇境。然后叹邹衍谈天之说为不诬,而数十百国星罗棋布于海外者,皆与我为敌者也	1888	上海格致书院学生(无科名)	《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卷,第39页
康有为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康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三次)	1888	文人(举人)	《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卷一,第6页
车善呈	道光年间,许泰西各国通商,逾今数十载,风气一新,凡轮船、电报、机器、铁路诸政,均已设局专理,风行海内,拓千古未有之奇	1889	浙江候选县丞	《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卷上,第28页
黄彭年	今日欧亚通商之局,从古所未有也,中国风气因之而开,亦四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也。当其未开,不能强之使开;及其既开,不能遏之使不开者亦势也	1889	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	《万国公报》,第10605页
汤震	大将以全地球属圣清,而特变一开辟以后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	1890	文士(举人)	汤震:《危言》卷四,第29页
马建忠	今也,中国创设海军,力求制造,拟开铁矿,自制芦沟桥至汉口之铁路,此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创举	1890	候补道员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6页
孙廷璋	又如中国通商局启,各处通商海口,昔为荒田,今为大埠。向之荒寂者,今变为富庶;向之质朴者,今变为繁华。此亦千古来一大迁变之奇局也。从此五都百货,光怪陆离,奇技淫巧,悦目骇心。风气既开,群相披靡,变本加厉,莫甚于斯。非又时事消长之尤显乎	1890	文士(贡生)	《格致书院课艺》庚寅卷上,第47页

续表

人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俞 赞	今日之势,匪特前古历朝所未有,实开辟来未有之局。合五大洲为一家,未可以寻常治天下之理治今日也	1890	文士(附贡生)五品衔议叙通判	同前书,庚寅卷下,第26页
李鼎颐	方今各国通商,中外一家,实创千古未有之创局。所贵不拘成格,以西学培养人材,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振兴	1890	文士(附贡生)	同前书,第31页
沽滨居士(真名未详)	今日之天下,此何如时也?此何如势也?拓千古未有之规模,集千古未有之人民,启千古未有之学问,制千古未有之器什,极千古未有之伦常。此数者且非以渐而至也,数年间焕然一新,直不啻游山阴道上,步步入胜,令人有目不及接之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1890	未详	《万国公报》,第11239~11240页
寓济逸人(真名未详)	自中原大开海禁,诸邦土商云集。朝廷大累代怀柔之效;草野逢千古未见之奇。识时之俊杰,经权之通儒,无不洞悉中西大局	1890	未详	《万国公报》,第11244页
金竺山农(真名未详)	自道咸以来,海禁大开。西瀛各国,联袂来华。陆则有火车,水则有轮船。山川失其险阻,风云逊其迅速。开四千年未有之奇局	1890	未详	《万国公报》,第11699页
董 琪	今天下五洲合一,万国联交,开上下五千年未有之风会,创东西九万里莫大之商局	1891	未详	《万国公报》,第12269页
项藻馨	当今之世,地球尽开,已成大小相维之局。我不交涉于人,人必交涉于我,虽欲闭关自守,而其势有所不能。于是商务遥通,舟车四达,重洋数万里,真若履险如夷。西人又专事行商,牵舟服贾之徒,踪迹及远,以寄旅为家,置性命货财于不顾。泰西廷议,俱重视其事。为之设官保护,惟恐措置之弗周。一遇商人受亏,小则赔偿,大则以	1891	文士(附贡生)	《格致书院课艺》辛卯卷下,第32页

续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胡家鼎	兵戎相见,以强劭弱,以大制小,尚力而不尚德。虽修和订约,载在盟书,而小忠小信之所为,万不能久长相恃,此亦风俗世界之一大变也(项氏言及变局处不下三次)	1892	文士(拔贡生)	同前书,壬辰卷上,第36页
杨史彬	自海禁开,创千古未有之奇局。自商埠盛,始中国无穷之漏卮。故居今日以衡时势,必以收回利权,方为第一要着	1892	文士(秀才)	同前书,壬辰卷下,第34页
孙兆熊	盖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限于中国,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孙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1893	文士(贡生)	同前书,癸巳卷下,第15页
李春生	今日者,时迁势徙,有生之大变局,云泥之相去也。起古之圣贤质之以时势,吾知其未有不谓当变也	1893	文士(台北名士)	《万国公报》,第13485页
严 复	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趣而逆睹其流极。惟知其所由趣,故后天而奉天时;惟逆睹其流极,故先入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严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四次)	1895	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直隶候補道)	严复:《严几道诗文集》卷一,第1页

续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蔡尔康	朝鲜有事以来,中国创巨痛深,为万方千古之变。深识之士,推原祸始,察度病根,知强大之困于弱小者,惟在仇视外人墨守古法两端。诚使急为改图,效法日本如孔子师郈子故事,席富有之大业,广日新之盛德,不三十年,誉满寰中,威行天下。从非反乎之易,直如操券之致。区区日本,何足介怀	1895	万国公报 主笔	《万国公报》, 第 15283 页
殷之轺	中西之交,从古未有之局也。言文迥异,风俗各殊。向之远隔重洋者,今皆近若比邻。通商数十年来,虽亦式好无尤,而齟齬处正复不少	1895	格致书院 肄业生	《万国公报》, 第 15473 页
陈 焯	而惟今日之洋务,开古今之大变,为耳目所未经,欲闭关绝市而不能,方合纵横之是惧(陈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五次)	1896	户部主事	陈焯:《庸书》 卷五,第 3 页
王树枬	今天下世变亟矣,人非其人,政非其政,识时之杰,类能言之。而人与政终未能一得其当者,则以君心之不格故耳(王氏言及变局不下二次)	1896	历任四川 资阳、青 神、新津 知县	王树枬:《陶庐 文集》卷二,第 17 页
卢慧章	不谓五十年来,开千古未有之局。以汽舟汽车,联万国为一家,电报新闻,列邦而晤谈于一室。他国有教化、格致、养民、安民、富国、强兵之书,我不学之,不能与之并驾齐驱也。他国有语言文字,我不学之,不能与之通商交接,协和万邦也	1896	文士(基 督教教士 麦吉茄湖 助手)	《万国公报》, 第 15815 页
沈 学	大清列圣御世,风气大开,萃万国之冠裳,通五洲之轮舰,极从古未有之世界,启从古未有之变局	1896	文士(无 科名)	《时务报》第四 期。
何绍休	大惟我朝华洋交涉,开前代未有之局。命旱使游历海国,兼交涉事务,无不事事仿行,新中华之耳目,开小民之衣食,则虽前代雄才大略之主,亦未能如我朝之盛也	1895 ~ 1897	文士(秀 才)	《沅湘通艺录》 卷三,第 20 页

续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刘善涵	庚申之变,畿辅仓皇,此中国受侮之一大变局,正中国自新之一大机会也(刘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1895 - 1897	文士(秀才)	同前书,第44页
涂儒菴	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涂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二次)	1895 - 1897	文士(秀才)	同前书,第45页
李玉如	自中东战事兴,而朝鲜立为自主之国,此亚洲之大变局也	1895 - 1897	文士(秀才)	同前书,卷四,第29页
田梓材	呜呼,今日五大洲之局,诚开辟以来未有之奇事也	1895 - 1897	文士(秀才)	同前书,卷五,第58页
周传德	故以今日例春秋,中国犹晋也,俄犹秦也,英犹楚也,法德犹吴越也,合地球九万里,而为会同朝聘之局,固开辟来衣冠玉帛之创见哉	1895 - 1897	文士(秀才)	同前书,卷四,第25页
盛宣怀	然数极则还,理穷必变;运会所值,天与人方迭起以相胜。而已然之迹,无衅可乘。于是日辟其,以创千古未有之局。特治安既久,又形势隔阂,非浸溃无以尽变。故中叶以后,萌蘖于川陕之乱,决裂于虎门之役,犹未已也。至大整稽诛,流毒遍天下,神州纷扰,神瀛积溢,迫极于庚申之祸,从此梯航交错,机巧日滋,景教流行,贡言频至。天更降割多难,俾宫廷忧劳顾虑,而无可如何。盖自七十七年来,变故迭乘,始成积重难返之势。迨至东溟一蹶,危逼群争,天乎人乎,则诚有不可知者矣	1897	大理寺少卿	《皇朝经世文续编》编次书后。
观海堂主(真名未详)	而五千年之大局至今一变。当海禁未开之前,准中国史鉴之褒贬予夺,措则正而施则行,不见其有所窒碍也。迨海禁既开以后,史鉴之昔所谓是者,今日或觉其非;昔所谓非者,今日或知其是	1897	未详	《万国公报》,第16720页

续 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徐 勤	方今中外大启,万国杂沓,环球而国者五十余,聚群而居者十五万万。凡所以强国体、开民智、通异域、审外情者,莫不竞相群效,不遗余力。而新政、新艺、新学、新理、新例、新法之事,曾日出而不穷。故知识之未开也,则学校以教之。人才之乏绝也,则科举以求之。上下之隔阂也,则议院以通之。商务之不盛也,则互市以广之。诸国之不通也,则使臣以通之。山川之阻塞也,则铁路以至之。河海之辽远也,则轮船以达之。掌故之未审也,则缮译以明之。地形之未谙也,则地学会以参之。时事之未知也,则馆报以周之。物产之未识也,则博物院以考之。器械之未精也,则工艺厂以成之。兵力之未足也,则兵籍以厚之。所以济千古之奇局,御大地之奇变,守自主之大权,定均势之要义,享同沾之利益,齐平等之公法也	1897年以前	文士(秀才)	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下,第27页
黄协坝	自西人航海通商,历五十余年,朝野上下间,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	1897	未详	《自强学斋治平十议总序》
刘被麟	方今世变已新,地力回转,推全球屡变之运,将穹而返之古初;合五洲纵横之机,必萃而归之中土。吾友梁卓如(梁启超)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变之在人,不如变之在己	1897年以前	未详(康有为弟子)	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下,第31页
唐才常	天下一大变局也,雕虫之儒,测蠡之识,昧于通变狃于故常,不思维新,动曰守旧,夫轻议旧法,妄事改更,愈更愈纷,愈改愈敝,于为政大体,未见其能有济也,至不问其善与不善,概曰守旧,守之不善,势必至盲其目,聋其耳,塞其口,孰其鼻,拘挛其手足,桎梏其心思而后已,噫!是一大病也	1898	拔贡	《湘学报》第三十二册

续 表

人 物	当前变局之认识	倡说年代	倡说时身份	资料出处
张之洞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	1898	湖广总督	《劝学篇序》
蔡镇藩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万国交通,古今创局,通则必久,断无复闭之时	1898	户部主事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第17页
谭嗣同	中国艰危,曾土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变。然吾约计开辟以来,战国与今日遥遥相映,时局虽皆极危,却又是极盛之萌芽	1898	候补知府	《谭嗣同全集》,第128页
皮锡瑞	今五大洲通而为一,乃古来未有之奇变。天地之气运,一变至此,人何能与天地相抗,能迎其机而自变者,其国必昌。不能迎其机而变者,其国必亡。至于国亡之后,必别有人代为之变。俄之彼得,日本之睦仁,能迎其机而自变者也。既有其机,则必不能遏而不行;既有其法,而人以为便,既有其物,而人见为利,则必不能废而不用。必欲遏之废之,不肯自变,将来亦必终归于变,此天地之气运如是(皮氏言及变局之处不下三次)	1898	南学会学 长(举人)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第28页
黄 蕙	衣裳局变而兵战起焉,兵车局变而舌战起焉,今中外联属之局一变矣	1898	未详	同前书,甲集卷中,第8页
熊崇煦	有志者尚当整励农工,开关通市,以商力争衡五洲,不待彼来争而我预争之,不待彼来战而我预战之。通千古之变局,立富强之始基,此亦黄种大快事也	1898	未详	同前书,甲集卷下,第42页
聂缉椽	自海钥大开,门户洞弛,绝域之节驰于路,番使之辎交于市。纷纭辘轳,稍失之疏,诸夷环起而乘之。盖智取力争之世,至于今而变益甚矣。是故莅今日之天下,而欲转弱为强,转贫为富也,无他,以学培人才,以兵振国威,以交涉联邻邦耳	1902	安徽巡抚	《道咸同光奏议序》

外力冲击，所感悟之时势参考，很明显当以英法联军之役，乃至订条约，付赔款，开商埠等等，均为具体可见之根据。当时人之提论变局创局者，无非以西方之扩张动力为重要根源，中国历代言变者，无此时之频密，亦并无此类之前提。且在有清一代，何以竟在此时热烈讨论，显然反映其严重之时代意义。

至就表中所列人物之身份观察，自尤值追索讨论。除其中5人用笔名，不详姓氏，另有5名不详身份，合计10人。其余则80%可以充分获得了解，故可靠程度，当无疑问。其中足以影响国政之权要，则先后主持清朝国政之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均有变局之醒觉。次要则执行政令之督抚，包括南北洋大臣，共有8人，对于当前变局亦有所觉察。此11人者，虽在总人数中约占17%，而实为时代中坚，全局重心。国家领导人物有时代敏觉而认识变局，对于国家前途，当然会清醒地思考因应方略。此外则一般京官，包括御史、主事、日讲官、员外郎，共有9人，对时代变局有清楚了解。京官言事，固然可以对国事有所建白，然更实际之影响，自在乎化解京官中茫然无知之气氛。至于中下层之地方官，自藩臬以至道台、守令、杂佐，共13人，代表中下地方官吏对变局之醒觉。再加使领参随4人，合之为17人，为数益可观。然观其全部仍以科甲出身之文士占最多数，包括举人、贡生、秀才，达24人之多，相当于总人数1/3，当知一般下层知识分子时代醒觉者相当普遍。若再加商人1名，无科名者6人，合之共有31人，故一般关心国事之下层人物，实占一重要多数，足以反映民间对变局之觉悟。

当时官绅士庶自上至下，均有世变之醒觉，并发抒言论，提示警惕，以呼唤国人之注意。有此至少81人之宣述变局意义，且有频频不止一次之立说，载诸当时流通之文集、奏折、书牘、日记与报章之中，其传播国内，必为广众士庶阅读。盖凡书籍流

通之地，即必承受影响。就此历年频见之连续性，亦足以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时代之共同醒觉。

再进一步观察有关变局言论之性质，究竟从何处反映变局之实义，自为当时人认识变局之重要依据。于前项表列所见，再加未收人表中之变局言论，总括大致意旨：则首要最占分量之重点，则在于对西力东渐，特别是中西接触后一个新世局之了解。兹略举数例，以为佐证。如王韬所见：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致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不重东南。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尽舟航之利，历环瀛之远，视万里有如咫尺，经沧波有同衽席；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①

如曾纪泽所见：

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以势较之，如中国已能自强，则可似汉唐之馭匈奴、西域、土蕃、回纥，若尚未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絮大耳。彼诸邦者，咸自命为礼义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亦诚与岛夷蕃苗獯豨情势判然。又安可因其礼义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之耶？^②

如项藻馨所见：

自欧美东来，大局一变，西人越重洋数万里而至亚洲，进退皆非易事。今见南洋各岛，地土之沃饶，人民之富庶，物产之丰盈，宝藏之充物，甲于他处。正可视为东道主人，供其匮乏。于是经营开辟，尽据各岛，以为属地。既庶既富，大非昔比，阴撤中国之藩篱，竟属西邦之外府。^③

其次一重点，对于变局之了解，则反映在西方工业技艺对华之巨大冲击，特别是兵器轮船之显著优势。自视为变局之到临。兹举数例，以为佐证。如李鸿章所见：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④

如盛康所见：

自轮船跨海而东，互市者十数国，其兵艘之利，器械之精，为开辟所未有。^⑤

如刘善涵所见：

今则海禁既弛，风气大开，泰西各国，挟其器数之学，航海来华。百十年间，而耳目心思为之一变，是故耒耜也，易为机杼；弧矢也，易为枪炮；水陆舟车也，易为汽轮之周转。合地球九万之遥聚于中国，此古今之创闻，天地之变局，而天之启中国，强中国，欲使中国崇向新法，所恃为生

死肉骨之具者，亦即寓于此。^①

又次一重点，则承西方来通商之大势，而就其以商立国之了解，并感悟其对华之腴削，故而视为中国所遭遇之空前变局。兹举数例，以为佐证。如郑观应所见：

洎乎海禁大开，中外互市，创千古未有之局，集万国来同之盛。轮船云屯，货贿山积，商之势力大者，往往足以把持市价，震动同业。下至淫巧奇技，亦领异标新，锥刀竞逐。穷天地之精华，竭闾阎之脂膏，熙熙而未者，不皆禹甸九州之人也；攘攘而往者，无复震旦三教之士也。彼方以国护商，群恃中华为外府；吾犹以今况古，不知商务之匪轻。天下滔滔，谁为补救哉。^②

如孙兆熊所见：

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至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其财充裕，其力无不足，而其国又为设官戍兵以资保卫，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③

如陈炽所见：

盖今日万国通商，千古非常之变也。^④

以上三种主要重点之认识，显见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变局意义的把握。列国并立之世界，中国为强国所环伺，遭此列强侵夺压

迫，固已警觉时势环境之急切。同时并认识到西方致富强而拓殖海外者，其所凭恃在于工业器械之精良，商业拓展之主动而积极，此实形成世界变局尤为根本之所在。由是而可见出当时人对于变局之实质了解相当透彻。除此三端主要性质之外，并有人认为鸦片之为害，给予中国带来重大变局者。兹举数例，以为佐证。如薛福成所见：

夫洋教洋烟骤入中国者，气运之变也。斟酌情势，默寓挽回之术者，君相之柄也。^⑩

如钱恂所见：

惟印度所产洋药，流毒中国，英擅其利而无其害。是彼倚印度为外府，以饵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又不当以通商论。罄各国茶价，不足偿此鸩毒，可胜慨哉。^⑪

鸦片之流毒中国二百余年，真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之毒劫，并构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之一项重要因素。

三 运会观念之应用

19世纪中国思想，广泛表露变局之警觉，充分显示对所面临时代之敏感。就抒论之人物以至创说意旨考察，均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时局世势之关心。然进一步追求，则于此等实体现象之产生，存在若干必要澄清之问题。首先须问，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会有变局的警觉？其所依恃之知识为何？就此问题探究，不免更引进一层，而须向中国固有传统知识中追寻。即要问：中国传统中有无变之观念？与巨大世变之经验？固有知识中变之基础为

何？变之理论为何？变之教材为何？总体重点，则要探求近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中变之知识之应用。

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认识世变之到临，多基于传统知识。自然依据一定之思考程序，与参验之史例。最古老之理论，本之于《易经》，用其中推衍天地人生变易之理，处处重视时间与某时间内之地位。曾国藩领悟易理，有谓：“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豪不得以人力与间。”^⑫《易经》为儒家经典，后世读书人视为必读之教材，故其理论深入人心，并有广泛影响。无论其实质上是否为真理所在，然被中国知识分子长久依信，应用于处世治事之依据，乃为厘然之事实。

世变之另一理论，创于宋儒邵雍，即后世学者惯用之运会观念，运会完全基于有秩序之时间变化观念。邵氏创说基本，依于一年中年月日时四种数字。并假定30年为一世，12世为一运，30运为一会，12会为一元。然后配合推衍，用来表示世、运、会、元之终始^⑬。19世纪知识分子，讨论世局变化，遂即广泛应用，而成为解释变局之一种“运会说”。用此说明世变之乘，出于天地自然之运转，人力只能顺应其势，而无法与之抗拒。王韬即借邵雍运会理论而应用于解释地球宇宙之终始，如其所言：

间尝笑邵康节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旨哉言乎。顾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

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⑩

就遭逢世变之经历而言，中华民族是数千年来饱受丧乱之苦的民族，对于历史上重大变乱之经历，有深刻感受，史实参考，相当丰富。盖中华民族之自立壮大，绵延数千载，实表现其适应巨大世变之坚韧性。历代遗留丰富的史例，足备个人国家之各种参考，使有知变之警觉。抑且《易经》之教材为广众知识分子所必读，其在变易之理论中，实并教人以持恒原则。持恒为何？所谓“自强不息”是也。盖于万变之世，实自有一适应之基本宗旨，就是“自强”。信守易道与孔子之教，遂至而能养成安定观变之修养。

19世纪中国学者，解释变局之理论，进而亦形成一个学说，即所谓“运会说”。当然是用传统固有成说，解释当时剧变之世局。故以“运会说”讨论中西开展之世局者甚众，于此仍可列表明之（以下表中所列，计19人，而提倡“运会说”解释变局者当不止此。前节列表中多有相同之说，其中至少尚有三人未再列于本表。盖其言论既已见前，本表自不复重列）。

“运会说”之应用于解释近代变局，表达出几种理论功能。其首要，在就时间运转之自然规律而视世变为天地必然之数。中国自古传统沿承下来，是以人与天地配合，人与天地共为自然总体，或人为天地所生所育之支裔。中国人之一贯信仰，是顺应自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与自然为一家。至于人事庶政，均与天地自然息息相关，必须顺其势而乘其利，始能获得大益。故面对近代变局，就其自然发生之势，因应利用，实最为明智。且就固有知识与信仰，亦必当顺应时势之巨变。兹举当时数例明之。

人物	引据运会说解释当前变局	倡说年代	资料出处
魏源	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随体,其自西而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赋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无一登于王会,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船,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	1842~1847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总叙
王韬	窃以为当今远方毕至,光气大开,海船估艘,羽集鳞萃。泰西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变局,运会之转机。怀奇抱智之士,尤不思幡然为自强计。集各国之人才,以供一国之用,正在今日。此某所以望阁下兴大利除大害也	约 1868 - 1870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23页
薛福成	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重洋之外,魔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	1875	薛福成:《庸盒文编》卷一,第19页
郭嵩焘	自道光二十年与中国搆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年再搆兵,而电报经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估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1876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第1页
曾纪泽	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	1878	曾纪泽:《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一,第8页

续表

人 物	引据运会说解释当前变局	倡说年代	资料出处
曹秉哲	窃惟法贵因时而制宜,事可取人以为善。方今之务,以海防为最要;欲办海防,莫先于筹款项;欲筹款项,莫大于采煤铁;欲采煤铁,莫便于用机器。臣闻泰西诸国,创造机器,凡织布匹、制军械、造战舰,无不用之,故日臻富强,争雄海外。千万人所不能动之物,机器可以运之;千万里所不能达之路,机器可以达之。此亦天运使然,非西人所能自主也	1878	《洋务运动》第七册,第359页
丁宝祜	窃惟外洋各国,皆以枪炮雄视一时,机智一开而不可复塞,殆亦天时人事之所趋,中国固未可置之于不讲	1879	同前书,第四册,第344页
张裕钊	泰西人故擅巧思,执坚刃。自结约以来,数十年之间,益铸凿幽渺,智力键起角出,日新无穷。其创造舆舟兵械火器,暨诸机器之工,研极日星纬曜,水火木金土石声光气化之学,上薄九天,下颀九幽,剥剔造化,震撼神鬼。申法警备,确若金石。发号施令,疾驰若神。又以其舟车之力,穷极六合四远,五大洲之地,无所不洞豁。徜徉四达,竞相师仿。精能倣诡,甚盛益兴。天地剖泮以来,所未尝有也。盖尝论天地之化,古今之纪,天人相与构会,阴阳以之荡摩,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推移	1879~1882	张裕钊:《濂亭文集》卷二,第4~5页
屠仁守	夫铁路为自古所无,行于西国亦近在数十年,国争富强,人趋利便,日推日广,其势渐及于中土,此其中有天运焉,有人事焉,岂能阻哉	1888	屠仁守:《屠光禄疏稿》卷四,第13页
王文韶	窃惟古今有不易之治理,无不变之治法。理为有生所莫外,法贵因时而制宜也。时至今日,中外之交涉,为千古未有之创局,因而风会之迁流,遂多千古未有之创举	1889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34页

续表

人 物	引据运会说解释当前变局	倡说年代	资料出处
汤 震	间尝推古今之元会,观天下之大势,而叹互市之局,殆将长此终古矣	1890年以前	汤震:《危言》卷一,第8页
张 玠	道咸以来,欧亚互市,洋务盛兴,气运使然也	1891	《格致书院课艺》辛卯卷下,第43页
郑观应	夫水行资舟,陆行资车,古之制也。民生自然之利也。至今日而地球九万里风气大开,以日行百里计之,环球一周,累年不能达,文轨何由一,声问何由通乎。天乃假手西人,以大显利用宜民之神力。于是而轮船火车出焉,以利往来而捷转运,风驰电掣,迅速无伦,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	1884~1892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篇》卷五,第6页
严 复	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淳淳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	1895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二,第23页
涂儒晋	昔孔子之修春秋也,所传闻世,攘夷。所闻世,进夷。所见世,夷会盟书,交聘书,征伐书。书传所纪,其始也,未有非外夷强于中国以相逼也;其终,未有非外裔进于中国以相一也。时也,亦天也	1895~1897	《沅湘通艺录》卷三,第45页
戴丹诚	呜呼!时至今日,欲闭关而治不可也,欲教之为亦不可也。盖气机所开,虽天地无可如何。以地球五洲之国互相往来,而欲以区区中国塞之,能乎,否乎!如知其不能也,何不合中西之法而变通之,师人之长,去己之短,使西人之不我欺,而后已乎	1895~1897	同前书,卷四,第20页

续表

人物	引据运会说解释当前变局	倡说年代	资料出处
唐才常	不知机器者,天之假手西人将宏脑气之用于地球,而积阿屯姆(atom)力以开新运者也。虽圣人复生,亦当因其自然而利道之,以予民自存之业。岂能随世俗徼倖之习,如西土所谓沛根(pagan)人者哉	1895~1897	同前书,卷四,第57页
刘桢麟	大地之转机,百年以往,由东而趋于西焉。百年以来,由西而趋于东焉。千年以后,合东西而为一焉。百年以往,吾得观之史氏之言;千年以后,吾惟俟之蓍龟之验语曰:“夏道不亡,殷道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吾今且谬为之语曰:“亚洲不蹶,美洲不兴;欧洲不亡,地球不一。今百年之运,其在斯乎!”	1897年以前。	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下,第63页
皮锡瑞	计欧洲之强盛,不过三四百年,其创立机器,不过百年。百年以前,其所用火器舟车,无大异于中国。然则其创机器以横行五洲也,亦天地之运气大变,将肇开大一统之象,而不可遏抑也	1898年	《湘报类纂》乙集下,第27页

如薛福成所见:

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术以处之,然后不为气数所穷;事之在人者,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⑤

如郑观应所见:

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况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

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輿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噫！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力行既久，成效自征。^⑥

如王树枏所见：

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人也。天与人相逼而机著焉，机与机相触而变生焉，变与变相乘而法立焉。天既特示以变以开天下之人，人即不能不特求一法以应天下之变。其始自一二人唱之，其终遂至千万人和之；其始自一二国创之，其终遂极于五洲之大万国之众莫不因之。由其法则强，不由其法则弱；由其法则富，不由其法则贫。此其中盖有天焉。独我中国孑然孤立于群雄环萃之间，一仍其旧法而不之变。久之，而以我之法治兵，而兵益弱，以我之法理财，而财益绌，以我之法辟土地，而土地日益削，以我之法饬纲整纪，而纲纪亦日益乱以弊。我之法若此，而人之法则若彼，相形而惧心生焉，复相逼而奋心出焉，此则又变者机也。^⑦

如涂儒嵩所见：

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道体夫理，理寓于气，气运则有数，消之息之，与时宜之。其究也，气不胜理，道行而可以胜数。是故三代以来，制作大

备，文胜则欲生，欲生则私长，私长则以利害义。是谓之气胜理，道乌得不敝。道敝矣，争夺攻取不可一朝居，数极而不反于道未之有也。道非有变也，世变而道与俱变，变而通则久。自上世圣王，未有不因革损益与时俱新者也。知中国则知泰西矣，知西则知中矣。^⑩

其次一理论功能，则就运会既知世变之必然，自当提高警觉，采取应变之行动。其功能乃在于提出警惕，不稍犹豫。运会之推移，变局之降临，正关系到国家盛衰，民族安危。主政者尤当警惕小心，因势利导，用以避免巨大灾祸。既须知所进取，以迎合天道，顺应世变。亦须知所戒惧，以避免世变之恶运。兹举数例明之。如王韬所见：

余三年中往还皆取道于法境，故得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糜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情，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呜呼！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喜选事，善用兵。欧洲全局视之以为安危。列国于会盟、征伐诸大端，无不遣使集议于其都，而法为之执牛耳。其国威兵力，足以慑人，盖积渐使之然矣。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虽然莫谓法无人也，一二老成人，盖有太息痛哭流涕以私相告语者。徒以职位不尊，事权莫属，虽言而不见用。自古事势一去，智愚同尽；运会所乘，才庸共奋。夫亦准诸天道，而权诸人事耳。岂由一朝一夕之故哉。论者但知法之所以盛，而不知法之所以衰，固不得为探本穷原者矣。法之盛，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并不得为弱法者咎

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⑬

如张之洞所见：

今虽越事略定，而外患方殷。法逼滇桂，俄窥珲春，且俄与倭争朝鲜，英与俄争印度，英与德又复分踞朝鲜各岛。伺便攘臂于其间，四夷斗争于中华洋面，而我亦将受其敝。故海防诸大端，天时人事，无可再缓。^⑭

如严复所见：

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Adam Smith）此书之功为多。观英相弼德（William Pitt 于 1804~1806 任英相）自云，必读斯密氏《原富》全书，而后受相位。一言为知，岂诬也哉。窃尝谓：凡此皆运会之事。运会既丁，虽斯密氏未为《原富》，而著书言计者终有其人。欧洲 18、19 两祺（century）之中，其世事之变动而日进于光明者不知凡几。盖自物理格致之微，以至治化文明之大。高而远之，至于天运律历。切而近之，至于德行性灵之学，无事不日标新理，而古说渐衰。且舟车棧通，坤輿翕辟，殊方诡俗，日相观摩，若共井里。聪明之用，日月俱新。夫如是之民，谓徼斯密氏之书，犹昧于食货之理者，吾不信也。故吾中国之处今日，其常忧于无救，而卒为棕黑二种之续者，病在自黜聪明，不察理实已耳。至于专利顾私之害，犹其轻焉者也。^⑮

再次一理论功能，则凡言运会以测世变，最后归趋，往往必提示其所预测之未来。此种判断未来，非预言家之直觉可比。盖

凡观测变局，虽在能知变，亦并非必探测变之性质，变之频度，变之原动力，以至变之发展趋向。进而自不免推测变之影响，是即未来之预估也。当时言论，多表示预见未来中西之混同，世界之统一。兹举数例，以为佐证。如魏源所见：

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驭，必有于《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②

如郑观应所见：

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考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洎秦始并六国，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以后，虽盛衰屡变，分合不常，然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耳。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又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③

如汤震所见：

互市之开，天将合地球而一之。^④

回观运会说之传承，以至近代人士之应用，或不免为人讥议。一则或竟视为有命定论之意。实则当时之言运会者，决不死

守一定成说，而本旨乃在说明变局意义。换言之，即引据固有理论，以便利于新遭遇新局面之认识而已。二则或不免视为一种传统迷信。然运会观念之为中国人之一种信仰当无任何疑问，惟至迷信而言，则并不谓然，尤以近代人士之应用，多在申明天地自然之力量动向而已。三则或不免视预测未来为神秘之巫术。然当时人本诸运会而推测未来者甚众，其所根据多依恃对于世界情况之冷静观察，对于中国历史事例之参考，其判断未来，虽不免有似直觉而得，但就世界发展趋势言，此种预测，亦难能断然否认。虽然实际上世界尚未混合于一统，而当时中国人士则早已大胆申说，并确信其终会合而为一。但关于此种兴趣此种自信之产生，实均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素养有极深关系。

四 应变之理解与适向

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既知变局之降临，复以运会说解释世变之必然，而终究目标，实在于应变。近代中国承受西方冲击，无论被动主动，理性与非理性之反应，其必须应变，亦势不能免。然则重要意义，实在于有无应变之自觉。自觉启于正确之认识，促使观念改变。自觉并直接增强信念，祛除犹豫，形成应变之意愿。而一切适应之方式，变革之设计，均必以此自觉为重要原动力。

中国知识分子于应变有所警悟，有所自觉，以其变局之认识与世变之理解为出发点，当由其不可避免之趋势与需要，自然会进入应变之思考与行动。一般面论，其自然之直接反应，并必采行以变应变之途径。盖因势利导，乘西方冲击之动向，纳入同一潮流，自最为方便。固固有方术，不足以抵挡西方强势之冲击，已为显见之事实。检讨固有治术，适应世变之得失，当为以变应变思考之起点。如陈翼为之检讨：

自通商以来，泰西诸国，接踵四裔。有火车轮船以通其道，民固不以欧西为远。然则今之天下，固中外争民之时也。处今之势，治今之民，欲以秦汉唐宋之制行之，固不可得而理矣。^⑤

如康有为之检讨：

况当十数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⑥

如薛福成之检讨：

夫今日中国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能进也。士大夫方敝敝焉为无益之学，以耗其日力，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闻非常之议，则群臧以为狂，拘挛粉饰，靡有所届。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其决机趋事，如鸷鸟之发。如是而外国日强，中国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为也。今虽贤王勳臣内外夹辅，仅能补苴措持，一二十年后，吾辈恐来得高枕而卧也。^⑦

三人俱在明白检讨旧制之不足以应付变局。然则更具体检讨，何者尤为应变无效之旧制？郑观应则直接批评到八股文之为害：

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则时文重而西学轻也，上之所重，下必有甚焉者矣。上之所

轻，下必有不屑为者矣。若夫胡曾诸巨公，皆少年登第，抛弃八股敲门砖，重研精于经济之学，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是科第以斯人重，非人材从八股出也。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②

由此种检讨引申，亦必自然进入以变应变之思考。

中国知识分子固已深彻检讨自身固有治术，而尤关重要之点，更在于参考彼西方挟以自恃之事物，自然趋势，亦不免产生仿习之意。若薛福成之观察论断：

顾臣观西洋大国图治之原，颇有条理。英俄法皆创国数百年，或近千年。炎炎之势，不始今日。今其制胜之术，屡变益精。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窥敌则变而用气球矣，照夜则变而用电灯矣。专家之学，互殚智力，往往能制驭水火，呼吸风霆，新艺迭出，殆无穷期。^③

若王韬之论断推测，尤为精审：

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船，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杼。虽刀矛枪炮同于用兵，舟舰轮船同于航海，车马火车同于行陆，器具机杼同于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病，

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絮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况彼之有是四者，亦不过百年数十年间耳。而被及于中国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准诸天道，揆诸人事，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③

若李元鼎之论断：

格致者，制造工艺之本也。《考工记》虽不言格致，而所记之工，若攻木，若攻金，若攻皮，若设色，若刮摩，若砖埴，莫不详究利弊，揆合时宜，亦何非格致之理。西人窃其余绪，加意研求，遂易人力为机器，而其格致乃精。如织机、染机，以及耕种、陶冶、浚河、开矿、印字、造纸、制糖、吸水、缝纫、制枪炮、造舟车，莫不有机器。乃叹今天下一大机局也。能以机心运机器，则富而且强，不能以机器从机心，则贫而且弱，然则机器制造，关系岂轻哉。^④

则知仿习西方器物，即已自然进入变之行径。不惟器物利用须变，而通商贸易，亦须仿习西方。如王韬之所见：

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此固尽人而知者也。抑知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东南洋之通于中国，则自明始。由是其国愈众，其路愈遥，而所为

貿易者其術亦愈精。^②

當時既以明顯之改變工商入手，實必自然更易發展至於改變法度。以變應變之言論，尤深切著明。既欲以變應變，亦自不免直抒變之意旨，以變之本身為中心論題，甚至進而申言變法。如鄭觀應所言：

惟今昔殊形，遠近異轍，海禁大開，梯航畢集，乃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君相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變而通之。^③

如醇親王奕譞所言：

竊維方今時局，為自古所未有，欲弭非常之患，必有非常之法；欲法之暢行無阻，必須群策群力，內外一心。^④

如王韜所言：

天心變于上，則人事變于下。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航海東來，聚之于中國之中，此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諸國既恃其長自遠而至，挾其所有，以傲我之所無。日從而張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軋以相傾，則我又焉能不思變計哉。^⑤

就審慎之思考，冷靜之觀察，并就運會觀念之判斷，而知天時地氣，帶來重大之變局，乃人力所不能抗拒。本之于此，尤使應變之理解更加深徹，人們以變應變，其信心亦更為增強。王韜申述天心世運，以支持其所謂“一變之道”：

鄙人向者所谓天地之创事，古今之变局，诚深忧之也。盖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胥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足下以为然乎否乎！所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也。^⑧

薛福成申述圣人应变之道，必亦与时无穷：

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擲数千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篲，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⑨

以必变之信心而肆应变局，本之天心运会，正为中国古老传统中之哲理，是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基此观念，所为变者，实所以争中华民族之生存延续，而志士所须剖肝沥胆必求力争者也。如陈炽所论：

天下之人，颙颙然虑铁路轮舟夺小民之生业者，皆不知天下者也。夫火轮舟车电报三事，天为之也。天假手于西人以成此他日万国会同之法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先天者兴，后天者废。天之智奚不若人，天之仁奚不若人。而能以好生之心为杀人之具乎。故小民之生业移而已矣，

夺则未也。拘眉捷之见者，悄悄然疑之，皇皇然禁之。而吾民之生业乃真为他人所夺矣。且举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物业，皆将见夺于他人矣。何则，彼富而我贫，彼强而我弱故也。其所以一富一贫、一强一弱者，则轮舟铁路一行一不行焉故也。^⑧

如严复所论：

嗟乎！二三十年以往，假炎黄种族，犹足以自存，则吾之所以与彼力争者方炽。立后来之基址不难，去当前之阻力难。去当前之困难矣，而救前人之失计，乃尤难也。顾此数十年之间，将瓜分鱼烂而破碎乎！抑苟延旦夕而瓦全乎！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视乎天心之所向，亦深系乎四万万人心民智之何如也。后此之变，将不徒为中国洪荒以未所未有，其大且异，实合五洲全地而为之。夫岂不佞区区之智，所能逆睹而预策之者哉。虽然，有可知者，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何，自然之机，必至之势也。阅今而考古，格物而致知，必求真实而后已者，凡为此耳，夫非妖祥咎征之谓也。吾党有志图存之士，其求深识此所谓天者。^⑨

然则以变应变，实自有其一定不变之目标，并非如水中飘萍任随风势流转。

至于应变之中，其根本仍含有不变之宗旨，所为一切之变，绝非无意识之随波逐流，而目的在保持民族之存续壮大。基此目标，自须随时代做各种适应。不变之最终目标既在，仍尚须有坚持永恒之精神力量，实为应变所必需之潜在动力基础，此一不变之基础，即出于古老之传统教材，是《易经》所谓：“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然“自强”之于中国近代史中，实为重大论题，在此不能展开讨论，但就应变而言，“自强”即为一持恒不变之动力源泉，必须有自强之基础，方足以有能力适应世变。兹为略举当时人之见解。如王韬所论：

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渐灭，可不惧哉。夫古今无异治，强弱无异民。非古之强远胜今，亦非今之强远逊古。善用之则强，不善用之则弱。然而强弱之势已形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而迟速久暂之间，审几者每不能决之于操券。则以守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渐，未弊则彼将先乘以困我，未渐则彼将先发以难我。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撓。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④

如薛福成所论：

夫疾疢之在身，暴客之伺睨而入室。人孰不憚焉恶之哉？恶之益笃，则不能不储药石，戒守备，以薪所以自全者。今讳疾而迁忌于医，憚寇而不知所以御之，吾恐变患之无穷期也。夫变已深而抗之过激以僨事者，躁也。坐视而不

豫为之谋者，玩也。欲求御变之道，而不务知彼知己者，瞽也。方今海外诸国，力与中国竞者，曰英、曰法、曰美、曰俄、曰德，其他往来海上，无虑数十国。中国之情状，彼尽知之矣！而其炮械之精，轮舰之捷，又大非中国所能敌。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敷。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焉。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中国之变，庶几稍有瘳乎！^④

当然，同此时代论道与器者，本与末者，亦并常分别讨论变与不变之旨，实又属于中体西用论之范围，此处尽可略而不论。

再进一步探讨，须知近代知识分子言变，其应变之最后宗旨，当不止在于维持国家民族之存续，实更可推衍更远大更乐观之展望。质言之，应变之最后目标，正在于为中国未来开创一个光明远大的新局面，应变之重大意义即存乎此。兹举数例，以见当时人之论断。如李鸿章所言：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语曰非常之原，黎民俱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⑤

如王韬所言：

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则其效易于速见。惟恐识见拘墟，智虑浅薄，以为舍己从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贵变通，势无中立。今在中土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则庶不至甘居乎西国之后，至于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阅万世而不

变者也。而又何疑焉。^③

如薛福成所言：

夫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虞。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交涉之事，日繁一日，应付之机，日难一日。诚不知何所底止矣。惟是通变方能持久，因时所以制宜，伊古盛时，或多难以保邦，或殷忧而启圣，臣愚以为，皇上值亘古未有之奇局，亦宜恢亘古未有之宏谋。^④

今既上下努力以求应变，并立意开创新局，其宗旨动向，当不免自然走上现代化之道途。

再进一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既多申言应变，何者方向为其所采取，亦即须知应变之适向为何？一般言论，大致所趋，均不免以西化为必取之途径，即是吸取西方知识。凡所谓师夷长技，西学、工艺，以至新学，其对象终不外乎欧美固有之知识技术。在当时中国言论中，殆即随处可见。此一情势，自正反应以应变而采取西化之适向。至于应变之决心如何？西化之信念如何？兹附列一表于后，以明其实状。

就表列诸家言论观之，其于必须应变之理解与决心，以及应变途径采行西化之信念，均表达得十分清楚而坚定。虽然，由于近代西方文明之冲击，应变是不得已之行动，西化亦为不得已之选择。根本宗旨，自在乎充实国家实力，一切仍为中国本身之存亡利害作算计。盖凡古今大智圣哲，遭此际遇，必不免循世界潮

人 物	应变之决心与西化之信念	倡说年代	资料出处
李鸿章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	1872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6页
沈葆楨	窃以为不特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此针对制造轮船而言)	187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六,第20~21页
薛福成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1879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48页
罗应旒	西人之法例有足采者,可参用焉,而士大夫往往恶闻其语。夫老子,道也,孔子问礼,卒成至圣。高僧,佛也,延平开化,得为大儒。佛老异端也,道岂贤于圣贤哉?圣贤亦有时资之而自成为圣贤耳	1879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78页
王 韬	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故西人在今日所挟以轻藐我中国者,即他日有圣王起所藉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于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	1880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第11~12页
吴大澂	大澂好之甚笃,知之渐深,几等于三代彝器之好。盖文字尚古,器用尚新,非亲自试验,不知此中之深浅利钝(此盖针对西式之枪炮而言)	1882	吴大澂:《吴憲斋尺牍》,第35页
陈启泰	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夷洋务,置而不备	1882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22页

续表

人 物	应变之决心与西化之信念	倡说 年代	资料 出处
彭玉麟	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	1884	《盛世危言序》
何 启 胡礼垣	当今之世而不变今之法,虽使尧舜临朝,禹皋佐绩,仲由慎诺,公绰无私,加以管晏之才,苏张之辩,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	1887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论初编》,第18页
郭嵩焘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1889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第12页
汤 震	自海禁既弛,虽尧舜为之君,管葛为之臣,势不能闭关谢客。如再讳疾忌医,事变不穷,人才已穷。不特游刃有余者无其人,恐求一敷衍能了事者亦不可得。大局何堪设想。然则洋务者非洋务也,时务中之亟务也	1890	汤震:《危言》卷一,第10页
谭嗣同	嗟乎!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	1995	《谭嗣同全集》,292页
陈 炽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无不久,惟通能久;大无不通,惟变故通;天无不变,惟穷始变。故《易》者天心也,即天道也。惟明者而后能知天,惟贤者而后能顺天,惟圣人而后能先天,惟神人而后能配天。维天为大,圣人则之	1896	陈炽:《续富国策》,自叙
皮锡瑞	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司马德操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使孔孟程朱生此时,不能舍西学不讲	1898	《湘报类纂》,丙集,卷下,第9页

流而迅速仿效。若不如此，则国必危弱，民必贫困，实不足以适应世变，终不免遭受淘汰，这当是众人所关心而警惕之点。

五 结 论

近代变局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冲击一种普遍的反应和认识，当然也是一种正确的时代醒觉。不但要认清时代，而且也知道此一新时代所形成的根源，以及所面对的西方列强。一切应变之动机，与应变适向之选择，均以此种醒觉为基础，并为一切行动之动力源泉。或有学者疑虑时代言论之代表性，盖千数百人之醒觉，如何与亿万庸众比侔。实则世界上无论任何一国历史，均为少数先知先觉者之思想行为所推动，西方古今史实中，终有几人言论代表各时代之思想，学者尚可详细参酌比较，若以量而言，恐将相距本文远甚。此其一。思想之彼此濡染传播，亦如空气之流通，其感悟而承受者，一可传十，十可传百，百可传千，千可传万。决非静止不动。此其二。思想之感染，多藉文字与口说，仍不易被及广大多数之文盲，但器物之实体，事迹之历验，无论有无学识，均必承受刺激，此固先知先觉者唤起民众之最有力根据。此其三。知变应变之行动，有者著于文字，有者则直接付之行动。社会人生，固非静止不变者，知识分子或只注重思想制度，而广大民间，则常迅速采取器物利用。此其四。由是而知，中国全而应变之自觉，实为广泛普遍，决无可疑。兹举1842年江宁条约后不久，浙江巡抚刘韵珂之函札所云：

抚绥既定，后患颇多，其制作奇巧，枪炮灵便，其足以夺中国之利者不可胜算。且彼制造物件，均用机器，较中国之用人力者，固有灵钝之别，而人心之好奇者，莫不见异思迁，而用心仿效，不下万人。^⑤

官绅与民间之反应不同，而其应变之行动则为一致。

再回头仍就全面醒觉思考，知识分子特别是主持国政之领袖，其历史责任仍较常人重得多。推动应变，实仍以知识分子为最重要。无论当时后世，实际上均是如此。兹举薛福成所论：

天地之变，递出而不穷者也。有大智者，烛幽阐微，与时推移，以御厥变，则天下被其休。否则懵无适从，敝敝焉执故常之见，以与世变相遇，而变乃环起而不可止。^④

设如不知应变，或应变不得其当，其罪过亦仍在国家之领袖分子。兹举严复所论：

顾不佞所以为天下正告者，中国以一统之局，为其旧者三千余年于兹矣。今乃开辟以与五洲之人类相见，则本屈伸相酬无往不复之理。吾策新机之动，将必有不可思议者见于方来。公等惧其过而为祸烈欤？则莫若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争之犹可，若乃据一时之国柄，而逞其禁锢剿绝之淫威，则无异持丸泥以塞孟津，势将处于必不胜，而后此流血滔天之祸有其尸之者矣。^⑤

据此知识分子之责任，亦当知在上领导者之自觉，实关系着全部国脉民命，其重要性，自不能与亿万庸众等量齐观。

近代知识分子对于认识世变之必然性，出以儒家传统之运会说，或不免被人视为神秘主义，以至沿袭传统之故说，或竟讥议其荒唐陈腐。然按当时思想成长之情势观之，此实为解释变局必有之理论化途径。至其所以采用运会说作为理论结构，当系就固有知识工具做近代问题之理解与应用。此亦人类思想形成中之自然现象。无论中西民族，均无所例外，只是学者未做深一层探讨

而已。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适应变局之展望，亦乐观向上，深具自信，虽不免警惕危机，而终相信前途可为，鼓舞国人奋斗意志。兹举当时王韬所见：

逮我圣朝，青海雪山近在肘腋，珠崖台岛咸奉冠裳。是境土之由渐广斥也如此。而欧洲诸邦，亦渐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粤，百十年间，洪波无阻，光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礼貌之，概与之通和立约。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盖善变者天心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①

故知变而需应变，应变而自能适变。适变之永恒目标，其不可犹豫怀疑而努力以图者，乃在为中国开创光明远大之世局。

1975年10月31日写于南港

注 释

-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8页。
- ②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卷五，第1页。
- ③ 《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卷下，第30页。

- ④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四，第 11 页。
- ⑤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 207 页。
- ⑥ 《沅湘通艺录》卷四，第 1 页。
- ⑦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二，第 41 页。
- ⑧ 《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卷下，第 15 页。
- ⑨ 陈炽：《庸书》卷五，第 4 页。
- ⑩ 薛福成：《庸盦文外编》卷三，第 27 页。
- ⑪ 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卷一，第 10 页。
- ⑫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八，第 25 页。
- ⑬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九，第 5-6 页。
- ⑭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第 16-17 页。
- ⑮ 薛福成：《庸盦文外编》卷三，第 21-22 页。
- ⑯ 郑观应：《易言》（又题：《盛世危言续编》）卷上，第 2 页。
- ⑰ 王树枏：《陶庐文集》卷二，第 15-16 页。
- ⑱ 《沅湘通艺录》卷三，第 45 页。
- ⑲ 王韬：《法国志略序》。
- ⑳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三，第 2 页。
- ㉑ 严复译：《原富》，第 469 页。
- ㉒ 魏源：《海国图志》卷首，第 3 页，后叙。
- ㉓ 郑观应：《易言》卷上，第 1-2 页。
- ㉔ 汤震：《危言》卷一，第 13 页。
- ㉕ 《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卷下，第 62 页。
- ㉖ 康有为：《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卷二，第 2 页。
- ㉗ 薛福成：《庸盦文外编》卷三，第 34 页。
- ㉘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一，第 15-16 页。
- ㉙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下，第 25 页。
- ㉚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第 16 页。
- ㉛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卷上，第 41 页。
- ㉜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〇，第 19 页。
- ㉝ 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凡例。
- ㉞ 《洋务运动》第六册，第 231 页。
- 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 10 页。

⑳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17~18页。

㉑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48-49页。

又，薛福成：《庸盦文外编》卷三，第51页：“方今各国，皆掷数千万亿之巨费，治火器，造铁舰，习技巧，无稍顾惜。而究之实有战事者，或数十年不一观。然使因其不用而不为，则其国必危且弱，而其终也，转不能不出乎战。殆亦时势使然，虽圣人不能违也。”

㉒ 陈炽：《续富国策》卷四，第5~6页。

㉓ 严复译：《原富》，第643~644页。

㉔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第14~15页。

㉕ 薛福成：《庸盦文编》卷二，第7页。

㉖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三九，第28页。

㉗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第11页。

㉘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扫叶山房石印本，本文所引薛氏资料，此条系采录于扫叶山房本。）卷二，第7~8页。

㉙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三，第8页。

㉚ 薛福成：《庸盦文编》卷二，第71页。

㉛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卷一，第32页。

㉜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第15页。

“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

一 引 言

中国人自称国为“中国”，其原始自于古代，历数千年之习惯，以迄于今。然如此人人尽识尽悟之词汇，历代沿用，无人探讨，实为中华民族生长发展中一种自然的自我意识。“中国”称谓与中华民族同具永久生命，而为中国人整体性之基本表征。然关其词称本身意义之沿贯，历代学者无人做一确定之谛范（define）。至于近代，因世界万国交往，中外士人接触频仍，酬答之间，偶而并及于“中国”词旨之辩诘，遂亦启悟中华有识之士一种自觉性之研求解释。其所反映，适正为近代民族思想之写照，虽此一极普通而众所周知之词汇，则亦表达近代知识分子之民族自信与自尊。无论其为客观主观之观点，有否论据，是否曲解，均足以见其意义之深远，值得加以探究思索。

二 秦汉统一前“中国”称谓的意义

欲明晰上古“中国”称谓之意义，须一审察秦汉统一以前流传古籍之所载。今寻绎先秦载籍 53 种，其中全无“中国”一词之著录者 28 种，有其记载者 25 种。此类古籍，虽不免有脱漏、杂增、伪托、错乱之处，然设有一分真迹，即不可放过，因是略

放宽尺度，加以考察^①。归纳诸书所载“中国”词称之总数，共为 178 次。研探其所含意旨，约有五类^②。

其一，谓京师之意，凡 9 次。如《诗·大雅》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其二，谓国境之内之意，即所谓国中，凡 17 次。如《诗·大雅》所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奭然于中国，斂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其三，谓诸夏之领域。凡 145 次。如《墨子·节葬篇》所云：“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又如《孟子·梁惠王》所云：“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又如《庄子·秋水篇》所云：“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曩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

其四，中等之国之意，凡 6 次。如《管子》所云：“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

其五，中央之国之意，凡 1 次。如《列子》所云：“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鞞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

据以上所列之五项意义，（据本文附表：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汇录。可以考见上古各书中所有句例）其中占最大多数者，则为第三种以诸夏领域为范围者。占全部数量 83%。其次指为国境之内者占 10%。再次指为京师者占 5%。可知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主要在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因为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并无政治统一之事实，而族类之

混同，则已构成一致同血缘之庞大族群，在当时则称为诸夏。同时文化之融合与同化，也已构成一致之观念意识，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与社会结构，在当时则形容为中国。所以“中国”称谓之形成，实际显示出当时中华族类全体之民族与文化统一观念。所以学者士子屡屡言之。古籍传世如此之稀，尚可见其概略，当可推知其同时代必甚为普遍流通。

就时代观念而言，以“中国”表一定领域者，古籍文字所载，实早在周初，阅《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其意义范围，甚为明显^①。以中国表同一血缘同一文化族类所居之领域者，当不至晚过春秋时代，其词称在《墨子》、《孟子》、《庄子》均已成为习惯语气，即已可知。是以“中国”之名称，在秦汉统一前，实早已代表地球上一定之界域，为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所居，其族类与文化之统一观念，并同时自然地充分地显示出来。

当然在一般性观念中，族群统一与文化一致之“诸夏”观念，自较“中国”固定领域之形成，当为时更早。其所形成之轨辙，很自然是从异民族与文化之对立，而相对自我认同，以确立本族群之文化特色。此种区别，当在极通常事物行为中存在，而自觉性之肯定，则是极为重要。上古典籍最早者若《尚书》、《诗经》、《易经》三书，以言国族、政事、体制者《尚书》最重要。其中记载“夷”字 29 次，可以确指为异族者 19 次。记载“蛮”字 5 次，全指异族。记载“狄”字 2 次，1 次指异族，记载“戎”字 12 次，3 次指异族。惟记载“夏”字颇值得深切思考。即记载“夏”字 62 次，指本族者 2 次，其余多指夏王及有夏一代。盖可以推知对夏代之自我肯定，一则自命为夏，即多不附族称之区别。二则此乃有国之义，自不必附族称。其次，则《诗经》以言民情、民俗及本族信仰者（如雅、颂是）。其中记载夷、狄、蛮、貊之处甚多，多指异族而言。而记载“夏”字多不指族

类，其中仅指称有夏一代者 2 次。亦足以为《尚书》之附证。

或谓族类之区别，以种界血缘分，前者并言文化之一致，似乎尚不足以说明。然则文化一致之观念，必为时甚早，以孔子所言最为明晰，如《论语》所云：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另一处记载亦极明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此处意旨，盖于文化观念中求解释，很是显然。至文化统一观念，至孟子而达于完密成熟，以其文化道统统一之一脉沿承理论为最高代表。如孟子所谓：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

夏、商、周礼俗相因，以至三代文化一贯观念，随孔子之思想而发展至于此，则已充分完成了文化民族自我之肯定。

至于古代“中国”在地球上所笼罩固定领域之范围，秦汉统一前，当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观念之中国，载于文献者，均漫指黄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边裔之秦、楚、吴、

越则不在“中国”领域之内。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至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人所共喻之中国领域。

三 近代自觉性的探讨与诠释

中国人统称其国名为“中国”，历代沿习，人人尽知，无待有何考说。虽然数千年来，朝代更递，各以朝名冠称国名，而“中国”之通称，迄未为国人忘怀，且为最广泛最浅显最常见之中国人自号之名词。但是至于近代，在19世纪后半，因世界万邦接触频繁，与彼此称谓之辨别，竟由地理位置之比较，而使此一共喻之代称亦发生疑问。联带并产生新探讨考索。首先在道光年间，有魏源探讨“中国”词称的广泛应用，有谓：

释典言佛降生，必于大地之中，故印度据南洋、小西洋之间，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为边地。西印度为天主所生之如德亚，及回教主所生之天方国，皆居阿细亚州之西，利未亚州之东，夹南海、地中海之际，故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其尊西印度如佛教尊中印度等，是二洲适中之地，自古异人所挺生。然谓居二洲东西之中可也，其地皆偏濒南海，乌得为全洲之中？曰：释典不言居瞻部之中，而言居大地之中，则是据南北二极言之。二极之中为赤道，近二极为冷带，稍离极为温带，正当赤道下为热带，南洋各国正当赤道下，距南北极度数皆均等，其地终年恒燠，是则正当地球南北之中，又正当瞻部洲东西之中，故彼自命为中国也。使专据瞻部洲言之，则正中莫如葱岭，而环葱岭左右，古今但为游牧部落，不闻产一英杰，何耶？

故曰：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圣人之出，必在海滨，扶舆磅礴之气，必至平原近海，如雍冀青兖，而后刚杀始尽，冲和始钟。惟是印度正当热带，地过炎燥，人多裸袒，而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西洋温带之地，则为地中海所占，而欧罗巴亦偏于冷带，利未加亦偏于热带，故儒、佛、回教、天主教，皆生阿细亚洲，天文算法奇器，亦皆创自阿细亚而后流被于欧罗巴洲。至利未亚洲之腹地，周万余里，万山环之，不与他国往来，故虽以麦西国、亚毗心城国之声名文物，亦不通中国，而西洋市舶所至，则仅其边隅黑奴乌鬼之区而已。是则又以濒海为糟粕，腹内为精英，地不灵者人不杰，信哉。^④

此种情势，亦正代表中国进入近代世局，传统观念意识，产生评估与动摇之状况。

近代中国人之探讨“中国”称谓之意义，很显然的是从直觉与一般印象中做批判，亦并从自身常识中了解做解释。因为所有学者并不是先考究“中国”一词在古代形成全部意义，而据以作为认识与探讨之基础。所以近代学者之批判与诠释，同样也全然是反应近代中国人之想法和看法。于是单就近代人解释来说，当已足以构成有趣之论题。

近代人之批判“中国”一词，是由两个意义上破绽作起点，也并由此两个破绽作弥缝。一面有挑战者提出批判，一面并有防御者迎上去堵挡。这两个意义上破绽，一是有形的地位之意义。当时人据常识了解，以为“中国”即中央之国，而据新科学知识，则不能容受此一观念。皮嘉佑著《醒世歌》，有言以促人觉悟谓：“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⑤但叶德辉立即提出解释，来堵御这种批判。

他致皮锡瑞（皮嘉佑之父）书云：

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适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而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④

叶德辉之说，显然仍是他自己从常识中了解做理论安排。因为比较前述古代普通观念中所形成之意义，并没有一点与叶氏符合。同时显然又有几个固定传统观念，牢牢控制着他的常识。重要的一个是五行观念，他应用了十干中东方甲乙，南方丙丁，说明“首东南”的本义。并用中央戊己，属土，其色黄，以傅会中国黄种人之居中的本义。五行观念自秦汉以来支配全国人心，实为一种中国本土宗教信仰，其基本结构，全出自于一种预设之假定，即金、木、水、火、土五者之基本性质，此五者乃天地间真实之事物，为可信之原始基础。然后用以配合各项形式与抽象之事物，如十干、四时、五色、五方、五臭、五味等等，不一而足。此种配合之事物现象，皆假定其一定之属性。然后用以解释天象人事万物。人既信仰此基本假定之为真，则无往而不应用其一切推演与解释。类此预设假定之信仰，世界各民族多有之，如欧西人信仰十三号为不祥之数字，及印度佛教之轮回说，皆为其例。

此外早于叶德辉而且较为更有意义之解释，则为同治年间满人志刚一说。他因从使外洋，乃有对西方质问者之答辨。如其所谓：

前在西国，客问使者曰：地球上无土而非国也，中国之说何谓也。使者晓之曰：尔谓中国为在中央乎。则大地悬于太空，何处非中。谓在中间乎，则万国相依皆有中间。谓在中心乎，则国在地面。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非若印度之佛言空，犹太之耶稣言爱，波斯之拜火，麻哈摩之清真，日本之新德，此大地上之彰明较著者。至于山陬海澨与夫穷乡僻壤，怪诞无稽者不可枚举。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⑦

志刚的解释和叶德辉不同，却仍然是根据固有信仰立说。同样也是属于他个人所创造之理论，其就中国文化道统作出发点，提出国人普遍信仰自是完全正确，比较更容易被人接受。但是这也是属于近代自觉性的理论，和上古所形成之意义并不一样。

另一个批判方向，提出意义上之破绽，是针对无形的夷夏区别之观念。这就关系到尊己而贬四裔之自大心理。国人遭遇万国荟萃之世局，以为这种尊己卑人观念甚为不当。于是徐勤著《春秋中国夷狄辨》三卷，直探上古中国与夷狄区别之本义，以正流俗之错误印象。徐书今不易得，然有梁启超序文，足以窥见徐梁之解释宗旨。梁序云：

夫晋郑邾卫，中原之名国也。鲁者尤春秋所托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为彝狄，又何以称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彝狄而与中国为礼。至邾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彝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大哉言乎。然则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虽中国也，覲然而彝狄矣。其

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彝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恕之，号为彝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何谓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四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⑧

易鼎据同一理论更于当时沿袭之陋习加以批判：

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懵然不知春秋之义，夷狄不以地而以人。风俗不善，无礼无义，乃曰夷狄。是故中国而类乎夷狄，则降而夷狄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者乃弥缝而掩盖。虽其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沈锢缠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伎，夷狄他洲也。^⑨

这是近代人士对于“中国”词称自两项定义上破绽作探讨之大要，而学者兴趣却不能仅止于此。因为更重要者则由于客观需要，那就是居于列邦对等之现代世界，中国国名必先有一个确定称谓。其次是史志舆地之叙说，也必需对本国有一个确定正名。再其次朝代之称势必罢废，全国亦需有一个统一共称。于是正面不同之注释，亦同时发展而出。

至完全不属于批判，而从正面考索，以确立“中国”词称之定义者，可以推至光绪五年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因鉴于世界万邦之国名，而欲以“中国”一词，为本国之统称，以对外国，而澄清他称之繁杂。如其所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对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可知华非必尊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睦。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⑩

梁启超更就民族自信观点，以确立“中国”一词应作为国家之统称。如其所谓：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

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①

汪康年就理性判断，认为自古相沿，各民族国家均有特定承袭名称，相沿既久，习以为常，岂可一一更改。国名之共喻者，早已约定俗成，岂能另觅新名，使全国遵循。其抒论有云：

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以今日论，则不符矣。顾相沿久未由改也。日本人或谓为自大之证，而吾国人亦多以为病，吾以为无庸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②

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三人解释，固本之于数千年传统习惯与普遍常识，而理论之确立，仍然应该属于近代，是出之于他们自己的认识和思想。他们的说法，虽是解释上古定义，并由古谊延伸，却并非古谊本身之翻版。

至于“中华民国”观念之酝酿成熟，实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五年。“中国”一词，自然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之一重要论题。章太炎著“中华民国解”与“金铁主义说”者讨论此项论题，章氏总论则以为：“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又谓：“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③这是历来国人共通之一般常识，亦大同于黄遵宪之解释。但这种普通观念之著为文字，构成一种

理论上之定义，则是在时代需要之下产生出来。

同一时期，不同之新诠释仍在发生。和章太炎同时，并为章氏所批判的“金铁主义说者”（本名待考）即有不同意见，他就文化意义立论，同时并引出“中华”一个词称，是章氏讨论所本，并颇具理论性。如他所说：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者也。^⑬

嗣后，“中国”“中华”并为中华民国之通称，国人自是沿承千古旧习，而定义之性质，则颇具现时代精神，并为现时代所确立。民国三年章铤立说可作一般性代表。如其所谓：

自曩例言之，中国之称，夙沿为定号。采诸习惯，则“中”可为名也。自古义言之，华夏之称，曾闻于孔子。征之往籍，则“华”可为名也。民国成立以前，朝名屡变而国号虚悬，故所谓正史，大抵皆为君主一姓之史，而不见有吾民立国之史。即治史者，亦仅仅知治君史，而不知君史以外别有国史。审是无今日之中华民国，则安有吾中华

民国之史？故执狭义绳之，举凡古来重要之史实，包举于吾中华通史全帙之内者，多为中华民国以前之所经历，而必标题为“中华”者，崇国名也。易广义绳之，自民国完成，从此邦内治史诸家，不致踈踈于君主国体专制政体之下，并得养成其社会观念，国家观念，世界观念。涣其史识而扩之广焉，矫其史才而又助之正焉。则是中华通史者，乃中华民国之产儿。中华民国之武，得以斩君史，中华民国之慈，并得以孕民史。本书之必以“中华”为标题者，尊所出也。^⑮

四 结 论

“中国”词称，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悠久的词汇。随中华民族与其文化之形成而存在，并为其全体活动与影响之领域代称。此一代称之确立，完全是自然的习惯的由上古沿承下来，成为中国人人最熟知易晓所共喻共戴的本国国名，用以识别不同国度之国家族人。

中华民族之有国观念，发生甚早，殆开始有文字记载，即已有确定命义。当时普通之通称有三：其一为“邦”，即国之意，且用以识别大国。如《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又谓：“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皇矣》：“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又谓：“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大诰》：“反鄙我周邦”。“兴我小邦周”。“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多士》：“不敢荒宁，嘉靖殷邦”。《顾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其二为方，亦国之意。如《尚书·汤诰》：“诞告万方”。“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梓材》：“兄弟方来”。《太甲》：“抚绥万方”。《咸有一德》：

“监于万方”。《诗经·大雅·皇矣》：“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大明》：“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抑》：“用戒戎作，用逖蛮方”。《常武》：“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又：“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荡》：“内典于中国，覃及鬼方。”其三为国，即后代应用最广者。古代邦国互相为训诂，《说文》、《广雅》均本此定义。是以邦与国在中国古史中尤为重要。

至于古代中国民族之自我认同，指称本国为中国者，为时亦在上古，近人柳诒徵以为首见于《尚书·禹贡》。并有其引申诠释。如其所谓：

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后世遂沿用之。虽亦有专指京师，或专指畿甸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初非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⑩

柳氏所论，即以《禹贡》“成赋中邦，锡土姓”一句为据。

自古代“中国”本词意义作学理上探讨者，首有胡厚宣的《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之为起源》，后有田倩君的《“中国”与“华夏”称之为寻原》，共为二篇。在基本观念上，与前述之近代贤哲有相当不同。最清楚之一点，就是他们不再是表达个人常识和理解，而是在探求上古所形成意义之本旨，特别不同者，是要探究原始。胡厚宣就甲骨卜辞为资料，确定探讨出“中国”称谓早已在商代形成。凡所举证，皆十分正确而有力。兹引述其解释：

又案“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之为

起源也。何以知其然耶？曰：可再由武乙文丁时卜辞之称“商方”者证之。其辞曰：百商方步立于大乙，伐羌方。（粹一四四）“商”既可以称“中商”，又可以称“商方”，则必更可以称“中商方”，既可以称“中商方”，则必又可以省称“中方”也。而方即国，商称方，周则称国也。卜辞中之方，所见逾百，无劳举例。盘庚曰：“辰綏四方。”微子曰：“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卜辞商书皆无“国”字，至周金周书周易及诗始习见之。其最常见之“四国”，其义实与“四方”同。故常武之诗，称“徐国”，又称“徐方”。民劳之诗，称“以綏四方”，又称“以綏四国”。书多方言“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而金文师虢殷则言“临保我有周，孚四方民”也。故诗皇矣言“维彼四国”，传曰“四国四方也”。书多方言“四国”，王肃则以为“四方之国”也。然则商之可称“中商”“商方”，又可称“中商方”及“中方”，则其必为周代以来，中国之义，盖昭然明矣。又商者亦称天邑商，亦称大邑商，亦称大邑。由前引卜辞观之，既又可以称“中商”，则必更可以称“中邑”，说文“邑，国也”，“中邑”，亦即中国之称也。以上两说，虽讲法不同，然其可以证成殷代必已有“中国”意义之称谓，则一也。^⑦

田倩君亦就卜辞与金文为主要根据，判断“中国”之名称始自商周，是沿承胡厚宣成说。对于“中国”名词之释义，则袭章太炎之说，以为“中国也是个相对的称谓”。不过把章氏说词释为白话而已。然其举证，则已表现笃实的学理探讨之精神。这里不及备举^⑧。

“中国”词称，上溯自商代，意义确定明显，自可立为定说。自商以下，至秦汉统一以前，诸夏民族，习用普遍，沿贯脉流，亦可察知。古籍记载留存之全部，其意义共有五端，如前所举

者：一为京师之义。二为国境以内之义。三为诸夏领域之义。四为中等之国之义。五为中央之国之义。然此五端亦并有一共同之基本意义，即皆指一确定之领域。此“中国”一词之形成为我国同名之最根本基础也。“中国”一词在秦汉统一以前已普遍成为国土之共称，则亦足知上古文化大一统观念之成熟，与其助成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之意义。

1971年12月18日写于南港

1976年2月26日增补

注 释

- ① 古代典籍之提及“中国”一名词者，并非每书皆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各书所载内容性质，各具有不同特色与意旨，乃有多寡与有无之别。如《周易》为纯理论之书，自无必要提及“中国”一词。又如《仪礼》仅载琐碎之生活仪节，亦无必要提及。然如载事之书，如左氏、公、谷三传，则记载自必较多。此自然之理也。
- ② 这里必须略一叙述方法问题。此处为搜求古代典籍中“中国”之词称，而采用所谓之计字法（word-count）。即将先秦所有古籍作为对象，专事钩稽“中国”一词，有者即将整句加以登录，即某书无有，亦必注明。各书得其总数，并分别辞旨意义，然后统计，再观察其全部词句所代表之意旨，即可获知“中国”词称在秦汉统一前之所有意义，及其各别之比重。此一方法，是属于语言统计之一种，西方学者向有引用。其应用于历史研究者，如石约翰（John Schrecker）以之统计1895以后中国官书中所出现的“主权”之词汇，用以了解中国人主权观念之成长。至于在中文学术著作中，本文当为首见。虽然往时梁启超著“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曾全面搜集《诗经》、《书经》、《易经》三书中所载之“阴”“阳”字，一一排比讨论，但此仍应为向之治学者之罗举法，而非计字法，乃甚为明显。
- ③ 据屈万里著《尚书释义》，第90页，注释其句意，当为皇天以中国之民

与疆土以授先王。可知此句之“中国”，即为明确之一定领域。虽谓为中原之意，亦属后日说经家之意见，反不如照经文原字直解为佳。且“中原”者亦指一定之领域，于当时必能指实其地望者也。

- ④ 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四，第1~2页。
 ⑤ 原载《湘报》第二十七期。据《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页。
 ⑥ 叶德辉：《郎园书札》，第9~10页。
 ⑦ 宜屋：《初使泰西记》，第42页。
 ⑧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二，第49页。
 ⑨ 《湘学新报》第三十五册。
 ⑩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
 ⑪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六，第3页。
 ⑫ 汪康年：《汪穉卿先生遗文》，第13页，载《乌言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一日。
 ⑬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民报》第十五号，光绪三十三年刊。

又关于“中华民国”一词，固以章太炎之题称为最早。然其比较相近并具全义者，则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所创刊《新小说报》为最早。其在民国元年追记当日宗旨有云：“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据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65页）至梁著“新中国未来记”原作今不易得，只好暂据后日之追记，以备异日考校。此条承张朋园先生提供，并志感谢。

- ⑭ 同前注。
 ⑮ 章枚：《中华通史》第一册，第2~3页。
 ⑯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第48~50页。

又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3页，亦有相类意见云：“中国之名，始见禹贡，历圣相传，皆以中道重教。故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现，我民族能统制大宇，葆世滋大，其道在此。”

- ⑰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⑱ 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之为寻原》，《大陆杂志》三十一卷一期。

附表：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汇录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尚书	梓材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王惟德用	全书出现“中 国”词称1次
易经			本书无“中国” 词称记载
诗经	生民之什	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惻 不畏明，柔远能迓，以定我王	全书出现“中 国”词称7次
	生民之什	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 逯，无纵诡随，以谨愆侮。式遏寇虐，无 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生民之什	民亦劳止，汙可小偲，惠此中国，俾民忧 泄。无纵诡随，以谨孔厉。式遏寇虐， 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生民之什	民亦劳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 残。无纵诡随，以谨缁绶。式遏寇虐， 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罔德于中国，斂 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 不明，以无陪无卿	
	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 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奘于中 国，覃及鬼方	
	桑柔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蠢贼，稼穡卒 痒，哀恫中国，具赆卒荒，靡有旅力，以 念穹苍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摘录	备注
论语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春秋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管子	小匡	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6次
	小匡	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杜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	
	霸言	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	
	小称	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	
	侈靡	夫事左,中国之人,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岂不几于危社主哉	
	侈靡	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	
邓析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墨子	亲士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5次
	节葬下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孟子	节葬下	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9次
	鲁问	鲁阳父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	
	鲁问	钧之巢,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梁惠王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公孙丑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滕文公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滕文公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	
	滕文公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庄子	离娄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5次
	万章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告子	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居子,如子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秋水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	
	田子方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	
	田子方知北遊天下	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 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列子	汤问	南国之入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鞞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2次
司马法	汤问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丘)至身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孙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吴子	料敌	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1次
礼记	檀弓	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7次
	中庸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王制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王制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仪礼	礼运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民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乐记	天子夹振之,而颺伐,盛威于中国也	
	大学	惟人人放流之进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尸子	卷上	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3次
	卷下	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貊	
	卷下	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	
慎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公孙龙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国语	齐语	筑葵兹、晏负、夏领、斧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3次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摘录	备注
春秋左氏传	楚语上	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6次
	吴语	夫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若事夸而从我,我遂践其地,其至者亦将不能之会也已	
	庄公三十一年	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鬻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僖公二十五年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僖公二十八年	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昭公二十年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成公七年	吴伐郟,郟成。季父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春秋公羊传	昭公九年	先王居棊杻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34次
	隐公七年	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僖公二十一年	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庄公十年	蔡侯献为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	
	庄公十八年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	
	僖公二年	江入、黄入者何,远国之辞也,远国至矣,则中国曷为独言齐宋至尔,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僖公四年	夷狄也而萌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僖公九年	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	
	宣公十五年	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襄公二年	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	
	襄公七年	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中国讳,郑伯将会诸侯于郟,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郑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强,则不若楚。于是弑之	
	襄公八年	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	
	昭公元年	曷为谓之太原。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	
	昭公二三年	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啗何,吴少进也	
	昭公二五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	
	定公四年	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忧中国奈何,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讎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讎,臣不为也,于是止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春秋谷梁传	定公四年	蔡请教于吴,伍子胥复曰,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 40 次
	哀公十三年	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	
	哀公十四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	
	桓公二年	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庄公十年	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绝之也。何为绝之,获也。中国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也,中国不言败,蔡侯其见获乎,其言败何也,释蔡侯之获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僖公二七年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诸侯也。其人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国也	
	僖公二八年	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	
	僖公二八年	复者,复中国也。天子免之,因与之会,其曰复,通王命也	
	文公十一年	传曰,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	
	宣公十一年	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为中国也	
	宣公十五年	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	
	成公九年	莒虽夷狄,犹中国也	
	成公十二年	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夷狄不日	
襄公二年	若言中国焉,内郑也		
襄公五年	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襄公六年	非灭也。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绘,中国也。而时,非灭也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襄公七年	郑伯将会中国,其臣欲从楚,不胜,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	
	襄公十年	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国从夷狄也	
	襄公十年	会夷狄不致,恶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国也。中国有善事则并焉,无善事则异之存之也。汲郑伯,逃归陈侯,致祖之会,存中国也	
	襄公三十年	澶渊之会,中国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	
	昭公元年	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昭公五年	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昭公十一年	何为名之也。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	
	昭公十二年	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	
	昭公十七年	两夷狄曰败,中国与夷狄亦曰败	
	昭公二十三年	中国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也。中国不败,胡子髡、沈子盈,其灭乎。其言败,释其灭也	
	昭公二十五年	来者,来中国也	
	昭公三十年	中国不存公。存公,故也	
	定公四年	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其信中国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诛于楚也	
	定公四年	蔡请教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	
	哀公四年	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	
	哀公十三年	吴,东方之大国也。累累致小国以会诸侯,以合乎中国,吴能为之,则不臣乎,吴进矣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摘录	备注
子思子	哀公十四年	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曾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晏子春秋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商君书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竹书纪年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老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关尹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尹文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尔雅	释地	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五方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1次
山海经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周礼	秋官司寇	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 1 次
孝经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楚辞	惜誓 九怀 九思	临中国之众人兮,托回飙乎尚羊 历广漠兮驰騫,览中国兮冥冥 迫中国兮沍,吾欲之兮九夷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 3 次。但皆为西汉初之作品,故不列计其数,并视为秦汉以前无“中国”词称。
荀子	王制 上制 王制 王制 王霸 致士 疆国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 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 东海则有紫紘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 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 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謏謏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 7 次
鬼谷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文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韩冠子	王铎	方若所言,未有离中国之正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1次
穆天子传	卷二	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1次
燕丹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韩非子	存韩	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7次
	存韩	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	
	十过	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遣之女乐,以乱其政	
	孤愤	夫越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用人	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如此则上下亲,内功立,外名成	
周髀算经	难	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于汤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难势	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喜游矣,而溺者不济矣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逸周书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子华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尉繚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伊尹	九主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亢仓子			本书无“中国”词称记载
黄帝四经	经法	在强国削,在中国破,在小国亡。谋臣(在)外立(位)者,命曰逆成,国将不宁;在强国危,在中国削,在小国破。主失立(位),臣不失处,命曰外根,将与祸閻(邻);在强国忧,在中国危,在小国削。主失立(位),臣失处,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国将大损;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威(灭)。主暴臣乱,命曰大芒(荒),外戎内戎,天将降殃(殃);国无小大,又(有)者威(火)亡。主两,男女分威,命曰大糜(迷),国中有师;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威(灭)	本书出现“中国”词称 5 次
孙臆兵法	见威王	尧有天下之时,黜壬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	本书出现“中国”词称 1 次
战国策	秦	对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燕,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 15 次

续附表

书名	篇名或卷次	原书词句引录	备注
吕氏春秋	秦	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全书出现“中国”词称3次
	秦	上破楚，于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	
	齐	故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	
	楚	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当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	
	楚	今君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	
	赵	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赵	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	
	赵	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	
	赵	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	
	赵	天下争秦，秦王受负，海内之国合，负亲之交以据中国，而求利于三晋，是秦之一举也	
	燕	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	
离俗览论威	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		
去尤	东征至于庠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	

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 探讨及其时代意义

中国近代之探讨儒学问题，其动机滥觞于清季，至民国始有广泛之重大发展，于中国学术思潮之汪洋巨涛中，足当为一支非常宽广之潮峰。其端绪之纷繁，波及之广远，实无逊于同时代他项各类澎湃之新潮流。当代诸家之讨论儒学，其重大趋向，循相背之两途。而有特殊之发展者，则以反儒思潮影响最为深远。其次则为另一面为世人所日渐轻忽之维系儒学立场。然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探讨，其首要所须解答之共同问题，厥为儒家之来源与本原，必须先有清楚的交代。因是儒家起源问题，遂即成为近代多数学者所热心研讨的目标，并亦形成一个学术思潮的新路向。

儒家起源问题，不发生於春秋末儒学成熟之时，战国间百家争鸣之际，而却在西汉承平，后人整理古学之机会，因诸家分类之发达遂亦及于诸子起源，儒为诸子学派之一，自然亦在探讨之列。

诸子学派分类，昉自先秦，参差纷杂，各据一说。至汉而大定于司马谈之六家要指。及刘歆七略出，遂立为九流十家。后世沿用，千载不移。刘歆论儒，以谓出于司徒之官。因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

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①

这就是儒家出于官守之定说，为国人二千年来所始终信奉不疑者也。

近代沿守斯说者固不乏人，而另立新义进求解说其本原者，已开始有观念转向之势。如刘师培著《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释司徒职守之原义，全为在于教民者是：

夫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者，以儒家之大要在于教民。周官冢宰，言儒以道得民，道也者，即儒者教民之具也。盖以道教民者谓之儒，而总摄儒者之职者则为司徒。说者以司徒为治民之官，岂知司徒之属，均以治民之官而兼教民之责乎。舍施教而外，固无所谓治民之具也。^②

刘氏宗旨，在充分说明司徒职守之所在，惟在教民。以立为儒家学派起始源头之所本。然后进而一言儒家后日之发展与转变。最重要之论点，在于司徒职守失官之后，孔子之儒的形成，以及其逐渐扩大题旨，远离本义，遂构成近代原儒论创始的启念。刘师培立义要点谓：

至于东周，司徒之职渐废，九流百家，各持异说。惟孔子之说近于教民，以道德礼仪之言为天下倡。欲渐复学校井田之制。虽出词近迂，立身近伪，然在九流之中，与古儒者之学相近者厥惟孔子。故其学以儒家为名，而班志溯其源始，以为出于司徒之官也。特孔子以后，奉其学者均以儒为名。实则孔子之言近于古代之儒者，而孔子之所行则与古代之儒不同。孔子以后之儒，较之古代之儒，其行事尤为相远。^③

又谓：

自史记立儒林传，班马二史沿之。然后以通经之人为儒。夫两汉经生，均以师法相教授，与儒者教民之事，亦复相符。惟其所教授者，在于先王之成绩，与化民训俗之义迥殊，名之曰儒，盖有儒名而无其实者也。^④

刘氏通篇主旨，先就司徒职守，确定教民训俗为真儒本原，据此推论，则见儒者步步之转化，自孔子已开其先河。而后世通经博雅之硕儒，与本旨相去愈远，更非真儒。由是可见，二千年来中国历代奉为正统学术者，自是日益转变后之儒学，已非原儒之真，乃可洞见者也。

刘氏一说，系就纵深层面剖析。章太炎著《原儒》一篇，则以名词范围，就横的层面探讨儒家之本原。章氏把儒之名词，分为三科。即所谓达、类、私三者。故有谓：“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此一指称，即谓儒者为一般性有才能技术之人物。“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此一指称，则指通六艺之学者，可以教授人以六艺知识之师保。“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此一指称，即为一学派之专有名词。这是章氏所确立儒之定义。然后章氏进而一论后世儒之转变，已实与名异。故谓：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道家之名，不以题诸方技者，嫌与老氏棍也。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般乱。孔子曰：今世命儒亡常，以儒相诟病。谓自师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使非独经师也。^⑤

章氏辨别之外，最后的主张则谓：

今令术士艺人闾眇之学，皆弃捐儒名，避师氏贤者路，名喻，则争自息。不然，儒家称师，艺人称儒，其余各名其家，泛言曰学者。旁及诗赋，而泛言曰文学。亦可以无相磨矣。^⑥

进一步对儒家起源做全面探讨的，是30年后胡适所出的《说儒》。胡适议论的基本精义，有几个要点可述。其一，根据许慎说文之训儒为柔，而肯定儒是形容柔弱者之代称。其二，确定儒者是穿戴古时衣冠的文弱之人，而此衣冠实即殷人服制。确定儒者是熟习古礼并传授弟子之人，此类人并多为殷之遗民。其三，确定儒是殷商亡国后，由于其民族维持殷之文化特色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宗教，此种宗教，正是殷商重视祖先崇拜与丧祭仪节之文化特色。其四，由于维持殷商之宗教仪节，就需要有特殊训练的祝官，殷亡国后，此类祝官即系维持传授此种知识之人，而形成一种专门相礼治丧的职业。他们在周朝统治下的殷民社会里，一直维持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其五，儒者这门职业的活动，主要在为人治丧相礼，此外即是传授弟子，讲习古礼。故此儒是古代宗教教师之一门职业。其六，殷民族亡国后，有其复兴民族之宿愿，并有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数百年来，流传下来为其民族思想的中心信仰。这个预言出在商颂的玄鸟篇。其七，孔子系应此预言之运会，而成为殷人宗教“儒”之改革圣人，使原有之柔儒谦退精神，一变为刚毅进取意志；使原有之殷民族宗教仪节，进而变为古代中国之思想体系；使原有相礼治丧的职业，进而变为普及教育的宗师^⑦。

胡适的议论很新，考证很详，其观念的出发点，来自于对基督教的联想。以犹太民族思想宗教精神相映殷之亡国与宗教精神

之形成。以犹太教祭司之专门知识相映儒者之专门知识。以古犹太教与耶稣创立新义，分别相映古代之儒，与孔子强化儒家精神之儒。以旧约以赛亚之预言相映商颂。以法利赛人相映古之儒者，以耶稣相映孔子。可以说节节相应，丝丝入扣，自是现时代一个创说。

《说儒》出现以后，颇引起学界的注意与争论，在前后一二年之间，至少有十余篇讨论的文字，有大致不同的异议。现今大致可以查考得到。其中做最强烈批评者是郭沫若的《驳说儒》^⑧。然而讨论辩难，双方针锋相对，乃至措辞严苛激烈，却并非本文所注意的范围。亦如本文于各家论说不罗举其精彩之论据一样。本文所要探讨者，是各家所提出的儒家起源学说，以及要追寻他们的思想动机与时代背景。本文所注意的不是各类学说之胜负与是非。而是要解答，何以在这个时代会爆发一个儒学起源的问题？何以会引起多数学者广泛注意与兴趣？何以这问题不发生在孔子后任何一世纪，而却发生在20世纪？所以各家争辩的问题，本文不管，却并不是忽略，而是用不着他们。

郭沫若对于说儒中的论证，提出了锐利的反驳。但他对于儒家起源的解释，却大致与胡适的说法相符合。他们的总体历史观察尤其一致。如他谓：

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殷灭于周，其在中国北部的遗民，在周人统制之下化为了奴隶。在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渐动摇起来，接着便有一个灿烂的文化期开花，而儒开其先。这种见解，我在十年前早就提倡着，而且不断地在证明着。《说儒》的出发点本就在这儿，虽然胡适对于我未有片言只字提及。^⑨

对于儒学本身，虽同样解释为柔，但却差别甚大，胡氏解为

态度之柔，是委曲求全的韧性表现。郭氏解释则为习性之柔，变成为没出息的意味。不过这一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他猜想孔子以前典籍中没有儒字，就推断因为“儒”是称人的贬辞所致。当是无中生有的臆断。

至于最重要的一项观点，郭胡的说法则是完全一致，那就是双方都确认儒家最早系出于一种职业。更早的来源是出于专业化的祝官，更往上说，就是殷代与周代的祝官。其中小有区别者，即胡适以为儒系来自于殷亡后祝官之流散于民间社会；郭沫若则以上级贵族没落，祝官乃流散于民间，自谋生活。

另一位直接提出驳论者，是钱穆的《驳胡适之说儒》^⑩。钱穆对胡适的驳论，自然也是对其举证一一反驳，这里不及细载。至其对于儒家起源所提出的个人观点，则是主张儒家出于职业之一说。他对此点总叙，说得明白：

余旧撰国学概论，已著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劳役取义，而于儒字尚无确诂。及著先秦诸子系年，乃知许叔重说文儒为术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因知儒墨皆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道。越数载，胡适之先生有说儒篇（刊于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亦以生活职业释儒字，而持论与余说大异。^⑪

钱氏虽然主张儒是出自职业，却并不认为相礼治丧就是儒的职业，他对于儒之本业，则仍循古来术士之说。钱氏有一段话，足以为原本之说明：

夫儒为术士之称，其所习曰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艺即术也。娴是艺者，小则为委吏，为乘田。大

则宰一邑，道千乘，相宗庙会同。乌见有以相丧为本业之说。^⑫

此外一位并不以辩论形式出现，而自具立说者，则为傅斯年的意见，其时代亦当在众论前后之间。他也主张儒是出于职业，却进一步确定其身分为教书先生。如他所谓：

所谓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儒者以孔子为准，而孔子之为“教书匠”在论语中甚明显。^⑬

他进一步据《论语》解释说：

其实一部论语三分之二是教学生如何治学，如何修身，如何从政的。孔子诚然不是一个启蒙先生，但他既不是大夫，又不是众名，开门受徒，东西南北，总要有一个生业。不为匏瓜，则只有学生的束修；季孟齐景卫灵之“秋风”，是他可资以免于“系而不食”者。不特孔子如此，即他的门弟子，除去那些做了官的以外，也有很多这样。^⑭

另一个有近似看法的学者是冯友兰，冯氏在《说儒》出现后，连续发表《原儒墨》与《原儒墨补》两篇论文。尤其《原儒墨》，大致是在讨论《说儒》与辨驳。在这一篇文字中，同时透露出前两位学者对儒家起源的观点。一个是傅斯年所主张的儒家者流是出于教书匠，和钱穆所主张的儒家是社会生活中一流品。这里可以不必重述了。

关于儒家出于职业的说法，冯友兰完全站在同意的立场。他认为多数学者一个“不约而同的见解”。不过冯氏对于《说儒》中的论证，都大致上一一加以反驳。简单说，他对于胡适的理论

多半不同意，不同意的程度，较郭沫若更远。因为冯氏并不认为祝与儒有直接关系，而且主张儒自儒，祝自祝。至于冯友兰关于儒家起源的自己看法，他也提出了一段说明：

照我们的看法，儒之起，是起于贵族政治崩坏以后，所谓“官失其守”之时。胡先生对于儒及孔子之看法，是有点与今文经学家相同。我们的看法，是有点与古文经学家相同。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见解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们与胡先生所不同者，是胡先生以为，这些专家乃因殷商亡国之后，“沦为奴隶，散在民间”。我们则以为，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以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生活。^⑭

关于此种学说，冯氏也提出了自己的例证，如其谓：

及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多有失势贫穷，而养不起自用之专家者。于是在官之专家，乃失业散之四方。如论语所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之类。又如上所引左传，周史以周易干陈侯之类。^⑮

在儒家出于职业的学说之下，冯友兰更进一步地提出一个较新的解释，那就是“士”的来源，而儒为士之一种。至“士”的兴起，正是承接贵族政治崩坏应运而生者。如他的解释：

儒即“士”之一种，在贵族政治崩坏以前，大概没有“士”之阶级。所谓士之阶级，即是一种人，不治生产，而

专以卖技艺材能为糊口之资。在贵族政治未崩坏以前，有技艺材能之专家，皆为贵族所专养专用者，故不自为阶级。及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在官之专家，统在民间，以卖其技艺为生，凡有权有钱者皆可临时雇用之。于是士之阶级出。士之本义，似是有材能者之通称。^{①7}

另外一位对《说儒》提出反应的是杨向奎，他的《读说儒》一篇，虽已不易见到，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可以了解他是同意儒家出于职业之一说。如他所谓：

儒家作为一个职业集团，由来已久，作为一个学术和教育的集团，应当始于孔子。^{①8}

后日之信从者，当然仍一本此一思路，说明古代儒术来源。如侯外庐的说法：

搢绅先生一方面因为社会的束缚，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而加以职业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则相对地保守着文化遗产。亦只有邹鲁这样的周公遗教可能存在的国度里，才没有将历史传统的文化斩断。儒者将西周文化形式化，正是春秋制度将西周王道形式化的照映。^{①9}

这一些解释，全是在基本上信仰儒家出于职业这一说法，并提出大量的论证与说明。实足构成解释儒家起源的一个最显著的趋向，同时也可以说是当代思潮中一个新的风气。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时也有不同的见解产生，却不及此一学说之盛行。

在同--时期，李源澄也提出了《评胡适说儒》一篇，批评比较中和，所持观点，则与以上各家相去更远。李氏的批评论证方

面，与郭、冯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而重点不同。自亦不拟在此臆陈。而其自有的儒家起源之见解，最不同于众说者，是反对儒家出于职业，当亦反对儒家出于祝。他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儒家为孔子及身所创，就是大收弟子教书的事，也非孔子早年志愿，故出于教书匠者，同样以孔子为起始。从他的议叙之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学派是起源于聚徒讲学的风气，但却未见他的明确说明。至于同于其他诸家立说之点，则是相信世卿制度的不行，也就是所谓贵族政治崩坏之环境下，布衣获得求仕机会，孔子应其时会而传授知识，遂由孔子而开私人讲学之风。他的重要主张可以写在这里：

因为儒家首先将古代的文献握着，其思想又是服先王之法服，言先王之法言，行先王之法行，于是成了中国学术的正统。荀子称周公为大儒，在周公时故未尝有儒名，因儒者传先王之业，周公之时虽无儒名，儒者与之相合，亦可名之为儒。诸子或亦称为儒，以儒家握中国学术之正统，大宗故可以支子也。假如不相信儒是后起的，为什么在孔子以前，莫有学士失业的问题，在孔子以后，平民已渐由家臣而至于卿相，各国还要大养其士。未必在孔子以前，都可以治丧餼口，今既有官做，又有书教，反不能以养，在我看来，这都是儒家后起的缘故。^④

至于另外一位学者，完全自思想渊源立说，而丝毫不考虑历史事实上的线索者，则为熊十力所著《原儒》中的见解。他的论儒家起源，谓自孔子起，承受上古沿袭之实用派与哲理派两大思潮，会通而成儒学系统者。他的意见当然很不易被这个时代学人所接受，因为他所讲的先哲，尧舜之有无尚未能证实，而伏羲则很明显的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如他的解释谓：

孔子之学，始为鸿古时期，两派思想之会通。两派者，一、尧舜至文武之政教等载籍，足以垂范后世者。可谓为实用派。二、伏羲初画八卦。是为穷神知化，与辩证法之导源，可称为哲理派。^①

同样的不大注重史实探讨，而专从思想渊源立言者，又有劳思光的学说。他对于不能或不肯驳论的部分，则置之于一种不确定的可能地位，然后自抒己说，如其谓：

约言之，“儒”作为一社群，可能是由职业礼生演进而成，此种职业礼生亦可能与殷士有某种关系；但就“儒学”而论，则孔子以前实无所谓“儒学”；“儒学”之基本方向及理论，均由孔子提出，故“儒学”必以孔子为创建人。至于儒学之精神及思想倾向，与其前之文化间之关系，则吾人可断言，孔子承周文化之方向，而扬弃周以前各民族之原始习俗及观念。就此而论，周人之人文观念可说在孔子手中方进入自觉阶段，而成为确定之学说；逆而言之，亦可说孔子之儒学乃周之人文精神成熟之表现，亦即周文为儒之源。^②

此外又有陆懋德的说法，亦谓上古哲学始于八卦九畴，孔子祖述尧舜，以成儒家宗派。仍完全自思想体系立说。陆与熊、劳意见，在诸家讨论之中，为较少数，但亦自具独立风格，不能略而不论^③。

除陆、熊、劳三说是从思想渊源立说之外，又有再自基本上文字训诂入手，重新连同史实思想做一贯解释者，则有饶宗颐的《释儒》。饶氏立说的原始根据，大体上不同于以上诸人。前人一般沿用《说文》，训儒为柔。在饶氏看来，其基本异点即发生在此处。他据《尔雅》、《尚书》、《诗经》、《中庸》、《国语》以及金

文上的许多记载，推断“柔”字本义当为“安”之意。并进而推定“儒”字原义当为“安和”之意，这是文字本义的一个新解释，很不同众说。至其所得结论，也是一个综合思想精神的新说，如其所谓：

今综合（一）论语所谓“君子安人安百姓”。（二）师儒即师保，保即以道安人者。（三）儒之言柔，即能安人能服人。各点观之，意义正是互相融贯。由上列的论证看来，无可否认的，“儒”训“柔”，它的意义并非柔弱迂缓，而是“安”，是“和”。但怎样才可达到安和的境界呢？在儒家特别提出礼乐二者，因为“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礼记·乐记》），人与人间的相安，有待于礼来维持；人与人间的和谐，有待于乐来调节。礼乐二者，是求安的最好工具，所以儒家非常重视。真正的君子儒，是要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修己之后，还要安人和安百姓。无论施之教育或行于政治，都要能安。贾谊是标准的儒家，在过秦论下述他们的政治哲学道：“先王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人而已。”提出一“安”作为政治的最高法则。“安”即是儒的意义。由于“安”的哲学的建立，长治久安，遂为中国历来政治家和老百姓的共同目标，且形成了普遍的民族观念。^④

然则饶氏探讨儒家起源的举证历程，虽无同意职业学说之意，却自不免又回到官守之说的路上去。兹见其所论可知。

乡里子弟和那些有道德有才能而致仕的师儒联系起来，受到人格的感化及陶冶；这种乡村教育是最基层的政治工作。欲使人民相安无事，先从教育入手，那是最扼要的。中

国古代的政治理论，见于尚书皋陶谟中，施政的双轨是：“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官人是施政者本身知人之明的训练。（“哲”字史记作“智”，“官人”是说如何去任用人。佚周书有官人篇，大戴礼作“观人”，是古代对官人问题的专门著作）安民是施政的惟一方针。能使人民心悦诚服地自动归向，而不致陷于罪过，相安以处，这是最高的政治理想。为欲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向一般人民施行德育和生活技能的训练，所谓“以道得民”，“以道安人”，便是这个意思。道只是一个混名而已。所谓“师氏以德行教民”，“保氏以六艺教民”，把“德行”“艺能”分开，我疑心这应该像现代学校把训育和其他科目的课授分开一样。“师氏以贤”正表示古代对于道德行为的重视，和给以特别的训练。（孔子设教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便是进一步的分科）古代的乡学和国学都有师保负责来推行教育工作，师保也叫做师儒，可见儒的原来亦就是负责推行教育工作的人。孔子所以为“儒之所至”（韩非子显学语），便是他将这种神圣工作给以扩展和充实。他把官学发展为私学，有教无类地去进行平民教育，毫不厌倦地去教人和充实自己的学问，统一了“师”“儒”的工作，揭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宗旨，都是他的绝大贡献。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推行教育工作的是“儒”，所以孔子被尊为儒宗。保氏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而儒家以六经为六艺，也是脱胎于保氏的。^⑥

当然，饶氏立论精义，自应在其解释儒家原始志节方面。

至于循同样的推理程序，而终于完全回到刘歆的儒家出于官守之说的，则是年代最近的戴君仁的《儒的来源推测》。他的结论，已充分承认儒是出于司徒之官的正确性。如他所谓：

上节我们已讨论了“儒”字的训诂，所谓术士，就是经艺之士，习诗书诸经的人。现在由这个解释出发，来推测儒的来源。关于诸子十家的来源，汉书艺文志都说出于王官。现在看来，有些家是附会的，而关于儒和阴阳两家，却说的很对。^②

然则沿守儒家出于王官之大命义下，从而解释其来源者，同样是民初以来学者所多方致力的工作。如孙德谦之说：

今天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四曰儒。解者虽谓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然儒以道得民，固周官世守之遗矣。^③

如陈钟凡之说：

儒者隆礼，因推崇周公而服习六经。盖以周公制周礼，六籍由是以传。故号周公为大儒，名周礼为儒书。而儒者之名亦本子周公之籍也。试详言之，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谓“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考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而师氏之职，掌以嫩诏王，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故郑氏知儒即司徒之保氏。道即保氏之六艺。刘氏乃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遘文于六艺之际也。^④

如陈柱之说：

夫周礼以师与儒并言，则儒本为掌教育者，此正与司徒

所掌同。孔门以教育为职志，故名为儒家。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孔门之自称为儒，乃其确证。^②

如钟泰之说：

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上世之学掌于王官，无可疑也。然王官之学孰为盛。曰，周为盛。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文献之盛，二代非周比也。虽然，周之盛，文武开之，而周公实成之。^③

又谓：

班固因刘歆七略为汉书文志，而谓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九流之学，皆出于古之某官。又谓“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近人诋之，以为附会揣测，全无凭据。然庄子天下篇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则百家渊源于王官六艺之学，战国时人多知之者。不得谓七略艺文志无所凭据也。^④

如张寿鏞之说：

上古官皆世守，各以其学施之于政。沿袭既久，又各出其所得，以教一时之穷，而收其效。所谓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当周之始，周公以礼，太公以法，于是齐鲁之政殊焉。周公之后，承其礼者孔子也。太公而后，承其法者管子也。^②

又谓：

周礼：儒以道得名。郑康成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国者。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然以论语：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之说推之。儒者不过士之通称而已。既有天下之善士，即有天下之不善士；既有通儒，即有陋儒；既有雅儒，即有俗儒。今日儒家，盖指以道得名者言也。^③

其次则有蒋伯潜的比较综合新旧之说法，略如饶、戴二氏之方向：

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是儒字有二种意义；其一，即有道术之士。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为儒。”就用说文解字底后一义。可见“儒”即今语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材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家”之名，似以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者为最早。汉代人称孔子之徒及其后学者为儒家，则孔子自为儒家之开祖。周官太宰：“儒，以道得民。”注说：“儒，有六艺以教人者。”又大司徒注说：“师儒，乡里教人以道艺者。”则“儒”不但须有知识材艺，而且须以知识材艺教人；即不但须为学者，而且须为教育家。^④

民初以来学者讨论儒家起源问题，可以说形成一种新的风气，许多有声名有学问而且在学界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都来参加。当然这仍是治文、史、哲三方面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讨论者，自然全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其影响力，在有形无形之中，却普遍深入人心。至少也可以广泛地激醒人的一般观感，特别是不同于旧说的新奇创论。这种影响，事实上即是外国学者也在连同承受。

一种学术潮流的变化，一种治学风气的形成，往往不尽在学术本身的发展而至，多半是受着时代思潮所支配，甚至也会受到一些流俗的时髦观念所影响。最显见的例子，就是汉代阴阳五行思潮对其同时代学术风气之影响，这是今日学界所公认的。儒家起源问题之发生于 20 世纪，也正反映当代思潮的影响力，同时并表现了当代的精神趋向。

就总体思潮大势而言，自清末 70 年间的酝酿，经辛亥革命，而建立民国，给与中华民族带来一个数千年来所未有的新局面。为此民主世纪之开始，知识分子尤其欢欣踊跃，而感到希望无穷。连接清季的一些新思潮，自此更加强其展舒勃发，迅速奔放，以至笼罩一切政治、社会、学术各项活动。这些奔腾活跃的思潮之主流，其足以刺激学术思想之转变者，在基本精神上有几支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存在。其一，是自由精神。它带来了言论自由批评公开的风气。使人人敢于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其二，是平等精神。它带来了彼我相对地位均衡价值的分判，使人自觉其立言抒论之重要性。其三，是独立精神。它带来了个人意义的确立。古人虽然也很重视个人之独立判断。但此时期却更要强化，而欲脱除一切固有信仰成说之依附，以自我负责的审察与建立信仰。其四，是进步精神。自进化论发展而来的进步主义，使国人在强烈的企图开辟天地新境界。反面说就形成反固旧反传统的风气。其五，是革命精神。自清季革命直接发展下来的趋势，

于政治革命成功后，立即转向于文化社会方面，特别是在文化学术，产生许多新的运动。或有人以为得自于一两人的提倡，自是不明历史渊源。此五项精神，为民国建立以后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基础，同时汇为两个具体的目标，当然目标也是从西方知识史例中模仿得来。这就是民主与科学，两个鲜明的思潮旗帜，几至人人倾心崇拜，而得以笼罩一切。

另一股外在的因素，是近代中国数十年来为外力侵逼，处处受欺示弱，以相形西方之强。并由欧美知识思想之输入，遂亦确认西方之优。在强与优对比之下，则更显示我国本有之弱与劣，于是而产生本有的自我反省，思路亦奔趋于固有文化之彻底检讨。终于发展为 20 世纪的古学大批判时代。固有一切，愈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权威地位，愈是会遭受严刻的批评。就儒家来说，当然是代表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自是首当其冲，受到当代学者注意。当然学者之批判动机，自不是直接据此而发，实则在时代思潮的支配下，许多人是在自设栏圈的自动走进去。同时在思路上有几个有形的栏圈和无形的栏圈，使所有的学者都会自然地走进古学批判之旋流，有形的栏圈是固有的所谓正统学术之必然废止的趋势，同时也可以说儒家独尊局面之必然废止的趋势。这个问题引导学者思路发展两个动向，其一是彻底反儒的动机。其二是重新评估儒学价值与意义的动机。无形的栏圈更具有支配力量，那就是上述五种精神支配下的心理因素。可以追察者，如慕新的心理、不蹈袭故说的心理、客观的分离心理、科学的怀疑心理、言论自由的心理。种种因素，使学者们大致地倾向于探讨新路之发展，面少与旧有事物以应有之尊重。于是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与风气之下，发展为古学批判的学术趋势。

虽然整理国故在表现文化发展之正途，学者们更以澄清古史体系为职志，但其方式则必然自古学批判入手。其基本精神，原始动机，固未尝不是正确的，而其发展变化，至于逐渐远离本题，

则是学者们在不自觉中卷入一时的狂潮，并推波助澜，加强其破坏力量，乃至无法收拾。这也是理性口号下一种更浪漫而冲动的行径，影响及于大部分当代知识青年。理性成分殆至全部消失，所遗者仅有冲动之革命情绪而已，自要打倒一切，所向披靡。

就理性方面说，古学批判之热烈，乃至反孔排儒，实在反映出思想之解放，正表现一个光明活泼的创造时代。可惜此一时期并未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以及重要的哲学体系。大部分工夫都用在古学探讨方面，激烈的批判气氛占去一部分，更激烈的反传统精神又占去一部分。对古学稍加信从者，都变为极不合潮流，换句话说都成了落伍者。对于过去既不具信心，对于西方文化学术又不是真能通熟融会，于是所凭依者仍是对西方新知之一种启示感悟，用之以处置一些传统知识中之素材，则亦只有古学批判，为自必循之途径。

古学批判之盛行，大致由上述种种思想背景发展而来，而在此风气下尽心尽力之学者，遂亦全神贯注，钻采古史，在正方面达成丰富之辉煌成就，一时古史研究大家辈出。而儒家起源学说之纷立，亦即此时代风气下之直接结果。

近代学者之探讨儒家，一开始的基本态度，即不同于往时之传统态度，这种新态度，在表现于客观的分离性。也就是说，论者所持的立足点，完全是外于传统的立场，尤其是外于儒家的立场。而以儒家纯然置于评判之客体，自己则立于超越一层之角度。此外则附以必有之心理的假定，就是观察真确，方法新颖，并具备世界新知识。很显然易见的，其中若干学者并故意以讽刺口吻批判，字眼用得十分轻佻，以示其绝对不是儒家，使读者以为公正而客观。例如胡适所谓“孔二先生”，傅斯年所谓“教书匠”，郭沫若所谓“文诌诌，酸溜溜”之类，均在表现其客观分离意味。这与往时学者之以儒者而论儒家，是完全不相同的^⑤。

再进面一论各家所持之方法，当然也是有若干不同。无论在实

质上乃至诸人的自信，近代的治学方法实较往时宽广而健全。但有一项缺点必须指出，那就是诸人对于方法的运用并不尽谨慎。从他们讨论原儒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一些人并未遵守严格的原则。

古史资料之最大特色，是有限而稀少。古史不易复，以资料万不存一，所存之中，又不免其脱漏错误。又加历代之杂增伪托，予以混淆。真者有限，真伪难辨。乃至事迹牴牾，难于清理。这是治古史者所应共知的重大特色。至其重建古史形象，无论采取如何方法，而基本趋势，则必然是以小见大，以微推显，由近知远。这是研究古史步骤上一个重大特色。惟其如此，故须特加小心。判断资料，运用资料，由一推至二，乃是自然之理；由二推至三，已不足有可靠把握；由三推至四，则已至于架空地步。若干学者，思想活泼，立论大胆，遂不免一推再推，全属蹈虚。结果是以科学之方法始，却反自陷于炫奇夸诞。以探讨儒家起源说为例，可以看出当时学者研究方法上之若干显著缺点。笔者这样批评，自在求学术进步起见。古人之说不可尽信，近人之说又岂至全为神圣权威。学术基本，在于理性判断，此古今不易之理。今既有此批评，自不能不举实例。此处举证，自是个别的，不但属于学者个人，且只限于儒学问题范围，无须视为解释一代之治学风气。

近人讨论儒家起源问题，若干学者喜鹜新奇，然不免其态度方法，均蹈不少错误，这里可以举其显著者六点。

其一，是争持创作权之意趣。比较诸家论著，最早发表儒家出于职业之说者，应为胡适的《说儒》。然郭沫若反对，认为自己十年来的言论中早有这种意思。钱穆则举其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比较《胡适论学近著》所载，以为自己在先。实则《说儒》单独发表早在钱书之先。冯友兰以为自己民国十六年在《燕京学报》第二期，已讲到孔子收学费授徒之事，已具有此意。而后又说这是同一时代各家不期然而共同想到的结论。傅斯年虽未提积

极意见，但也不说明创说来源。这种情形在今日学术研究来看，是极严重的现象。就当时的反映说，一是可鄙的争夺。二是蔑视他人的成就。三是对学术研究的不忠实。四是诸人多半为受新式教育，特别是留学外国，对于重视著作权之意义与道德，实未能学得。当代学界领袖如此，自无怪学界之盗说丛生，以不引前人创论为高，攘他人之长为己者，不一而足^⑤。

其二，是架空蹈虚之推理。这里可举一个例子，郭沫若就司马迁《报任安书》，推断原始之儒，是轻骨俗鄙的一类人。其举证史迁的原语：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⑥

郭的推理的第一道桥梁，当必认为史迁是在批评儒者。但司马迁时代已把儒家和他种身分划分得很清楚，在《报任安书》中显然不是批评儒者，这几句话也丝毫没有评儒的意思。郭的推理的第二道桥梁，是认定古代之祝是古代之儒，司马批评祝，等于批评儒。但必须知道，史迁是在说西汉初他父子一代的世风，这句话特别是愤慨自己受侮，上面尚有“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的一句话，下面尚有“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一句话，他不是叙述往古。拿西汉祝的地位去形容孔子以前祝的地位已足够荒唐，并再辗转去影射到孔子以前之儒的头上，岂不更是不着边际。再说，儒的本原是不是祝，还都在疑似之中，没有被人接受之定说。再拿后代之祝，去代表前数百年之儒，真是连影子也沾不上。

其三，牵强附会。近代学人最好讲究科学方法，实际在治学方面，仍极容易自蹈牵强附会。这里可举胡适所讲殷商亡国后一个复国的预言。胡适的举证，认为商颂的玄鸟篇就是预言一个民

族复兴的英主。又举宋襄公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失败英雄。再以孟子所讲五百年圣人迭出的话，而证孔子是殷商复兴运动中应运的圣人。他这一串学说，凡有论者，无不反对。首先江绍原一连三篇讨论，批评其附会宋襄公故事的举证。简单说，宋襄霸业之争可有明证，代周之图却无从见及，何来有复兴殷商之说。关于玄鸟，本在歌颂先德，是一堂皇铺张之乐典，何至变成一首预言。冯友兰即以此反驳。郭沫若更就读法不同，推翻了他对玄鸟的曲解。关于孟子的话，是自尧舜以至汤，自汤以至文王，自文王以至孔子，其间各五百年，本在指文化道统承继而言。何曾分别朝代民族的对立。春秋时孔子已有此种思想，经孟子始为系统化，理论化，又何尝是复兴殷商的意思。总之胡氏的预言说，举证虽琳琅满目，却不能支持他的学说，这是他整篇《说儒》中最弱的一项理论。

其四，是立说之自我矛盾。近人论儒家起源，创说对象即要先反对传统旧说，而探讨最后，各家或隐或显的又多归宗于二千年来来的官守说。此以冯友兰之说为例，他讲儒家出于一种职业，即治丧、相礼、教书这一项行业，似乎足已推翻刘歆官守之说了。其实却不然。若再加追问，这种职业的来源是什么呢？他的答案很清楚，那就是来自于“官失其守”的官，在《原儒墨》中，他自解释谓：

贵族不能自养知识礼乐专家，于是在官之专家失业散在民间，此即所谓“官失其守”，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贵族既不能自养专家，而专家之用仍不可少，如教育子弟，丧葬典礼之事，仍须专家。于是昔日在官之专家，今仍操其旧业，不过不专为一家贵族之专家，而成为随时为人雇用，含有自由职业之性质。^⑧

而在其另外一篇《原名法阴阳道德》中，就进一步承认刘歆之说的正确性，如其所谓：“刘歆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其主要意思，是有历史的根据。”^③虽然他还有更细的解释，而官守之说，却无疑地被再稳固下来。因此就冯氏个人说，既要创立职业说，而又服从官守说。显得颇为自我矛盾。

其五，是无根之臆断。这里可以举郭沫若所论孔子以前之儒之推论。他推断古人称儒云：“古之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诌诌，酸溜溜，起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意的称呼，故尔在孔子以前的典籍中竟一无所见。”^④显然这一段话是属于郭沫若自己的想法，因为孔子以前之人并没有留下一毫这样性质的记载，这是凭空杜撰的。没有证据，连假借之架空桥梁也省了，只凭空制造云雾，渲染一番，未免到了信口开河的地步。

其六，是轻疑。就时代风气而言，学界正大力提倡科学，人人亦必以推重科学为进步。而科学的基本启念，即出自怀疑。是以怀疑风气，同时盛行。怀疑本为治学重要基本精神之一，为治任何学问必不可少。但近人提倡，遂不免有过度之发展，难得完全适中运用。古之人多偏于轻信，今则矫枉过正，乃转而偏于轻疑。此乃时代风气，并非一二人如此，今可举郭沫若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看法。他举《论语》中与《易》有关系者两处。第一处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对此他据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考说易为亦，而以为应读：“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然此说成立，《论语》中他处皆扞格不能通，浅学如笔者即已直觉看出。后来验之熊十力《原儒》。亦举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云云，及“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云云，而反证“五十以学”之不能成立。第二处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一句话是直证周易最佳证据，一是讲“恒”之意义，二是“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句，同于恒卦爻辞。但郭氏认为，一部《论语》中“只共通得这一句”，是奇怪的。所以不予接受。这种反驳，简直弱到极限，没理找理。反正他要怀疑孔子与《易》有关，现成的反证完全看成一文不值。这是轻疑风气的直接结果^④。

回头来再一探讨诸家原儒说的重大贡献或成就，这应须在一代学术史中做一估计。这里也有六点成就足以称述。

其一，是反映一个开朗的学术自由时代。辛亥革命以后，随著政治的民主世纪之到临，学术界也达到一个千年不遇的开放时代。思想尽情奔放，言论十分自由，无论在哲理、政法、文史、艺术各方面，都表达了热烈踊跃的讨论批评。反映在古学更是显著，值得后人做一番精细的探讨研究。本来实例随处可见，这里单就儒家范围，而且更就其最微细一点来看，就足以见出五花八门的思想见解来。根据《说文》：“儒，柔也”这一个极简单的定义，各家的反应，却都表现了他们独立的观点。胡适主儒为柔，指态度之柔，在表达一种坚韧柔逊。郭沫若主儒为柔，指习性之柔，在表现没有骨气之柔儒。冯友兰主儒为柔，指形表之柔，乃柔弱文士之状貌。钱穆主儒为柔，在限于字义之训诂，儒名之义，乃为术士。饶宗颐主儒为柔，指精神之柔，在于安和之意。（今日形容光、色、音、调，尚保存此义。诸家之说，吾从饶氏）虽一字之简单，各家陈说，均自显其卓识，推之其他复杂之史实，其必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乃是自然之理。

其二，是表现启发性与创造性。新思潮之产生与进展，起于联想者多，起于推理者其次，起于顿悟突创者最少。此外则模仿效法，虽未足云创造，然亦有其新思想之地位。凡此均须藉启发诱导，始足扩大创新之动力。民初风气开朗，知识基础拓展，新问题之提出，新理论之介绍，新方法之试验。均予人耳目一新。虽然是探究古史，亦增不少创发性之结论，彼此影响，互为因果，自有益学术进步甚大。

其三，是批评风气之建立。20世纪初之中国学术界，旧有师承传统已被抛弃，新学者权威尚未建立，各家争鸣之际，谁也不服气谁。于是甲说出则乙评；乙说出则丙评；丙之评又被丁评；丁之评又被戊评，构成互相交织热闹之讨论。这是二三十年代学界最流行的风气。对之儒学而言，一时有数十人共趋同一问题，互相指正谬误，已显示谁也无法独占，亦足见公开批评之有益。

其四，是论题、取材与方法的开拓新领域。近代学术界之开拓，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文化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复兴的一项最有希望的途径。这个步骤，最初当然是幼稚而杂乱的介绍，不适当的应用，生硬艰滞的蓄纳，和一些标新立异夸诈不实的见解。但是终于会酝酿出新路，澄清若干观念，和逐渐达于吸收融会完成创造之境。讨论原儒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其中可省察到题旨与资料，理论与方法，均正与往古有着不同方向的试探与进展。

其五，是古史系统重建的前驱。古代资料与史实，自秦汉以来，从未遭受过现时之严苛批判，尤其向来未见如此全面的总检讨。其动机背景自如前述。而古史经过一次重大淘洗之后，反而使之眉目清醒，亦可见出其百炼不坏之基础架构。以近人之原儒论而言，他们共同澄清了一些概念。其有不可摇撼之处而重新坚定信念者，如：一、相信孔子为中国总古学大成之人物。二、相信孔子是一伟大之师表。三、相信孔子及儒学为古代思想最早建立体系者，亦即中国思想界之重要开辟者。

其六，是造就一代古史研究人才。在古学批判的风气下，一时重要学者全都参与讨论，他们是本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学界领袖，所提出的言论，为后辈青年注意和信从。同时他们又多为教育后人的大学教师，并在学校专门讲授这些学说。即使不教书，也会在出版品的影响下广及于大众。于是造成了后一代的趋向古史研究的风气，新人则更奔向深入的发掘与细密而合理的考察。

考古学的发达，新资料的层出与应用，使古史走上了稳定的重建坦途。古学批判时代，自必在七八十年代逐渐消歇，而稍留余波荡漾。更成熟的创造与建树，是属于有理性自觉的学者所应尽之责任了。

关于儒家起源问题，经过多人探讨审察，大致已予人一新的概念。基于人类文化发展线索推断，儒家出于官守，由官守而发展为职业，是自然的趋势。基于古籍所载，特别是周官的记载，儒是由师保身分而来，特别是师儒即师保的了解。大抵较新派学者，不取信周官，而多主职业说。较守传统之学者，则重视周官说法，仍本官守说。此外又有不依历史线索而纯就思想立场作说者，即以孔子为儒家起源。

考察众说，虽各有立场，但仍可归趋于一体，第一说虽合理，但孔子以前并无确据，无论如何，均须将孔子以后之《礼记》与《左传》作为重要参考方可，既然必须依据《左传》和《礼记》，自无须歧视《周礼》，实则《周礼》出战国末年，去古未远，其说自有所本^⑩。若合各书共观，则诸说合一，证据更多。何况诸人在训诂方面又均用更晚的汉代的说文。

至于儒家原来与其后代，其意义所指与内容所涵，显然是历代均有变化。自如章太炎所谓：“题号由古今异。”此乃名号词类之通例，任一词类皆有随时代变化之可能，何况在一有体系发展之儒家。名号愈显，竟戴此名者愈众，尚不止于其本身之繁衍扩张也。战国儒分为八，固已周知不论。即秦汉方士，亦假儒名文饰，陈槃有极确当之考论，有谓：

谓儒学为显学者，非必其为权势利达也。砥厉廉隅，怀抱道艺，声名高世，伦类向趋，虽不臣天子，不事诸侯，即此是也。然儒学已尊显，子是虚伪之徒，有假之以为进身之阶者，则阿谀苟合之方士，是其人也。以今所知，盖自邹衍

以来，即已如此。^③

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儒名自战国以来，已因内在的演进与外在的附庸，而随时代在扩张中。是以名实因古今而异，乃自然之趋势，不足怪也。若必欲共求名实，历代争议实多，而终无所底止。是以确定儒为保氏，则汉代难得几人。如戴君仁所谓：

汉儒治经，只是为博士之学，而不是培养政治领袖的。所以西汉儒士虽多，而能成为大儒哲人的只有贾谊、董仲舒、扬雄寥寥三两人而已。儒家的真血脉，恐直到宋代才延续起来啊！^④

此同于刘师培、章太炎之观念，可以在治学上分明学派，却不足以形容中国儒学之发展。虽然章太炎更做达、类、私三重名词分别，仍然不符实际。

在今日了解往时所沿习称谓之儒，有几重不同意义，可以略说于此。其一，是最广泛的称谓，儒就是一般学者之代称，也可以解释为知识分子之代称，或读书人之代称。若看习惯上所谓的“焚书坑儒”，“舌战群儒”，乃至明代学者称利玛窦为“西儒”等，均是此意。其二，是历代经师饱学之士之代称。虽为泛称，却意有专指，这些儒，大抵必须包括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有学术贡献之思想家而言。历代史家所列儒林传，乃其显著范围。其三，是儒家原有学派之代称，即先秦自孔子及其门弟子所开创之学派，这就是近代学者所讲求的真儒。当然在今天来说，由于观念的逐渐改变，最盛的广泛指称已不再生效。昔日章太炎所希望的“皆弃捐儒名，避师氏贤者路”，已自然实现。即使博学之士，各以其学名家，亦无须自认或他认为儒。所余者，仅历史上名词，以识别儒者与儒家学派，故决无与当世身分

有所关联。

至于向所为人共戴之正统学术，自董仲舒之独尊儒术起，至康有为之立孔教止，亘二千余年之历史，亦至 20 世纪而终止其独尊局面。今世学术，尽其中外辉映。尤其欧西繁类之学说，大量倾入，自无独尊一家之可能，则儒学地位，复归其一学派之立场，乃自然趋势。

但儒学自战国起为世之显学，经历代学者相研讨发明，崇重备至，若非其有博大深厚之道理在，何至多数学者，倾心至此。岂历代学者皆愚昧无知，或童奴成性，而甘心受世之人主所牢笼者。此当可信儒学在任何时代，必有其坚定不摇之存在意义。今世学术昌明，中西各类学说杂陈，任凭学者自择而钻探之，凡所归趋，皆本良知。儒家乃众家之一派，儒学乃世界文化之共器，其有无发展，能否存续，皆俟后之才智聪明之士之采择，无待今人之打倒或扶持也。

最后再进而一论孔子。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孔子，实有两种不同了解。或者说中国传统中有两个不同格的孔子。其一为孔学或儒学之中心，真事真迹表现于古代历史及其对于往古历史之直接影响。其一为中国文化表征之中心。中国文化之特殊表征多种，孔子乃其最著者也。此即中国历代学者士庶所共同塑造之信仰偶像。提出孔子，即足以了解中华民族全部信仰，与一切对于天地知识，人生观念等理性的信念。在无数不同支派的世界文化型制中，孔子即象征着中国所独创的人格，亦即代表中华民族全体之人格。在笔者之前，有就文化立场而言者，如柳诒徵之说，然未及中华民族之全体也。兹举其说：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

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④

就一个全体民族文化立场而言，孔子是中国理性信仰中的伟人。同时也是中国人所创造的世界伟人，足以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民族与文化之代表^⑤。至于儒学，则是孔子及其门徒以至历代智士贤者所共同创造与维系之一门显学。纵观古今中外之世界伟人，欧洲有五，即：苏格腊底、米开兰基罗、伽利略、马丁路德、贝多芬。美洲者有二，即：华盛顿、林肯，然以博大仁爱而言，仍不及亚洲者之伟大。亚洲者有六，即：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孙文、甘地。中国有孔子，是表现其文化创造之自信，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不可磨灭之光辉。近人要认识孔子，这一点关键是不可忽略的。

1971年10月10日写于南港

注 释

① 刘歆：《七略》，“诸子略”。

② 《国粹学报》第三十三期，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刊。

③ 同前。

④ 同前。

⑤ 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下，第119页。

⑥ 同前书，第120页。

⑦ 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刊。

⑧ 《说儒》一文所引起的反响与新的探讨，计有：

江绍原：《古宋君臣们的民族复兴运动》，1934年12月21日《华北日报》。

江绍原：《力劝宋襄公复兴殷民族者谁耶》，1934年12月22~24日《华北日报》。

江绍原：《“天之弃商久矣”，是谁说的》，1934年12月25日《华北日报》。

贺次君：《说儒质疑》，《史学论丛》第二期，1935年刊。

李源澄：《评胡适说儒》，《国风》半月刊六卷三、四合期，1935年刊。

冯友兰：《原儒墨》（此文非直接批评说儒者。但论述中颇有涉及），《清华学报》十卷二期，1935年刊。

冯友兰：《原儒墨补》。《清华学报》十卷四期，1935年刊。

杨向奎：《读说儒》。《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四十三期，1936年刊。

郭沫若：《质问胡适》（后收入《青铜时代》，改题为《驳说儒》），《中华公论》，1937年刊。

刘兴唐：《儒家的起源》，《人生评论》第二期，1936年刊。

钱穆：《儒学之起源》，《华北日报》，《史学周刊》一一三期，1936年刊。

知堂：《谈儒家》，《世界日报》，明珠六十五期，1936年刊。

缪越：《儒学序》，《国风》八卷八期，1936年刊。

姜忠奎：《儒学叙论》，《国学论衡》第八期，1936年刊。

张寿林：《“儒”的意义》，《晨报副刊》1936年刊。

⑨ 郭沫若：《青铜时代》，第150页。

⑩ 钱穆有关儒家起源学说，最早有1936年11月，《华北日报》史学周刊所载之《儒家之起源》一文，然今已不易见。兹乃采取其在抗战期间所发表之《驳胡适之说儒》，此文又于1954年《东方文化》一卷一期重新刊出，此处引论，即据此本。

⑪ 钱穆：《驳胡适之说儒》，《东方文化》一卷一期。

⑫ 同前。

⑬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第9页。

⑭ 同前书，第10页。

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第28页。

⑯ 同前书，第29~30页。

- ⑰ 同前书，第 31 页。
- ⑱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第 185 页。
- ⑲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 39 页。
- ⑳ 李源澄：《评胡适说儒》，载《国风》半月刊，第六卷第三、四合期。
- ㉑ 熊十力：《原儒》，第 8 页。
- ㉒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 34 页。
- ㉓ 陆懋德之学说：应在其所著《周秦哲学史》。此书于 1923 年问世，今已绝版，访求不易。今仅据柳诒徵书评，述论其全书 11 章大要，而获知其概略。此书评见于 1924 年 5 月《学衡》第二十九期。又，陈恭禄著《中国史》，中有“说儒”一节，亦主张儒家以孔子为始。见该书第 562 页。
- ㉔ 饶宗颐：《释儒》，《东方文化》一卷一期。
- ㉕ 同前。
- ㉖ 戴君仁：《儒的来源推测》，《大陆杂志》三十七卷第十期，1968 年 11 月刊。
- ㉗ 孙德谦：《诸子通考》，第 9 页。
- ㉘ 陈钟凡：《诸子通谊》，第 53 页。
- ㉙ 陈柱：《诸子概论》，第 5 页。
- ㉚ 钟泰：《中国哲学史》，第 6 页。
- ㉛ 同前书，第 8~9 页。
- ㉜ 张寿镛：《诸子大纲》序。
- ㉝ 张寿镛：《诸子大纲》，第 8 页。
- ㉞ 蒋伯潜：《诸子学纂要》，第 24 页。

又，民初论儒家起源之说者，不一而足，虽广为搜罗，尚未能尽全。今就所知，已得 22 家，而未能读得者尚有：邵海：《儒家出于史与宗教家出于祝不同说》；许地山：《原始儒家与儒教》；刘兴唐：《儒家的起源》；张寿林：《儒的意义》；李翘：《说儒》。此五者当必为近代儒家起源之新说，无论观点如何，自应为本文所当参考。这是笔者所引为遗憾的。此外又有相关者，尚有：马叙伦：《儒学论》；知堂：《谈儒家》；缪越：《儒学序》；姜忠奎：《儒家叙论》；贺次君：《说儒质疑》。此五者似当参考。均望学界有以教正补充之。

- ㉟ 中国历代尊孔之盛，不惟列为国家祀典，各地文士，宗奉为大成至圣先

师。穷乡僻县，亦有文庙泮宫。即使蒙塾，亦必朔望致祭，礼仪严肃。凡知书识字者，称及孔丘，则读如孔“某”，书写“丘”字，必作讳笔。上下习俗，崇敬若斯。盖信为圣人之徒，儒门之行耳。与今者比，其极力标榜不同者，亦文士风习之一重大转变也。

- ③ 冯友兰 1927 年在《燕京学报》第二期发表《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其中果有“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之句。且冯氏于《原儒墨》并先举胡适、钱穆、傅斯年诸说。故冯氏态度，实足当治学者严正之道德风范。然冯氏前论，仍是创意，并未言及儒家出于职业。自尚有一段距离。又据冯氏所引，傅斯年之油印讲义言儒家出于职业说，当在 1929、1930 年间，自前于胡适《说儒》。然非正式公开发表。是以此间所论，当不必深计于冯、傅。然其争持领先创作地位之行为，则很显然是相同的。
- ⑦ 萧统：《文选》卷四一，第 8 页。
- 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第 30 页。
- ⑨ 同前书，第 78 页。
- ⑩ 郭沫若：《青铜时代》，第 152 页。
- ⑪ 同前书，第 66-94 页。
- ⑫ 史景成：《周礼成书年代考》云：“周礼当成于吕氏春秋后，始皇统一之前。盖作者目睹周室已亡，天下即将统一之局势下，而写此建国方略，以供新王行政之大典。因其成书之晚，又兼秦室统一，旋即亡乱，故不见先秦文献。”（《大陆杂志》三十二卷五至七期。）钱穆则主张周官和吕氏春秋为同一时代。见《燕京学报》十一期，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
- ⑬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 ⑭ 戴君仁：《儒的来源推测》，《大陆杂志》三七卷十期。
- ⑮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第 300 页。
- ⑯ 陈清泉：《诸子百家考》，第 12 页，特具此观念，有谓：“孔子者，伟人中之伟人，圣人中之圣人也。孔子生于中国，为中国一国之名誉。故中国人常称孔子为绝代之伟人，以夸于其他外国。”

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 问题之发掘

在中国近代史范围中，往时学者对于思想方面颇不注意。有者则缺略不论，即论者亦仅泛泛叙述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显著之流通词汇。实不足代表近代思想转变之概要，且多予人误解，以至轻视此一时代思想潮流，而以为原不足观。本为学者之懒惰、无识与轻率，致使人误解前人思想之贫乏、固陋与浅薄。实乃治近代史者之耻辱。

自中西接触频繁，西方知识学问，制度习尚，直接间接传入中国。自1840~1860，1874，1884，1895，1905，1911，1919，1937各阶段，新思潮之输入，先后不同之观念，亦此消彼长，互相冲突。国人在此加速之输入，加频之接触，加深之感应，加广之播扬之剧变时代，真是应接不暇。遂至达于处士横议，言论纷驰境地，奇说妙谛，不一而足。而此一百年间新出思想之流布，真是五花八门，实可上追先秦时代，虽谓百家争鸣，亦不足以赅遍。

研究与处理近代思想，与治先秦思想，其难易各有不同。古代思想资料，流传于当代者实极有限，绝大多数是缺略不全，而每家每派，又必各自有其理论体系，是以研究者颇费工夫于资料之疏解考证，从而塑造一思想架构。然其必不能如原有之完整健全，则可推断而知。若最幸运者如儒学之资料，最少缺略，亦只能谓可以接近体系之完整面已。此外又有真伪问题，以淆乱各家

之学说，大足费辩解澄清工夫。近代思想，则资料浩如烟海，本不需疏证考订工夫。然其难在思想渊源之纷歧，此时代之处士横议，言论歧出，非如上古皎然可辨之流派，与有限数量之学者。且此时每一言论，又各自有其融会固有，吸收外来，辗转传习，与互相启发等来源。是以探讨一类言论，即随时关系到西方思想学术文物制度，亦牵连到中国固有习俗风教，且亦关联到当时时局之刺激变化。由是则须合并古今中外之思想文化与当代时势能通熟了解，始可获得正确之认识，而做较有把握之探讨。

此外，就一般而言，治思想史较一思想家尤其为难，即必须具备天资，有高度之敏感力与同情心，并须胸怀恢廓，能包罗全局。由是始可有特出见地，重大发现，以及达成公正之结论。

关于近代思想的研究，往时及当代学者已有的成绩，当不在少。兹暂略举中西文之成书数种。至于散见各杂志之论文，亦不下数百篇，无法一一备举。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

胡 滨：《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思想》。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

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

谢兴尧：《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周弘然：《中国民主思想运动史》。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及补编》。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Y. C. Wang (汪季千):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Tse-Tsung Chou (周策纵):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aniel W. Y. Kwok (郭颖颐):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 ~ 1950*.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g-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

就往时一般学者之研究思想史，习惯上多以人物为中心题旨。这在研究思想史的范围中占绝大多数的分量。例子非常之多。以人物为中心，则探求其思想渊源，师承系统，以及其人之理论体系。或者扩大人物范围，以研求一学派之思想体系。或者同样的扩大至某些学者思想家之师友关系，以帮助了解某一家某一学派所受之互相影响。或则更扩大至某一时代某些并行之学派与某些思想体系。然无论如何扩大，其基本途径与论题单元，总不外是以人物为基础。这种以人物为中心题旨的研究方式，可以说是近 50 年来处理思想史方法之主流。当然就中国学术传统而言，这种方式自有其历史渊源。近古学术界，处理思想史问题，数百年来已创造一项固定的形式，就是“学案式”的著作方法。如《宋元学案》，以至今年所出之《朱子新学案》。以及往时的各类师承记，各地方各区域乃至各时代之学者象传，乡贤名贤列传等等。均是此类形式著作。近 50 年来之学者，就往贤资料之方

便，无形中沿承了以人物为中心之写作方式。虽然近 50 年来探讨思想史问题者，已经注意到著作形式的结构与增强批判精神，而其基本形式则仍不脱是“学案式”的。

研究近代思想史，固然不妨采取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但是尚有他法可以试验和采用，这就是我个人所从事并且提倡的方式：就是以单一概念为中心题旨的著作形式。个人的著作完全代表这种写作形式的尝试，并且自信是处理现代思想问题一项更有效的方法。很显然我的做法是希望完成一个时代的观念的历史。而并不像前人是用人物分别代表时代，并为时代思想的骨干。我是希望做到更清楚地用观念本身的发生演变代表这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人物只是环绕着概念而随时提及。这种方法有其取也有其舍，有其长也有其短，主要因为用概念为中心题旨，自必不再顾及思想家自身的理论体系，当然也不会再注意师承系统和学派渊源。这是和前人方法绝然不同之处。

以单一概念为中心题旨，其着手研究探讨之时，会有许多困难必须克服，也就是在研究之准备与起始要比以人物为中心之做法为难。其一，必须熟习一个时代的历史，更要者是时代之转变关键，必须完全了解清楚。其二，必须就某一时代阶段了解某一概念共喻之定义，特别是多数人所信仰所互相提示的新概念。这样就必须广为搜集多数人之有关言论，用以确定其发展与影响。其三，必须探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用以了解时代思想之整体。因此这须详细考察概念之间纵的与横的方而之联属。并且最忌把发生的先后弄颠倒。

现就个人向所注意的若干现代思想史问题，提出来公之同好，以便共同研讨，使对这一代思想能获得更多的更正确的了解。我们当然可能发掘数以百计的问题，或者更多。但在作者向来喜爱偏好者，特别是思考某些历史现象时，遭到困惑或触动了一些感念，就存留下不少片片断断不成熟的概念。于是日久汇成

较大的有趣的乃至主观说来有意义的问题，再就个人能力学力体力所限，无法迅速解决，以及做深一层的研究，因此希望治思想史的同好能够注意和从事细密的追索。当然我所注意的论题和向来的偏好与信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并没有单单看重某几家思想体系，而是特别注重一种观念对某一时代所发生的影响，所注意的是单一概念在一时代中的意义。

至于所提出的论题，我可以就主观的经验作一简单的提示。基于个人已往所知和所接触的资料，我会有某种程度的负责的保证。第一，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有创发性或开拓性。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为前人解决的部分占极少数，而多半是开拓新路的研究。第二，就思想史本身来说，是富有重大意义，将有功于对这个时代更清楚的了解，而不至被夸张或虚声所蒙蔽。第三，就资料来说，是不会落空或有重大缺陷。简单说这些论题都必需广众面的大量的资料来支持，不会是只夸炫一两件特藏的稀有资料来吓诈同道。关于每一问题之下的一些简单的提示，更是主观的笼统的介绍，做深入研究的人自然会随时加以修正。

一 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意义与近代化

这个论题像是太广泛而空洞。前些年中央研究院朋友中有人从事研究，后因去职作罢。但无论观念的澄清与史实的探讨，均有重大意义。50年来的学术潮流，谈起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例外地循着一个共同的想像作出发点，那就是广泛注意和讨论中国近代的衰落。前些年还有人发下宏誓，要写出“中国近代的衰落”一部巨著。这种动机，他也不讳言地说是受了 Oswald Spengler 所著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一书的启发。可是近年也有少数学者转变方向，准备在长时期中观察中国近代的抬头，无论观念的与史实的均已展现新的论点。今日最突出创导新路的代表，

是徐中约所著的《近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这是近代史研究风气一个转变的先锋。因此也愿国内朋友会就这个方向去发掘问题。

二 “西化”问题论争

“西化”本身不代表一个思想概念, 却代表中国近代发展的动向。讨论历史的人很注意中国西化的史实, 却并不提倡西化。提倡西化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意愿和要求, 才形成了时代思想。因此“西化”在近代史领域内是不争的真实, 而在思想演变的深广时代领域, 则产生颇多的争执和冲突, 于是有本位的与西化的不同立场, 互相激荡, 构成了可观的论争, 值得从事探讨。

三 “全盘西化”论研究

此一论题与前一论题不但性质不同, 而且也不能用同一方法处理。“全盘西化”和“西化”在辞意的使用上有重大区别, “全盘西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西化”则可以一般用。“全盘西化”是中国人自己酝酿出来的思想, 可以说真正是土生土长的观念。这和更前的讲“赛先生”、“德先生”者又不相同。“赛”、“德”本身之使用就已代表了西化。而“全盘西化”却是并未西化。20世纪30年代之提倡“全盘西化”, 也像19世纪之提倡洋务运动一样, 是反映时代的思想。有其时代意义, 也有其发展渊源。虽然全盘西化之本辞出现很晚, 但在流存的文献中, 至少在1898年已有两人有了这样的言论。但在另一角度考察, 这个观念的形成, 正有其颇为曲折的发展历程^①。

四 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进化论思想

进化论原是生物学理论，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却对政治社会发生极大影响，特别是 19 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侵并压迫弱小民族，这个观念构成为最重要的理论动力。进化论思想之输入中国，无论情感的与理智的各方面，都没有发生排拒，相反的是被知识分子广泛地接受，激起多方面的反应。由于物竞天择这样冷酷的自然律，激起了民族存亡的警觉，更加增强民族主义意识。在这个意识之下，就直接发展为权威主义的国家观念，小己大群之说由此导引而出，自然走向开明专制的向往。由于进化的自然演变，激起维新的进步主义，以日新又新的配合，倡为“新学”、“维新”、“新民”，乃至“新中国”的理说。由于固有知识中公羊三世说的趋合，遂广泛地构成了政治进化三段论的学说，弥漫清末民初的言论界。这样重要的论题，国人对此尚无从事研究者^②。

五 近代科学主义之发轫

科学与科学主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是一门学问，一个是一种思想。但是科学主义则由于“科学”产生。两者间之重要不同点在于：科学的基本启念，发源于怀疑；科学主义的基本启念，发源于信仰。科学家可能同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有其严肃的宗教生活；而科学主义者则十九是无神论者。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科学已代替了他们全部信仰中心，自然也决不相信非科学的神祇之类。在中国来说，科学主义可以说是 20 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潮，影响十分广远。对于这个问题，郭颖颐的研究论著已经在 1965 年问世。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史一个重大的贡献。他的

分析，十分精辟切当，值得对学术界郑重介绍。他不单是一个问题的发现者开创者，而且在思想史领域中做了重大的建树。此间再指出这个论题，并不是要重复郭书，而是认为对于科学主义的思想渊源，仍需要做补充，因此这可能用一个论文的形式便解决了^③。

六 近代之墨学复兴

这一论题与前一题颇有关系，但也具有不同的来龙去脉，不能当作同一问题处理。自 19 世纪西方知识大量输入中国，启发了思想趋新的追求，同时也渐渐导致古学的复活。以广泛的古学批判形式，使先秦文物制度以及百家学说均获得同等重视。在诸子之中，大致趋势是儒学最受责难，墨学最受崇敬。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墨学中有不少古代的科学理论，其他如爱无差等诸说，也颇合于平等思想。自黄遵宪、梁启超诸人提倡以后，在学术领域中颇为盛极一时。但虽然是学术范围，却重要地表达了思想动向，因为此时的研究墨学，和汪中时代的风气与动机是显然不同的。同时有人也会夸张地怀疑到要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正统思想 (orthodoxy)。所以就形容这是想要“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其实平情地去探讨近代的墨学复兴，却比较更为必需，但尚无人真正从事。

七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商战”观念，全为外国来华通商所激起，一方面也是反映对西方以工商立国的认识。这个思想发生很早，在 1860 年前后已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间一个固定的概念。但更重要的是比较西方列强立国的基础而导致中国近代的重商思想。这个论题在资料上

来说是相当分散，处理起来相当繁难，至于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极重大^④。

八 近代教育改革思想

这个论题，不但资料极丰，而且问题复杂而众多，其时代上可溯自鸦片战后的考试问题与专门学校，下可连及于当代之教学方法与理论。在实质上的教育制度却因改革思潮的推移，而走上十足的西化形式，为时不及百年，则已完全改变了数千年来的传统规制，其影响力无疑是革命性的。至于一个时期（在改革思潮全程中划分）与一个时期，均有其不同的发展重心、思想趋向和其若干的影响。其间“中体西用”思想影响于教育制度的彻底改变，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则趋向教育方法理论等五花八门的展放光彩。近代思想解放，表现于教育改革方面者最具有优异的成就。

九 近代农业改良与农村重建运动

这是以务农思想为动因而展开农业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论题。无论中外学者，以往从来无人作过探讨。因为向日的风气，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却忽略了同时还存在着这样有深广幅度的重大问题。中国以农立国，数千年来重农传统早已深入人心，自近代与西方接触频繁，各国先后以精利的船炮与多样的工业产品，输入中国，尤其工商业发展的沉重压力，均使国人有深深的感受，和觉悟到谋求工业技术之重要。无论自强运动中之分别推行了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而广泛的认识与讨论也是不可胜计。但有极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仍在考虑到一个农业国家的基本问题，那自然不是恢复固有的重农

思想，而是现代化的农业改良。自强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在同治初年也曾有过片段的提示，但只为兵工业的陪衬说词^⑤。另一领袖左宗棠更在西北实地推行农业机械的发展^⑥。可以说是早期农业现代化之先驱。但重要的思想认识之转变，当以甲午战后的醒觉为显著的关键。而最先敏感的觉察并决然力行者，则表现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孙文上李鸿章书^⑦，以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立农学会缘起^⑧。可以说是反应时代之先知。而农学会之组织，亦即为现代形式农业改良机构之滥觞。接着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有朱祖荣、徐树兰、罗振玉、蒋廷黻、张謇等人在上海创设务农会，宗旨远大而策划周密，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农业现代化的理想^⑨。人于民国，这种农业改良运动又有进一步具体的表现，那就是梁漱溟以自己的构想在北方所推行的村建运动，和晏阳初利用洛氏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所推行民众教育计划（Mass Education Project），以及南京基督教大学的村建工作（Ginling Rural Work），都是十分积极而有效的推展农业现代化运动。直到最近二十余年，蒋梦麟及其农复会，以国家庞大力量合并美援基金的运用，而以台湾省区为试验地，使农业改良与乡村重建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效验。农业现代化运动的发生，是基于思想家现实的（pragmatical）观点。比较新文化运动更深入更具重大意义，但却难激起较多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兴趣。因为在表面上看来是太平凡而太不新鲜。因此这是先知先觉所领导从事的工作，也正需要有智慧的历史家去发现他们，研究他们^⑩。

十 人生观论战的意义及其影响

人生观论战，在总括的大关键上是科学与玄学的人生现分野。这是当时与后来学术界的一般印象，实质上自然要繁复得

多，至少说这已经不是守旧派与维新派的争执，因为对垒双方都有直接受新式教育甚或西方教育的人。论点的发轫与世界大局的变化有直接关联，但却触发起基本信仰问题。其重大表现，是科学主义者重要理论的建立，而且阵容相当壮大，留下很丰富的并且密集的言论资料。对后世显著的影响，是有多数人的信从，结果也更倾向于宗教成分。当时一个通俗的口号是打玄学鬼，但在反面却无意中建立了科学的神，产生所谓的“科学崇拜（Science Worship）”，流为心理的科学主义。玄学方面不但为对方理论所压倒，而且被时代所淘汰。后来几乎不再有学者敢去沾上玄学二字，个个都标榜科学。既然是科学一统，玄学鬼该是被消灭了。实际上玄学鬼的精魄却已潜伏在科学旗帜之下，发生了作用，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符录派，他们只消张口科学闭口科学，于是便感觉一切都科学了。

十一 近代反儒学思潮

自 20 世纪初，中国学术领域中展开了古学大批判时代，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还有相当强度的尾声^①。在古学批判中占最大分量以及影响最广远的是反儒学思潮。思潮发生的渊源较为单纯而易于追寻。但其发展与影响波及则是十分复杂，反儒之动机与想像则尤其千头万绪，花样繁多。自理性的以至浪漫的，其间参差不一。自理论的以至抒情的，又是百彩多姿。自经典的以至说部歌谣，也是五花八门。自实体的以至虚构的，更是包罗万象。自形式章句以至印象玄想，几乎面面涉及。自古以至今，自帝王以至隐逸庶民，凡关儒徒、儒学、士风民习之有关儒家规制者，俱在批判之列，而基本倾向自在反儒。因是这是代表此一时代的重要思潮，需要平情的研究，客观的分析，公正的论断。目今该是开始总结讨论此一思潮的时候了，希望有博大精深器识

宏远的学者去担当这个重大题目^⑫。

十二 中华民族西来说

时间过去虽非久远，然我辈于前代风气、思想、流行论题，已大多忘淡，留心探讨者已无其人。因是不能不提醒当代治近代史者勿疏忽其职司。中国民族西来说，盛行于晚清庚子以后，直迄民国二十年代始渐消歇。前后约跨 20 世纪初首之 30 年时间。最远渊源，发轫于西洋教士与汉学家之创说。乘其风会而扩张播扬者，则为晚清新派学者，如梁启超、蒋智由、黄节、刘师培、章太炎等。其宗奉信从宣扬歌颂者，则为民初学者，如吕思勉、闻一多等。一时并形成黄帝率其部民自中亚移来中原之定说，各级学校历史教本通行采用。虽一时风靡，然因证据不足，其说终以消灭。但此则反映晚清以来之思想信念。庚子以后，乃中国思想变化一重要段落，其所反应颇为复杂，并具多方面态势，而民族信心之丧失乃其中一点。醉慕西方已成普遍风气，其借西立说，正所以转变信念之方向。探究此一问题，须熟悉中国人类学、考古学之大致成就，然后始就本题之个别角度探讨分析。

十三 中国文化西源说

此与前题极相近，而更较宽广，但可以合并研究，盖其资料范围大致相同，意义价值影响亦略同。当然此一论题却有其更繁复的意义。其一则文物征献之比较，更为复杂。即相似与移植不同，又须区别文化之发生问题。其二则有文化移植与模仿之问题，如系随民族而移植，其说自成立，如系模仿，则为文化交流问题。这二者是属辩证的问题。其三是所反映的思想理念，要更近于稍前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只不过形式上加以颠倒而已。

其四是此一问题在学术讨论上还未有真正澄清，但风气与学者注意力均已降低至接近零度。在思想反应上说，则已完成其时代意义。这二者是属于思想方面的。

十四 中国社会史论争

这是北伐以后思想界所激起的一段论战，中心环绕着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性质问题与其发展阶段。前后影响十年之久，参与讨论者甚众，现存资料甚丰。近年做简略介绍者，有郑学稼所著《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⑩。学者参考研究，可做更深层的探讨和发掘。例如一个最重要的潜流，是支配社会史论战的基本信仰，那就是清末以来的政治社会进化思想。像这样重大关键，研究者必须先做一详尽的清理探索。虽然，这时的论战，几乎全部采取西方新理论，但其基本动向，却是进化论的多面发挥。

十五 五四运动的浪漫动向及其影响

五四运动为近代人重视，并引起普遍信仰，甚至纪念庆祝。文学家诗人宗奉为近代文运之先河。在时人心目中，已具备固定的影响力，然真正做理性探究者，只有周策纵之巨著一种。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在历史上较任何一代机运均佳，而“五四”则为此期中具代表性之风潮。一般认识，颇偏重于其理性之一面，而忽略其浪漫动力之强烈。尤其在其影响方面，则多属于浪漫性者，波及后世，实为深远。做研究者应就他人所忽之重大方向从事发掘，自必有出人意外之建树^⑪。

十六 西方思想模拟时代

20世纪中国思想界，其足以代表一时代之潮流者，则大部为西方新思想之介绍移植。此种移植，并非固定一端，而系杂驳万有。大抵凡西方所有者，中国必有信从者。发挥某一学说之代表，亦必蔚成宗风，门系俨然。在中国遂亦形成学派林立，各据法义。西方固有或新起之思想学说如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虚无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并必能见到倡导发扬之宗师，笃信景从之群众。亦若战国之百家争鸣，实以西方思想宗派为其依归。此种代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特殊现象，代表若何动向？有何时代意义？产生若何影响？俱值得后世学者审慎探讨。

十七 清末民初的佛学振兴运动

自19世纪西方知识思想大量输入，中国固有知识文化均受到冲击，首当其冲者固为儒学，而佛学亦受到严重影响。宗教方面之佛教，尤其急遽衰敝。特以经济利益之剥夺，各地寺院，多成废墟，幸留者或改造官廨学校，或为兵营盘踞，极少能继往日之兴盛者。不百年间，佛学沦落千丈。世界上古代中亚南亚之佛学胜地，什九为回教所代，文化景观完全改变，然亦经数百年酝酿而成。犹不及近世中国变化之飞速。有心之士，遂自觉地起而维护，或改造其组织，或加强其仪式，或阐扬其义理，或传印其经典，要之以延续佛学为指归，自杨文会、丁福保、沈曾植、宗仰，以至黄忏华、欧阳竟无、弘一、印光等，俱在致力于佛学之复兴，此期可为探讨之论题亦颇为广泛。

十八 晚清通俗文学对于新思潮传播的功能

此一论题，需要大气魄的吸收融会，并且要通熟这一时代普遍的流行语词，始足以锻炼出思想精华，把握到通俗文学之影响功能。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繁重工作，需要阅读大量过时的浅俗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确是一个为人所忽略的近代思想史之宝藏，特别是民国初年学者的若干思想与行为，不尽是从严肃的典型论文中获得动力，颇有一些迹象，可以见出小说戏曲与说唱文学的影响力。近代人自白话文学观点，特别是小说史观点做探究者颇有其人，如周树人、钱杏邨均为著名的而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一则是着眼于文学观点。二则是范围狭窄，完全忽略了弹词、小曲等说唱文学的探讨。三则采用资料有限。所以在研究思想史来说，仍然是一个开创工作¹⁵。

十九 联省自治思想及其政治活动

经过数千年大一统之中国民族，而有联省自治思想，显然是对西方政治制度之向慕与模拟。他国之必须采取联邦形式，实不得已而为之政治统一手段。盖如百衲之衣，连缀而成。具有长久统一局面之国家，实不必先拆为破片，再缝合一体，所以此种思想不能有广泛发展，而只昙花一现者在此。然联省自治思想实包罗几个新思潮之基因。其一，则民主政治中地方自治思想抬头，而必须以此为民主政治基础者。其二，模仿发展富强之美国，而19世纪前期，特早有梁廷枏之《合省国说》，以介绍美国。其三，趋合民初各省分立之局面，使之藉自治联合重新趋而为一。然此为所有提供之论题中意义最小者。

二十 当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 观念之反应

每一时代自有其思想特征，不惟思想家要有其敏感，足以反应时代心声，历史家尤须有能力追察，并把握其渊源意旨与发展动向。一时代中所表现之繁复意趣，极为错综差池，有前代末流之残余，亦有外来思潮之激荡，同时并正酝酿新观念之萌芽。今天代表此一时代国人之思想路线，20年来，大致是共趋于“现代化”之体认与探究。亦自不免有涣漫其旨，附庸其义者。数年前（1968年）曾就其时代意义简单介绍。实则可以作为专题，全面考察，以确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潮动向。要知“五四”以来之所谓新思潮者，在二次大战后，多已失其对象与依据，亦俱沦为末流之盘旋。抱此器守此道者，亦何尝有异于民初所见之维新人物之可足悲悯，只是较其幸运，而仍能在同时代中高唱旧日口号而已。然其使命已尽，当有更新潮流以乘其敝。况值今日世界混同局面，彼此意念，呼息可接，国人反应，亦非麻木无灵。于是“现代化”一概念，自然迅速汇为思想主流。各家所论，虽不免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实则提炼精华，基本上仍为一思想问题，一种新认识之实践与推广。此时搜罗众说，当必最完备而少有遗漏之缺憾。

二十一 · 上海地位与近代新思潮之推衍

此一论题与前二十题略有不同，主要在探讨上海地方对近代思想发展的意义，因此是以地方为中心。然在研究方法上仍以概念题旨为主，而以人物为附。同时虽以地方为中心，却又不同于往者之地域学派，若浙东学派、常州学派者。上海地位就思想一

端来说，为中国观察世界万国之前哨，新观念之输入口，同时就中国思潮本身来说，则常构成酝酿传播之动力源泉。复以其租界地之特殊环境，言论之保障，活动之自由，洋化之倾向，均有重大影响。复加自立与依赖，改造与革命，民族与国际等矛盾观念亦并时而存。自 1850 以来，近百年间，中国各时期不同思想之变化与启导，多以上海为中心，向各地传达。研究上海各时期之思想，足以认清中国近代思想之特征，而能解释若干不易统一的复杂现象。

说到近代中国史，以至于一个近代中国发展的过程，无论在各个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复杂，有多方面的适向反应和繁乱的交错牵连。思想史就显著地代表这种特征。因是治理方式，自以处置各个单一概念之发生发展为重要基础。若以人物为中心探讨，只求建立一家思想体系，显然无法明白一概念之纵横相关之各个因素，且必定划断时代横面的相关问题，强化一人物之色调，而导致误解。此即作者采用以概念为中心治近代思想史之理由。以上所列二十一种论题，俱属此类。但只是作者个人多年所关心和偏好的问题，其他问题尚多，或者已有了从事，如近年外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大同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研究是。或者有问题及资料之缺陷，不便提在这里，相信同道学者当亦不厌作更新的发掘。

1970 年 10 月 13 日初稿

1972 年 4 月 17 日修订于南港九愚一智之书斋

注 释

① 关于“全盘西化”论，自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反映了当时若干知识分子的意愿，并引起热烈讨论。但此观念之萌芽，实以两位湖南学

者为鼻祖。一位是樊锥，光绪二十四年他在《湘报》发表《开诚篇》，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政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湘报类纂》甲集，上卷，第37页）另一位是易鼐，光绪二十四年他在《湘报》发表了“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他的议论之一就是：“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使敦槃之会以平等待我，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人万国会，遵万国公法。庶各国知我励精图治，斩然一新，一引我为友邦。是欲人万国会，断自改正朔易服色始。”（《湘报类纂》甲集，卷上，第4页）自此以后，间断续续表达者颇有其人，直至“全盘西化”本辞之提出。数年前又有人抄袭30年代旧稿，高唱“全盘西化”，不久即销声匿迹。似乎并不能反映当前的思想路线。史家即使十分宽留余地，也只能待之以未流而已。

- ② 关于中国政治社会进化论思想，史华滋（Benjamin Schwartz）在其所著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一书中有很多分析，但只是以严复为主体。而单就社会达尔文在中国思想界等影响做论题者，尚无人从事。
- ③ 关于科学主义，在1966年春间曾与同研究所的青年朋友谈及，并建议同事郭正昭先生去研究。这时我只有一些片段的概念，未料郭颖颀先生已著书问世。因是十分钦佩他的卓越，和对于时代思潮敏锐的感悟力。后来在1968年秋和颖颀在夏威夷大学相识，晤谈之下，更使我钦服。颖颀把科学主义分为物质的科学主义（Materialistic Scientism）、经验的科学主义（Empirical Scientism）和心理的科学主义（Psychological Scientism）三个类别。可是他抱歉地告诉我，他并未把心理的科学主义写在书里，因为深怕别人以为他是在嘲弄一些当代学人。我回答说了解，并相信心理的科学主义是影响最广远的一项。我开玩笑地为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就是：某些学者会深具自信地向人保证说：“我是毕生提倡科学的学者，你还用得着怀疑吗？我是多年争取民主的斗士，你还用得着反对吗？”这就是心理的科学主义者。颖颀抚掌称是。
- ④ 关于重商思想，往时国内外学者均无从事探讨者。只有同事吴章铨先生自1964年开始研究，迄尚未定稿。闻其趋向已扩大至近代经济思想史方面。但是重商思想仍然必须做专题研究，虽然资料分散，却必不至落

空。

- ⑤ 参看海防档，丙编，机器局，第13~15页。
- ⑥ 参看蔡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
- ⑦ 《国父全集》第五册，第1~12页。
- ⑧ 《国父年谱》，1969年增订本，第67~68页。

又，往时撰论因引民报发刊词，遂引作者所署孙文于正文，嗣后循一贯体例亦即沿此，偶于注文中引为孙中山先生。盖正文为史家严肃之著作，注文则可表达撰者个人情感，是以于正文中无论往时或当今贤豪师友，俱著正名，不加称谓，此亦现代治学精神。方之往古，于司马迁之著述法例，亦无所违，自亦得谓之复古。惟熟见近50年来著史者，于文字中以称谓字号、室号、籍号、谥号、乃至某官、某爵、某先生、某前辈、某师、某兄等为惯常，甚且标榜得意，炫人博雅，执笔诸公，多号称新派人物，而倡此鄙陋习气，不免是一讽刺。史家撰述，必自慎其严正，于人物以正名为主，或用其习惯称谓如慈禧、恭亲王、余蛮子、大刀王五之类，俱所应当。尤不须加某师某先生字样。自古以来，圣贤豪杰，为人钦服者，何可胜计，今若史书中称诸葛亮先生、王守仁先生，即使初学，亦知其芜赘。然注文、序文、书评、辩难、跋识、通信，在表达作者个人情意，则可自由称呼，中山先生正名孙文，见于其自署各书，若民报发刊词、遗嘱、题字等等均是，甚为普遍。而国人习称为孙中山，西人习称为孙逸仙 (Sun Yat-sen)，均足传之史册。

- ⑨ 务农会创立之初，计划在江浙两省地方购田，采用新法试办农业。并计划仿造西式农具，实验中外植物，发展牧畜，殖养鱼类，选择优良品种，设立农产品加工厂，办农学报，设农学堂，以及开办农业展览会（当时谓之赛会）。实即今日世界食粮农业组织 (F. A. O.) 活动之大部分项目。
- ⑩ 从事农业改良入手，推展中国的现代化，自与工业化不同途径。而此类倡导人，实更深刻了解中国积弱根源，欲救中国而谋富强，则占绝大多数人口之农民首须健全，亦即首先健全农业，使国家基础安定，其他事业自可顺利发展。至少在消极方面可以消除国家发展的负累。且足以防止工业资本急速发展下的贫富悬殊现象。这是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孙中山撰农学会缘起，对此发挥甚明：“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穡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政教，近世科学，靡不博览研

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诚以中华自古养民之政，首重农桑，非如边外以游牧及西欧以商贾强国可比。且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也。故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观察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决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国父年谱》，第68页）

- ⑪ 把20世纪以来六七十年间的学术史，划为中国史中的古学批判时代，首见于拙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叙录》。相信此一说法必为后世学界所承认。
- ⑫ 在本文诸论题中，我个人最偏好，以及十多年所常常反复思考者，就是“近代反儒学思潮”。但自始即盼望较后的新人去从事研究，自1966年春，曾建议刚来研究院的同事郭正昭先生去做，他不敢接受。后来又在1967年春夏之交，对台大历史系同学讲课时开列给他们。但我迄今并未准备自己从事，今后也不做研究之计，这是因为我并非适当人选，就是自知才力识力不足，我所凭恃的能力，是对古今思想史以及近代史熟悉，和对于资料尚有把握，但我缺乏思想家的敏锐感悟力，和贯通中西思想全局的气魄。而近年目疾重创之后，更是不敢承担这样重大的论题。当代学者中有资格做此问题者当然也有，此前已有周策纵先生撰“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一文，实为此中先导。此外如刘殿爵、刘广京、王德昭诸先生，均系通熟古今中外思想哲学，而且治学谨严，胸襟恢廓，可以包罗全局。而刘广京、王德昭两位先生又均为治近代史同道，由他们做，较我可以高明十倍。
- ⑬ 郑文载《中华杂志》第三卷二至六期。
- ⑭ 世俗流风，观念常有所偏，认识多有所蔽，学者可贵处，在能缜密考察，清彻研判，而有真知灼见提供当世。今于五四运动之常说，自以其为理性时代，实大忽略其浪漫一面。亦如世人之视魏晋思想为浪漫时代，实则又颇忽略理性一面。近代新著，涉及魏晋者，莫不叹服其理性之成就，而得以肯定发挥者亦在此面。
- ⑮ 鲁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1927年出版，其中仅用16页（第329~345页）篇幅，探讨晚清小说4种。阿英（钱杏邨）：《晚清小说史》。民国37年出版，共286页，颇为详尽深刻，但自文学观点讨论，并未收入他种通俗文字。

征引书目

甲 专 书

- 安吴四种 包世臣著 36卷 咸丰元年 吴门小倦遊阁刊
- 战国策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战国子家叙论 傅斯年撰 在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1952年12月初版
- 张季子九录 张謇撰 政闻录19卷，实业录8卷，教育录6卷，自治录4卷，慈善录1卷，文录19卷，诗录10卷，专录10卷，外录3卷，附编哀荣录10卷 1931年 上海印
- 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著 232卷 1937年5月 北平楚学精庐板
- 荻楚斋随笔 刘声木著（刘体信）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各10卷，书目1卷，目录1卷，共52卷 直介堂丛刻本 1929年印
- 秀华堂文钞 金应麟著 咸丰元年刊 敬叔校刻
- 郟园书札 叶德辉著 一册 郟园全书第六十册 1935年印
- 甲骨学商史论丛 初编：胡厚宣著 成都，1944年初版 台北，1972年 大通书局影印
- 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著 二卷 光绪二十三年 聚丰坊刊
- 知过轩谈屑 文廷式著 手稿本原件
- 治平十议 计收书10种：庸书、校邠庐抗议、适可斋记言、记行、筹洋刍议、经世博议、救时要议、时务论、钞币论、盐法

- 议略 自强学斋印 光绪二十三年冬印
- 金壶七墨 黄钧宰著 1929 上海扫叶山房石印
-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第一辑：胡秋原编 共二册 1972年11月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 警世钟 陈天华著 载晚清革命文学，第173~212页
- 经世博议 陈虬著 光绪十八年 自强学斋治平十议本
- 清朝续文献通考 刘锦藻纂 400卷 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 清季兵工业的兴起 王尔敏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3年7月版
- 清季的立宪团体 张玉法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刊印，1971，554页
-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编 光绪朝218卷，宣统朝24卷 1934年印 北京
- 清议报 冯镜如、梁启超编 100册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创刊，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百册，嗣停 在日本横滨发行
- 清代外交史料 10卷 嘉庆朝6卷，道光朝4卷 故宫博物院文献丛编特刊 1968 台北 成文出版社影印
- 觉迷要录 叶德辉辑 4卷 光绪二十七年编成
- 觉颠冥斋内言 唐才常著 4卷 光绪二十四年刊于长沙
- 救时要义 陈虬著 光绪十八年印（序文）
- 拙遵园丛稿 黎庶昌著 上海醉六堂印 光绪十九年印
- 周易 孔颖达正义 上海中华书局聚珍本，四部备要 1965年11月 台北中华书局影印
- 周礼正义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周髀算经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周武壮公遗书 周盛传著 卷首1卷，正集9卷，外集3卷，别

- 集 1 卷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金陵刊本
- 畴人传 阮元撰 4 册 (46 卷)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 1955 年 5 月第二版
- 筹办夷务始末 文庆等修 道光朝 80 卷 咸丰六年成书
- 筹办夷务始末 贾桢等修 咸丰朝 80 卷 同治六年成书
- 筹办夷务始末 宝璽等修 同治朝 100 卷 光绪六年成书
- 竹筒兵法 (即孙臆兵法): 孙臆著 台北河洛出版社印 1975 年 12 月初版
- 竹书纪年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本
- 诸子学纂要 蒋伯潜撰 台北正中书局排印 1953 年印
- 诸子概论 陈柱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2 年印
- 诸子百家考 陈清泉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印
- 诸子大纲 张寿鏞撰 1958 年影印 台北
- 诸子通谊 陈钟凡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第 4 版
- 诸子通考 孙德谦撰 江苏存古学堂排印本 宣统二年印
- 楚辞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本
- 初使泰西记 宜厘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出使英法义比日记 薛福成撰 6 卷 光绪二十三年 上海醉六堂石印
- 庄子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本
- 春秋谷梁传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本
- 春秋公羊传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本
- 春秋左氏传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本
- 中西纪事 夏燮著 (江上蹇叟) 24 卷 同治四年六月刊
- 中华通史 章铤著 5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印
- 中国哲学史 钟泰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印
- 中国哲学史 劳思光著 香港崇基学院 1969 年印
- 中国哲学史补 冯友兰撰 台北影印本

-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初编：张静庐辑 上海群联出版社印 1954
年第2版
- 中国近代货币史 魏建猷著 上海群联出版社印 1955年6月
初版
-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周树人）著 上海北新书局 1927年8
月第4版
- 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杨向奎撰 1962年印
- 中国商战失败史 黄炎培、庞淞合编 1917年5月初版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此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原书
所载之英译：*History of China's Failure in Commerce.*
- 中国史 陈恭禄撰 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年初版 1941年3
月再版
- 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等著 1957年印
- 中国通史要略 缪凤林著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57年印
- 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著 3册 台北正中书局印 1948年初版
1952年10月台一版
- 劝学篇 张之洞著 2卷 光绪二十四年 两湖书院印
- 尔雅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重订 法国志略：王韬著 24卷 光绪十六年庚寅，仲春 上
海淞隐庐刊
- 抚夷纪略 黄恩彤著 传抄本（同治四年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藏
- 抚夷日记 张喜著 北平隆福寺街文殿阁书庄 1936年7月重
印本
- 海防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9册 1957年印
- 海防余论 颜斯综著 载海国图志第五十二卷
- 海国图志 魏源著 100卷 光绪二十四年夏 文贤阁石印本
- 海录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受 3卷 中华书局铅印本 1955

年9月上海初版

海岛逸志 王大海著 道光二十四年 京都漱六轩刻海外番夷录本
海外番夷录 王蕴香辑 道光甲辰二十四年刻本 京都漱六轩藏
版 有：道光壬寅秋王鑾序 共2册 辑海录等书，并有摘抄
汉书 班固撰 100卷 台北明伦出版社影印 1972年印

韩非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著 1938年长沙初版 1973年
台北国史研究室影印

亢仓子 说郭本第七十一卷

蒿盦随笔 冯煦著 4卷 1926年刊

合肥李氏三世遗集 24卷 李光禄公遗集：李文安著 8卷 李
文忠公遗集：李鸿章著 8卷 李袭侯遗集：李经述著 8卷
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 刻本

鹖冠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孝经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王锡祺编 正编十二帙，60卷，辑目1175
种 自光绪三年起编，至光绪十七年成书 光绪十七年跋文
上海著易堂印行 补编十二帙，58种 光绪二十年序 再补
编十二帙，180种 光绪二十三年序 均上海著易堂印行

湘学新报 唐才常等编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创刊，光绪
二十四年八月停刊 1966年10月 台北华文书局影印

湘绮楼尺牘 王闿运著 1册 1935年 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排
印本

湘绮楼文集 王闿运著 台北新兴书局 1956年3月印

湘报类纂 6卷(8册) 光绪二十八年 上海中华编译印书馆
印

小航文存 王照著 1930年仲夏开雕 4卷

新政真诠 何启、胡礼垣合著 初编至六编 格致新报馆印 光

- 绪二十七年春刊
 辛亥革命 中国史学会 1957年7月印
 续富国策 陈炽著 四卷 光绪二十三年仲夏 慎记书庄石印
 虚受堂书札 王先谦著 2卷 1932年刊
 荀子读本 王忠林注 台北三民书局 1972年7月初版
 花随人圣龠摭忆 黄濬撰 一册 1965年2月 香港龙门书店印
 皇朝经世文新编 麦仲华辑 21卷 光绪二十三年编成 光绪二十四年刊 上海大同译书局印
 皇朝经世文续编 葛士澂辑 120卷 光绪十四年仲夏 图书集成局印
 皇朝蓄艾文编 于宝轩辑 80卷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 上海官书局印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 王廷熙、王树敏编 上海久敬斋石印 光绪二十八年印
 黄公度先生年谱 钱仲联著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3年影印
 黄帝四经 见“帛书老子”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郑子瑜、实藤惠秀编 1968年 东京早稻田大学印
 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汪文泰著 道光二十四年 京都漱六轩刻海外番夷录本
 逸周书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仪礼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夷氛纪闻 梁廷枏著 1937年4月 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印
 仪卫轩文集 方东树著 12卷 又外集1卷、附录1卷 同治七年闰四月刊于安庆
 易言（盛世危言续编）：郑观应著 光绪二十一年冬 时务丛钞

本 上海赐书堂发行

伊尹 见“帛书老子”

日本国志 黄遵宪著 40卷 光绪十六年 羊城富文斋刊

开县李尚书政书 李宗羲著 首1卷、政书8卷 光绪十一年
(1885) 武昌刊印

康轺纪行 姚莹著 12卷 中复堂全集刊本 同治六年八月刊

格致书院课艺 王韬辑 13册 光绪十二年至十九年 弢园校
刊

革命军 邹容著 1954年3月 中央文物供应社印

管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关尹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 倚剑生编 上海广智报局 光绪二
十四年印

光绪通商综核表 钱恂撰 1卷 (光绪十四年完成并印初稿，
见自跋) 光绪二十三年仲夏 慎记书庄石印

鬼谷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公孙龙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国父全集 孙文著 6册 1957年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印

国父年谱 2册 1965年11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
委员会编印

国故论衡 章太炎撰 3卷 杭州浙江图书馆刊

郭侍郎奏疏 郭嵩焘著 12卷 光绪十八年孟秋刊

郭嵩焘先生年谱 郭廷以等编 2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
1971年12月

国语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年二版

礼记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 年子敏编 1960年 中华书局印

- 李文忠公奏稿 李鸿章著 80卷 光绪三十一年 金陵刻本
192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 李文忠公译署函稿 李鸿章著 20卷 光绪三十一年 金陵刻本
192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鸿章著 20卷 光绪三十一年 金陵刊本
192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张朋园著 1964年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
-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丁文江著 1958年 台北世界书局印
- 两壘轩尺牘 吴云著 12卷 光绪十年刻本
- 列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濂亭文集 张裕钊著 8卷 光绪八年七月 苏州查氏木渐斋刊
- 论再生缘 陈寅恪著 台北 油印传写本
- 论语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吕氏春秋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 贺凌虚著 1970年5月 台北商务印书馆印
- 毛诗正义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蒙学报 第一册 近代史资料 1963年第二期
- 孟德斯鸠法意 (Montesquieu: Spirit of Laws): 严复译 193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
- 孟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民报 月刊 第一号至二十六号 附“天讨”专号 自1905年
11月创刊(光绪三十一年)至1908年10月10日第二十四号
停刊 1910年2月续刊第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又停刊 发
行地点在日本东京
-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著 (见梨洲遗著汇刊本 1969年10月

台北隆言出版社印)

墨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穆天子传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康有为著 四卷 光绪二十三年仲夏 慎记
书庄石印

能静居日记 赵烈文著 全6册 中央图书馆原稿本 台湾学生
书局影印 1964年12月版

帛书老子（内附伊尹九主及黄帝四经） 台北河洛出版社 1975
年12月初版

边事续钞 朱克敬辑 8卷 光绪六年刊于长沙

不忍杂志汇编 康有为撰 初辑、二辑 1914年仲春 上海书
局出版

山海经笺疏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商君书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 上海通志社编 1939年出版 上海中华书
局印

尚书释义 屈万里著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56年初版
1966年第4版

社会通论 (Edward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 严复译
193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

慎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盛世危言正续编 郑观应著 9卷 光绪十九年刊（序）

盛世危言后编 郑观应著 15卷 宣统元年（序）排印本
1969年 大通书局影印

史记会注考证 司马迁著 泷川资言考证 1972年3月 宏业
书局影印

世界史纲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y H. G. Wells) 向达、
梁思诚、黄静渊、陈建民、陈训恕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

- 年6月初版
- 适可斋记言 马建忠著 4卷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序 木刻本
- 实理公法全书 康有为著 未刊稿本
- 史料旬刊 40册 第1期至40期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 1930年6月创刊
- 尸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时务论 宋育仁著 1卷 附于采风记 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又：光绪二十三年 文瑞楼石印本
- 时务报 汪康年、梁启超编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创刊，至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止
- 时务报论说汇录 汪康年著 1938年10月 杭州汪氏铸版
- 四国新档 4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66年2月印
- 司马法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著 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
- 孙子：孙武著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松龛先生全集 徐继畲著 奏疏2卷，文集4卷，诗集2卷，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1卷，徐氏本支叙传1卷。共5种。
1915年排印线装本
- 宋史 脱脱主编 496卷 上海中华书局聚珍本，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影印 1965年11月版
- 宋元学案 全祖望修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谭嗣同全集 1册 北京三联书店 1954年3月初版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著 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
- 陶庐文集 王树枏著 陶庐丛刻本 1915年11月刊
- 弢园尺牍 王韬撰 6卷 光绪二年刊
- 弢园文录外编 王韬著 12卷（6册） 光绪二十三年 上海弢园老民刊

- 邓析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天演论 严复译 严译名著丛刊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年2月版
-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吕实强著 1972年12月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
- 丁文诚公遗集 丁宝楨著 卷首1卷，奏稿26卷 光绪十九年刊于北京
- 采风记 宋育仁著 5卷 附时务论 光绪二十年前撰 光绪二十一年印
- 曾纪泽的外交 李恩涵著 1966年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
- 曾惠敏公使西日记 曾纪泽著 2卷 1932年印 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 曾惠敏公手写日记 曾纪泽撰 8册 1965年4月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
- 曾惠敏公文集 曾纪泽著 5卷 1932年印 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 曾子 说郛本第四十六卷
- 曾文正公书札 曾国藩撰 33卷 光绪二年 传忠书局刻本
- 左文襄公年谱 罗正钧纂 10卷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 湘阴左氏校刊
- 左文襄公书牋 左宗棠著 26卷 左文襄公全集本 光绪十八年刊
- 左文襄公在西北 秦翰才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年再版
- 屠光禄奏疏 屠仁守著 4卷 1922年 潜楼校刻
- 东溪文后集 姚莹著 14卷 中复堂全集本 同治六年八月刊
- 桐城吴先生尺牍 吴汝纶著 7卷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刊
- 桐乡劳先生遗稿 劳乃宣著 8卷 1927年冬日 桐乡卢氏校刊
- 自强学斋治平十议 自强学斋主人编 光绪二十三年刊
- 子华子 说郛本第四十六卷

- 子思子 黄以周辑解 南菁书院刊本 光绪二十二年刊
- 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王尔敏著 1969年9月 学生书局出版
- 晚清小说史 阿英(钱杏邨)编 1937年5月初版
- 晚清革命文学 张玉法编 台北环宇出版社 1972年2月初版
- 晚清文学丛钞 阿英编 小说4卷 北京中华书局印 1961年四月初版
- 晚清文学丛钞 阿英编 说唱文学2卷 北京中华书局
-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贺昌群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年4月印
- 尉繚子 尉繚撰 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 1937年12月印
- 危言 汤震著 4卷 光绪十六年刊
- 文选 萧统编 1955年 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
- 文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戊戌奏稿 康有为著 宣统三年排印本
- 戊戌履霜录 胡思敬著 4卷 1913年仲夏刊 南昌退庐版
- 戊戌变法 4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印 1953年9月初版
-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1958年 中华书局印
- 吴意斋尺牘 吴大澂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印
- 吴子 吴起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12月印
- 毋自欺室文集 王炳燮著 10卷 光绪十一年夏五月 天津津河广仁堂刊
- 鸦片战争文学集 阿英编 上下2册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1957年2月初版
- 养知书屋文集 郭嵩焘著 28卷 光绪十八年孟秋刊
- 洋务运动 中国史学会编 8册 上海 1961年4月初版
- 严几道文钞 严复著 五卷另诗钞暨附录1卷 1922年 上海国华书局印
- 燕丹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晏子春秋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饮冰室文集 梁启超著 16册 饮冰室合集本 1936年 中华书局印
- 尹文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 英吉利记 萧令裕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 光绪二十三年印
- 英吉利国夷情记略 叶钟进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光绪二十三年刊（序）
- 瀛海卮言 王之春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瀛环志略 徐继畲著 10卷 道光三十年刊 福建巡抚署藏版
- 柚村文 汤彝著 6卷 又：柚村诗2卷 道光二十七年 长沙槃澗园刊
- 庸盦全集 薛福成著 10种 44册 庸盦文编4卷，续编2卷，庸盦文外编4卷，庸盦海外文编4卷，筹洋刍议1卷，浙东筹防录4卷，出使奏疏2卷，出使公牒10卷，出使日记6卷，出使日记续刻10卷
- 庸书 陈炽著 内篇4卷 外篇4卷 光绪二十三年仲夏 慎记书庄印
- 愚斋存稿 盛宣怀著 100卷 卷首、卷末各1卷 1931年印 思补楼藏版
- 粤东市舶论 萧令裕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等九帙 光绪二十三年刊（序）
- 原富 亚丹斯密原著 严复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光绪二十七年译完（二十六年完成，二十七年序）
- 沅湘通艺录 江标辑 10卷 内四书文2卷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 长沙使院刊
- 原儒 熊十力著 台北明伦出版社影印 1971年元月初版

乙 论 文

- 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 陈槃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七本
- 郑观应 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 刘广京撰 清华学报, 八卷一、二期合刊 1970年8月 台北刊
- 耆英外交 王尔敏撰 大陆杂志三十卷九至十期 1965年 台北刊
- 清季的广学会 王树槐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 1973年 台北
- 清初历算家梅文鼎 王萍撰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期 1971年6月
- 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 全汉升著 岭南学报, 四卷二期 1935年6月 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刊
- 周官著作时代考 钱穆撰 燕京学报第十一期
- 周礼成书年代考 史景成撰 大陆杂志三十二卷五至七期
- 中国近代学会约论 王尔敏著 食货月刊一卷六期 1971年9月 台北刊
- 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 田倩君著 大陆杂志三十一卷一期 台北
- 冯桂芬的政治思想 吕实强撰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四卷二期 1971年2月刊
-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 刘师培著 国粹学报第三十三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刊
- 儒的来源推测 戴君仁撰 大陆杂志三十七卷十期 1968年11月 台北刊
- 古代中国的外交 雷海宗著 社会科学三卷一期 1941年4月

-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邓宗义合撰） 六十年来的中国
近代史研究（上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年 45页
- 从政治局限看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第二次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1989年 24页
- The "Turn of Fortune" (Yun-hui): Inherited Concept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osmology, Ontology and Hu-
man Efficacy*, Univ.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993, 11
pages.
- 郑观应传 国史拟传 第四辑 1993年 16页
- 郑复光与泰西科技知识 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3年 32页
- 孙中山先生的谋国远识 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1994年 16页
- 孙中山先生的门户开放主义与全面利用外资政策 国史馆馆刊
复刊第十七期 10页
- 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
十四期（上） 1995年 40页
- 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实用价值 近代中国 第一一八期 1997年
10页
- 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
十七期
- 近代中国之开明专制论与强人领袖之想望 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
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 1998年 14页
- 蒋中正对于孙文思想之继承及其政党首领资格之历练 中华军史
会会刊 第三期 1997年 18页

清华大学出版

- 郭嵩焘之洋务思想 陆宝千撰，广文月刊一卷三期 1968年12月
-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冯友兰撰 燕京学报第二期 1927年刊
- 陆懋德著“周秦哲学史” 柳诒徵撰 学衡，第二十九期 1924年5月刊
- 漫谈知识之士 谢文孙著 大学杂志第一卷第四至六期 1968年 台北刊
- 评胡适说儒 李源澄撰 国风半月刊，六卷三、四期合刊 1935年刊
- 驳胡适之说儒 钱穆撰 东方文化，一卷一期 香港 1954年刊
- 驳说儒（原题：质问胡适） 郭沫若撰 收入“青铜时代” 科学出版社印 1962年第5版
-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 石锦撰 台北 故宫文献，二卷一期 1970年12月
- 释儒 饶宗颐撰 东方文化，一卷一期 香港 1954年印
- 说儒 胡适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1934年刊
- 晚清的重商主义运动 李陈顺妍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三期 台北 1972年
- 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 郭正昭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台北 1971年6月印
- 文祥对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 王家俭撰 历史学报，第一期 1973年 台北师大
- 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 陈鏊撰 燕京学报，二十五期

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探讨 吴章铨撰
思与言, 七卷三期 1969年 台北

原儒墨 冯友兰撰 清华学报, 十卷二期 1935年刊

原儒墨补 冯友兰撰 清华学报, 十卷四期 1935年刊

丙 外文论著

Barnett, Suzanne Wilson, "Wei Yüan and Westerners: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 Ching-shih Wen-t'i", II. 4St. Louis, 1970.

Cohen, Paul A., "Wang Tá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VI, No.4, 1967, August.

Hart, Robe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01.

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ills, David 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17 Vols., 台北虹桥书店 1968年刊。

Marquis Tseng, (Tseng Chi-tse),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18, pp. 146-153, 1887.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本书作者所著其他有关 思想史论文目录

- 中国近代学会约论 食货月刊 卷一期六 1971年 9页
- 王韬早年从教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游 东方文化 香港大学
卷十三 期二 1975年 14页
- 王韬课士及其新思潮之启发 东方文化 香港大学 卷十四 期
二 1976年 22页
- 中国人与礼拜日制 宇宙光 卷三 期十二 1976年 7页
- 戊戌湖南客籍人士对于地方思潮的启发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期五 1976年 44页
- 德智体群四育的缘起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卷十 期二 1977
年 7页
- 中西学源流说所反映之文化心理趋向 中研院五十周年纪念论文
集 1978年 16页
- 薛福成的生平与思想 史潮 期五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
1979年 19页
- 儒家传统与近代中西思潮之会通 新亚学术集刊 期二 香港中
文大学新亚书院 1979年 16页
- 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期九 1980
年 24页
- 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
报 卷十一 1980年 48页

- 近代湖南女权思潮先驱 中国妇女史论文集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14页
- 中国近代之工商致富与商贸体制之西化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中研院 1981年 48页
- 中华民国开国初期之实业建国思想 中华民国建国史国际会议论
文集 册二 1981年 31页
-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 期十一 1982年 33页
- 官督商办观念之形成及其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
报 期十三 1982年 26页
- 中国近代人权醒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期十四
1983年 16页
- 姚莹之经世思想及其对于域外地志之探究 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
讨会论文集 1984年 32页
- 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 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
讨会论文集 中研院 1984年 68页
- 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期十三 1984
年 12页
- 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期
十五 1984年 26页
- 张謇之实业经济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期十
六 1985年 26页
-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之初步反应及共产制度之适然想
象 东亚研究 辑七 韩国西江大学 1986年 25页
- 蒋中正在抗战后期的实业建国理想 蒋中正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
讨会论文集 1986年 25页
- 蒋中正五大建设之建国宗旨 中国六十年来之忧患与建设国际学
术会议论文集 香港 珠海书院 1988年 7页